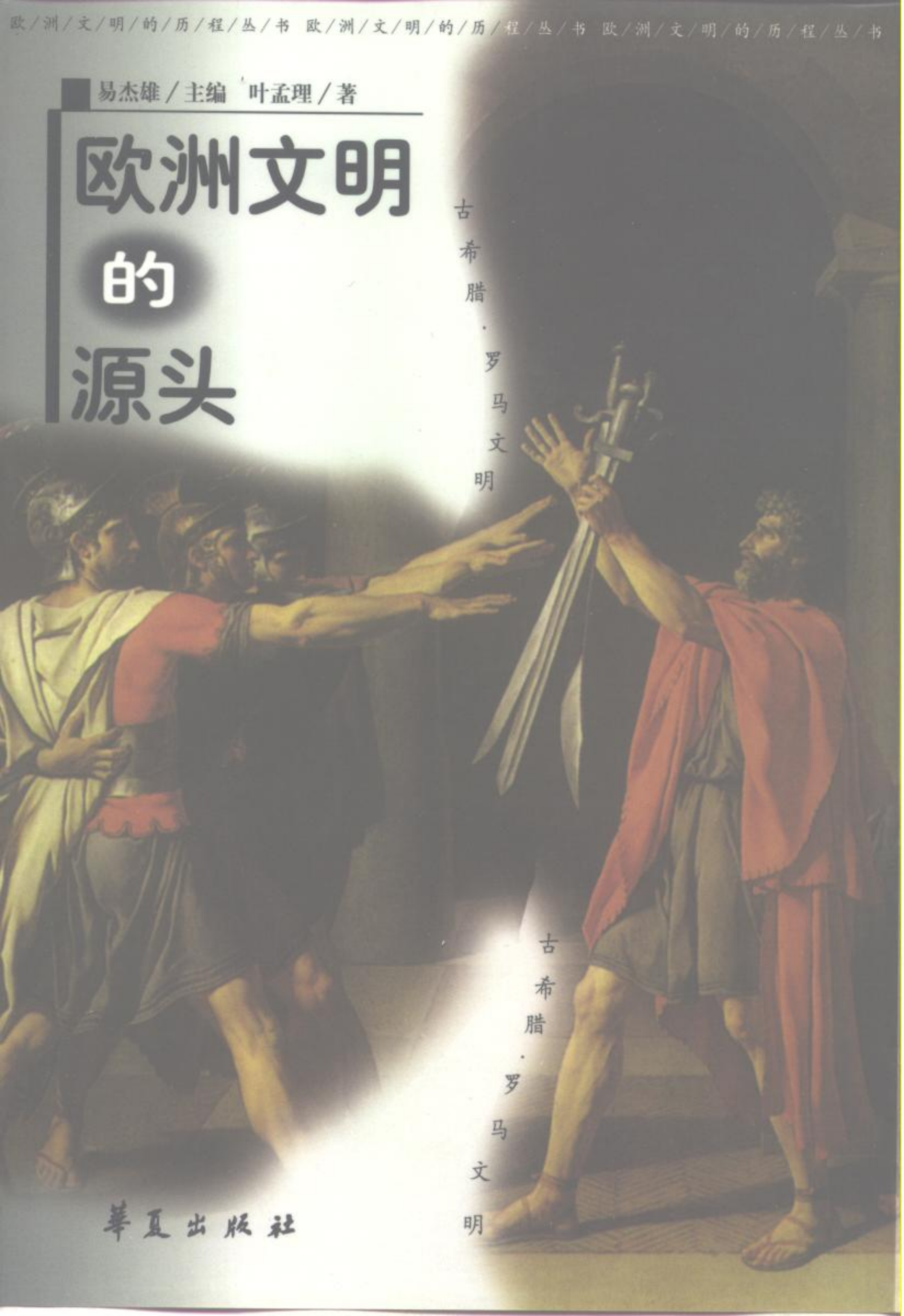

欧/洲/文/明/的/历/程/丛/书 欧/洲/文/明/的/历/程/丛/书 欧/洲/文/明/的/历/程/丛/书
易杰雄/主编 叶孟理/著
欧洲文明的源头
古希腊·罗马文明
古希腊·罗马文明
華夏出版社

《欧洲文明的历程》丛书 / 易杰雄 主编 / 叶孟理 著

欧洲文明的源头

——古希腊·罗马文明

华夏出版社·二〇〇〇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洲文明的源头/叶孟理著．-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
(欧洲文明的历程/易杰雄主编)
ISBN 7-5080-1963-6

Ⅰ.欧…　Ⅱ.叶…　Ⅲ.①古希腊-历史 ②古罗马-历史
Ⅳ.K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62726号

华 夏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世 界 知 识 印 刷 厂 印 刷
850×1168　1/32开本　14.375印张　293千字　插页2
2000年1月北京第1版　　200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定价:19.80元

代总序

博采众长，加速文化现代化



几年前，在我国的报刊上，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口号："批判西方价值观"。提出这种口号的人尽管动机是好的：担心西方一些腐朽的东西传进来，毒害我们的人民，引起我们的道德滑坡；害怕西方一些有害思潮影响老百姓，特别是广大青年的观念，导致人们的思想混乱，信仰动摇。提出和拥护这一口号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很爱国的。但是，由于"批判西方价值观"这一口号对"西方"一词缺乏严格界定，本身毕竟是一个未加分析批判过的口号，因而是一个非科学的命题，特别是如果真正按这个口号做起来，恐怕事情只能与口号提出和拥护者的愿望相反。因此，很有对它进行重新研究的必要。

(一)

讲"西方价值观"，这里"西方"一词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的呢？是就地域、方位讲吗？那么与之相对应自然就是"东方价值观"了。日本、韩国与我国同为东方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一样吗？不一样；台湾、香港、澳门和大陆同属中国领土，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一样吗？不一样。要是一样，哪里还用得着什么"一国两制"？就是中国大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所宣传、提倡的价值观，与国家所反对的民主派人士、精英人物所主张的价值观一样吗？不一样；我们今天的价值观，与几千年前我们老祖宗的价值观一样吗？也不一样。既然如此，我们怎么能由于地域相同，就认

定有共同的价值观呢？鲁迅先生在他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时，就懂得贾府里的焦大不会爱林妹妹。如果在地域、方位上使用“西方价值观”的提法，岂不表明我们连价值观是具有强烈的阶级性的这一起码常识都忘了，连马克思主义重要的阶级分析方法都抛弃了?!

有人可能要讲，价值观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然文化明显地存在着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区别，由东、西方两种文化派生出来的两种价值观怎么可能没有区别呢？如，一般认为：东方文化重道德，西方文化重科学；东方文化重感情，西方文化重理性；东方文化是人文的，西方文化是宗教的；东方文化重整体，西方文化重个性；东方文化重经世致用，西方文化重系统研究；东方文化重精神，西方文化重物质，等等。不错，如从文化渊源的角度来使用西方价值观，无疑是可以的。但从这个意义上使用“西方价值观”，难道西方价值观中重科学精神、重理性、重系统研究、重物质性的东西等等，也都是统统需要批判的吗？反过来，难道东方文化强调尊卑等级、重农抑商等也都是值得肯定的吗？结论只能是：如在文化渊源的意义上使用，笼统地提“批判西方价值观”是不对的。要么，就不能在这个意义上使用。

“批判西方价值观”口号的提出者可能要说，他们是在承认价值观是一历史范畴，是随时代、随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的前提下，用它来专指发达国家的价值观的。这样讲显然也有问题：既然承认人家是发达国家，他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比我们高，而且事实上他们还处于快速发展中，就不能不承认他们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至今基本上还是相适应的；就得承认他们的经济基础水平总体上还比我们高。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就不得不承认，其

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观念形态的重要要素的价值观，一般说来，从总体上讲也要比我们先进。这样，“西方价值观”主要就不应该遭受批判，而应该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了。

“批判西方价值观”这一口号，从策略上讲也是很不明智的。不错，西方一些领导人也常常使用“西方价值观”这一提法。其实他们所指的只是他们少数领导人、西方国家统治集团的价值观。如前所述，整个西方世界没有、也不可能有所有的人的价值观都一致。他们所以要这么讲，无非是为了标榜他们的政府是代表全民的。其实，我们的价值观主要是与西方领导人的价值观有区别，与西方各国广大劳动群众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批判西方价值观”的提法，对西方各国领导人、统治集团的价值观与劳动大众的价值观完全不加区分，把整个东方与西方对立起来，这当然是错误的、有害的。

（二）

“批判西方价值观”的提法，不仅对在何种意义上使用“西方”一词未作界定，容易导致思想混乱，而且对“西方价值观”不加分析地都要加以批判，在理论上也包含着许多的错误。

首先，任何一种文化及其所包含的价值观，无论是从文化渊源上讲，还是从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所对应的角度讲，作为某一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产物与精神条件，必然是既有好的一面，又不可避免地也会有一些消极的、乃至需要抛弃的糟粕。“批判西方价值观”提法的错误就在于，不加分

析地把自己价值观好的一面和别的国家与地区价值观有问题的一面都绝对化了，特别是没有从总体上加以比较，从而陷入了形而上学。事实上，一般说来，几乎可以断言，当一个地区、国家和社会还在健康、协调、快速发展时，它所对应的文化及其价值观就还是有生命力的，好的，积极的方面一定是占主导地位的；当一个社会和国家停滞不前，在剧烈的国际竞争中越来越落后，说明与它相对应的文化及其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一定有问题，或过时了，至少是相当一部分已经过时，至少表明，从总体上看它不如那些发展快的地区和国家的文化。

其次，有些价值观首先由东方提出，如“天人合一”，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有些价值观首先由西方提出和加以强调，如科学、民主、人权、法治精神，等等。这些不等于说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是东方价值观，重视科学、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精神就是西方价值观。其实，它们都是全人类所向往、追求的共同的价值观。事实上，西方各国由于接受工业化过程不注意环境、资源等问题的教训，现在也很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问题，注意防止和治理污染，合理使用资源，以保证可持续发展；东方人也很向往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和法治，也很尊重科学与科学精神。

价值观，作为人们对事物作评价和选取的一种思想倾向和标准，从来都是普遍与个别的统一。它必然既有全人类共同的地方，如凡正常人都要追求更好、更幸福的生活，都崇尚真、善、美；又有各个地区、各个国家不同的特点和表现形式，如东方人喜欢含蓄、稳重，西方人喜欢直率、豪爽。不管表现形式如何，共同的东西都是由广大老百姓提出来的，特有的东西往往是这些地区和国家内一些有特殊利益而

又对社会有控制权的统治阶级提出来的。他们以国情特殊把种种特有的价值取向强加到广大老百姓头上，目的是维护自己的特权。如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无一例外总要以这样那样的借口剥夺劳动人民的自由和权利。“批判西方价值观”的提法的理论错误就在于割裂了个别与一般的辩证关系，否认有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这一事实，或把自己的文化、自己的价值观看作是全人类的。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就曾有过明显的表现：如无限夸大、抬高本民族文化，竭力贬低乃至诋毁别的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盲目地宣扬什么孔孟之道乃惟一科学真理，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人，只要他是人，迟早必将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同化，不可能长久地游离于尧舜孔孟之道之外。邓嘉绩在《复扬辑庵书》中就是这样讲的：“中国之道如洪钟铸鼓，万物都归一冶，若五朝，若元魏，若辽金，若金元，今皆与吾不可辩也，他时洋人终必如此”（《扁善斋文存》卷上）。

第三，“批判西方价值观”的提出者还忘掉了这样的基本史实：今天的中国文化及其所包含的价值观与公元前好多世纪前就逐渐形成的华夏文明已经有了天壤之别。它不仅是历史上我国南北各民族文化大融合的结果，更是我们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以它为指导思想的结果。其中也包括历史上吸收印度文化中优秀的东西和近代以来学习、吸收西方文化中如科学思想等许多好东西的结果。把别人的东西看作都是应该批判和抵制的，把自己的看作都是最完美的，这样就势必使自己缺乏忧患意识，盲目陶醉于自己已有的东西而不思进取，从而不能虚心学习乃至排拒一切国外好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同时丧失自我批判和创新能力。结果不仅阻碍文化自身的更新、导致其僵化、枯竭，还反过来成为社会进

步的绊脚石，导致误国害民。而且这种负作用还会与社会进步成正比。

最后，从文化发展史来看，南北文化的融合始有中华文化，中国文化与印度等东方各国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始有东方文化。而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交通、通讯条件的极大改善，东、西方文化日益频繁、多方面的撞击和融合，一种新的世界性文化正在迅速形成和发展。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以血缘为基础、家族为核心的文化，它具有人文主义和整体主义的特点。所以在管理上表现出注重人际关系、具有家长制的特点。这种管理既有缺乏民主与科学精神，鲜有明确、系统的规章制度和严格、明晰的计划、规划，主要领导人的情绪和人际关系对管理本身影响大的弊端，又有相对比较关心劳动者、在一定程度上注意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利用人际关系挖掘潜能等长处。

而西方人受科学主义影响很深，甚至相信可以用数学结构来描述世界，相信精确的数量关系的描述是正确地进行决策和达到最大效率的基础。这种思想表现在管理上就是，他们把人员作细致的专业分工，把工厂的每项工作分解为若干部分，测定各部分所需时间，并设计出最佳方案，经理部门提前按计划确定每个人要完成的任务，以及人员之间如何很好地相互配合，以保证产品精密、准确，使零件达到标准化和具有可置换性，以及生产的严格同时化和连续高效进行。从而使组织高效率，决策科学化，并实现了专家统治。这就是泰罗的科学管理原则。这种管理的缺点是，把人变成了不过是按机器运转节奏活动的、可以随时替换的零件，人与人之间、人与机器之间只服从某种固定的外在关系，劳动者被

看作只是能活动的物，只能靠高工资把工人留在高度紧张而又枯燥乏味的简单重复的机械运动中。

日本丰田英二吸取西方科层制组织形式和泰罗制管理经验，同时根据东方文化特点，鼓励职工加强联系，努力培养职工的集体荣誉感，强调人与人合作，人与机器优化组合，强调利润共享，以此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和责任心，提高效益，形成了一套“以人为中心”的日本现代管理方式——即丰田英二的精益方式。这种坚持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相统一的管理方式就是典型的融合东、西方文化的产物——一种新的世界性文化的表现。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虚心学习西方，我认为今天已很难说日本文化仍是纯粹的东方文化。美国作为移民国家，几乎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去的优秀人材都有，长期以来，各种文化撞击、融合，也已很难说是纯正的西方文化。

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光纤通讯、无线电技术、英特网的迅速普及，正越来越使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世界各国的交流和互相依赖正日益加强，各种文化的撞击和交融也空前加快，全人类的价值观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认同和尊重。少数国家少数统治集团为维护自己特权而提出的特殊理由越来越没有市场，以致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地步：哪一个国家的统治集团还想为自己的利益而为所欲为而要国际社会坐视不管已越来越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谁要是还死抱着自己过时的、甚至是错误的东西不放，而拒绝接受人家好的、特别是整个世界公认的通行的东西，以国情特殊为借口而游离于整个人类文明大道之外，连与其他国家沟通都逐渐成为问题，就更遑论紧跟时代前进了。

“批判西方价值观”的提法恰恰是既忘了文化自身发展的历史，又未能看清今天时代发展的基本趋势和特征。

（三）

“批判西方价值观”口号的提出，是长期流传下来的根深蒂固的“文化本位主义”的表现。

早于公元前好多世纪，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就逐步形成了华夏民族有自己特色的华夏文明。当时由于这种文明发源早，总体上的确优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文明。所以，华夏民族对那些居住在黄河流域以外地区的民族一律斥之为“蛮夷”。所谓的“九夷、八狄、七戎、六蛮”就是华夏民族对周边少数民族的鄙视的称谓。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民族和民族文化本位主义。这两种本位主义贯穿于整个中国的历史。

直到明清之交，中国人还把远渡重洋而来的欧洲人士一律称之为“夷”。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仍把外交、外贸等涉外事务也一律称之为“夷务”。反映出来的仍然是对别国和外来文化的轻蔑和排斥——一种“四夷宾服”、“万方来朝”的自尊自大的“文化本位主义”。

鸦片战争，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一批有识之士对西方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改变了对西方的偏见，自觉地抛弃了对别的国家和民族不尊重的习惯称呼，开始用“洋”字代替“夷”字，用“洋务”代替“夷务”。1856年6月26日在被迫与英国政府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第五十一款上也明文规定：“嗣后各式公文……自不得提书‘夷字’。”从此，“夷务”全部为“洋务”所代替，人们也广泛

用“西学”称呼西方文化。尽管一些顽固的文化本位主义者仍坚持西方不可能有什么学问：“西方所资以富强者，法也，术也，艺也，不足以言学也。”（徐致祥《嘉定先生奏议》卷下）对他们来说，承认西方有自己的术也是一种了不起的进步。因为传统的看法是大中华以外的夷、狄、蛮、戎人，是根本不值得一提的。

用“洋务”代替“夷务”，用“西学”称呼西方文化，是中国对中外文化相互关系认识上的一个巨大进步。尽管“西”相对于“中”，相对于一贯以“中心”、“中央”、“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仍有一定的轻蔑之意。表明这时文化本位主义仍占主导地位。但不管是自觉的，还是被迫的，总是承认了西方文化也是一种学问。这是“天朝上国”观念的开始破灭。其中既有被迫改变的恼恨，又有向前艰难挪步的足迹。

后来，张之洞等人又开始用“新学”一词来代替“西学”，尽管“新学”一词在他本人那里与仍不及天朝文化的“西学”并没有多少区别，但到了通常按词义本身去理解的广大群众那里，“新学”已有了明显的褒扬之义，它含有赞赏、效法之意。它实际上是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的对立面——“旧学”来看的。事实上，“新学”提出、流行之时，也正是西方文化向中国传入的一个高潮期。因此，用“新学”代替“西学”客观上反映了中国人对西方、西方文化感情和观念上的进一步的变化。这也为后来反对旧传统文化，提出全面学习西方，打下了进一步的思想基础。

戊戌变法的失败，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很快又是袁世凯称帝，张勋扶助溥仪复辟，封建主义的实质丝毫未改。官场照样腐败，国家还是越来越落后。在这种情况下，一批先

进的知识分子终于看清了，封建主义所以能苟延残喘，就是由于有作为其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的旧的中国传统文化依然如故。因此，它还可以借尸还魂。认识到，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光是在器物层面和制度层面学习西方，甚至把它们移植过来，只要社会文化土壤不变，这些被搬过来的发展经济的方法、科学技术乃至政治体制就无异于桔子移栽到淮河以北就会变成 枳子。科学技术和经济还照样发展不起来，改变政治制度也仅限于换块招牌而已。于是，他们与袁世凯等复辟派“欲树尼山教义以作民族精神”针锋相对，发动了“五·四”运动：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宣传科学与民主，提倡自由、平等、个性、人权、法治，宣传西方文化，提出要从经济到思想，从政治制度到文化来一个“全盘西化”。可见，提出“全盘西化”的基本含义就是认为，文明是一个整体，它的各个部分——经济、科学技术、政治、思想文化是互相制约的，它们只有保持一种协调的关系，整个社会才能快速地、健康地发展。因此，学习西方不能只学习其中某一部分。提出“全盘西化”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国与世界接轨，“充分地现代化”。这与反对派故意把它解释成仿佛中国自己的东西什么都不要了，把西方文化不管好坏一古脑儿都搬过来是不同的。与普通老百姓就字面上理解也是不同的。“全盘西化”论者也曾考虑到这一口号在受众那里可能引起的扭曲，即使在这种意义上他们也认为“全盘西化”并无不妥：“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斯风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的。”（胡适《我是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独立评论》，1935

年3月17日）其实，陈独秀、易白沙、鲁迅、胡适、钱玄同等人就都不同程度地表现过“全盘西化”思想。后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由向往“法兰西文明”转向追求“俄罗斯文明”，直到后来毛泽东同志提出“向苏联一面倒”，我们都可以把他们归到“全盘西化”派中。因为马克思主义、俄罗斯文明，也是一种西方文明。而且他们都是反中国传统文化反得很厉害的。当然，如果说“全盘西化论”的提出者主张的是中国实行欧美的资本主义，“俄罗斯文明”的提倡者是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之间又是有本质区别的。

作为对“五·四”运动的反动，本世纪30年代中期又出现过上海王新命、何炳松等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这样的事，他们提出要恢复“以‘礼义廉耻’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固有的德行”，有的甚至主张“还要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尽管如此，他们表面上还不得不在宣言中声明“不守旧”，“不复古”。可见，文化本位主义顽固派在当时已经进步了的社会条件下，宣传传统文化也不能不有所顾忌。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批判西方价值观”的口号所包含的对现代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关系的看法与态度，不仅相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认识与立场是一种大倒退，连把西方文化看作是“新学”的广大有识之士都不如。它在实质上与90年代以来形成的新文化保守主义在对待西方文化上是完全一致的。

(四)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文化及其所包含的价值观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其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能对社会发展起极大的反作用。先进的文化、价值观念能给社会以极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落后的文化及其价值观念会严重阻碍社会进步。而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只有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相互协调、互相促进，才能健康地快速地向前发展。因此，学习先进应当全方位地学，而且应注意首先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和思想观念。文化本位主义不仅理论上站不住脚，而且在实践上也极其有害。这是中国许多代爱国知识分子通过艰苦的理论探索才认识到的，也为中外历史，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外历史的发展所一再证明。

鸦片战争，西方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除少数极端顽固派，不少人都看到了坚船利炮的确优于大刀长矛，从而感到应向西方学习。但由于文化本位主义的“道本器末”论——即认为西方先进的器物“乃器械机巧之末”，“非立国之本”，而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才是最了不起、最根本的东西——作怪，所以这种学习只能停留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水平上。你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可慈禧太后们要吃喝玩乐，所以把扩建海军的经费都挪用去修颐和园。由于政治体制问题未解决，注定了光想引进西方近代工业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洋务派的失败。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使更开明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只知“有洋务”，不知“有政务”是不行的，于是提出了向西方学习更根本的东西

——政治制度。在他们的推动下，光绪皇帝实行变法，企图引入近代西方君主立宪制。失败后，孙中山又成功地领导了辛亥革命，宣布在中国实行民主共和国制。但是，紧接着袁世凯称帝，张勋扶助溥仪复辟。事实表明，你想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制度吗？可广大老百姓还希望有一个好皇帝。只要作为其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的旧的中国传统文化依然如故，旧制度就还能复辟。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改革都休想彻底，只能眼看着国家越来越落后。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有识之士才发动了“五·四”运动，向传统文化发动猛烈进攻，并提出了“全盘西化”的口号。很遗憾，这场思想运动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进行到底。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什么时候对外开放，虚心学习、吸取外国文化中一切好的东西，我们国家就出现大好局面，什么时候文化本位主义膨胀，排斥一切外来文明，国家就急剧衰败。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流的时代。特别是唐太宗推行儒、道、释三教合一、向外开放、大量吸收外来文化的政策，从而出现了有名的“贞观之治”。明末，特别是清初，由于康熙皇帝的提倡，西学传入中国一度出现盛况，所以紧跟着也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盛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实行改革开放，虚心学习、利用国外一切好的、对我们今天还有用的东西，中国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快速发展局面。相反，每当文化本位主义抬头、强烈排拒一切外来文化，甚至搞闭关锁国，就使国家停滞甚至倒退，在剧烈的国际竞争中迅速下滑。美国一个经济史学家根据各国制造业占世界总量的分析，中国在1750年占世界的1/3，中国经济居世界第一位。但在19世纪中国经济迅

速下降，1900年制造业下降到仅占世界的6%，1950年下降到仅占世界的2.3%。这与康熙晚年开始禁教到雍正继位(1723年)后发展为彻底闭关锁国政策，使西学早期输入完全终止，经乾、嘉、道绵延100多年时间，盲目陶醉于自己的文化，难道没有密切的关系吗？本世纪60年代初，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与日本大致持平，到80年代末仅剩下日本的1/4，这种情况难道与这期间中国文化本位主义恶性膨胀，自以为自己已是马克思主义的顶峰，真理都在自己手里，奉行闭关锁国政策无关吗?！在人类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还能出现文化革命这样长时间、大规模的不幸事件，本身就证明我们的思想文化出了严重的问题。经济上，以1987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计，我们不足德国的1/54，日本的1/57。国家要赖以发展的科学技术水平呢？1999年3月美国《时代》杂志以“科学的一个世纪”为题公布了100年来全世界100多件重大科技发现与发明，与中国有关的仅一项，即1974年中国农民发现了兵马俑。自诺贝尔奖设置以来，全世界大约已有近700人获得此项殊荣，像英国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卡文迪什实验室先后已有几十人摘取过桂冠，而人口世界第一的中国大陆至今尚无人能问津过科技类奖项，尽管海外华人有过。我们的人文素质呢？发达国家平均5个人就有1名大学毕业生，有的国家已经进入“博士社会”，而我国，5个人中就有1个人是文盲。我们各级政府的廉洁指数和办事效率又如何呢？不用说，大家心里都清楚。

那么，欧洲的情况又如何呢？

斐声国际学坛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中曾对有史以来21种人类文明进行比较研究，发现：

有些一度曾繁荣过的文明经过“死亡之门”已在世界上消失了；有的衰落了；有的停滞了。惟有西方文明直到20世纪上半叶尚未显露出丝毫解体的征兆，仍具有生命力。

这是不是他作为一名西方学者的偏见呢？很难这么说。

欧洲的面积1千多平方公里，仅占世界陆地面积的1/15。人口4亿多，如不包括东欧，仅3亿多，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7，只有中国的1/4。而它在全球国民财富排行榜前20名中，竟占有15名；在1994年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水平的比较中，得分最高的20个国家，欧洲就占了14名；世界经济论坛与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共同出版的1996年《世界竞争力报告》，根据经济实力、国际化程度、政府效率、金融实力、基础建设、科技实力、企业管理能力、人才及生活素质这8个方面综合考虑排出的竞争力排行榜，在前20名的国家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有13席；根据日本《东洋周刊》杂志报导，对全球55个国家全球信息建设指数进行比较，居世界前10名的国家中欧洲就占了8名；《科学观察》的统计资料显示，对全球20个发达国家1992－1996年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及该论文被引用的次数进行比较，前10名中欧洲也占了8名；联合国计划开发署《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统计的世界各国和各地区人文发展指数前20个最高国家和地区中欧洲也占了15个；透明度国际组织对85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廉洁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廉洁度最高的10个国家和地区中，欧洲就占有7名。不仅如此，曾经两度引发了世界大战这种惨剧的欧洲，通过吸取历史教训和几十年的艰苦努力，已从法德的“煤钢联营”到“欧共体”又进一步发展到“欧盟”。这些国家的国民在欧盟范围内不仅可以自由来往，还可像本国公民一样在别的国家找工作。

1999年又推出了统一货币——欧元。

当然，除了欧洲，当今世界发展水平高的还有美国和日本。

至于这两个国家我前边已经谈到，美国实际上是一个博采众长，能把各种文明的长处融于一体的国家。但一定要从东、西文明相比较的角度看，美国文明的主导方面当然还是来自于欧洲。因为美国人口中1/3的人自身或其祖先就是来源于欧洲。

至于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就全方位地学习西方。今天的日本文化就很难说还是以东方文化为主干的文化了。它已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产物，一定要讲哪种成份多，依我看，在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中受西方影响可能要更大些。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就讲过，日本在现代化建设中，曾以德国为最理想的榜样，就连国家体制也效法德国。而在科学，尤其在自然科学方面受德国影响则更大。

因此可以说，今天美国、日本、欧盟之间的竞争，在一定意义上不过是欧洲文明在不同地域的表现和发展程度之间的竞争。

1956年，毛泽东曾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讲过这样一段非常实在的话："……历来自诩的地大、物博、人多，你有那么多的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6页）。是到了我们老老实实承认自己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的时候了！是我们好好反省自己，看有哪些过时的、落

后的、阻碍社会进步的东西，从而坚决加以剔除；是到了认真研究西方文化及其价值观中有哪些有积极意义的东西，虚心地把它吸纳过来，从而加速自己文化的现代化，加速整个社会现代化的步伐的时候了！我们再也不能盲目自大，仍不加分析地陶醉于自己已有的文化，整天莺歌燕舞、自吹自擂、不断地只顾批判人家的价值观了！虚骄和自吹自擂不仅不能代替现实的发展和进步，还只会使自己落后得更快。只有老老实实承认自己落后，而又不甘落后，敢于否定自己，并能虚心地学习别人的长处，才有希望变落后为先进。

这也是我所以愿意主编这套《欧洲文明的历程》丛书的原因。

（五）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要想真正博采众长，特别是学到西方文化及其价值观中一切优秀的东西，加速我国文化的现代化，首要前提就是要不断排除文化本位主义对学习外国文化、特别是对学习西方文化的干扰。在这方面，这样两种相当普遍的有趣现象很值得研究：一是，一个人有了病，或只是怀疑自己可能有了病，都会积极主动地去医院检查，按医生的吩咐去做；但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有了病，一些人不仅不愿找医生，有人把病指出来了，特别是得的是需动大手术的重病，他们宁可疼起来时吃些止痛的药敷衍，也绝不同意做手术以求根治，甚至还死不承认，硬说自己什么病也没有，不仅如此，还硬要咬定那些非常健康的人有病。二是，外国好的器物、科学技术要大家接受很容易，如高楼大厦、电灯、电话、电视、冰箱、空调、电脑乃至西服和国外发现

的各种自然科学理论，以至现在看到穿长袍、马褂和中山装，人们反而觉得不习惯了；如果要学习人家，对社会的结构、组织、各种制度直至政治体制进行改革，由于要影响到一些控制着社会的人的利益，即使广大老百姓欢迎，这种改革和引进也要比前者难多了。当提出要学习西方文化及其价值观时，这就难上加难了。当一些外来文化、特别是不同的价值观闯入国门时，人们会普遍感到强烈的冲击和威胁，自发产生出一种戒惧和强烈的排拒心理，从而群起而攻之。你要提倡民主、平等、人权么？人家会骂你“心术不正”，是“无父无君之行”；你要提倡理性和法治精神么？那些习惯于拉帮结伙、搞人治的人要讥笑你是“书生之论”，“不懂国情”。就是老百姓有了事，也总是通过请客送礼、找门子去寻求解决……等等。总之，要在这些看不见的、也是社会最深的层面上全面学习西方以改造自己，这是非做不可的，但这犹如“刨祖坟”、“脱胎换骨”，也是最最困难的。

历史表明，每当外来文化传入，总要受到文化本位主义的坚决抵制和排拒。这种外来文化越是强大、先进，显示出比中国传统文化优越、有活力，中国国内的形势越不好时，文化本位主义表现就愈突出，排外情绪就愈炽烈，对外来文化的反对也就愈坚决。仅近代以来，好几次都是由于这样的强大势力的反对，至少是他们的积极配合，遂使学习西方不得不中断的。

早于明清之交，西方文化开始传入中国时，徐光启、李之藻等有识之士就认识到西方科学是“真修实学”，像“泰西水法”之类，“器虽形下，而切世用”。主张“会通以求超胜”，即主张把西方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认真把它吃透，争取在此基础上再超过它。结果引起了文化本位主义者们的惊

恐、戒虑直至激烈反对。连利玛窦等人献的世界地图都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因图上的中国既非最大，又不居中，与中国传统文化提供的观念相抵触。文化本位主义者攻击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相信并提倡学习西方文化是“离经叛道”、“不可为训”。杨光先甚至提出：“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

由于文化本位主义的强烈排拒，加上后来罗马教廷对康熙皇帝有不尊重的表现，造成了康熙晚年禁教，到雍正则索性闭关，完全中止了中外文化的交流。

“五·四”运动，反对中国传统文化、学习西方，一时汇成了洪流，锐不可挡。文化本位主义一时虽然显得软弱无力，但像康有为、林琴南、严复、张东荪等人对主张西化人物的攻击却一天也没有停过。直到 30 年代中期还出现过上海十教授发表的《中国文化本位建设宣言》。后来，新文化运动被凸显出来的救亡运动中断。时至今日，不是还有人要在大陆全面复兴儒学，再造国学辉煌，使 21 世纪成为“儒学世纪”吗？

所以，要想真正把西方文化中一切积极的东西学到手，就必须坚持不懈地与根深蒂固的文化本位主义作斗争。

西方文化作为一个整体，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二者掺杂在一起的。我们学习西方文化及其价值观，无疑要有分析，学习它健康的、积极向上的、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注意防止和抵制它的不好的、对我们有害的东西，如极端的利己主义和一些让人颓废的生活态度等等。但值得注意的是，对在西方文化进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进来的某些消极因素不必大惊小怪，更不能因此而否定整个西方文化，乃至对它采取排拒的态度。过去搞“闭关锁国”，拒绝学习乃至研究

西方文化，在不少人那里就是因西方文化也有不少不好的地方这种形而上学思想作怪。最突出的是：既然他们还侵略我们，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哪里还能把他们当老师来学习?!不仅如此，即使是一些好的东西，弄得不好也可能有其另一面。如科学与民主，正如陈序经先生在《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中所讲的，“要享受赛先生的利益，应当要接受赛先生发脾气时所给我们的亏”（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第89页，台湾，牧童出版社，1966年版）。对此我们必须辩证地看问题。

事实上，历史上我们几次对外开放，虚心吸纳外来文化，当时进来的也不可能100%都是好东西，还不是促进了中国文化的丰富，国家的进步?!只要主流是好的就行么！当然，我们也要特别注意没有把人家好的东西学过来，而把他们一些坏的、腐朽的东西倒都引进来了这种情况。而且在我看来，即使真的出现这种情况，问题也主要出在我们吸纳主体自身。

看不到，或不愿承认西方文化从总体上比我们的文化强，根源于一种深刻的、同时又是狭隘的民族情结。有严重文化本位主义思想的人中的绝大多数是如此，就是坚决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人中有这种民族情结的也不乏其人。

因此，我们在与文化本位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一定要始终牢记，他们绝大多数人是出于爱国，希望中华迅速强大。尽管在历史上他们一次次的行动都是事与愿违。他们的主要问题在于，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太深，对它又缺乏具体分析，从而采取了全盘肯定并不适当地夸大了的态度，同时对外部世界好的一面却看得不够。因此，我们在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时一定要尊重他们，坚持耐心地充分说理，注意与他们

搞好团结。

由于狭隘的民族情结作怪，使中国自近代以来每次学习西方文化时，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相反的问题总是首先并一再浮现到台面上来。致使真正的学习、吸纳尚未展开，为此已争论得不可开交，不仅消耗许多精力，而且致使这种学习很快被扼杀。我认为，要真正为“国家前途、民族命运”计，站到爱国主义立场上，在这方面，立场只能有一个：即科学的立场。不论是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还是马克思主义、一切其他外国文明，凡是好的我们都要！中国传统文化中真正积极、健康的东西要大力弘扬；西方文化中一切好的东西要敢于大胆吸收；马克思主义作为以往人类文明的总结，其基本的东西更应坚持不动摇。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博采众长，加速实现我们自己文化的现代化。

恩格斯和列宁都十分欣赏亚里士多德这一思想：“身体的各个部分只有在其联系中才是它本来应当的那样。脱离了身体的手，只是名义上的手。”（转引自列宁《哲学笔记》中文版，单行本，第217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我们学习西方文化中一切优秀的东西，也一定要注意把它们放到西方文明的整体中加以把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理解得准确。在学习、引进西方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时，尤其要注意防止它们被中国传统文化扭曲、同化和封建化。如民主、自由、平等这些概念的含义，在西方是把它们作为一种“天赋人权”、作为人之为人不可或缺的东西来看待的。至少它们在西方普通老百姓心目中是这样的。所以，列宁也讲，“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除了“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

(列宁《国家与革命》中文版，单行本，第89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作了这样的理解之后，就不会把它们看作只是一种手段，看作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可以给，也可以不给人民的东西了。

学习西方文化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决不能教条主义地、简单地、机械地照抄照搬。在这方面，我们有过太多的沉痛的教训。我们一定要像毛泽东所正确指出的那样，注意从本国实际出发，与本国实践相结合。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学得起来。

不仅不是简单地、机械地照抄照搬，而且也不能把西方文化中那些优秀的东西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健康的积极的东西简单地加以拼凑。博采众长，加速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举个形象的例子，应当像人喝水、吃粮食、水果、蔬菜和各种肉类那样，通过咀嚼、消化、吸收、最终把它们变成自己有机体的各种要素和组成部分。这一方法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可以叫做“有机生成论”。这样形成的文化，才可能是高水平的现代化的文化，一种真正世界性文化；这样的文化才可能对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产生极大的、经久不息的推动作用。

当我终于能把丛书的全部文稿交给出版社发排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滋味：既如释重负，甚感欣慰；又多少有些苦涩、不无感慨。

作为丛书主编，感到欣慰的是，在同行专家们的全力支持、通力合作下，经过两年多的奋力拼搏，这套近200万字的丛书——《欧洲文明的历程》不久就要面世了。

我主编、出版过一些书。这套丛书的写作指导思想、结构是我给出的。每本书的写作提纲是我与作者共同商定的。

我除审读了大多数作者试写的有关章节外，还认真通读了全部书稿。我觉得，丛书作为中国大陆学者系统地比较详尽地评述整个欧洲文明发展史的第一套著作，还是成功的。它比我以往主编出版的一些书写得还要好些。就其质量而言，尽管以后有机会再版进一步修订、提高的空间还很大，但总的说来，还超过了我对它的预期。它不仅基本上实现了忠实地再现整个欧洲文明、尤其是其精神文明及其实质的目标，作者们在注意学术性、思想性和知识性的同时，还兼顾了趣味性、可读性。全书寓庄于谐，雅俗共赏。我自信，它出版后会拥有读者。因为，只要不带偏见，谁都不能不承认这是一套充满了学者良心的、严肃的、负责任的丛书。相信广大青年学生、公务员、宣传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一切对此有兴趣的读者，通过它不仅可以对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一种文明——欧洲文明的全貌有一个较清晰的把握，增长许多知识，而且从中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迪，获得力量，受到激励。从而使这套丛书对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对国家的加速现代化，起到它可能有的作用。

令我不能不感慨的是，就是作为主编的我，单就几个月来审阅、加工书稿，除了到学校上课、开会，其余时间几乎都用上了。没有星期六、星期天，也没有节假日，平常每天工作时间都在10小时以上。尤其是近来，北京连续35度以上高温，有时甚至高到40度以上，为了防止汗水模糊视线和滴落到写字台上，常常是一边不断地用湿毛巾擦拭，一边坚持看稿。作者们为了把尽可能好的作品奉献给社会，为此付出的心血和辛劳就更是不难想像了。他们为了把中外有关研究成果吸收到书中，就像蜜蜂采百花酿蜜一样，在原来研究、积累的基础上，少的也翻看了几十本，多的参阅了一二

百本中外文献。有时为了查对一段引文，核实、考证一个史实，就跑好几家图书馆，花去两三天时间。就这样，写了改，改了抄，有的交稿后根据我的建议还要重新改写某些章节。就中甘苦，恐怕是认真、严肃、有过这种实践的学者之外的人很难想像的。然而社会上又有多少人理解学者们对祖国、对人民这份痴情，这份苦心，这份深深的爱呢？时下，社会上一些骗人、害人的东西泛滥成灾，不少人不惜花几百元、上千元去买它们，而严肃的学术著作连出版都困难，出版了，也鲜有人愿意花钱去买它、读它；一个青年，或因一支歌唱得好，一出戏演得好，一场体育比赛表现突出，一夜之间可成为家喻户晓的大名人。我们这样的学者不待说，就是一个终生钻研不辍，造诣极深，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都能提出一些真知灼见的那些大学问家、大思想家，在国内，超出他的学术圈子，又有谁知道呢？这些现象正常吗？长期这样下去国家能快速发展吗？我们这个国家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究竟怎么了？

一些亲友对我还如此拼命也很不理解。他们都提出这样的疑问：你为什么还要出书？

是啊，我为什么还要写书、出版书呢？

为解决职称问题？我早已评上教授了。

为了挣点钱？就这套丛书所花的时间和精力，根据与出版社签的合同，我算了一下，每小时所得比时下北京打扫卫生的小时工即使多也无几。今天，恐怕只有傻子才不知道要靠社会科学研究、写作发财是痴心妄想。这，我已经很知足了。因为现在我已不需要自己拿钱出版书，甚至也不需要“想方设法”去争取什么项目资助。出版社、刊物约稿已是应付不过来。而且人家承诺的稿酬按规定也都是比较高的。

罗素、怀特海那么有名的学者，用整整十年时间写出的《数学原理》这样的不朽之作，用一辆四轮马车运到出版社去的卷帙浩繁的文稿，不也是由剑桥大学和英国皇家学会各出资 300 英镑，两位作者各出 50 英镑才得以问世的吗？何况，在我国，教授工资虽然不高，基本生活还是有保证的。尤其是在国家经济还有困难，还有千百万人不能就业或下岗，基本生活都有问题的情况下，作为一名人民培育出来的知识分子，的确从来也不曾有过什么脱离同胞大多数生活水准、追求个人物质享受的非分之想。

是想在市场上把自己卖个好价钱吗，让党和政府感到自己“学而优”，给个“仕”、捞个一官半职吗？我作为一个学习哲学，又曾长期在社会上受到过锻炼的人，不可能对社会没有一个较清楚的认识，也不可能一点自知之明也没有。实事求是地讲，至少是从我下决心考研究生那一天起，当任何官的梦就再也没有做过。何况如今我早就超过了“知天命”的年龄呢！

是还想扩大自己的知名度吗？对于一个在北大搞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要想出名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真是要想出风头，就不钻研基本理论、写作或组织写这类书出版了！

可能有人要说，这些年来你就是读书、思考，然后把心得写出来，讲出去，以论文或书的形式发表或出版，这已形成了习惯，成了你的生存方式。不这样你就难受吧？

这话也对也不对。这些年读书、思考、写作的确已成了习惯。但还远没有达到不知道在节假日到繁花似锦的园林与友人散散步、或到气候宜人的名胜区度度假也是人生一种享受的地步。也不是不知道无论从年龄、还是身体状况都到了客观上需要增加休息和体育锻炼的时候了。

那么，我究竟为什么还要抓紧时间写书、出版书呢？

作为一个贫寒的农家子弟，对祖国的贫穷落后，人民生活的艰难，我从小就有十分深切的体会。后来，正是这个贫困、艰难而又伟大、可爱的祖国与人民节衣缩食，用乳汁和汗水茹苦含辛地把我哺育成人。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自己从上中学到大学毕业，拿的始终是最高的助学金。接到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后，连来北京的路费都是南通县文教局给的。而我们这代人上学期间所接受的教育又都是“好好学习，将来报效祖国”。大学毕业后，我到河北省承德地区工作了8年半时间，山区更为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山区人民的善良、淳朴一起，像用刀子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人生意义感悟的加深，这种心志也愈坚。1988年以来，我有机会到了一些国家，更真切地感受到了我所挚爱的祖国与人家的巨大差距。每想起这些，一个正直的、多少有些良心的知识分子，社会科学工作者，怎能不去努力探索国家所以落后的原因，寻求强国富民、使老百姓生活更幸福的道路呢？他又怎么能不不计后果地把自己的研究结果想方设法地公诸于世呢?！他哪里还有什么心思去脱离同胞的大多数去追求个人的名、利和权力，还怎么可能为个人的蝇头小利、个人恩怨耿耿于怀呢?！我深深地懂得，我们这代知识分子在成长过程中就像果树开花坐果遇到过冰雹一样遭遇了太多的天灾人祸，已不可能硕果累累，也不可能果实上没有一点伤痕。正是出于这种自我觉识，我更感到要把脚步紧了再紧，惟有这样，才能完成时代赋予我们这代知识分子的使命。

我历来认为，一个人如果只是为了自己活着，无论是想追逐财富，攫取权力，还是想沽名钓誉，也不管他的这些目

的能实现到多么“光辉的”地步，都是很渺小的，甚至是可鄙的。尤其是从事科学研究，这更是一个圣洁无比的事业，把它当作追名逐利、争权夺利的场所，本身就是对它最大的亵渎！在中国就更是如此。我们的国家还很贫穷，能获得长期系统栽培的人只能是极少数，而能在科学研究领域工作的就更少了。在中国能从事科学研究这是一种极其难得的幸运。马克思说得好：“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受，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当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转引自《回忆马克思》，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版，第2页）每个有幸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应当牢记国家的嘱托，人民的期望。

在我看来，一个真正的学者，并不单单属于他自己，甚至也不属于他所在的单位，他是属于整个民族乃至人类的。他的存在不应当限于他生前，而应当在人类历史上有他的印迹。因此，他应当高标准地严格要求自己，应当努力除旧布新。而且应当考虑自己所写的每一篇文章，每一本书，是在为自己，还是为国家和人民；说的是肺腑之言，还是言不由衷；能启发读者的心智、净化人们的灵魂，还是可能混淆视听、毒化社会；是推动社会进步，还是可能误国害民？

自从北大晋升我为教授后，我始终感到诚惶诚恐。不管别人怎么看，在我眼里，“北大教授”这个称呼还是很高的。所以我一直在争取“以实副名”。主编书，写书，发表论文，统统基于以上考虑。《欧洲文明的历程》丛书，就是我想出的书的一种。据可靠消息，研究出版欧洲文明史，也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列为重点项目，拨专款资助一些学者在研究。这表明我们出的这套丛书，正好是符合国家需要的。

长期从事理论工作，很少有时间看文学作品，以致语言

不仅枯燥，而且贫乏。但愿这些还多少有些理性的文字不至影响读者看出我对我们这个伟大而又贫弱的祖国，对我深深挚爱的艰难前进的民族的真诚与深情。

易杰雄

1999年8月于三励斋

目　　录

引子

人类历史上的各种文明绝大多数都是在相互吸取、互相渗透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大约早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人类最早的文明已经在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开始萌芽和产生了。古代欧洲人就是在东方文明的影响下，驱散黑暗和愚昧，以巨大而又艰难的脚步，创造出自己独特而辉煌的文明的。

按照荷兰学者克鲁克荷恩的说法，从考古和史学角度讲，只有产生了一些互相联系且有5000以上的人口的集镇或城市，有独立的文字体系或有了纪念性的建筑遗迹和进行仪典活动的集中场所的时候，才算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文明。这其中只要具备两个方面即标志文明的产生。如果以此为标准，原始社会末期，不仅有了一定规模的城镇，有了农工、商贸，产生了私有制，而且有了经济、行政管理机构，有了文字、文化活动，它已经进入文明时代。

文字的产生是一个过程。传说大流士一世和西徐亚人作战时，西徐亚人派使者给波斯人送去一只鸟、一只鼠、一只

蛙、五支箭。这并非礼物，而是一封实物书信，它严正警告波斯人：你们必须像鸟那样赶快飞走，或像鼠那样钻进洞里，或像蛙一样跳进湖水里，不然我们将万箭齐发。这表明，当时文字尚未产生。

接着产生了图画文字。图画文字的发展就是象形文字。西方文字的来源就可追溯到古代西亚腓尼文字、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以及巴比伦的楔形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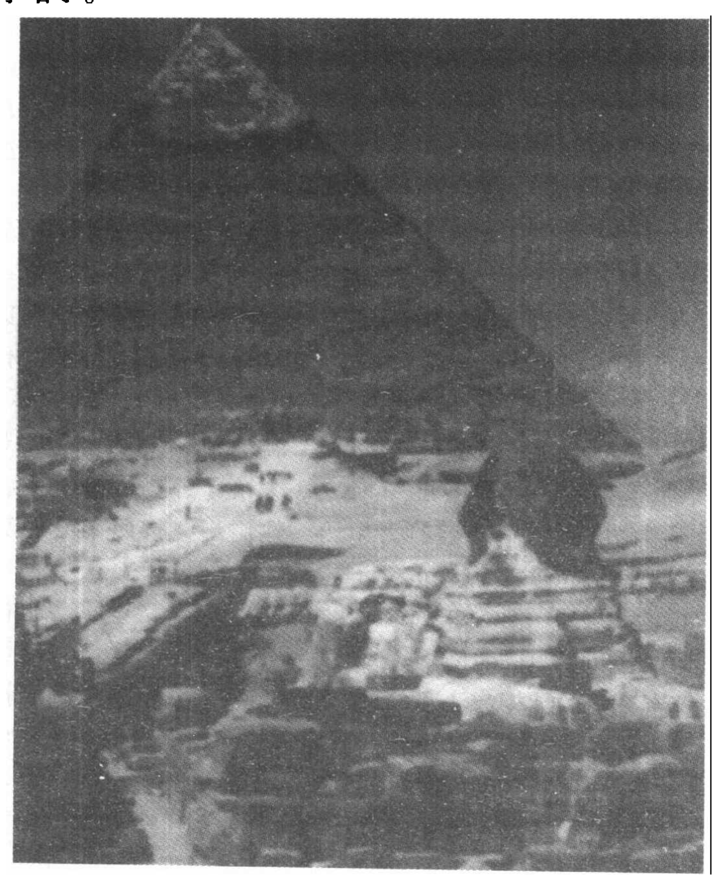
原始人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经过漫长的实践，还积累了天文、气象、地理、动物、植物、医学等方面的知识。尽管这些知识是那样幼稚，却为后来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进步奠定了全部基础。

作为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的古代埃及在原始人达到的成就的基础上创造出的灿烂文明，不仅对本民族，而且对希腊、罗马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早在公元前3500—前3100年，古埃及已产生私有制和国家，进入文明时期。不仅有了象形文字，而且发明了冶炼技术。人们已能用冶炼过的铜铸刀、斧、钻、锛、匕首、枪矛等工具和武器，还基本上掌握了金、银器的加工。金属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力，水陆交通、经贸往来也随之快速发展起来。这时，为争夺土地、财富、奴隶和对尼罗河水的利用控制权，一些分散的小国常常发生争端乃至战争。为了征服对方，国与国之间彼此结成联盟。这时，建立统一的奴隶制国家就成为必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约在公元前3100年前后，上埃及征服了下埃及，试图最终结束南北对立的局面，实现统一。

也许最能折射出古埃及科学技术、生产力水平和政治体制、即反映当时文明程度的要数人类奇迹和世界奇观埃及金

字塔了。



金字塔

在作为众多的法老陵墓的埃及金字塔中，以胡夫金字塔最大、最有名。法老胡夫的金字塔约建于公元前2800多年，占地600公亩，高147米，基座边长230米。据估计，建此金字塔用每块重达2.5吨的石料就多达230万块，用的土方

就更不待说了。胡夫塔旁还有两座金字塔，一座是胡夫继承人哈佛拉的陵墓，高 143.5 米，底座边长 215.5 米。另一座是门卡乌内的陵墓，高 66.5 米，底座边长 108.5 米。三座金字塔相映生辉，为天下奇观。有人估计，用这三座塔的石料如果建造一条高 10 英尺、宽 1 英尺的墙，可以绕整个法国一周。

金字塔不仅外观雄伟，而且内部构造精奇。塔体所用的优质石料全部经过精心打磨，光洁如镜。石料之间的接缝全靠自身重量和精细加工的平面互相衔合，缝隙细不可辨，以致利刃都难以楔入。金字塔矗立数千年而不坠落，确是古代埃及人民智慧和力量的结晶。

古埃及的科学成就是极其辉煌的。他们从远古开始就对天体进行观测，约在 6000 多年前就发现了作为当今世界各国通用公历的原始基础的太阳历。他们当时按回归年的算法，把一年分为 3 个季节，每季 4 个月，每月 30 天，全年共 12 个月 360 天，年末加 5 天节日，共 365 天，这已经很接近地球公转一周的时间了。古代埃及人在实践中也很早就懂得了十进位的计算方法和加减乘除的运算规律，并掌握了计算三角形、长方形、梯形及圆形面积的几何学知识，还算出了圆周的长度为其直径的 3.16 倍。正是由于有这些知识才使金字塔这样大型建筑物的设计精确度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此外，古埃及的医学，文学艺术和宗教，在当时也是水平很高的。他们在发明文字的基础上，已开始用植物的浆液制造墨水，把芦管加工成笔，用纸草做“纸”，从而使人类进入了有史记载的时期。所有这一切，后来都通过各种渠道传到古希腊古罗马，成了欧洲文明形成的重要来源。

除了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

河）文明及古巴比伦文明也是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一个重要来源和生长点。

两河流域古代文明的火炬是由南向北依次传递的，苏美尔是最古老的文明发源地，接下来是阿卡德、巴比伦，最后是亚述。两河流域文明还要先于古埃及。在地域上有两个中心，一是滨临波斯湾口的苏美尔，一是苏美尔以北的阿卡德。而两河流域古文明最集中的代表则是巴比伦。

有的历史学家曾说过这样的话："人类的历史是从苏美尔发轫的。"早在公元前4300—前3500年期间，苏美尔已经开化。懂得了铸造和使用铜器，步入金属时代。到公元前3500—前3100年间，私有制已有相当发展，文字已产生。到公元前3100年—前2900年期间，该地已有相当发达的贸易和对外联系，当地的文明迅速向两河流域的中、上游传播。

苏美尔人在天文方面的成就还超过了同时代的埃及人。他们通过天文观测，建立了精确的计时系统，根据月亮的盈亏制定了阴历，他们把两次的新月出现的间隔作为一个月，12个月为一年，其中6个月每月为30天，另6个月每月29天。另外又用置闰的办法来调整与地球公转一周的时间差距。在数学方面苏美尔人创立了60进位法，六的倍数也常用作计数单元。按这种方法把60秒定为一分钟，把60分钟定为一小时。白昼与黑夜各为12个小时。圆周的360分度也是渊于此法。他们制定出了乘法表、倒数表、平方表、立方表和立方根表，并能计算出矩形面积和立方体的体积。此外，他们还制定了重量、长度、面积、体积、货币等计量单位。在文学艺术方面，他们创作了现在所知的世界上最早的史诗——"吉尔伽美什"史诗。在建筑方面也形成了自己独

具特色的风格，其中拱门、拱顶及穹窿结构的发明与运用，对后来世界各国，其中包括对欧洲的建筑都有相当的影响。在军事上苏美尔人马拉战车、方阵战术也为后来的希腊人和马其顿人所采用。

巴比伦则在参照阿摩利人习惯法的基础上制定了一部详细、完备的成文法典——《汉谟拉比法典》。当时巴比伦还很重视开凿河渠，兴修水利，促进农业的发展。在天文学方面，巴比伦人创造了另一个为全世界通用的时间单位即星期，一星期为七天。每小时60分，每分钟为60秒也是他们最先开始使用的。他们很早就已经能把火、水、木、金、土五大行星和恒星区分开来，他们最先提出的星座名称直至现在仍被西方天文学界所广泛使用，成为天文学的宝贵遗产。巴比伦人在数学上已能解出三个未知数的方程。对几何学也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在文学艺术方面，《主人与奴隶的对话》、《咏受难的诚实人的诗》都是很有名的作品，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表现手法，都达到了相当高的地步，对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建筑艺术方面，无论是王宫塔庙的宏伟建筑还是在雕刻绘画艺术方面都达到很高的水平。萨尔贡二世建在尼尼微东北面萨尔贡堡的华丽富贵的尼尼微王宫，成为汉谟拉比的巴比伦城以后西亚的宏伟建筑和大规模城防建设的楷模。新巴比伦时期在尼布甲尼撒兴建的巴比伦城，更是使王宫和城市建设达到了古代两河流域的最高峰。被誉为“空中花园”的内城北部王宫中最著名的建筑当之无愧地被列入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塔庙结构和屋顶花园的有机融合、土层封闭、唧筒取水机构等建筑艺术，是巴比伦人对人类建筑的独特贡献。

其中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作为古巴比伦乃至整个两河流域

文明标志的、对后来波斯、摩西及希腊法律的形成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汉谟拉比法典》。

在苏美尔人中，原来婚姻家庭关系是按照习惯法来维持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建立后，为适应奴隶制统治的需要，在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制订了一部《乌尔纳姆法典》。这部用苏美尔文字写成的法典，是迄今所知的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成文法典。其实质是保护私有经济，为奴隶主阶级服务。基本内容是规定不准非法侵占他人田地财产、反对巫术，不许伤害人的肢体、器官等。后来又先后出现过《苏美尔法典》、《李必特·伊丝达法典》、《俾拉拉马法典》等。《汉谟拉比法典》是巴比伦统治时期，在综合以往法典成就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是留传下来的古代法典中最完备、最详尽、影响最大的一部，它是一部针对当时社会现实、调整社会关系所必须遵循的司法判决的法规汇集。这部法典对诉讼程序作出了较详细的规定，除了始终贯穿对君主专制制度的维护和确定社会各阶层不同的法律地位外，还对财产所有权、债务等作出了相当详细的规定；《汉谟拉比法典》对婚姻家庭关系的规定也很明确；此外，这部法典还对侵犯人身罪、侵犯家庭罪等犯罪行为作了详细的规定，并对此规定了各种刑罚办法。

《汉谟拉比法典》不仅在具体的法律条文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后来成了欧洲文明的一个显著特征的法治精神方面，对古希腊文明的产生和奠基发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章 古希腊文明的曙光



- 爱琴海区域的古文明
- 荷马时期
- 海上贸易和殖民对希腊文明的影响
- 斯巴达和雅典国家的形成

在近东文明成就的影响下，古代希腊文明的曙光日渐灼亮。

古希腊文明是从爱琴文明开始的。爱琴文明的中心是克里特和迈锡尼。爱琴文明的发现，使古代希腊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远的时代，从而使希腊成为世界上重要的文明发祥地之一。然而随着迈锡尼文明的结束而开始的荷马时代，使希腊文明的发展经历了一段暂时的、曲折的过程。公元前 8 世纪起，希腊广泛的海上贸易和殖民活动，又大大促进了工商业发展和文明的进步。

一　爱琴海区域的古文明

（一）爱琴海区域及其古文明的发现

从地理位置上看，爱琴海区域是指以爱琴海为中心的地区，其中包括希腊半岛（希腊本土），爱琴海中的各岛屿及小亚西亚半岛西部的沿海地带。爱琴海区域最主要的部分是希腊半岛。希腊半岛位于巴尔干半岛南端，岛上群山环抱，海岸蜿蜒曲折。由于岛上地少山多，因而交通很不便利。但那深深的海湾，众多的港口，加之爱琴海上星罗棋布的岛屿，为古希腊人航海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爱琴海区域，岛屿

相连，碧海蓝天，美丽的自然风光和宽阔浩淼的海面，极大地吸引着热爱航海的人们，这里成为远古航海业的摇篮。航海加强了希腊人与东方文明的联系，他们向东航行经叙利亚可达两河流域，与爱琴海以南的克里特岛隔海相望的就是有古老文明传统的埃及。希腊人吸取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丰富的文化遗产，从而孕育和创造着欧洲最古老的文明。

由于山阻海隔，造成了希腊半岛特殊的地理自然形势。伊庇鲁斯山地和狄萨利亚平原称北希腊，以阿提卡、彼奥提亚、弗西斯、埃陀利亚等为主的部分地区属于中希腊，包括亚哥利斯、拉哥尼亚等地区在内的区域叫做南希腊，南希腊又称伯罗奔尼撒。爱琴文明的中心之一迈锡尼在亚哥利斯，古希腊最大的城邦之一斯巴达位于拉哥尼亚，此外，如亚尔果斯、科林斯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圣地奥林匹亚等希腊本土的重要城邦也都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从伯罗奔尼撒向东，经科林斯海峡便来到亚狄加半岛，那儿是希腊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城邦之一——雅典。

爱琴海上岛屿众多，大大小小岛屿有380多个，其中南边的克里特岛最大。克里特是一个狭长的带状地形，东西长约250公里，南北宽约有12至60公里，它横卧海上，形成爱琴海区域的门户和前沿。这里海陆相连，舟楫出入便利，有良好的对外交通条件。克里特岛是爱琴文明的发祥地，也是欧洲古老文明的中心之一。

爱琴文明的发现，是世界近代考古学上的一项伟大成果。所谓爱琴文明，是指爱琴海区域的青铜文化。克里特岛和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岸的迈锡尼，是爱琴文明的两大中心。在这一时期，原始氏族制度逐步解体，奴隶制国家随之产生，并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成为目前已知的欧洲古文明

的渊源。然而，当爱琴文明终结后，又经历了荷马时代这一段曲折的过程，希腊人才又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国家。这时，人们对曾经光彩夺目的爱琴文明已经遗忘殆尽，茫无所知了。而那些曾经发生过的激动人心的故事，只在民间传说或神话中得到一些模糊不清的反映，因而长期以来，人们不知道爱琴海区域曾有过古老而光辉的文明存在。在有关爱琴海区域的神话传说中，最有影响的可数克里特文化中的米诺斯王及其迷宫和迈锡尼文化中的特洛伊战争的故事。但是，这些传说都被人们当做神话，从来没有人去思考或相信它的真实性。

到了 19 世纪，这种局面被一位叫亨利希·谢里曼的德国考古学家打破了。谢里曼生于一个贫苦的牧师家庭，童年时代他常听到父亲讲荷马史诗中那激动人心的故事。当他听父亲说“特洛伊城早就消失了，现在谁也不知道它在哪儿”时，他天真地说：“我不信，等我长大了，一定能找到它。”这时候谢里曼只有 7 岁。因为家境贫寒，谢里曼 14 岁时便辍学去一家食品店当学徒，以求谋生。但他刻苦自学，自强不息，只用了两年时间便学会了英语、法语、荷兰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后来他在经商的岁月里，又自学了俄语、瑞典语、波兰语、拉丁语、阿拉伯语和希腊语。到 1863 年，谢里曼已经成为一名百万富商了。5 年后，46 岁的他决定退出商界，实现他寻找特洛伊的理想。在谢里曼生活的年代，人们普遍认为希腊文明应从第一次古奥林匹克运动会（公元前 776 年）开始，人们不相信原始文化之前还有荷马史诗中描写的那样高度的古典文明。甚至对荷马其人是否真实存在都产生怀疑，以为荷马史诗不过是一段神话传说。但谢里曼却对此深信不疑，他常被史诗中那些令他心驰

神往、如醉如痴的故事所陶醉，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寻找特洛伊的事业中去。

亨利希·谢里曼（考古学家）带着深深的怀古幽情考察遗址，雇佣工人挖掘探索，在地下发掘出大量武器、陶器及各种装饰品，并出人意料地发现几座古代城市。谢里曼继续深入挖掘，以判定哪一座城是特洛伊城。结果1873年6月15日，谢里曼在一处断壁残垣底层奇迹般地发现了一批宝藏。他把这批宝藏秘密运往欧洲，他以那些在地下埋藏了几千年，出土后仍然金光灿烂的王冠、金手镯、金项链等希世珍宝为事实，向人们宣布他找到了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城，并发现了国王的王冠等宝藏。这一消息，轰动了欧洲文化界，谢里曼名扬天下。但壮心不已的谢里曼又开始了迈尼锡的发掘工作。1876年下半年，他在伯罗奔尼撒的迈锡尼故址地下挖掘出大量花瓶、圆形建筑物、石碑等物。接着又陆续发掘了一座座王陵、一具具古代帝王尸骨、一顶顶纯金王冠、一件件金制用品。这些考古成就，无不向世人展示出希腊史前古文明的轨迹。尽管谢里曼发掘特洛伊城和迈锡尼后的判断结论与后来研究结果尚有出入，但他在探索希腊史前文明方面决定性的贡献和在考古方面的辉煌成就是永存的。

谢里曼之后，希腊考古学者卡洛凯里洛斯在克里特岛发现了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米诺斯王的迷宫，即克诺索斯王宫遗址，揭开了欧洲文明源头上新的一页。特别是英国学者伊文思对克诺索斯王宫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终于使淹没数千年的爱琴文明重见天日。伊文思经过长期发掘研究，对米诺斯文明发展和分期进行了充分论证。从此以后，一些学者在希腊半岛、爱琴海各岛屿和小亚细亚等地进行了大量发掘和研究，有关爱琴文明的成果日渐丰富。

根据地下发掘和考古学者们研究表明，爱琴海各岛和希腊本土在公元前3500至前3000年间逐渐由新石器文化转向早期青铜文化。到公元前2000年后，克里特岛建立了奴隶制小国家，后来便以克诺索斯为中心建立了统一的王权，产生了米诺斯文明。从公元前1900年起，一部分希腊人移居中部，接受早期希腊文化，并在米诺斯文明影响下，在公元前1600年后建立了国家，从此产生了迈锡尼文明。按照考古学者们的研究，米诺斯文明从公元前2000年到前1450年，分为旧王宫和新王宫两个阶段。约从公元前1600到前1100年，是迈锡尼文明产生和发展的时期。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克里特岛和迈锡尼城是爱琴文明的中心。从公元前2000年克里特最早的奴隶制国家产生到公元前12世纪迈锡尼灭亡，爱琴海区域的古文明存在了约800多年。爱琴文明的发现，使人们对西方文明史可以追溯到更加古远的年代，爱琴海区域也成为世界著名的文明发祥地之一。

（二）克里特文明

克里特是目前所知希腊古典文明最早的发源地。大约在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4500—前3000年），这里已有人居住，到公元前3000年，克里特进入金石并用的时代。前3000年代末期，这里的原始社会逐渐解体。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起，克里特进入青铜时代，奴隶制国家也随之产生了。

奴隶制城邦国家形成后，克里特岛上出现了较大规模的王宫。如奴隶制小国都以王宫为中心，克诺索斯是当时各国

联盟之首。克诺索斯最大的王宫大约在公元前1800—前1700年间建成，随后，克诺索斯的米诺斯王朝逐步统一了克里特岛，并以克诺索斯为首都。这一时期，各地王宫在建筑风格上趋于一致。随着社会进步，文字也出现了，并由图形文字逐步演变为象形文字，最后演变为线形文字A，这种文字直到现在还没有释读成功。但是王宫和文字的出现，却标志着统一的米诺斯文明开始形成。在公元前18世纪中叶前后，克里特曾发生过某种“灾变”，至于这种灾变是由于强烈的地震，还是外族人入侵进行军事掠夺，或是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所引起的，现在还无法断定。但克里特文明却没有消灭，相反，从公元前17世纪初叶起，克里特出现了新的繁荣，进入实力雄厚的强盛时期。特别是遭破坏后重建的克诺索斯王宫更见宏伟壮观、豪华的气派，以至史学界由此把克里特文明划分为旧王宫和新王宫两个阶段。

新王宫阶段，克里特已经完全建立并巩固了统一的王权，这一时期岛上人口稠密，城镇众多，再加上它地处地中海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美丽富饶的自然条件，从而促使其得以繁盛和发展。荷马在《奥德赛》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在那色如酒浆的海中央
　　有这么一个地方——
美丽富饶的克里特，四周翻波浪。
九十座城池在岛上，人口众多无数量。
各种语言北腔南调。亚该亚人的部落，
勇毅的埃泰奥克里特人、基敦的大丈夫、
分成三支的多利斯人、神奇的皮拉斯基部落共居这厢。

克里特的众城之最数克诺索斯，
那里的统治者是
宙斯挚友，九岁即位的贤主米诺斯王。①

克里特的农业、手工业较为发达。平川地带土地肥沃，阳光充足，很适合农耕。在米诺斯文明时期，除了种植粮食作物而外，还大量种葡萄、橄榄等，并酿制出葡萄酒和橄榄油，其中许多进贡于王宫。克里特的手工业也很发达。在金属手工制品中，铜剑、双面斧、金银镶嵌的匕首及用金银制做的生活用品和工艺品等，也很精巧实用。在陶器制做中，早在旧王宫阶段，克里特人就能用轮制法制作杯、碗、钵、罐、花瓶等，而且能够进行彩绘装饰，其制作精巧，式样秀美，堪称古代陶艺之最。到新王宫阶段，彩陶技艺更为精湛，成为米诺斯文明的一大特色。

造船和航海贸易的发展，是米诺斯文明在经济方面的主要成就。从许多壁画及工艺品上的图案可以看出，米诺斯王朝时期的工匠已经能够制造远航帆船和较大的战船，并常有多种船只组成的船队出入岛上。特别是克里特人在造船中，对舰船结构的改进和对古代造船术的提高，为后来希腊人所袭用。造船业的发展推动了米诺斯的航运和海上贸易，从而大大加强了克里特和海外国家的往来，促进了文明的进步。旧王宫时期前后，克里特就和埃及有了密切联系。埃及的文化和物品流传于克里特，克里特的陶器等也经常出现在埃

① 荷马：《奥德赛》（又译作《奥德修记》）第19卷，郭小凌译自原苏联《古希腊史文选》。转引自《世界古代及中古史资料选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2页。

及。到了新王宫时期，克里特和埃及的联系更为紧密。航海的发展和广泛的海上贸易，加强了克里特和埃及以外其它地区的联系，其中与爱琴海区域及周边地区的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交流更为广泛。在希腊本土，克里特对迈锡尼文明的影响颇大，迈锡尼文明的发展实际上是克里特文明的继续。

克里特的宗教和艺术也很繁荣。关于克里特宗教的具体内容目前了解得还较少，但从已有的研究材料中可以看出，在米诺斯文明时期，仍保留以人作牺牲祭神的野蛮习俗，譬如在地震等自然灾害面前杀人祭神等。克里特人的宗教信仰有许多和东方民族的信仰乃至希腊宗教相同的特点，鸟、鱼、兽被尊为神，树、花、石等作为崇拜物。在克里特，祝神的时候往往举行公共祭礼和庆典，并有游艺、体育竞技、拳术、剑术决斗、斗牛、演剧、杂耍等表演相伴。和东方民族不同的是，在克里特没有强大的祭司阶级和宏伟的庙宇来执行宗教事务。克里特的宗教信仰对希腊的宗教有巨大的影响。希腊的某些神与克里特宗教有一定关系，如雅典娜故乡就在克里特岛。雅典娜被希腊人自己承袭过来后，经过变形被供奉在希腊的万神庙中。克里特的艺术最突出的成就是米诺斯的壁画。特别是新近在克里特以北锡拉岛上发现的壁画，无论在艺术风格还是在反映当时生活现实方面，都在古代壁画中占有独特地位。在锡拉壁画中，那描绘美丽的自然风光的《春天图》，反映年轻人生活情趣的《少年搏斗图》和《渔家少年图》等作品，表现手法简练明快，艺术风格自由奔放。在克诺索斯王宫，古代壁画艺术达到了高峰。王宫内壁画佳作很多，著名的《宝座神兽图》、《牛戏祭礼图》、《海豚戏水图》等作品中，那奔腾的雄牛，繁茂的花草，尊贵的神兽以及在碧海蓝波中狂欢、跳跃的海豚，都描绘得栩

栩如生。此外，还有描写人物场面的《观战图》、《宫廷舞蹈图》等作品，在反映当时人们的精神生活面貌，全面展示米诺斯文明方面更显特色。

最能表现米诺斯文明成就的是克诺索斯王宫，因为这里实际上是米诺斯王朝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这座古代王宫是一组围绕中央庭院、庞大而复杂的建筑群，附近还有许多小宫、商馆、剧场、陵墓、工商业集市和居民住宅区等，这里是一座拥有 8 万人口的城市。克诺索斯王宫在旧王宫时期多次扩建，其建筑设计和建造技术不断完善。新王宫时期最后建成的王宫倚山而建，西高东低，占地约 2.2 万平方米，有人估计大小厅堂房舍至少有 1500 间以上。宫内楼层密接，梯道走廊迂回曲折、多变，加之许多厅堂馆室在设计上的不对称性，外人很难探知这座错综复杂、出奇制巧的王宫。在希腊神话中，有一个关于南海米诺斯王“迷宫”的故事，大概就是由此而来吧！整个王宫以中央庭院为中心，它长约 60 米，宽约 30 米，是宫内最大的庭院。中央庭院靠西边的楼房是国王办公、祭祀的场所，这里神龛神坛整齐排列，办公集会的厅堂和祭仪大厅金碧辉煌、富丽豪华，此外，还有贮存油酒、收藏财物的陶罐、库房。中央庭院东边是国王及王后的寝宫、接待厅及学堂、作坊等生活机构和设施。从这些生活设施的建造中可以看出，米诺斯文明时期工匠们在建筑设计构思上富有惊人的智慧。那上粗下细的圆柱形结构和冬日能保暖、夏天可通风的折叠门扇，那宽敞的浴室内精巧的陶制浴盆及冲水设备，以及从宫外 10 公里远的山上把清泉引入宫内的陶制管道和抛物线形的引水沟槽等等，无不闪耀着古代科学技术的光辉。

公元前 15 世纪，可能由于受内部或外部危机的影响，

米诺斯文明出现了低潮。公元前1450年前后，希腊本土日渐强大的迈锡尼在控制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各地和爱琴海诸岛后，占领了克诺索斯王宫。这一历史变故，标志着米诺斯文明将退出历史舞台而为迈锡尼文明所取代，爱琴文明也由克里特文明时期转入迈锡尼文明时期。

（三）迈锡尼文明

迈锡尼文明是在米诺斯文明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迈锡尼文明以迈锡尼城而得名。实际上，它是希腊本土较发达的青铜文化的通称，而迈锡尼则是最强大并起主导作用的国家，所以，史学上一般称其为迈锡尼文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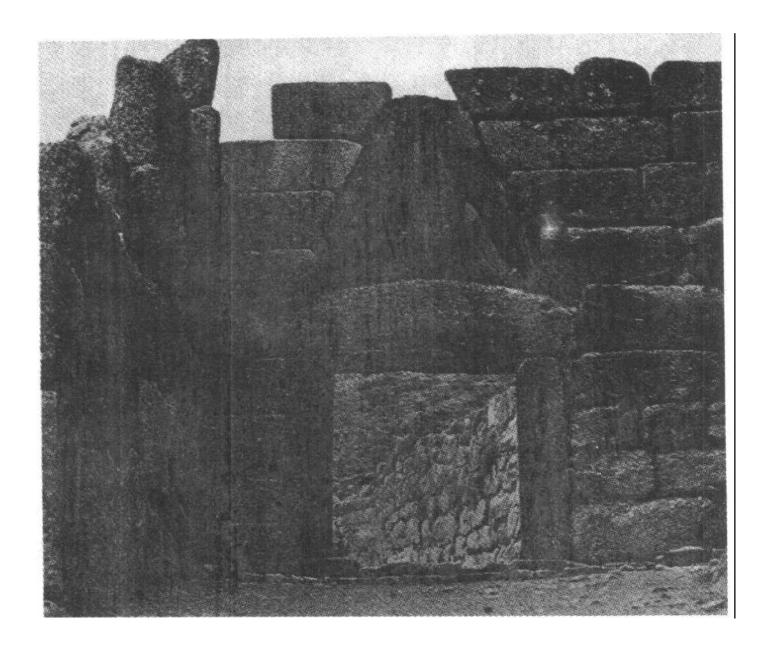
迈锡尼文明主要是通过考古发掘才为人们所知的。根据考古资料，公元前1600年左右，在迈锡尼出现了竖井穴墓。这些竖井穴墓是在地下数米深处用石板砖砌成的方形墓室，顶上用圆木或石板做盖，地面部分用土隆起，上面安置刻有士兵车马图案的墓碑。谢里曼在发掘中，发现这些墓穴中金面具、金角杯、金额带、金指环、金印章以及用金银镶嵌的青铜剑和金杯银罐等陪葬品很多，还有克里特制造的匕首，刀上有极为精致的镶嵌图画。这些作品在形制和风格上主要是仿效米诺斯文明，其工艺之精绝令人叹为观止。

公元前1500年前后，圆顶墓取代了竖井墓，这是一种更为宏大富丽的石墓，被认为是国王的坟墓，因而这一时期统治迈锡尼的王朝又称为“圆顶墓王朝”。圆顶墓王朝是迈锡尼文明成熟与繁荣的时期。和竖井墓相比，圆顶墓不是把墓室置于地下，而是在地面凿岩砌石修建圆形墓，墓前有走廊通向圆形墓室。这是一种宏伟的石造陵墓建筑，风格和形

制很可能仿效克里特，但规模之大却是克里特没有的。在圆顶墓王朝之初，迈锡尼生产力迅速发展，金属冶炼和手工业品制造技术达到较高的水平，同时商业也发达起来，海外贸易方面，其范围和数量大大超过米诺斯。考古学家在埃及、腓尼基、叙利亚、塞浦路斯及意大利南部、利巴拉群岛等地发现了许多迈锡尼陶器，其数量比各地已发现的米诺斯陶器还要多，这说明，迈锡尼在当时发展极盛，呈现一派兴旺景象。

迈锡尼人在公元前 15 世纪占领克诺索斯王宫后，在米诺斯的线形文字符号基础上发明了线形文字 B，并把线形文字 B 带回希腊本土，在各地广泛使用。考古学者在迈锡尼、派罗斯王宫和诺萨斯等古城遗址发掘出了大量线文 B 泥版文书。1952 年前后，英国学者米开尔·文特里斯和查德威克经过艰苦的努力，使线形文字 B 释读成功，这为人们研究迈锡尼文明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经过研究，人们明白了线形文字 B，实际上是希腊文最早的一种写法，从使用范围可以看出，当年克里特岛与希腊本土的联系是很密切的。

迈锡尼文明在建筑艺术方面成就突出。除了前面说的竖井墓和圆顶墓等陵墓建筑外，还有迈锡尼城墙，阿伽门农王宫等大型建筑。迈锡尼的卫城周围共约一公里，城墙用石块垒成。西北方向有中央大门。这是一座宏伟的建筑，它象征着迈锡尼王不可动摇的强大威力。四个整块的巨石构成了两扇门框、门槛和门的拱顶，在巨石门楣上面有一个三角形的拱券，其间浮雕着两个侧身而立的狮子，它们的脚爪踏在祭坛上，威风凛凛地俯视着走进城门的人。这座城门因此被人们称为“狮子门”。狮子门的入口处有坚固的四角形棱堡保卫着，是很难攻克的。迈锡尼城墙随地形起伏，一会儿沿山



狮子门遗址

岗蜿蜒而上，一会儿向山谷俯伸。在城堡东部修筑了两条狭窄的城墙通道，可能是准备在城堡被围时作小规模突围用的。城墙东北部还有一个进入城堡的门，比狮子门窄小，但建筑方法和结构与狮子门相同。迈锡尼王宫是国王阿伽门农的住所，位于山岗顶上。王宫内装饰豪华，庭院的地板和墙壁都涂上彩色，黄、蓝、红的线条在正方形里构成了复杂的图案，有的房间地面铺着石膏板，墙上有壁画点缀。宫内生活设施齐全，带炉灶的寝室、浴室，还有排除脏水的陶土阴沟等。

绘画和美术也反映出迈锡尼文明的成就。迈锡尼壁画题材广泛，有的和克里特壁画内容相同，有的表现当地风光。

有一幅壁画描写一位长发妇女，身穿短切的花边红上衣，紧扎着彩条纹的长裙，双手托持象牙圆盒朝前行走。作者用简练的笔触和平静的图案装饰表现了人物的生动神态。还有描写狩猎野猪、《女猎人出行》等内容的壁画，表现明快，装饰风格很浓。在迈锡尼发掘中，还有一些精致的工艺品，它所体现的高度技巧和雕刻、绘画艺术密不可分。在陶器上那些海栖动植物，如被水摇动悠然自得的海藻，那欢快戏嬉的乌贼章鱼等，都表现得无比生动、惟妙惟肖。在雕刻方面，除了"狮子门"上的浮雕狮子外，还有墓室中的石板浮雕。但最能反映雕刻技艺的是一些金属工艺品上的装饰雕刻。在迈锡尼墓穴中发现了许多如金杯等黄金制品，上面装饰着精巧的雕刻图案，十分美丽。这些作品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而且反映出能工巧匠们高度的写实技艺和对现实生活深刻的观察表现能力。

公元前 12 世纪，迈锡尼文明由极盛渐渐走向衰落。这一时期，与迈锡尼商贸频繁的埃及、赫梯等国家也面临由盛而衰，迈锡尼贸易减少，经济受到影响。在内部，一方面，迈锡尼常常遭受外族侵扰，引起社会动荡，另一方面，国内阶级矛盾日渐加剧，政局不稳。这些情况，从考古材料中反映的城堡修建频繁和希腊神话传说中隐约提及的王朝更换较快等迹象中，可窥见一斑。经济上的衰败必然导致武力掠夺。希腊本土上各城邦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越演越烈，其中最大的一次战争就是特洛伊战争。位于小亚东北海岸的特洛伊，土地肥沃，阳光充足，加上宽阔的平原很适合农牧业发展；由于工商贸易发达，金银财富甚丰，又出产美酒良马，因而相当富裕。为了掠夺特洛伊的财富，以迈锡尼为首的希腊诸国组成强大联军，东渡爱琴海，远征特洛伊，奋战

10年，仍未攻克特洛伊城。据说，希腊人最后使用“木马计”① 才攻城得手，夺取胜利。然而，这次战争对希腊人来说不仅没有掠取和垄断财富，反而弄得疲备不堪，不仅国力未振，反而损失惨重，许多人战死沙场，幸存回国者也难免厄运。国王阿伽门农回国后被其妻伙同奸夫残害，迈锡尼宫廷陷入混乱，流血悲剧不断发生；斯巴达王门涅劳斯和妻子海伦在外漂泊8年后才回故里；“木马计”的发明者、多智多勇的奥德赛也在漂流达10年之久才与家人团聚。由此可见，特洛伊战争的最后结果是特洛伊毁灭，迈锡尼文明日渐衰落。希腊人的另一部族多利亚人从希腊北部乘虚而入，逐步征服了迈锡尼等国，迈锡尼文明随之中断，希腊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

① 根据希腊传说，奥德修斯发明制造了奇大无比的木马后，一天早上，希腊人拖船下水，佯装离去。特洛伊人跑到岸边看到木马，一个被俘的希腊人告诉他们，他的同胞已丧失胜利的信心，乘船返回，木马是献给雅典娜的礼物，为了不让特洛伊人把它拖进城才造得如此之大。特洛伊人不听警告，拆了一段城墙把木马拖进城里放到卫城上。夜深人静，特洛伊人进入梦乡后，木马肚子上的门悄然打开，奥德修斯等希腊英雄从木马里爬出，为偷偷返回的希腊人打开城门。希腊人用奥德修斯的木马计里应外合，攻克了特洛伊，夺取了战斗胜利。

二　荷马时期

（一）荷马史诗和荷马时代

公元前 12 世纪到前 8 世纪，希腊历史发展经历了一个落后倒退又孕育发展的曲折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文化遗产是荷马史诗，它包话《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作品，是欧洲最早的文学巨著。由于相传是古希腊的荷马所作，所以称为荷马史诗。

在古希腊，荷马史诗被人们看作智慧的海洋，知识的宝库。许多人能背诵诗的全文，一些重大庆典都朗诵荷马史诗的篇章，在学校，荷马史诗也是学生们必须吟诵的。人们尊崇荷马，更热爱这壮丽的英雄史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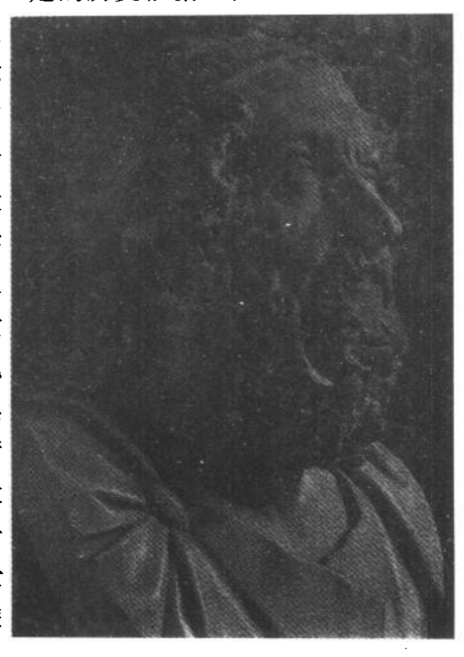
荷马史诗的诗体是古代行吟诗人所用的一种“六音节诗”，每行约有 12 个轻重音，朗诵起来很好听。《伊利亚特》共 24 卷，15693 行，主要叙述希腊盟军围攻特洛伊的故事。英勇的将领阿喀琉斯因盟军统帅阿伽门农夺其女奴而愤然退出战场，使希腊人屡遭失败，后因其最亲密的战友战死疆场，他又复出投入战斗，直至枪杀特洛伊主将赫克托尔，特洛伊国王普里安姆哀求讨回赫克托尔的尸体举行葬礼。至此，这部壮丽的故事打上句号。《奥德赛》共 12110 行，主要叙述伊大卡国王奥德修斯在攻克特洛伊后回国途中十年漂泊，历经艰险的故事。诗中描写了奥德修斯海上漂泊中到处

遭难，在流落异域期间其妻子被伊大卡及临国贵族们欺侮，并被逼迫改嫁，其妻巧施计谋拖延求婚者。最后，奥德修斯受诸神怜悯，扮成乞丐还乡归家，与其妻一一杀掉求婚的贵族们，从而恢复了他在伊大卡王国的权力。这两部宏伟的篇章和光辉的杰作，不仅是古代西方文学的宝贵财富，而且是我们研究和了解迈锡尼文明覆亡后希腊社会一个时期的重要资料。荷马史诗也是希腊民族童年时代的写照，它不仅是研究古希腊文明起源的最宝贵的文字资料，而且反映了整个人类在童年时代所共有的许多特性，具有极大的认识论意义和研究价值。

德国学者谢里曼和英国学者伊文思的考古发现证明，荷马史诗是有一定历史依据的。史诗最初形成大概在公元前10世纪左右，但描写的都是古代社会在公元前2000年下半叶到前1000年初叶地中海东部一带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形态的壮丽故事。这两部史诗最初是以民间口头文学流传的，流传期间经过不断的加工创造，语言更加精炼，故事更加丰富。再后来用文字把故事和情节固定下来，流传中又经过几个世纪的加工修改，最后才成为现在的形式。关于史诗的作者荷马，也许并无其人，只是史诗的一个代称，或者确有其人，他可能就是这壮丽的英雄赞歌所歌颂的英雄原型或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也可能他是把民间传说用叙事诗的形式最后用文字形式整理固定下来的人。但人们一般都相信，荷马这个人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他是这两部史诗的创造者，是把古代英雄传说用史诗这种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的伟大诗人。古代许多职业歌手、乐师或文学艺人，黑眼瞎子居多，他们或是被人弄瞎成为专事歌乐的奴隶，或是由于生病导致双目失明而选择这种职业以求谋生。传说荷马也是一位瞎了

眼睛的盲人，这也许有一定的历史根据吧？

关于荷马史诗所反映的历史阶段如何称呼，史学界似乎还没有定论。由于这一时期希腊留下来的主要文化遗产是荷马史诗，西方学者们习惯比照欧洲历史上罗马帝国灭亡后中世纪出现的文化落后现象，把那个时期称为黑暗时代的说法，而把荷马史诗反映的历史阶段称黑暗时期。大概由于荷马史诗所描写的是壮丽的英雄故事，因而摩尔根在《古代社会》、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都把这一时期称为英雄时代。我国学术界则习惯于将其称之为荷马时代，因为我们了解这一时代的文献史料主要来自荷马史诗。当然，随着考古新发现和对古代历史研究的逐步深入，荷马史诗对这一时期提供的史料会越来越有限，因而也有学者提出按这一时期已发掘陶器，称此期的文明为原始几何形和几何形风格时期。



荷　马

按摩尔根对历史时期的划分，荷马时代大致处于野蛮时代高级阶段的全盛时期。我们从荷马史诗特别是《伊利亚特》中可以看到：完善的铁器、风箱、手磨、陶工的辘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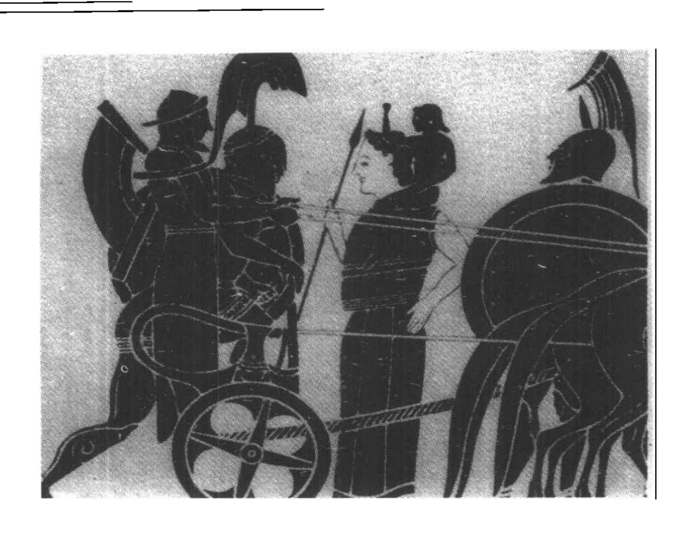
榨油和酿酒、作为手工艺的发达的金属加工、货车和战车、用原木和木板造船、作为艺术的建筑术的萌芽、由设雉堞和炮楼的城墙围起来的城市、荷马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这些“遗产”，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荷马时代的社会状况。

（二）荷马时代的社会状况

荷马时代对历史进步最重要的推动是铁器的使用。铁器的出现和使用，是荷马时代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荷马时代的社会状况和历史发展就是奠定在这种生产力基础上的。

荷马时代的希腊，由于铁器的广泛使用和推广，使农业和手工业大大发展起来。那时候，农业是大多数居民从事的最主要的生产活动。古代希腊山多地薄，土坡坚硬，再加上灌木丛生，盘根错节，铁器工具如铁斧和铁锄等就成为伐树垦荒，变山丘、丛林为田亩的最有效的农具，因而在当时最受欢迎，甚至一些重大活动都用生铁做奖品。《伊里亚特》在叙述阿喀琉斯为阵亡的战友举行盛大葬礼时所开的运动会上，发给投掷铁饼运动员的奖品就是一块生铁，诗人说有了这块铁，耕夫牧人就不会因缺铁而进城去，因为家中将有足够的铁用了。铁器的使用，也大大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荷马的两部史诗都提到许多铁匠用的工具，如锤、钳、钻、风箱等，还提到金银匠、皮匠、木匠等。尽管荷马时代的金银工艺技术和其他手工技艺还不及迈锡尼文明时期，但造船业却达到或超过了迈锡尼文明的水平，并保持了较高水平。

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荷马时代的社会进化。荷马时代的



赫克托尔与安德罗马克分别

氏族已经到父系氏族阶段，若干氏族组成一个胞族，若干个胞族组成一个部落。若干邻近的部落又组成联盟。荷马时代的希腊还没有奴隶制国家，但部落联盟已为以后的希腊城邦国家产生形成了雏型，奠定了基础。这些远古的部落是军事性和宗教性的结合，每个部落都有固定的地区，祝神献祭和部落集会都在那里举行。处在军事民主制阶段的部落和部落联盟，其组织机构是这样的：首先是议事会。这个机构在以往可能是由氏族的首长组成，现在则成了氏族贵族的会议。议事会是一个常设机构，代表部落处理日常事务，有关内务外交大事都要在议事会讨论通过，因而具有广泛的权力。其次是人民大会。由部落里的全体成年男子（全体战士）参加，参加人员可以发言并参与对重大事情的表决。人民大会原则上是最高权力机关，遇到战争等紧要关头，这种会议经常举行。不过从史诗中反映的情况看，人民大会实际上已被

贵族所把持，战士在会上的发言如触犯了贵族，是要遭到打击报复的。再次是军事首长（希腊语为巴赛勒斯），其主要职权是统率军队指挥作战，同时掌管宗教祭祀。原则上他们由人民大会选举产生，但实际上已逐步世袭。在军事民主制下，军事首长的统率权和议事会、人民大会并存。

荷马史诗中所说的“英雄”，大多是描写军事首长及那些掌握特权的贵族。在氏族内部，普通成员从公社的公共田地里领得小块份地为生，贵族们则从公社田地中占有大片土地。许多氏族成员逐渐陷入贫困，失去自己那份土地而被迫去给富人做雇工，有的甚至沦为乞丐，而占有大片土地的贵族们则拥有大量的畜群和财物，并开始雇工给他们在农田劳作和放牧畜群。荷马史诗中常常提到奴隶和女奴，特别是《奥德赛》在描写奥德修斯家乡时提到，他家里有五个女奴，分别从事纺织、磨面等家务劳动。此外，还有许多进行耕种和做手工业的男奴。奴隶的主要来源是战争俘虏。那时在战争中的战败者只有两种命运，或者被杀、或者沦为奴隶。保全奴隶的性命，无论对奴隶还是对社会发展，无疑是一种进步。战俘中有的直接成战胜者的奴隶，有的被战胜者卖给奴隶贩子，再转卖给他人做奴隶，以腓尼基为主的海外商人经常拐卖人口，甚至到处掠夺，身兼海盗和奴隶贩子的角色。主人对奴隶是相当残酷的，他们不仅可以把奴隶卖出，而且可以把奴隶处死。据《奥德赛》记载，一次奥德修斯远行归来，发现家里的女奴对他不忠诚，就凶残地把她们处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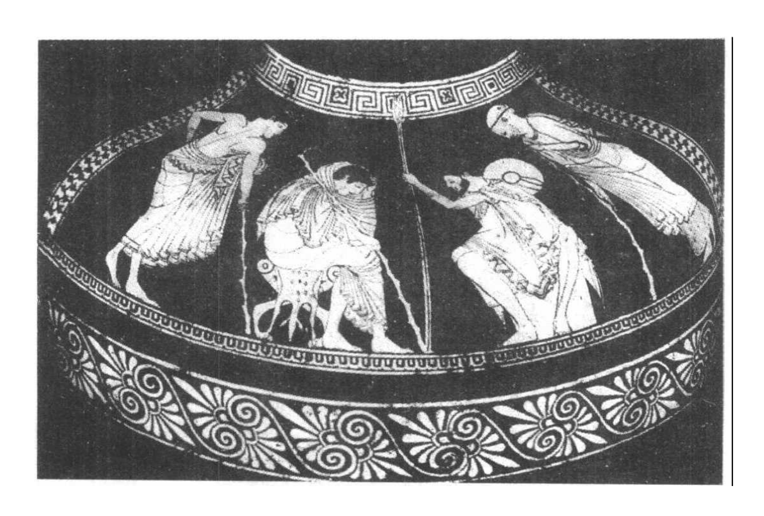
荷马时代盛行的是一夫一妻制家庭，这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在男子的统给权逐步加强和女奴隶的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妇女的地位降低了。只要读一下《奥德赛》，就可以看到特里曼珠是怎样打断他母亲的话并迫使她缄默。



阿喀琉斯

在荷马的史诗中，被俘虏的年轻妇女都成了胜利者肉欲的牺牲品；军事首领们按照他们的军级依次选择其中最美丽者；大家也知道，全部《伊利亚特》的故事都是以阿喀琉斯和阿伽门农二人争夺一个女奴而引起的纠纷为中心的。荷马史诗每提到一个英雄，都要讲到同他共享帐篷和枕席的被俘的姑娘。这些姑娘也被带回胜利者的故乡和家里去同居。这些女奴同主人所生的子女被认为是自由民，可以得到父亲的一小部分遗产。作为正式妻子，只能容忍这一切。她必须严格保持贞操，否则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尽管随着氏族内部分化，氏族贵族开始剥削奴隶的劳动，但决不能据此认为荷马时代已经进入奴隶社会。我们从史诗中可以看到，古代氏族组织虽然开始瓦解，但在当时还是很有活力的。每个自由民都是一名战士，但在那时还没有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常备军，至于监狱和法庭就更谈不上了。议事会、人民大会和军事首长虽然是常设机构，对一切重大问题有做出最后决定的最高权力，但在这一时期已经开始逐步瓦解，因为：由子女继承财产的父权制，促进了财产在家庭中的积累，并且使家庭变成一种与氏族对立的力量；由于财产的差别，通过世袭显贵和王权的萌芽的形成，对社会制度发生反作用；古代那种部落之间的战争已经开始蜕变为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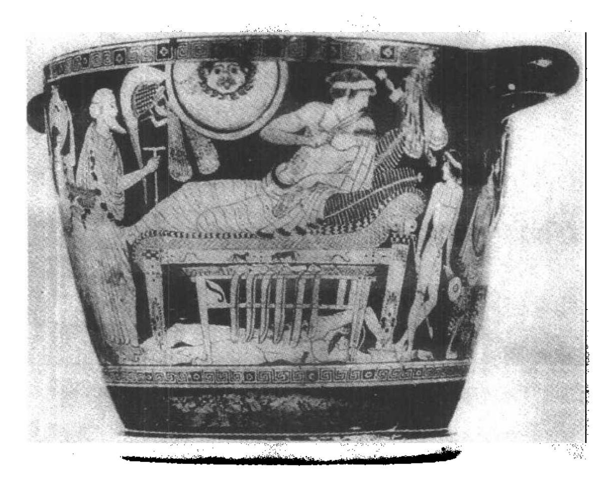
阿喀琉斯会见使团

陆上和海上以争夺财富和奴隶而不断进行的抢劫或掠夺。这时候，国家即将产生了，远古希腊已处在文明时代的门槛上了。

（三）荷马时代的文化

对于荷马时代的文化，我们可以从考古发现和精神成果两个方面加以说明。在历史上，荷马时代的考古文化也称作几何形风格的文化，它由原始几何形和几何形两个阶段组成。从考古发现看，原始几何形风格的文化在陶器上的表现特征是，喜用多管笔在器物上描绘平行的线纹、波浪式线纹和同心圆图案，看起来线条分明，有简有略。而几何形风格则通常用多种几何形图案组成装饰性图案，以此布满器物全身。起初，在几何线纹中杂以虫鱼鸟兽等动物图案，到后

来，则在器物颈部、腹部画以带几何形图案风格的人物形象。



普里阿摩斯赎取赫克托尔的尸体

“几何形风格”的陶瓶，是保存到现在的美术作品中最早的作品。这些作品，一般是在陶器的淡黄色背景上用棕色颜料画上几何形图案，以装饰陶瓶。这些图案以互相衔接的环形状绘在陶瓶上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环形画布满陶瓶整个表面。考古学家们在雅典狄庇隆古墓中发掘出来的公元前9世纪至前8世纪狄庇隆陶瓶，可以说是“几何形风格”最全面、最典型的作品。这些几乎与人等高的陶瓶，两耳装饰十分华丽。它不仅使用单线的几何形素材，而且用云卷状纹样来构图；不仅用几何形图案来装饰，面且广泛地采用了图案化的植物与动物装饰——在装饰图案的某些部分刻划着鸟、兽等动物形体，以增强画面的鲜明性。由此可见，狄庇隆陶瓶的主要特征是在纹样图案上加上简单的情节描绘，加

上图案化的、几何符号式的动、植物及人的形体。尽管和克里特——迈锡尼陶瓶上的图画相比，它是粗糙的、幼稚的，但就阶级社会以前艺术发展而言，它无疑是一种进步。

荷马时代的雕塑作品是荷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的雕塑作品保存到现在的只有小型雕塑。这些作品一般是用赤陶土、象牙或青铜制成，作品上刻划着神与英雄人物形象，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供祭祀之用的。考古学家们在比奥西亚出土的赤陶土小雕塑上，看到了画满密密麻麻的纹样，造型虽稚拙，但形象完整，引人入胜。青铜小雕塑是荷马时代雕塑作品的一部分。在奥林比亚出土的属于荷马时期末叶的作品如《赫克里斯与山陀儿》和《马》等小雕像，表现出纯朴稚拙及图案化的鲜明风格。公元前8世纪，在比奥西亚出土的《阿波罗》小雕像，虽然在身长比例与一般形体结构上，与克里特——迈锡尼美术作品中表现方式较近似，但在面部与形体的表现上比较死板虚套和公式化，因而与克里特——迈锡尼作品中描绘的人物有明显区别。

荷马时代希腊建筑中那些最古老的建筑遗物的残留部分，基本上运用了一些迈锡尼的建筑风格。比如，作为供物台的庭园一般设计在神殿内部，建筑物正面设计两根柱子。在最古老的那些建筑物中，一般是用生砖和木制骨架构成的墙垣，墙垣是用石头奠基的。可见，荷马时代的建筑处于初期发展阶段。

荷马时代在精神文化方面，最集中的表现是荷马史诗本身，这是荷马时代留给后世人惟一的文化遗产和精神成果。

古往今来，论及荷马史诗和作者其人的著作真是汗牛充栋，由此发生了所谓的“荷马问题”。关于荷马问题的其他内容在此不论，这里要说明的是，荷马史诗创作依据的素材

主要形成于几何形风格时期，这实际上反映出这一时期的文化成就。在浩如烟海的“荷马问题”研究资料中，关于荷马史诗的创作源泉和时间，一般较流行的看法是，史诗是由古代民歌、神话和英雄传说发展而成的，尽管史诗的起源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古老的传说，可能早在迈锡尼末年的宫廷和民间歌手中就已经开始流传和发生。在特洛伊战争那样激动人心的事件中，产生了许多英雄传说，某些英雄人物的真实名字可能在诗中留下痕迹，还有一些神话人物名字，其中一部分名字成为民间崇拜的根源。有时候，古代歌谣所咏及的那些真实史迹，在史诗悠长的创作和流传过程中，逐步带上了神话和传说色彩。一些英雄战迹故事中也加有战斗、游历及其种种历险性描写，这些历险情节的素材可能出自腓尼基作品。这些诗体故事由行吟诗人和朗诵者代代相传，特别是每逢盛宴或节日，诗朗诵者便在军事首领及其战友的宫邸中弦歌咏唱，对史诗的加工和成型起了重要作用。从时间上说，与其他民族的英雄史诗类比，我们可以看出：从特洛伊战争到形成有关传说，然后再把这些东鳞西爪的故事和颂歌加工整理成一部有机的大型史诗，时间应不少于二三百年。根据许多史料来看，荷马史诗在公元前 6 世纪已经在希腊本土雅典广泛流传。有的学者这样分析：荷马史诗中“多次提到腓尼基城市西顿和西顿出产的布，而这个城市是公元前 677 年被亚述毁灭的。1954 年发现了一个公元前 8 世纪的杯子，上面的铭辞中提到了涅斯托尔的酒杯，学者们认为这很可能是对《伊利亚特》第 11 卷描写的涅斯托尔的酒杯的反映。从这些情况来看，公元前 9 至 8 世纪应是创作荷马史诗

最可能的时间”。[①] 大量史料和研究成果充分表明，荷马史诗的血肉躯干是在几何形风格时期形成的，在这几百年中，那些原始的故事情节、人名、地名经过文学的想像、夸张和典型塑造的创作过程，才成为世界文学的瑰宝和人类早期文化的灿烂明珠。

三 海上贸易和殖民对希腊文明的影响

(一) 希腊城邦的形成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希腊城邦制度，既是希腊古代文明一系列历史条件演变的结果，又是希腊文明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什么是城邦呢？所谓城邦，就是一个城市连同其周围不大的一片乡村区域构成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它同那种包含多个城市、疆域广阔的领土国家是完全不同的。

希腊城邦的形成，最早是移民到小亚爱奥尼亚和伊奥尼亚的各邦，他们为了在异国立足，便要筑城自卫，遂在小亚沿岸和爱琴诸岛建立了许多大小不等的城邦。在中希腊东部的阿提卡半岛、优卑亚岛、爱琴海中部的岛屿直到小亚细亚西岸的中部，建立了很多城邦，被称作伊奥尼亚，米利都、爱非斯、卡尔息斯和雅典等是其中最著名的。在北希腊、中

① 陈洪文：《荷马和〈荷马史诗〉》，北京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14 页——115 页。

希腊西部、南希腊北部以及小亚细亚西岸的北部，也建立了许多城市，重要的有底比斯、达尔斐等。在南希腊的东部和南部、被多利亚人占据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和克里特岛以及小亚细亚西岸的南部，多利亚人通过对被征服居民的奴役而形成武力强盛的城邦，著名的如斯巴达、亚尔果斯、科林斯和麦加拉等，后来科林斯等随海运的恢复和发展而成为商业中心。大约到公元前750年前后，整个希腊世界城邦星罗棋布，文明的光辉开始闪烁。由于这些城邦都是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包括周围若干村落，因而一般都是小国寡民。最小的城邦面积方圆不过几十至上百平方公里，人口不过万余人。最大的城邦斯巴达在强盛时期面积也不过8400平方公里。雅典的面积也只有2556平方公里，全盛时代居民近40万，其中男性公民大约35，000人，其余的人是没有参政权利的妇女、儿童、外来人口和奴隶。

希腊城邦的形成，是荷马时代早期铁器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城邦的形成推动了希腊经济发展，促进了文明进步。公元前8至前6世纪，希腊各地普遍使用铁制工具，希腊本土开始开采铁矿、铜矿。农业上有了铁铧、铁犁、铁锄、铁斧、铁锹，铁制的锤、刀、锯也广泛使用。铁制工具把希腊多山而贫瘠的土地成片地进行开垦和深耕，从而种植了大量谷物、橄榄和葡萄等经济作物，一些地方酿制的葡萄酒和榨制的橄榄油开始行销海外。手工业中，制陶、造船、冶炼业发展比较快。陶器制作技术大有进展，而且注重装饰，过去那种朴素的“几何陶”逐渐被“黑画陶”及“红画陶”所取代，许多绘有精美图画的陶器连同所装的酒、油一同远销异地他国。造船业在原有基础上吸取了腓尼基人的技术，开始建造使用水手近200人的三层桨座大船。农业、手工业和航

海技术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商业贸易。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各地手工业和一部分农业生产明显带有商品生产性质，因而使希腊各地之间以及和其他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起来。公元前7世纪，希腊出现了金属铸币，在小亚的希腊城市中铸币一般以金银合金铸造，而在希腊半岛则通常以银铸造。金属铸币的纷纷出现和广泛使用，大大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于是一批专门从事生产者中介的商人出现了。从此，希腊的活动范围大大超出了自己的本土，逐渐地，他们和东方的商业联系已经超出了爱琴文明时期的水平，希腊本土和爱琴诸岛之间，本土各邦之间，希腊与西部的地中海和黑海地区之间的贸易联系大大加强。这种贸易联系，将带来希腊文明更加辉煌的前景。

（二）海上贸易和殖民运动

希腊人最初来到爱琴海区域时，只是从事畜牧和农耕。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和交换经济的发展，他们逐渐懂得了航海和贸易。加之爱琴海区域那优良的港湾，星罗棋布的岛屿，蔚蓝色的海洋以及辽阔无垠的海域，使人胸怀眼界得以扩展，常常生发起冒险远游的激情。随着造船和航海技术的发展，希腊人开始较普遍地从事海上贸易和殖民活动。这种贸易和殖民的过程，也是希腊人开化和走向文明的过程。

大约从公元前8世纪，希腊人开始渡过海峡，远涉重洋，进行普遍的大规模的殖民运动。所谓殖民，就是把本邦的部分居民迁移到国外甚至海外的地区，让他们在那儿“安营扎寨”，另立家园。这种殖民活动，是由城邦组织并以建立新的城邦即殖民城邦为目的的，它是为了解决自身发展间

题而采取的战略措施。殖民运动历经二三百年，那时候，希腊世界的人们纷纷向四面扩张，殖民者扬帆渡海，开疆立国，展现出一副激动人心的壮丽画卷。希腊人殖民范围很广，南面达到了北非利比亚沿岸，西面进入意大利、伊利里亚、西西里、西班牙和法国沿岸，在北面通过赫勒斯滂海峡而到普罗朋提斯海、黑海的大部分地区。根据统计资料，先后参加殖民的希腊城邦有 40 多个，在上述地区共建殖民城邦 139 个。在地中海、黑海之滨，殖民城邦如一群趴在池塘周围的青蛙，遍地分布，此呼彼应。

希腊殖民活动是由各城邦分头组织进行的，其中西、北两方的殖民活动形成浪潮，经久不衰。在西方，希腊殖民者于公元前 750 年左右开始定居意大利半岛南部，公元前 706 年在此建立塔林敦城，这是斯巴达在海外建立的惟一殖民城邦。在西西里岛上，希腊殖民把早先就移殖到那里的腓尼基人压缩到该岛的西北边，而在那里建邦立国。科林斯于公元前 733 年在此建了叙拉古城，该城后来成为西部地中海地区最大的希腊城邦。雅典旁边的多利亚城邦墨加拉也在岛上建立希白拉亚的墨加拉。克里特岛的多利亚人也在西西里岛上建立盖拉城。中希腊的一些城邦也在西西里岛上建立了殖民城邦。不仅如此，殖民城邦也在其附近新建居民区，这些居民区又发展成新的城邦，那不勒斯、拉乌斯、波西顿尼亚(佩斯顿)、卡马林纳、阿克拉加斯等城邦，都是由一些殖民城邦建的新城邦。这样，西西里岛绝大部分被希腊殖民城邦所占据，许多希腊人移居此地，以致后来罗马人竟把那块地方称为“大希腊”。向北方，米利都所建立的殖民城邦居多。爱琴海西北、色雷斯沿岸、赫勒斯滂海峡和黑海沿岸等地区，是希腊人北向移民的主要区域。希腊人从黑海以北的地

区获得大量谷物、蜂蜜、木材、琥珀以及牲畜和奴隶，并在小亚细亚北部地区开采铁矿。经过殖民开发的黑海广大地区，成为希腊的渔米粮仓，向雅典等大城邦输送鱼粮果干，对希腊文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通往黑海一侧的海角上所建立的拜占廷，后来发展成为欧亚水陆交通的枢纽和历史名城，以至后来罗马帝国以它作东部帝国首都，改名君士坦丁堡，后来又成为东罗马帝国首都。希腊人向南的殖民活动远不及西、北方向。在为数不多的殖民城邦中，有一个经埃及同意建立在尼罗河三角洲上带有商站性质的殖民点——瑙克拉提斯是值得重视的，据说这是埃及26王朝法老阿马希斯为了给瑙克拉提斯的希腊人以经商自主权。据考古史料，希腊人来埃及经商可能还要早。希腊人和来埃及经商谋生的人集中在一起，那里商品云集，货运繁忙，一片繁荣景象。瑙克拉提斯殖民城邦的建立，对勾通希腊和埃及的联系，加强海上贸易，促进东西方文明交流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我们了解了希腊殖民运动的一般情况后，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能使希腊殖民运动如此风起云涌，方兴未艾？

从经济根源上说，解决土地不足、人口、灾荒问题是其根本原因。古代希腊山多，土地贫瘠，一旦人口增长，生产发展，耕地不足是一个突出问题。那时，为数不多的土地被贵族把持，农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人口增长，土地不足，一遇灾荒，生存危机，这对于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的希腊人来说，是一个十分尖锐而严竣的现实问题。在古代生产力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人们无力改变这种状况，只有向外移民，扩大定居范围。马克思在分析希腊和罗马建立殖民地根源时，非常精辟地指出："在古代国家，在希腊和罗马，采取周期

性地建立殖民地形式的强迫移民是社会制度的一个固定环节。这两个国家的整个制度都是建立在人口的一定限度上的，超过这个限度，古代文明就有毁灭的危险。……由于生产力不够发展，公民权要由一种不可违反的一定数量对比关系来决定。那时，惟一的出路就是强迫移民。"①

从经济发展来看，希腊殖民运动是与商业贸易密切相关的。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使一些生产活动和产品带有商品性质。希腊人为了把自己的产品向外推销，通过交换获得自己必需的其他产品，这就需要广泛密切的商业贸易，扩大海外市场，发展商品经济。殖民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因而得益最大的是商业贸易的发展。希腊本土各城邦从殖民地区获得粮食和金属原料，又将本土所产的葡萄酒、橄榄油及手工业品行销殖民地区。这种贸易往来，不仅大大促进了奴隶制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为希腊文明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从政治上看，希腊殖民运动是为了给在贵族与平民斗争中失去公民权的人寻找出路，以平息社会矛盾。移民者有的是贫富分化过程中破产失地的农民，为生活所迫而外流，这些人由于氏族纽带的崩解和阶级分化而导致贫无立锥之地，为了避免当奴隶的悲惨命运，他们纷纷到海外去寻找安身立命的地方。有的是在城邦政治斗争中失败的集团和平民，这些人往往离乡背井，去海外拓展他们的新事业。还有一些政治野心家、"骚乱分子"也被纳入强迫移民之列。亚里斯多德在其《政治学》中讲了这样一件事：相传，斯巴达男性公民长期在外攻打美塞尼亚，国内妇女生了一批私生子。斯巴

①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618页——619页。

达人战胜归来，称他们是“处女之子”而不予承认。这些人由于没有公民权和不能分得土地而密谋起义，密谋泄露后，被强迫送往塔林敦去殖民。从本质上说，“私生子”之说，只不过是一种借口，其根本问题还是土地斗争和密谋起义的政治原因。

（三） 海上贸易和殖民对希腊文明的积极影响

海上贸易和殖民，在促进希腊经济和文化发展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它加强了希腊各邦和海外各地的商业联系，为希腊人接触并吸收埃及、腓尼基的文化提供了条件，从而大大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传播。

第一，海上贸易和殖民活动，大大刺激了希腊各城邦工商业的发展。希腊一些殖民地如黑海北岸的殖民地，起初是农业性质的，由于特别有利的地理位置，很快便成为商业性质的殖民地，成为对东北方贸易的集散中心。公元前7世纪与前6世纪间，在黑海北岸地区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斯基泰王国，希腊人跟斯基泰人有着频繁密切的商贸往来。当地人用奴隶、谷物、羊毛、干鱼来换取希腊人的手工产品、油和酒。斯基泰的王子们往往以中介商的面目出现，他们从臣民们那里榨取大量良种小麦，输送到产粮不多的希腊去。希腊人在埃及作为法老王雇佣兵的一部分人，最初也是以商人姿态出现的。希腊人建立在尼罗河流域的殖民地瑙克拉提斯，也因其有利的商业地位和肥沃的土壤，达到高度的繁荣和发展。殖民活动不仅影响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变革和发展，而且直接影响着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及贸易的扩大。海外贸易极大助长了手工业及其技术发展。公元前7世纪，熔接铁的技

术和方法就发明了，小亚细亚诸城市以生产铁器、铜器、青铜器而知名；人们对衣物、纺织品、花布、家庭用品的需求，引起了纺织业、冶金业、制革业等的发展。这些手工业品，是当时商业贸易的主要内容。手工业产品的丰富又加速了商业贸易，希腊城邦与城邦之间，殖民城邦之间，殖民城邦与本土城邦之间，发生着密切的商务联系，形成希腊内外很大的贸易圈。度量衡制和钱币的发明和使用，也表明公元前 8—前 6 世纪希腊世界高度的经济贸易水平。

第二，腓尼基字母的传入，促进了希腊文明的进化和东西方文化的发展。大约在公元前 9 世纪，腓尼基人就已经在使用字母，这些字母共有 22 个，没有元音。随着商业上的往来，这些字母传到希腊人手中，形成希腊字母。希腊人在学习使用腓尼基字母基础上加入了几个元音字母，和所有辅音字母一起使用，使其能尽到字母的作用。这些经过希腊人改造过的字母称为“希腊字母”，后来又传入罗马，形成拉丁字母。而希腊、拉丁字母便是后来欧洲各国文字字母的嫡祖。腓尼基字母传入后，埃及的纸草、笔、墨也陆续传入希腊。公元前 700 年前后，希腊人开始较广泛地用字母写字，至此，希腊历史真正进入了有文字记载的时代。腓尼基字母对促进古代各族各国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化发展做出了伟大贡献，但这种贡献，则是在广泛的商业贸易活动中传播和实现的。

第三，海上贸易和殖民，对东西方文明全面传播与迅速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对希腊来说，海上贸易和殖民活动的意义不仅限于商业等贸易经济方面，更重要的是东方文明对希腊的影响，希腊人及时吸取了东方文明历经数千年才达到的丰富成果，从而逐步揭开了希腊文明光辉灿烂的篇章。那时

候的情景是波澜壮阔、激动人心的，希腊本土和四周殖民城邦构成的整个希腊世界，东与埃及、叙利亚、巴比伦等文明地区相连，西与中欧、西欧内陆地区接壤，南及非洲，北出黑海，形成了一个东方与西方、海洋与大陆交互影响的、古代地中海最大的经济贸易圈和文化圈。在这种情况下，海上贸易和殖民不仅在文化交流方面给希腊人带来更多的文明成果，而且开阔了他们的眼界，加强了他们对世界的认识，有利于他们很快赶上世界发展形势，步入世界文明的金光大道。在政治上，经济贸易的发展使工商业奴隶主力量日益壮大，从而使平民反对贵族，工商业奴隶主反对贵族奴隶主的斗争不断深入，这对古代文明中民主政治的建立具有重要作用。事实上，希腊文明虽然以东方遗产为起点，但后来取得的杰出成就都是其他民族无法比拟的。希腊古典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和朴素辨证法，自然科学方面的初步发现和成就，文学艺术中的现实主义，等等，对整个西方文明产生了巨大影响，以至恩格斯说希腊这个“小民族”却获得了“大成就”。

四　斯巴达和雅典国家的形成

（一）希腊城邦政治

希腊各城邦形成初期，公民有较充分的政治权力，成年男性公民可以参加公民大会，这实际上是军事民主制下民众会的延续。后来，政权被氏族贵族独占。贵族们为了巩固其

特权地位，他们单纯地从贵族中选举官员，极力削减民众会权力，一切权力都集中在由议事会转化而来的贵族会议那里，公民大会成为一种表决形式。在当时，平民的主要成份是小农，也包括手工业者。随着贵族政治的推行，平民与贵族的对立也日益加剧。公元前 8—前 6 世纪，希腊历史上充满了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尽管各地斗争情况不同，但总的来说，平民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氏族贵族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击，他们不是被推翻，就是对平民的剥削和压迫受到一定限制。

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使奴隶制民主政治得到发展。特别是像雅典这样的大城邦，在斗争发展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较彻底的民主政治，不仅在希腊城邦产生很大影响，而且在世界文明史上首倡政治民主，开创民主政治新道路，对人类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方面，我们在后边还将论及。

需要指出的是，在希腊城邦平民与贵族斗争过程中，曾出现过“僭主政治”。僭主政治起初具有一些进步意义，但因后来走向反面而未能持久。它实际上是希腊民主政治的一种前奏。

“僭主”一词，希腊原文为“tyrannos”，转为拉丁字的“tyrant”。希腊人使用的这个词来自小亚，与君王同义，专指城邦政治中暂时恃权专制的头领。可见，僭主就是依靠武力僭越夺权的个人统治者。僭主在施行统治时，往往采取打击贵族改善平民处境的政策，推动了工商业发展和民主政治的进步，因而在历史上曾起了积极作用。但僭主的独裁政治毕竟与城邦公民的民主政治原则相对立，加之后代僭主的骄奢残暴，这种政治统治未能坚持下去。在近代，西方僭主这个概念被用在很不好的意义上，中文译为“暴君”。从本质

意义上说，僭主是不合法的王，因为僭主是未通过选举而取得政权的独裁者。虽然王和僭主事实上具有同样的最高的权力，但王被视为合法首领，僭主则被视为不合法的王。

僭主政治是希腊城邦特殊条件下的产物，初期僭主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作用。希腊城邦绝大部分是一些蕞尔小邦，尽管僭主们周围也围绕着一批雇佣的卫队、顾问，但它和那种深宫幽居，故示神秘，森严戒备，盛饰仪仗的帝王毕竟有很大区别。在希腊古代王权传统逐渐被航海贸易、神人同形的宗教所摧毁的时候，贵族阶级也处在一种玩世不恭精神的状态下。僭主们夺取政权后，成为事实上的专制君主就成为很自然的事了。初期的僭主所取代的政权基本上是贵族寡头政权，所依靠的力量，是无法忍受经济上惨遭剥削和政治上无权的平民。因而在他们夺权以后，必然实行牺牲贵族、有利平民的政策。僭主政治是在贵族政权无力统治下去，平民阶级尚未成熟，还未达到组织起来进行革命，建立民主政权，两个阶级之间斗争胜负不决、两败俱伤的情况下出现的凌驾于两个阶级之上的僭主专制政体，它用暴力来把社会维持在一定秩序之内。从公元前 7—前 6 世纪的希腊世界可以看出，僭主政体以后，很快出现了比较普遍的民主政治时代。由此可见，在希腊文明史上，僭主政体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是贵族专制到民主政治的一种过渡。

这种具有进步作用的僭主政治在最初时期使许多城邦获得发展，国力强盛起来，亚尔果斯、科林斯、西夕温、墨加拉等城邦建立僭主政治后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亚尔果斯的僭主斐冬（约公元前 670—前 660 年）夺取政权后，立志重振亚尔果斯在伯罗奔尼撒的霸权，使亚尔果斯一度成为希腊强国之一。科林斯僭主连续了 3 代。与亚尔果斯僭主斐冬的

功绩主要在军事方面不同，科林斯3代僭主，使其工商业得到发展，从而跃居希腊最大城邦之列。最早在科林斯建立僭主政治的是居普赛洛斯（约公元前657—前625年），他掌权后常以公民领袖自居，把土地分给民众，争取民心，同时大力发展工商业，建立殖民城市，扩大向意大利和西西里岛的殖民和贸易。他还极力支持修造德尔菲和奥林匹亚神庙和神像，促进了科林斯文化发展和国际声望的提高。居普赛洛斯的儿子皮里安德（公元前635—前585年）当政时，科林斯处于极盛期。皮里安德的最大成就是修建了横跨科林斯地峡的石道拖运专线，该专线把科林斯湾和爱琴海连接起来，方便两岸运输，为科林斯的繁荣提供了条件。他组织科林斯人发明3层桨座大战船，扩建科林斯城，为居民修建供水系统，大力发展工业，使科林斯陶器、纺织、金属加工和造船业跃居希腊前列。在文化方面，皮里安德颁布法律，提倡文艺，广揽诗人学者，他本人曾被称为希腊七贤之一，有很高的声誉。但他后来的个人独裁与豪华淫逸的生活作风，使僭主政治的真正本质暴露出来了。他遭到民间的极大反感。皮里安德死后其侄子续位，很快便被人民推翻。科林斯人民欢欣鼓舞，举行体育竞技会以示纪念。居普赛洛斯家族房屋被毁，前人尸骨被从坟墓里挖出抛弃。与科林斯相邻的西夕温也有长达百年的僭主政治史，历代僭主中最有影响的是克里斯提尼（公元前600—前570年），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他的外孙也改名克里斯提尼，后来成为雅典继梭伦改革后进行重大民主改革的政治家。

僭主政治作为一种政体有很大的缺陷，这是它所以不能巩固的原因。亚里斯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尖锐指出，有一种僭主政体是："单独一人统驭着全邦所有与之同等或比

他良好的人民，施政专以私利为尚，对于人民的公益则毫不顾惜，而且也没有任何人或机构可以限制他个人的权力。”尽管如此，僭主政治导致贵族统治的衰落，工商业的发展，文化的进步，确使希腊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总的历史趋势看，希腊城邦社会即将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社会历史必将出现新的局面。

（二）斯巴达

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部的拉哥尼亚地区，那里东、北、西三面环山，山下有一个比较肥沃的小平原。在迈锡尼文明时期，就有一个早期的奴隶制城邦，这就是荷马史诗里所说的斯巴达。

早在公元前2000年代初期，一批由阿卡亚人组成的希腊部落就已经来到伯罗奔尼撒的拉哥尼亚平原。迈锡尼文明时期，斯巴达曾是希腊本土上一个重要的文明中心。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另一批由多利亚人组成的希腊部落南下到伯罗奔尼撒，这些人征服了早先就居住在这里的阿卡亚人，占据了此地。我们一般说的“斯巴达”指的就是来到这里的多利亚从。进入这里的多利亚人分为3个部落，他们正处于原始公社解体时期。在斯巴达定居下来后，多利亚人的血缘关系逐渐融化在地域关系之中，到公元前10—前9世纪，原来的3个部落被逐渐形成地域关系的5个村落所代替，5个村落联成一体，组成一个期巴达。

多利亚人稳固了斯巴达的统治权后，于公元前800—前730年间征服了拉哥尼亚。他们把拉哥尼亚原有的居民变为集体所有的奴隶，称他们为希洛人；而把另一部分人驱逐到

边远地区，当作在政治上从属他们但有人身自由的自由民，称作“皮里奥西”（perioeci），意思是住在边陲之地的邻人，或周围地区的居民。希洛人耕种份地，按规定向斯巴达人交纳谷物，主人不得超出规定多要产品，也不能将他们私自变卖，这有利于公民内部不产生分化，有利于斯巴达社会内部的稳定。公元前 8 世纪后期，斯巴达人又侵入西边邻邦麦西尼亚，经过几十年战争，到公元前 7 世纪中期，完全征服了麦西尼亚，其中绝大多数被征服者变为希洛人，少数边远各城市的居民成为皮里奥西人。

由上面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斯巴达的社会阶级结构是这样的：斯巴达人、希洛人和皮里奥西人是斯巴达国家 3 个不同的阶级集团。第一，征服者斯巴达人，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奴隶主阶级，其成年男子均享有公民权。这一阶层约有 9000 人，他们各自从国家征得一份土地和若干耕种此地的希洛人，但土地和奴隶的所有权属于国家，斯巴达人只能使用，世代相传，不得买卖、分割或转让。份地由希洛人种，斯巴达贵族不参加任何生产活动，他们坐享其成，靠奴隶供养。贵族阶级毕生职责和惟一职业是从事军事和镇压希洛人反抗，进行对外扩张等政治活动。第二，被征服后留在原来土地上受奴役的希洛人。这些人是斯巴达的国有奴隶，他们按户耕种斯巴达人的份地，每年向份地领有者交纳 82 麦斗大麦和一定数量的油、酒，这大约等于田地产量的一半，另一半用于维持奴隶们自身的生计。希洛人是斯巴达人集体所有的奴隶，没有政治权利，没有人身自由，贵族阶级可以随意残酷虐待，甚至任意杀戮。战争爆发后，希洛人必须随斯巴达人出兵作战，或从事军中运输、修筑工事等苦役。第三，皮里奥西为第三阶级，他们散布于边远山区和沿海地区

的村镇，属于没有公民权而有人身自由的小生产者。这些人有自己的土地和资产，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在国家规定斯巴达不得经商的情况下，国内从事工商的主要是皮里奥西人。皮里奥西人不能与斯巴达人通婚，不得参加斯巴达人的任何集会，但须向斯巴达国家纳税和服兵役。

政治制度上，斯巴达属于奴隶主贵族专政的国家。在政体上，斯巴达实行“奴隶主贵族寡头政治”，国家机构由国王、公民大会、长老会议和监察官组成。那里有两个权力完全相等的世袭的国王，他们享有很高的尊荣，在平时充当祭司长和裁判官的角色，主持国家祭祀和处理家族法案，战时一个统军作战，一个留在国内坐镇。古老的公民大会虽然被保存下来，但实际作用不大，它由年满30岁的成年男性公民组成，对长老会议的提议只能表决，无权讨论，表决时往往以呼喊声的高低来决定，声高表示通过。长老会议是斯巴达的最高权力机关，共30名成员，两个国王是当然成员，也是会议的主持者，其余28人是由公民大会从年过60岁的贵族中选举出来的，终身任职。国家的一切大事先由长老会议讨论决定，然后再交公民大会通过。长老会议也是最高的司法机关，所有民法、刑事和国事案件都由它来审理。为了强化国家政治，公民大会每年选出5名“监察官”，负责监察处理国家行政事务，并对国王和长老会议进行监督，同时镇压希洛人的反抗。据说每年新监察官一上任，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举行向希洛人宣战的仪式，以表示以后可以任意屠杀和镇压奴隶，同时是维护和巩固斯巴达的奴隶制和已形成的社会秩序。公元前7世纪后半期以后，监察官的权力不断扩大，他们有权审判国王以至决定处死国王，他们可以从两个王族中决定王位继承人，对一般公民可随时以违规犯纪的罪

名逮捕直至处死。不仅如此，监察官也取得了代替国王主持长老会议和公民大会的权力。斯巴达这种政治制度一直沿用了五百多年没有改变。

斯巴达奴隶主贵族阶级为了保持其统治地位，在本阶级内实行男性公民完全脱离生产劳动，而按国家要求终身过着军事生活的政策。斯巴达人的一生从生到死都不属他自己，新生婴儿如果其父亲事前未得到长老许可，是不得养育的。其父得先把婴孩送到长老那里，经检查便决定让他生存还是把他抛到“弃婴场”。斯巴达的反动贵族就是用这种野蛮方法弃弱留强，以保持公民的所谓“优性”。允许生存的男孩，7岁开始离家到军营里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在斯巴达，对年青人的一切教育和训练，都带有军事的性质。少年时要经受缺衣少食，日夜操练等艰苦生活考验，青年人终年不准穿鞋，一律着粗朴衣服，大部分时间固定在团队里，从事体育锻练和各种运动。年青公民饮食睡眠都在一起，他们终年睡在不用刀削而用手工编织的粗糙的芦苇席上，以锻炼其吃苦精神和意志。为了考验年青人肉体承受能力，在神庙里有鞭笞未成年人的制度，让他们每年要跪在神像面前，受一顿鞭打，执行鞭打时，女祭司们临场监视。她们手持女神塑像，有时举高有时放低，用以指示鞭笞应该加强或减弱。在贵族们看来，年青人是斯巴达社会制度的未来和主要力量，因而处处让他们接受刻苦耐劳的教育和锻炼。少年人和青年人必须奉命去做苦工，必顺绝对服从毫无怨言。对贵族女子的教育也有特点，她们在出嫁前也要接受跟男子一样的体育锻炼，因为让少女们竞走、格斗、掷铁饼、投标枪、拳击等可以强身健体，这样，未来的孩子在健康的母体中就有了结实的身体。

经过严格锻炼的贵族青年，到了20岁就成为战士和公民，可以从事政治活动。这些人20岁服兵役，60岁解甲归田过平民生活。他们不仅体质强健，军事技术过硬，更重要的有忠于国家、不畏死难的军人气质。多少年来，创造了许多英勇善战，视死如归的惊世佳话，这些可歌可泣的故事，不仅希腊各邦闻之丧胆，而且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斯巴达人。

斯巴达这种尚武轻文的军国主义制度，严重扼杀和窒息了斯巴达人的创造性。在辉煌灿烂的希腊古典文明中，斯巴达人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建树和贡献。在麦西尼亚战争前，斯巴达还产生过少数诗人，也有自制的陶器等工艺品，但战后很快被军国主义制度窒息了。在军事生活和战争中，虽然也产生了一些诗歌曲乐，但都是激励战士骁勇善战或颂扬战死疆场的斯巴达勇士的。例如，在行军的时候，斯巴达在笛声和合唱之下列成方阵迈步前进。这些合唱曲当时闻名全希腊。乐曲雄壮激昂，不仅能唤起男儿征战热情，而且有一往无前、如排山倒海之势。斯巴达诗人台达斯（tyrtaeus，公元前7世纪人）的哀歌体诗和进行曲，成为斯巴达战歌的典范。请听那歌声：

> 不要怕敌人的军队，不要给恐怖所支配！
> 让每个人拿着战盾，站立在战士的前驱。
> 生命是不足怜惜的，预言家所说的死亡，
> 在我们反觉得可爱，有如一片灿烂旭阳……
> 在光荣的死者之间，慷概的抛弃了生命，
> 在战场为祖国战死，博得好男儿的英名……
> 青年人，比肩作战吧，不要做可耻的逃亡，
> 青年人，比肩作战吧，不要做懦夫的丑态……

青年人，冲上去吧，你的脚跟踏着宝地，
让每个人守着自己的岗位，咬紧牙齿！
用镶铜的战盾掩护着你的脚和胫，
用坚固的战盾掩护着你的胸和肩；
用右手挥动你的坚实的长枪，……
步伐合着步伐，战盾靠着战盾，
羽饰混着羽饰，铁盔照着铁盔，
肩膊靠着肩膊，让每个人跟敌人厮杀，
用手紧握着长矛，或者执着利剑……①

（三）雅典国家的形成

雅典位于希腊中部一个半岛上，这个半岛称为阿提卡。阿提卡地区约有85公里长，50公里宽，是一个三面临海的丘陵地带。这里山峦起伏，崎岖不平，且瘠薄多石，偶有几块小平原，也不太肥沃，给农业发展带来困难。很早以前，阿提卡人就开始种植葡萄、橄榄等，而粮食很难自给。但是，阿提卡有漫长曲折的海岸线，有许多便于航海贸易的港湾；那里有可供开采的陶土和大理石，还有铁、锌、银等丰富的矿藏，这些又为手工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原料。

雅典城邦国家的建立，是与一个叫提秀斯的政治改革相联系的。相传很早以前，雅典臣属于地中海岛国克里特，每年须向克里特神牛（人头牛身怪物）献童男童女各7人。这

---

① 转引自B·C·赛尔格叶夫《古希腊史》（缪灵珠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第165——166页。

年克里特再次索要童男童女时，雅典王子提秀斯向国王埃勾斯请求自充童男，再给他 13 个人，去征服克里特神牛，以解除人民苦难。国王被这种为国雪耻的壮志雄心所感动，答应了他的要求。临别时对提秀斯说：如果你取得成功平安归来，返回时就把船上的黑帆换成白帆，以释父亲悬念。到了克里特后，提秀斯在克里特国王女儿的帮助下，杀了神牛，胜利返回雅典。但兴奋过度的他忘了取下船上黑帆换上白帆，国王埃勾斯看到船上黑帆未换，断定儿子葬身克里特，悲伤得投海自尽。在这种情况下，提秀斯继承王位，成为国王。

提秀斯年轻得志，雄心勃勃，初登王位，便开始着手构划宏伟的改革方案。那时，阿提卡有 4 个部落，每个胞部落有 3 个胞族，每个胞族有 30 个氏族，各个部落一般都有自己的管理机构，各自独立互不相属。加之由于生产发展，交换经济的形成，手工业和农业分离，以及人口迁移、居民混居，土地卖买，大量使用奴隶等，使原来的氏族血缘关系受到破坏，阶级开始分化。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提秀斯实施了两项重大改革：第一，废除阿提卡各城邦的议事会和行政机构，设立以雅典为中心的中央议事会和行政机构。原来各城邦村社、部落、胞族、氏族的以血缘关系各自为政的分散局面被打破，建立了集中的统一的权力机关，共同法律取代了各部族的习惯法，部族武装也变成了统一的国家武装，监狱、法庭等国家机构相应设立。第二，把阿提卡公民分为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 3 个等级。贵族掌握国家大权，能够“掌管宗教仪式，充任官职，讲授法律、解释天意”，而农

民、手工业者却没有任何特权，成为平民[①]。这些改革，使作为氏族制度对立物的国家出现了萌芽，所以说，提秀斯改革是雅典国家形成和建立的标志。

雅典国家形成后，氏族贵族掌握了政权，原来作为最高首领的“国王”（巴赛勒斯）已被执政官所取代。这些人拥有很大的权力，他们包揽官职，袭断司法，统理军务，执掌内政，在政治上压得平民百姓抬不起头，经济上通过高利贷、土地兼并和债务奴隶制等使广大穷苦大众无以为生，处境日益恶化。亚里士多德这样描写当时的情景：贫民本身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事实上都成为富人的奴隶，他们被称为被保护民和六一汉。[②] 如果他们交不起地租，那么他们自身和他们的子女便要被捕，所有借款都用债务人的人身为担保。这样的习惯一直流行到梭伦之时为止。[③] 可见，这时的雅典实行的完全是贵族寡头政治，奴隶们受着人间最残酷最苛虐的统治。

公元前 7 至前 6 世纪，雅典的手工业和商业迅速发展起来。从考古发掘的材料可以看出，公元前 7 世纪末叶，雅典已成为一个很大的手工业中心，那里银矿丰富，可制造大量银币；盛产陶土，有了较高的制陶技艺，所产的陶器外形美观，图案花纹丰富多彩，不仅作为工艺品输入埃及、意大利，而且作为盛酒、油的容器与这些农产品一并远销海外；加之有天然的港湾，处于东西方交接点上等优越的地理位

---

① 普卢塔克：《提修斯传》第 24——25 节。

② 贫民为富人种田，只能得到收获物的六分之一，故称为“六一汉”。——引者注。

③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 3、4 节。

置，给发展工商业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工商业的发展，给雅典贵族们提供了发财致富扩大势力的绝好机会。他们变本加厉地加强对贫苦大众的剥削和压迫，于是平民与贵族的矛盾日益尖锐，斗争愈演愈烈，政局动荡不定。公元前 632 年发生了基伦暴动，贵族出身的青年基伦，企图利用平民对贵族的不满武装夺权，在雅典实行僭主政治，因未得到平民支持而惨遭失败。公元前 621 年，雅典的执政官德拉古，把当时的习惯法改为成文法。然而成文法典，完全是保护贵族和有产者利益的，条例非常苛刻，甚至最小的偷窃案也要处以死刑，所以有“血腥法律”之称。为了扭转局势、挽救危机，缓和社会矛盾，必须进行彻底的社会政治改革，为奴隶制经济发展开创新的道路。公元前 594 年，才华横溢的政治家梭伦当选为雅典首席执政官，从而进行了一场斗争锋芒直指氏族贵族的政治改革，即历史上所称的梭伦改革。

梭伦出身贵族，在他父亲时期家境败落，遂经商致富，周游世界，到过很多地方，见多识广，洞悉利弊。他在漫游各地、经商贸易中注重考察当地社会制度和风土人情，广交文人学师，自己也成为饱学之士被誉为希腊七贤之一。梭伦在政治上倾向于工商业奴隶主，不满氏族贵族专横跋扈。他曾作诗揭露和抨击氏族贵族，赢得工商业奴隶主和广大平民的同情，在雅典民众中享有很高的社会威望。梭伦掌权后，开始了希腊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民主改革，主要内容是：第一，颁布解负令，取消公私债务，同时恢复债奴的公民身份，禁止把雅典公民变为奴隶。按照解负法令，平民所欠公私债务一律废除，禁止放债时以债户的人身作抵押，废弃债务奴隶制，过去因负债而被奴役的人立即恢复自由，被卖到国外的债奴由国家出面赎回。解负令如一场及时雨，把生活

在酷暑高温下、在生命垂危挣扎中的劳苦大众拯救了出来。第二，按地产和收入多寡把居民划分为4个等级。当时财产和收入一般按农产品来计算，工商业者则按其货币收入合成实物来计算。规定凡收入500麦斗[①] 谷物或油、酒的公民，列为第一等级，收入300麦斗以上者为第二等级，200麦斗者为第三等级，其余收入在200麦斗以下或没有财产者一律列为第四等级。这4个不同的等级享受着不同的权利，第一、二等级可以担任执政官等高级官职，第三等级可以任低级官职，第四等级则不能担任一切官职。在军事义务上，第一、二等级组成骑兵，第三等级充当重装步兵，第四等级则任轻装步兵和战船上的水手、桨手。第三，改革政治机构，设立400人议事会和陪审法庭。400人议事会由每个部落各选出100人组成，除第四等级外，其他等级的公民都可以当选。400人议事会为公民大会拟定议程，准备提案，是一个有广泛的代表性又有很大权力的常设机关。陪审法庭相当于雅典的最高法院，陪审员由4个等级的公民中选出。它的建立，打破了贵族垄断司法的局面，是梭伦民主改革的重要方面。

此外，梭伦还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工商业经济，保护新兴工商业奴隶主利益的政策措施。他改革币制，稳定币值，提倡雅典人都要学会一种手工艺技术，欢迎外邦手工技艺高的人移居雅典；鼓励酒、油输出，禁止谷物外销；承认财产私有，等等。这些改革标志着雅典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取得了胜利，把雅典引向民主政治和工商业经济大发展的广阔道路。在梭伦改革后的一个世纪里，雅典国家政治民主，

---

① 一麦斗约合52.3公升。

经济繁荣，国力强大，文化昌盛，成为希腊文明史上一颗灿烂的明珠。

然而，梭伦的改革使氏族贵族失去特权，氏族贵族坚决抵制改革，执意恢复旧制度；贫苦民众虽免除了债奴身份，但并未实现平分土地和政治平等的要求，因而不满足梭伦改革的措施；工商业奴隶主得益最多，坚决拥护改革。这些矛盾导致雅典政局继续动荡。这时梭伦任期届满，他洒脱离任，在埃及、塞浦路斯、小亚细亚等地漫游 10 年，回国后隐居在家，约公元前 560 年逝世。

在梭伦去国隐居的数十年间，雅典的阶级矛盾和政治斗争异常激烈。不久出现了 3 个政见不同的政治派别：代表平原地区氏族贵族利益的平原派，企图恢复旧秩序；代表海岸地带工商业奴隶主利益的海岸派，拥护梭伦改革；代表山地贫苦农民、牧民和雇工的山地派，不满改革现状要求继续深入改革。这 3 派互不相让，争执不下，甚至有的年份连执政官都选不出来，一时雅典处于群龙无首的局面。公元前 560 年，工商业贵族出身的庇西特拉图依靠山地派力量，组织了一支卫队，夺取政权，成为雅典第一个"僭主"。庇西特拉图理政温和，处事仁慈宽厚，"在他统治时期，从不与大众为难，总是致力于和平，保持安靖；因此人们常说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有如黄金时代"。[①] 庇西特拉图没收逃亡和被放逐的贵族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耕种，部分地满足了贫苦公民重分土地的要求；发放贷款，以资助贫苦农民种植橄榄树和葡萄，并且减免贫瘠和受灾土地的赋税。他还大力发展工商业和航运业，大兴土木，致力于城市

①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第 16 节。

公共设施建设。在文化方面，庇西特拉图注重文化，宏奖学术，据说著名的荷马史诗，就是在他直接关怀下，第一次在雅典整理成文的。他出资组织节日庆典。从此，雅典逐步成为希腊文化的中心。公元前527年，庇西特拉图去世后，他的两个儿子相继承袭父位，继任“僭主”。但他们未能继承其父的仁政，相反，他们奢侈骄横的生活和作风遭到人民的不满和憎恨。公元前514年，次子希巴库斯被刺杀，公元前510年，长子希庇亚斯被逐出雅典，至此，庇西特拉图家族的僭主政治真正结束了。

庇西特拉图家族统治告终，雅典政权一度落入贵族派手中。然而平民奋起反攻，击败了贵族势力，平民领袖克里斯提尼于公元前509年开始进行划时代的改革。

克里斯提尼改革的中心，是实行按地域划分居民。他抛开过去以氏族和胞族为基础的4个部族的血缘关系，完全按照人们所居住的地域，把整个阿提卡划分为100个自治区，叫做“德谟斯”（demos)，它是基层的政治单位，由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这实际上是现代国家区域自治的原型。每10个德谟斯构成一个地区部落，全国共10个地区部落。每个地区部落兼有经济、军事各种职能。克里斯提尼建立了十将军委员会，由10个地区部落各选一个组成，负责当年的军事指挥，其中一人为首席将军，即为统帅。他还制定了贝壳放逐法，每年由公民表决放逐那些危害国家的分子，被放逐者10年后才许回国。随着新地区部落的划分，克里斯提尼又把梭伦改革时创设的400人议事会改为500人议事会，主要任务是为公民大会准备议案，执行公民大会决议。议事会分为10个组，每组50人，称作“50人团”。按规定，10个“50人团”分别以同样长的时间依次担任会议主席，主持国

家日常政务。

克里斯提尼改革，使雅典氏族组织逐渐崩溃，民主政治得以确定，最后完成了由氏族组织向国家过渡的整个历史过程。恩格斯指出："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已不再同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直接符合了。"[①] 在雅典，经过克里斯提尼改革，这两个特征已具有了完备的形式，国家机构完全取代了氏族组织。它标志着国家正式诞生，从此，雅典成为希腊古典文明的中心。

①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6——167页。



第二章 欧洲文明源头上的火炬



- 神话与宗教
- 文学与艺术
- 童年时期的哲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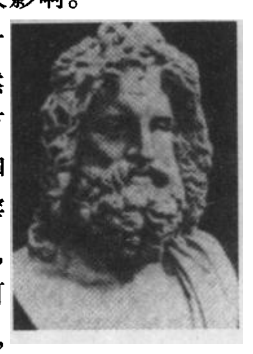
公元前8—前6世纪，是希腊文明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希腊人在许多波澜壮阔的事件中，以勇敢的探索和伟大的开创精神，揭开了世界文明史上极富特色而又光辉灿烂的篇章。随着海上贸易和殖民运动的发生，古代东方文明对希腊文明产生了很大影响，希腊人不仅注重学习东方文明，而且把古代东方就已经点燃的人类文明的火炬传递到古希腊乃至欧洲，并使之发扬光大。经过努力探索和创造，早期希腊人在神话和宗教、文学、艺术、哲学等方面取得的成果，成为后来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文明源头上的熊熊火炬。

一 神话和宗教

古代神话，是民间口头传承的原始文化结晶，它的起源、发展同人类早期文明进步紧密相连。从一般意义上说，所谓神话，是一种极富特色的关于遥远往事的陈述，其中现实与虚构交织在一起。这种民间口头传说。构成了关于世界和人类的起源、神及英雄的故事等完整的叙述。希腊神话里关于神界故事的种种描写极为丰富。它如同一个巨大的“宝库”，其中蕴存着许多宗教观念，闪耀着光彩夺目的人生哲理和处世诀窍。在那无数的神界故事中，所发生的许多受神支配的奇异事迹，无不洋溢着古代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的火热激情。希腊神话在形成发展中，广泛吸取了地中海地区古代

文明的精华，并使神人同形同性等观念得到更高发展，从而创造了一个完整的、具有丰富情节和饱含深刻哲理的神话体系。这种神话体系及其系列，不仅包容了希腊童年时期的思想观念，而且培育和创造出了一种原始的民族精神：那优美的神话及栩栩如生的神界故事，表现出古代人在和自然斗争中所产生的丰富的想像力，因而具有永久的魅力。希腊神话对整个希腊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

希腊的神话和宗教是多神教。在希腊人看来，最初的宇宙是一片混沌，然后有了天地之分。地母盖娅是众神和万物之源，她生了天神乌拉诺斯，天神和地母结合再生众神及万物。第一代主宰乌拉诺斯被自己的儿子克洛诺斯阉割了，克洛诺斯与自己的妹妹瑞亚结合，（这可能是族内婚时期的印记）生下 6 儿 6 女，宙斯是他们最小的儿子。克洛诺斯害怕自己也像父亲一样被儿子阉割推翻，决定吞食自己的所有子女，瑞亚生下一个他就吞吃一个。当宙斯出生时，瑞亚瞒过丈夫，只身逃到克里特岛上，生下了宙斯。宙斯长大后，把那些受到父亲压制的天神组织起来，推翻克洛诺斯统治，救出那些已被吞食的兄弟姊妹，建立了新的神界秩序，自立为神界无上主宰。希腊人所信奉的新神就是从宙斯开始的。宙斯建立了以他为首的奥林帕斯山诸神的统治，奥林帕斯山遂成为希腊城邦宗教信仰和活动的核心。山上有 12 位主神，他们各有自己的区域和职责。宙斯为众神之父，居住在奥林帕斯山上，以闪电霹雳为威力无比的武器和权力与尊严的化身；宙斯之妻赫拉兼为天空之神，也掌管



宙　斯



宙斯与赫位

着人世界的婚姻；海神波赛东统管海洋；智慧之神雅典娜平时保护着人们的幸福，主宰着战争胜负，深受雅典人的崇敬和爱戴；太阳神阿波罗，英姿勃勃，金光四射，是男性美的化身，喜欢诗歌曲乐，不仅保护农业和畜牧，而且能预告人间的吉凶征兆；还有月神阿尔蒂密斯；爱与美之神阿芙罗蒂（即后来罗马人所称的维纳斯），主宰着人世间的爱情，是温柔和美丽的化身；商旅之神赫尔米斯，是众神的“信使”，掌握着国家间的贸易和外交。还有战神阿瑞斯和火神赫伏斯特，农神迪米特和灶神赫斯提亚。构成了属于“新神”范畴的 12 天神，称作“奥林帕斯神系”。从此众神的性质逐渐发生了变化，他们从直接的自然力量之神演变成了管制自然力量的巨大的神力；从原始的神演变成了具有人文色彩和社会

因素的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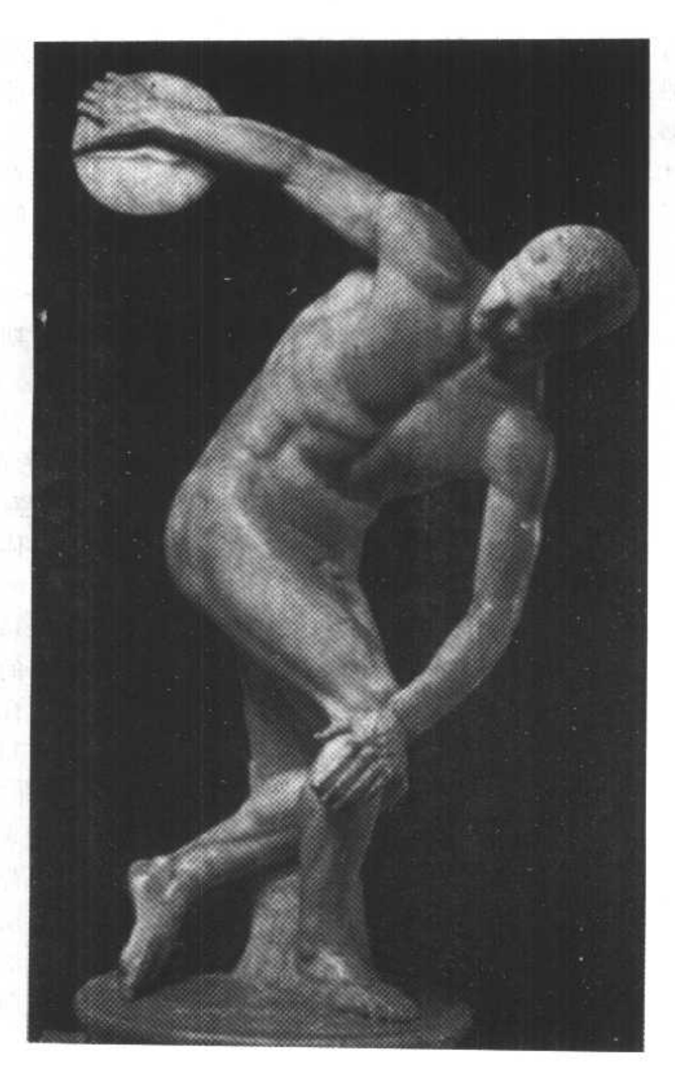
一切神话都不过是现实生活在人的头脑中歪曲的、虚幻的反映。希腊人创造的许多关于世界起源和世代交替的神话传说，实际上反映了城邦形成前后人们思想观念包括宗教观念演变的过程。“任何神话都是用想像和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① 不是“神”创造了人，而是人按照自己的想像创造了神。希腊人的宗教观念以及关于神、英雄和世界的观念都是随着社会经济的演变而演变的。例如，希腊早期的宗教里还保留着图腾制度的残迹，在其文化发展的前期，人兽之间还没有明确的界限，往往崇拜禽兽形的神。人名、天体的名称都从走兽名字派生出来，后来的神灵也有禽兽同伴。除了禽兽外，他们也崇拜橡树、桂树、橄榄树、山川河流、森林溪涧及水、火、风、雪等植物和自然力。由此可见，希腊是一个泛神论、多神教的国土，它所有的风景都嵌进美妙和谐的神话框格里，每个美丽的地方如河流、森林都有自己的神。希腊众神都有和俗人一样的情感，他们之间常常发生的冲突，也和俗人感情上的纠葛一样。

希腊众神的形象和性格，表现出希腊宗教思想的一大特色：神人同形同性。随着文化的发展，希腊人不再像自己的祖宗那样把走兽等自然物当神来崇拜，而是用人形来描绘神。这时的神祇，则有了彻底的人类外形，而且具有人的意志、欲望、性格等，拥有超人的能力和实现自己目标的非凡手段，通过这种神奇的力量和手段所实现的目标，也充分人

①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卷，第113页。

性化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希腊宗教的神人同形同性。按照此说，希腊诸神特别是主要神祇，已经经历了彻底的“人化”，他们和人一样具有七情六欲，既有成功也有失败；既有正确的一面，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既干出一些荒唐绝伦的事情，也发生着各种风流韵事；他们也贪图眼前享受和现世快乐，如遇不快也常常发怒和施威。你看他们，喝酒、争斗、戏嬉、喧闹、恋爱、奢侈无所不干。他们有时为争风吃醋打得不可开交，有时却玩世不恭，进行恶作剧。例如战神阿瑞斯和爱与美之神阿芙罗蒂私通，被爱神的丈夫赫伏斯特包在一张网中送到众神面前，引得他们轰堂大笑。后来，神界诸神有时竟为了一点小小的虚荣而不惜发动人间战争，使千百万人为他们的心血来潮悲惨而死。由此可见，神人同形同性的神话，充满了世俗内容，极其广泛地反映了人们的社会生活，其中包含着许多人性因素和人类向文明时代迈进过程中的社会内容。总而言之，神话世界里的神都很世俗化，他们和人类的区别在于，神不仅长生不死，威力无穷，随心所欲，不受拘束，而且能够通过生育把这些特性传递继承下去。

和古代东方神界相比，希腊神话把人的想像和美的创造推向了最高境界。东方的神威严、神秘，是超世俗的。古代东方只把帝王个人推向神界，位同天子，是至高无上的主宰。神性与人性有天壤之别，神性高于九霄，秘不可测，人性贱如草芥，任人宰割。所以，东方人并不过多地去诠解神的一切秘密，也不像西方那样殚精竭虑地为天上地下众神们编造系统完整的神际关系。而希腊神话和宗教思想的突出特点是神人同形同性，他们把神请到人间，神性和人性不仅没有本质界限，而且彼此照耀，相映生辉。这使得希腊神话处



掷铁饼者

处洋溢着浓厚的人间气息，神界那种神秘的面纱被神人同形同性观念彻底揭开了。从而，神的形象和神话故事变得那样美妙动人，那样具有现实生活气息，这大大促进了希腊文化艺术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器，而且是它的土壤"。①

希腊神话对文化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希腊神话是希腊文化艺术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源泉，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以至近代，许多艺术大师们以希腊神话故事为其创作素材。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许多著名学者的著作中，也常常引用希腊神话典故。在希腊人看来，神能主宰人间祸福。为此，他们大肆进行宗教崇拜，举行各种祭奠神的庆节，其中对文化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而又最负盛名的是在祭神时举办体育竞技和文艺表演。由于这种体育运动会具有敬神祭神的意义，因而特别隆重和神圣，得胜者得到很大殊荣。各城邦都有体育场馆，各地、各城普遍举行运动会，其中最著名的是在奥林匹亚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这是全希腊国际体育盛会，为敬奉宙斯专设的祭典，每4年一次。这种仪式不知起于何时，但第一次有记载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在公元前776年举行的，希腊人以这一年作为公用纪年的元年，以此来计算年代，记载历史。奥林匹克运动会异常隆重，每逢举行期间，各邦若遇战争必须立即停止，各地选出最优秀的运动员前来参加，一些音乐家、诗人、绘画雕刻等艺术家和政治上的权贵要员，也都到场参加盛典，进行表演。也有一些商贩

①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卷，第113页。



阿波罗

赶来做小生意。竞技运动的主要项目有竞走、持械竞走、战车竞赛、骑马表演、角力、赛跑、跳高、投标枪、掷铁饼等。竞赛中优胜者被戴上桂冠或橄榄冠，受到各种名誉和实物嘉奖，受到英雄般的尊敬和拥戴，并可以享受当时只有神才能享有的立像权利。此时，不但获胜者及其亲属，而且整个城邦和部族都会欢欣鼓舞以示荣耀。此外，还有对阿波罗神、雅典娜神的祭典盛会，也相当隆重热烈。奥林匹克运动会对希腊民族和文化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具有宗教、体育、文化、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意义，促进了希腊各城邦和部族间的团结，推动了希腊文明的进步，以至现在，国际性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仍然沿用古希腊时期运动会的名称。



雅典娜

二　文学和艺术

（一）文学

希腊最早的文学作品是诗歌，荷马史诗和赫西阿德的创作是其中最杰出的成就。荷马史诗抒写了城邦形成时期希腊的民族精神和浪漫情怀。从文学艺术角度看，史诗不仅朴直雄伟，古奥瑰丽，而且华美优雅，平易流畅。作品中许多地方描写英雄们的战斗，那如猛火雷霆、暴风骤雨般的战斗场面，读后给人一种强烈的阳刚之美。然而，史诗忽而又如把人引入夏夜的幽梦，使人进入美妙瑰丽的幻想世界里，这又给人一种阴柔之美。史诗中的英雄被描写成超人的勇士，具有普通人无法比拟的非凡的力量。一块两个头等勇士才能拉起的巨石，赫克托尔却能毫不费力地拿在手中，用它去撞击希腊营垒的寨门；涅斯托尔的酒杯非常大，斟满酒后一般人是不易拿起的，而这位英雄却毫不费力地端起痛饮。这些精彩的描写，再加上那委婉的故事叙述和动人的情节，给人以巨大的艺术感染力。荷马史诗对希腊文学艺术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克思对荷马史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以及它对后来艺术的影响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困难并不在于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是与社会发展的某些形态相关联的。困难是在于了解它们还继续供给我们以艺术的享受，而且在某些方面还作为一种标准和不可企及的规范。一个大人是不可能

变成一个小孩的，除非他变得孩子气了。但是，难道小孩的天真不会令他高兴吗？难道他自己不应当努力在更高的阶段上把小孩的真实的本质再现出来吗？不是每个时代在儿童天性中都有它的特性，在它的自然真实性中复活着吗？为什么人性开展得最美好的社会幼年时期，不应该作为一个永不复返的阶段显示着不朽的魅力呢？……①



赫西阿德

赫西阿德生活在中希腊彼奥提亚农村，他的诗往往带有农民的质朴和真诚。公元前 8 世纪，土地集中在贵族手中，农民陷于贫困，纷纷起来反抗贵族，赫西阿德的弟弟伯尔塞斯企图凭借当地贵族的势力，争夺本份以外的更多的财产。为了说服教育他的弟弟，赫西阿德写了教谕诗②《田功农时》，旨在劝导伯尔塞斯应当勤劳致富，做事公正，不要懒惰与贪财。诗中描写小农的辛苦和与农作有关的历法节令和各种迷信禁忌以及如何经营农业等，风格清新自然，叙述平易简洁，十分精彩。应该指出的是，《田功农时》作为反映公元前 8 世纪希腊社会状况的作品，还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全诗谴责贵族的骄横，歌颂辛勤劳动的农民，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荷马时代以后希腊社会的变化，展示了当时的社会性质、土地所有制、农业、天文学、航海技术水平等史实画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导论》。

② 传授知识和训诫的一种诗歌类型。

面。特别是赫西阿德把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提出了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和黑铁时代的划分。他断言人类的历史每况愈下，而他自己所生活的时代——铁器时代是最不好的。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平民与贵族斗争中小农的心态和情绪。他们把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原始时代看作黄金时代，认为铁器时代是只讲强权，不讲公理，农民就像老鹰爪下的夜莺。诗中写道，一只老鹰抓住夜莺，飞向云端，夜莺悲鸣，老鹰骄横地说："可怜的东西，你有什么好叫？一个比你强得多的正在紧紧地抓着你，我带你到那里你就得去，那管你是鸣禽。我把你当做我的一餐，或是让你走，全凭我的高兴。"① 赫西阿德对历史进化的结论是错误的，但他在诗中把历史看作不再是一成不变的，而具有连续性和方向性的思想，却是历史观上的进步。在赫西阿德名下还有另一部作品《神谱》（有种说法认为可能不是他的作品——作者）。诗中描写了世界的形成和历代天神的世系及斗争，揭示了城邦公民对希腊宗教的正义信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公元前8—前6世纪期间，氏族社会进一步解体，奴隶制城邦逐步形成。在这种情况下，过去那种集体的情感由于阶级的分化和不平等的社会地位而冲淡了。个人的种种遭遇引起了许多复杂的情感，人们往往用诗歌来直叙胸意，抒发情感，于是，抒情诗产生了。

抒情诗是从民歌发展而来的，可分为哀歌（或称双管歌）、琴歌和讽刺诗三类。哀歌题材广泛，一般用双管伴唱，

① 转引自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林志纯主编）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54页。

琴歌有独唱和合唱，以竖琴伴唱，讽刺诗用双管或竖琴都可伴唱。相比之下双管歌体安静柔和，讽刺诗活泼激昂。双管歌以公元前 7 世纪末的阿尔开俄斯最为著名，讽刺诗最著名的代表是阿客罗科斯，他的作品讽刺尖锐，激昂有力。



萨　福

在琴歌创作中，女诗人萨福的独唱琴歌最负盛名。萨福出身于莱斯波斯岛的贵族家庭，她写过颂歌、婚歌、哀歌、圣歌等共有 9 卷，但存世很少，而且只有两首是完整的。萨福一生曲折多难，曾被迫流亡国外，最后死在西西里。她的抒情诗多半以爱情为主题，风格朴素自然，感情真挚强烈，例如在《相思》中写道：“妈呀，亲爱的妈呀！我那里有心织布，我心里已经充满了对那个人的爱慕。”相思之情迫切而又真诚，读来令人感动。萨福的诗大都用简洁自然的语言写出自己复杂的心理变化，反映出希腊奴隶主贵族的生活情趣。萨福死后，声名传遍整个希腊，受到历代诗人的推崇。

阿那克瑞翁是典型的宫廷诗人，他也是琴歌的著名作者。他作诗 5 卷，只留下一些短诗和残句。阿那克瑞翁歌颂醇酒和爱情，自称他的诗是歌颂爱情与欢乐的歌。他对政治、战争和生活的骚乱非常冷淡，而给自己的生活经验罩上优美的诗的形式。他认为凡是破坏生活和谐的一切都是不好的。阿那克瑞翁特别憎恨钱财、白银，写道：

为了它，便没有兄弟；
为了它，亲人不和睦；
为了它，杀伐，战争；
而且，最可惜的是——
我们，彼此相爱的人，
也往往为了它而相杀。①

阿那克瑞翁对诗的体格形式掌握得十分娴熟。他写过哀歌体诗、讽刺体诗、短长格诗等，同代和后世许多诗人对他的诗评价很高，不少人还模仿他的诗体。

和抒情诗同时，在希腊民间还广泛流传着许多散文故事，其中多是关于动物的寓言。相传它的作者是公元前6世纪居住在萨摩斯岛上的伊索。传说中的伊索是一个相貌丑陋而又极为聪明的奴隶，他以自己的才能和智慧而获得解放。伊索寓言虽然冠以伊索的名字，但究竟哪些是他写的，现已无



伊　索

① 转引自B·C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缪灵珠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第205页。

从稽考。因为最早的伊索故事集大约成书于公元前 3 世纪，那时伊索已去世很久了。公元 1 世纪有人把所有的寓言故事都汇集在伊索名下，统称为《伊索寓言》。伊索寓言反映了社会下层劳动人民和奴隶的思想情感，给所影射的权贵们以辛辣讽嘲和无情的鞭挞。像《狮子与野驴》，生动地揭示了统治者的强横霸道。《猫与公鸡》、《狼和小羊》揭示了强权就是公理，并对弱者寄予深切同情。一些寓言写狮子、豺狼、老鹰和狐狸的凶残狠毒和伪善狡猾的本性，提醒世人保持警惕。还有一些寓言写压迫者装出伪善的面孔去欺骗人民，但人民、弱者却以智谋去战胜强者。还有一些寓言旨在传授知识，说明事理，有的说明人们做事要掌握规律，量力而行，以及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也有相当部分的寓言鼓励人们要热爱劳动、勤勉、正直，劝人不要骄傲、不要撒谎。伊索寓言无论在反映当时社会状况和文学的艺术性、现实性及对生活现象的概括方面，都达到很高的水平，表现出古希腊人民的聪明和智慧。伊索寓言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它为寓言体裁的作品奠定了基础，丰富了文学作品的形式和内容。它形象生动，短小精悍，常为后人包括一些思想家、文学家、剧作家仿效和引用，成为意义深远的典故。

（二）艺术

希腊奴隶制国家形成时期，建筑、雕塑、手工工艺等古代艺术发展较快。这一时期的艺术，抛弃了荷马时代幼稚的形式，逐步克服了那种虚套的公式化倾向，走上现实主义道路。

建筑艺术上的成就，突出地表现了当时艺术发展中的巨

大进步。希腊艺术从遥远的古代就已经创造了建筑物的新的形式，而希腊的神庙就是这种建筑形式的集中表现。“安泰式神殿”，是石砌的神殿最简单、最古老的形式。它由正殿（一间不大的房屋）构成，门朝东开，在它的正面两侧墙垣之间，有两根柱子。这种神殿，作为城市国家的主要建筑物，用处是很少的。前柱式建筑是神殿的较完整的形制，这种神殿，在正立面安上了四根柱子。前柱式建筑的列柱既装饰了正立面，也装饰了背立面，比安泰式神殿有很大的进步。围柱式建筑可以说是希腊神殿典型的建筑形制，这种建筑形式在公元前7世纪下半叶就已经形成了。它在长方形的内殿四周均有圆柱环绕，这里是祭神的圣所。圆柱的布局有多种，有的只沿着内殿的一边，沿着两个相对的边，或者安排在两个矩形的平行线上。这种建筑风格，在当时是极为杰出的发明，以至现代建筑师们仍然采用。这种建筑的成功在



希腊科林斯阿波罗庙遗址

于，它按照梁和柱的原则，来确定建筑的某些固定组成部分，如柱基、支承体本身（墙与圆柱）及与支承体相连的石块等。希腊人的创新和贡献，就是把这些组成部分按照一定的规则组合起来，这种组合规则后来被人们称为“柱式”。柱式建筑系统的美感及表现力，主要在于神殿的整个样式与结构系统，它是以柱子以及放在柱子上端的屋面（檐部）的相互关系的和谐为基础的。因此，柱檐结构的组合形制，基本代表了希腊的建筑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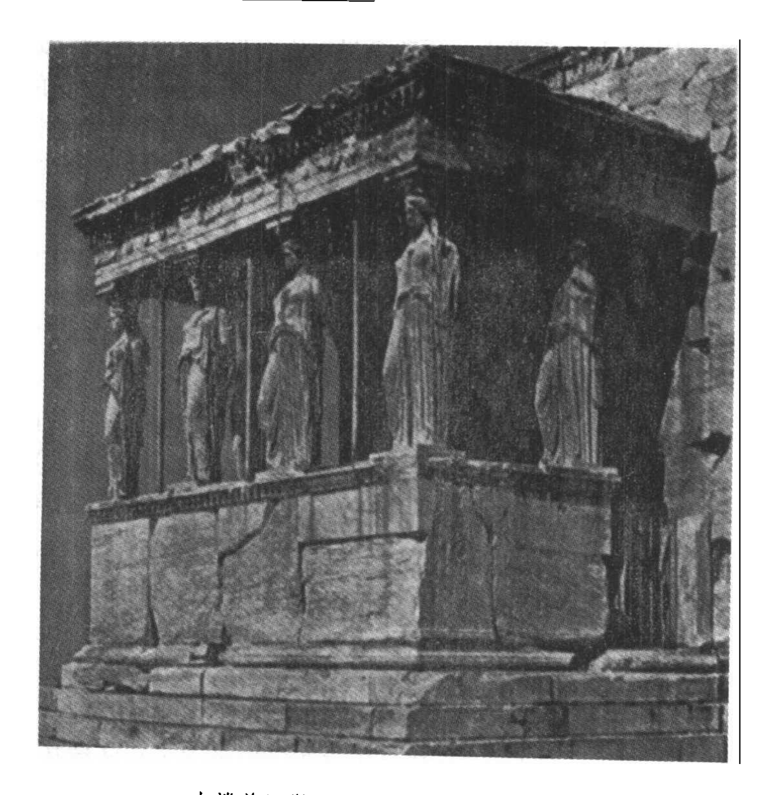
希腊柱式建筑有两种基本的形式：陶立安式和爱奥尼亚式。

陶立安柱式建筑形式，包括一个基础，基础的最上面一层阶梯叫做柱座。陶立安建筑柱式中的圆柱没有柱基，它直接放在基础表面即柱座上。圆柱的主体部分（柱身）上端盖有一个柱顶，使柱身和屋顶有机地连接起来。柱身和柱顶形成了陶立安柱式的显著特色。通常情况下，陶立安柱身不是平滑的，它上面布满了一系列紧密的凸棱，从上到下刻有连续不断的凹槽，这些凹槽和凸棱一起围绕着整个柱身，同时借助于明暗的变幻来加强柱子的立体感，也突出了全部列柱的整体垂直结构。屋顶也由几层构成，各个柱顶由称为楣梁的石块相互连接，安装在楣梁上的叫中楣，安装在中楣上的是飞檐。飞檐作为建筑物的屋檐，保护着下面的建筑不受雨水冲刷。飞檐也支撑着屋顶，呈现出倾斜状，在正立面和背立面上分别形成三角形，称为三角形山墙。浪漫主义时期的一些评论家认为，不同柱式的建筑风格与人们的特性有关，他们看来，陶立安柱式与男性坚毅、刚强和雄浑的气概及朴实而和谐的风格相联系，所以，它实际上是民族精神的产物。

相比之下，完成于公元前 7 世纪下半叶的爱奥尼亚柱式是轻快而严谨的。它比陶立安柱式要高一些，细一些，它的形制赋予了柱式结构以特殊轻快的感觉，加之柱身上凹槽挖得较深，引起光线的明暗变幻，显得更加生动优美。同样，在浪漫主义时期的评论家看来，爱奥尼亚柱式代表女性灵巧、优美的特征，建筑风格上体现了民族的自由、活泼和秀丽的精神。在这种建筑中，柱基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由依次安放在底座上的一组外形不同的石盘状浇铸物构成的，这种底座如同陶立安式顶板一样，一般称作柱脚。爱奥尼亚柱式的柱身较为细长，有的是整块石料雕成的，它的凹槽多而深，且呈半圆形。从截面上看，柱槽之间被一条狭窄的光滑饰线分开。直接放在圆柱上的楣梁由 3 条水平线组成，安放在上面的横饰带要比下面的略微突出一些。爱奥尼亚柱式中的中楣环绕着整个神庙，有时还有雕刻装饰。在圆柱的大小和总体比例上，爱奥尼亚柱式显得更为细长，外形上的凸形曲线也不那么明显，各个圆柱的间距也较宽。

希腊建筑艺术是希腊文明的重要内容，它从公元前 9 世纪开始，经过长期发展，到公元前 7 世纪形成了高度精巧的建筑艺术形式，陶立安柱式和爱奥尼亚柱式就是其主要代表。从陶立安柱式的基本特征上已经形成了陶立安柱式的建筑风格，这种风格决定了它在伯罗奔尼撒与大希腊（包括西西里与意大利南部）建筑的主要发展方向。而爱奥尼亚柱式建筑风格，首先在希腊的小亚细亚地区与希腊半岛及接近东方文化的商业城市得到发展。这两种建筑形式，在审美方面达到了令人信服的效果，因而后来不断被其他文化所采用。

雕像是希腊艺术的另一代表，从公元前 7 世纪起，它几乎是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它的起点很低，但发展速度却很



支撑着厄勒忒奥神庙侧面门廊的雕像

快。公元前7世纪中期，希腊雕像还不脱手法简拙，形象呆板，粗劣虚套的性质，但作为初型已略显规模。这一时期的雕像作品受埃及影响较大，但在技艺方面要比埃及逊色得多。作品的特征一般是英雄人物的直立裸体雕像，或者较后时期出现的战士的直立雕像，称作库罗斯。库罗斯形成于公元前7世纪到前6世纪初，它的出现，对于希腊雕塑艺术后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库罗斯形象，即坚强、英勇的英雄和战士形象，是与人作为市民的成长密切相关的，这和

起初把祭祀英雄人物作为库罗斯形象比，不仅显得生气勃勃，而且在艺术思想和表现形式上，都比以前大大地进步了。库罗斯形象的出现，还表明英雄人物已经有了和神一样的地位，这种地位的提高，不仅具有弘扬优秀、表彰最坚强、最英勇的市民，开始对人进行社会教育的意义，而且反映了当时最先进的美学思想，因而对后来的艺术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到了公元前6世纪中叶，库罗斯雕像就比较生动而富于人性了。人体的整体比例趋于正确，肌肉开始塑造得更出色，雕像面部有了表情的描写。尽管这种面部表情描写还带有古拙和虚套的性质，但它从雕像的整个形体结构上明显地表现出对自己力量的自信和乐观。从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起，希腊雕塑作品开始出现了明显的现实主义倾向。这时候，不仅能纯熟、写实性极强地表现单个人物，而且在群像的处理上，也有了恰当的构图匠心。从考古资料中可见，在雅典卫城出土的《赫拉女神像》那样的女子雕像，已经具有少女般的神韵美感；群像方面如《特洛伊之战》、《神之集合》、《神与巨人之战》等装饰雕像，在处理人物之间的关系和雕刻与建筑本身的空间关系上，克服了以前人物形象拘谨、动作呆板虚套的表现手法，显得更加自然合理。特别是，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表现生动的现实生活的雕刻作品。在雅典出土的《玩曲棒球的人们》及《看犬猫相斗的人们》基座浮雕，是带有很大的叙事性和生动有趣的风俗画式雕刻。

阿提卡派艺术是古风时期后期希腊艺术中最先进的流派。阿提卡聚集着来自希腊各地的能工巧匠，是希腊重要的艺术中心。它的作品以强烈的造型感和立体感而引人入胜，

其作品的现实主义特性，充分显示出城市国家及文化的特征，形成了向古典时期美术过渡的最重要的形式。在一些大神殿的山墙上，描绘着神与巨人的战斗画面，其构图方式的特征，是以对登场人物形体的造型和立体感的表现，来取代以往平面式的雕镂。那些能工巧匠们全身贯注地刻画出勇士们形体动作和战斗姿态，富有极大的表现力。古风时期的希腊雕塑艺术，不仅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文明成就，而且为以后文化艺术的高度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希腊人的绘画没有留下充分的东西，仅存的作品大都是一些绘画片断和幸存下来的陶器上的图案。公元前 7 世纪到前 6 世纪，希腊就有了具有不同用途的陶瓶的固定造型，这些陶瓶的造型与形体比例，和荷马时期的陶器相比显得更加严谨、精致和漂亮。陶瓶上的绘画布局和图案的构图，与陶瓶的造型联系紧密、协调一致。这时期的瓶画，已从公式化的抽象装饰性描绘转向叙述被描绘人物的动作与行动。这种和雕塑一样的现实主义探索，往往超越雕塑作品本身的意义。

希腊陶器的形状是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他们首先考虑陶器的用途，用途决定其形状。在装饰图案上，开始使用特有的几何图形风格，对人和动物的仿模描绘，常常带有因袭和仿效倾向。但随着经济繁荣和手工业发展，这些特征很快就被一种自然主义的装饰性风格更强的美术风格所代替。从公元前 6 世纪上半叶起，那种早在公元前 7 世纪就开始萌芽的黑像瓶画发展起来，这时的陶器作品一般用黑色图案来装饰，它是在陶器的赭红色底子上绘制图案，所以叫黑像瓶画。黑像瓶画突出图案的轮廓，这种轮廓强调形体的全貌，在轮廓图案上填上黑漆，这些画面就从被

烧制过的粘土构成的红色背景上清晰地突现出来了。为了增强真实感，有时候在漆的表面上还描上其他颜色及服饰、头发等纹样，看起来人和动物的姿态动作具有较强的感染力。

在雅典，黑像式花瓶被公认为当时最优美、最时髦的产品，它不仅广泛使用，而且大量出口。在陶器生产方面，雅典人领导着整个希腊世界，产于雅典及其周围地区的陶器即“雅典货”成为希腊陶器的同义语。欧克塞基是公元前6世纪中叶阿提卡伟大的画家，他的黑像瓶画生气勃勃，引人入胜。在他手下，荷马史诗等神话故事，成为表情深厚的艺术画面。他画在酒樽上的图画《坐在帆船上的狄奥尼斯》，显示出其高度的技艺。作品描绘了关于狄奥尼斯的神话，表现了他如何从海盗手中脱险，又怎样使海盗变成海豚的故事。仔细观察可以看出，圆形画面上海船与海豚狭长弯曲的侧影，水面上弓起脊背和穿梭直行的海豚，加上弓形线条的船舷，充满着动荡不定、线条变幻的感觉，饱孕着风的船帆，乘风破浪，一往直前，好像海浪惊涛不绝于耳；但静神一看，帆船又似乎在海面上平稳滑行。长在船桅上的葡萄蔓，勾起人的重重联想，甚至想入非非。这种动与静、虚与实的有机结合，使作品栩栩如生，画面和谐华丽，表现出高度的创作技巧。

三　童年时期的哲学

希腊童年时期的哲学思想，同希腊世界的形成及希腊城邦制度的初期发展是密切联系的。希腊城邦及其社会政治制

度和文化成果对希腊人的思想和哲学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哲学在古代人那里被看做是探索天地众相演变的学问。在中国古代，哲学的任务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希腊人则称哲学为“爱智慧”之学。最早的希腊哲学家们极力在宗教神话之外，凭借观察和想像去探讨世界本原和运动发展规律，被称为自然哲学家或朴素唯物主义者。他们站在民主进步势力一边，用唯物主义思想抨击宗教迷信和传统保守观念，反对贵族保守势力。

希腊哲学的兴起，与这一时期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我们知道，奴隶制度是一种十分野蛮的剥削制度，但没有奴隶制就不可能有人类文明，因为“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手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① 在希腊奴隶制下，经济迅速繁荣，农业、手工业、商业和贸易十分发达。财富的积聚和大量剩余劳动的出现，使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得以分离，专门从事文化创造的精神劳动如哲学、艺术等才有可能产生。不仅如此，哲学思想的出现，也有其充分的思想条件。希腊人从对自然界的斗争实践中，总结出了一些萌芽状态的科学知识。航海术、造船术、金属冶炼技术、历法等，在公元前 7 世纪就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在此基础上，逐渐产生了古希腊最早的科学理论，一些数学公理、公式和丈量知识，天文学中的星象知识及测量知识，应用力学知识等相继产生了。随着古希腊经济和贸易发展，与东方

①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220 页。

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广泛，埃及的历法、医学、度量，巴比伦的天文、算术等陆续传入希腊，为希腊科学发展和人们认识改造世界能力的提高提供了重要条件，从而大大促进了对自然界和社会的理论思维。除此以外，神话和传说也是希腊最古老的哲学思想的来源之一。希腊系统的神话传说，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① 这种以幻想形式来解释自然和社会的观念中，孕育着童年时代的人们那最初的世界观萌芽。

（一）米利都学派：研究自然世界及其本原，使哲学从神话中分离出来

米利都学派诞生于公元前7世纪到前6世纪小亚细亚西岸伊奥尼亚的米利都城。小亚细亚是当时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汇地，米利都城则物产丰富，交通方便，经济发达，是伊奥尼亚地区工商业的中心。产生于米利都城的哲学学派，是古希腊哲学史上第一个哲学派别。主要代表人物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及阿那克西美尼。他们的共同点是用自然界的现象来说明世界统一的基础，把事物看做是运动、变化、发展的。米利都学派的产生，表明人类开始摆脱蒙昧的神话时代而向理性思维时代迈进，它是人类认识史上光辉的起点。

1. 泰勒斯

泰勒斯是米利都学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是古希腊乃至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位哲学家。他是米利都本地人，出身于

①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3页。

名门望族。关于泰勒斯的生卒年代，现已无法详考确证，一般认为他约是公元前624—前547年人，终年约78岁。他和雅典的著名政治家梭伦是同时代人。

泰勒斯曾从事过政治活动，他聪明好学，善于思考，是一个富有智慧的人，被誉为希腊七贤之一。关于他的一些轶闻趣事，足以说明他的智慧和社会影响。相传他是一个经营工商业的富人，他曾根据自己的预见，认为来年橄榄一定会大丰收。于是以低价租赁了大量榨油机，等到丰收季节，又以高价出租，由此积累了一大批财富。泰勒斯是一个在政治上具有深谋远虑的人，他坚定地站在工商业奴隶主一边，积极支持和拥护僭主政权。他建议伊奥尼亚人联合起来，建立共同的统治中心，以抵御波斯人的侵略。告别政治生涯后，他又转向研究自然科学，在天文、数学、物理、航海、工程等科学方面，都有较高的声誉。据说他是最早的天文学家，几乎是第一个研究天文的人。他最早研究星象学，并“发现了小熊星”①。泰勒斯第一个测定了太阳从冬至到夏至的运行，并提出了月亮只有太阳的1/120大。他发现了冬至、夏至和春分、秋分的联系，初步确定了太阳是从起点到终点的行程。他还发现了一年的季节，提出了一年四季，并把一年分成365天。泰勒斯还是最早的数学家。他在埃及旅行期间掌握了几何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并加以发展。据说，他在一个圆里面画出了直角三角形，并且还为这个发现宰了一头牛献祭；他还根据金字塔的影子来测量过金字塔的高，即按照人的身影等于自己身长的那个时刻通过比例测算来确定金字塔

① 参见格思里：《希腊哲学史》第1卷，剑桥1978年英文版，第52页。

的高度。[1] 据有关史料记载，数学方面的一个圆被它的直径等分，等腰三角形的底角相等，如果两条直线相交则对角相等，半圆内的内接角是直角以及如果给出一个底边及与底边相关的两个角，即可确定一个三角形的定理，都应归功于泰勒斯。[2] 由于泰勒斯的聪颖和卓越的成就，他受到了希腊人极大的尊敬，并被认为是最著名的贤人。传说有一次人们用渔网打捞到一只三脚鼎，经过一番争论，最后决定将它献给当时希腊最有智慧的人，结果献给了泰勒斯，而在泰勒斯的一再谦让后，最后献给了阿波罗神。

作为希腊及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的哲学思想是很简单的，他的主要内容基本包含在"水是万物的本原"这样一个命题中。亚里士多德这样说："那些最早的哲学研究者们，大都仅仅把物质性的本原当做万物的本原。因为在他们看来，一样东西，万物都是由它构成的，都是首先从它产生，最后又化为它的（实体始终不变，只是变换它的形态），那就是万物的元素、万物的本原了。因此他们认为，既然那样一种本体是常存的，也就没有什么东西产生和消灭了；……这一派哲学的创始人泰勒斯就把水看成本原。"[3] 由此可见，泰勒斯哲学思想基本观点是：水是世界万物的本原与实体，万物由水而来，是水的变形，但万物又复归于水。水包围着大地，大地在水上漂浮，不断从水中吸收它所需要的养分。

---

① 参见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第 2—3 页。

② 格思里：《希腊哲学史》第 1 卷，剑桥 1978 年英文版，第 53 页。

③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15—16 页。

泰勒斯之所以把水看做世界万物的本原，既有从神话世界观中吸取的思想成份，也有来自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在希腊远古神话中，就有关于水神和海神创造万物的祖先的说法。那时，人们对着起誓的东西往往是最古老、最受尊崇的东西，而神灵们起誓时的见证也是水。但是，泰勒斯哲学观点的形成，最根本的还是来自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思考。古代人们很早就认识到水这种生命不可缺少的元素对人们生活、社会生产及万物生长和存在的特殊作用。泰勒斯到过埃及，尼罗河每年的洪水泛滥给当地带来衣食之源的丰饶沃壤，那里的人们认为大地是浮在水上的。尼罗河水养育了埃及人民，是埃及文明形成发展的基础。泰勒斯很可能看到这种现实以及地中海、爱琴海的汹涌波涛使希腊成为强邦富国的情况。泰勒斯据此也相信“地浮在水上”，并解释地震说，这就像船在水上，由于水的运动发生摇摆一样。

泰勒斯把一种具体物质形态作为世界本原，是朴素唯物主义哲学观念。他的哲学思想使人类最早抛弃用超自然的力量来说明客观世界的神秘观念，是人类在认识世界方面开始从宗教迷信中解救出来的重要标志，它沉重地打击了贵族奴隶主宣扬和维护的宗教迷信观念。从思维方式上看，泰勒斯力图从自然本身说明自然的客观本性以及从个别事物抽象出一般原则的思维方式。泰勒斯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对当时的社会变革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贵族奴隶主极力利用宗教迷信来宣扬他们是神的后代和人间的合法代理人，妄图用神的圣法灵光来维护他们世袭特权的情况下，泰勒斯把世界万事万物的生息变迁归说为“水”这种自然原因，这无疑给贵族奴隶主以沉重打击。他的哲学思想既反映了工商业奴隶主反对迷信，宣扬科学，发展生产的要求，也为工商奴隶主反对

贵族奴隶主的斗争，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哲学上，泰勒斯关于世界本原的思想，对哲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把水作为世界万物的本原，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是太幼稚和简单化了。但是，在人类刚刚由神话传说向哲学思维转变的时代，这却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这需要多么大的精神勇气啊！以致黑格尔明确地说，泰勒斯的这个命题，“是哲学命题，哲学是从这个命题开始的”。① 泰勒斯的哲学思想，也为整个希腊哲学乃至西方哲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后来“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②

然而，泰勒斯的原始、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是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他把世界本原归结为一种特殊的、感性的东西，这实际上是用一种特殊的东西去说明其他特殊的东西，因而未能摆脱思想理论的感性形态。泰勒斯的唯物主义思想也有不彻底的地方。他的哲学命题不过是对思维与存在关系最原始的表达，在他那里，一方面把世界本原归结为水这种自然物质，另一方面又认为“万物都充满着神灵”。他说磁石所以能够吸动铁块，是因为“磁石有灵魂”。③ 这在那时人们的观念中，是不可避免的，这也表明，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逐步深化的发展过程。

2. 阿那克西曼德

阿那克西曼德是米利都学派唯物主义的第二个代表人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86页。

②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8页。

③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5—6页。

物。他是米利都人普拉克西陀的儿子，是泰勒斯的亲戚、学生和继承者。关于他的生卒年代，一般认为是在公元前611—前546年。阿那克西曼德热心于研究自然，熟悉当时的自然知识特别是天文地理知识，在科学技术上也称得上一个发明家。根据费巴莱尼记载，“他第一个发明了日晷的指针，并且把它安装在斯巴达的日晷上来测定冬夏至和春秋分。他制造了一个计时器，绘出了第一幅海陆的轮廓图，制造了第一个天球仪”。[①] 他也是第一个对自然作出书面论述的希腊人。他对宇宙和自然作了许多解释和假说，有些见解颇有价值，具有明显的科学性质。

阿那克西曼德哲学思想的特点，是从自然事物的产生、变化和消亡中去观察和研究自然，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企图深入细致地去说明人们生活世界里的一切现象，并以原始自发的形式探索和解释自然界事物的发展过程。阿那克西曼德认为，世界万物也是从某种本原产生出来的，这种本原不是泰勒斯所说的水，而是“无限”。他认为，“从这个无限体中分离出对立物。……对立物就是热和冷，湿和干等等”。[②] 这表明，“无限”中包含着热和冷、湿和干等，都是物质性的东西。黑格尔说阿那克西曼德的“无限”，“所指的不是别的，就是一般的物质，普遍的物质”。[③] 从唯物主义哲学的立场上说，阿那克西曼德哲学是泰勒斯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继续。然而，与泰勒斯相比，阿那克西曼德的唯物主义又比

---

① 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2 页。

②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第 8 页。

③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 1 卷，商务印书馆 1960 年，第 195 页。

泰勒斯大大前进了。这种进步性不仅表现在包含着更多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因素，而且在思维的抽象性上比泰勒斯大有提高。阿那克西曼德讲的“无限”虽然和泰勒斯讲的水一样，同属物质性的东西，但它却扬弃了水这种特定事物的具体形态，因而更具有普遍性。在阿那克西曼德看来，用这种“混沌”状态的“无限”，可以更好地解释世界上多种多样的事物和现象，既能说明与水有关的事物，也可以解释与气、土、火等相关的事物。可以说，他把“无限”作为世界万物的本原，这已表明在人类认识史上已经开始由认识个别转向一般，也初步接近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这一重大的哲学问题了。

在阿那克西曼德哲学中，还包含着朴素辩证法思想。

他认为，“万物是借分离而从混沌中产生出来的”①。这就把世界上的万事万物的形成发展看作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泰勒斯说万物从水中转化而来又直接转化为水，这无疑把纷繁复杂，千姿百态的世界万物简单化了，从科学意义上说，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而阿那克西曼德却认为，万物不是由本原直接转化而来，而是从本原中分离出来的，即“无限”中“分离”产生世界万物。这种“分离”是逐渐进行的，例如太阳，月亮和其它星辰的形成，就是“在世界的生成之初某种能产生热和冷的东西，从永恒中分离出来。它构成一个火圈，环绕着包围地球的气就像树皮围着树干一样，一旦它炸裂开并进入一定的圆周中，便产生出太阳，月亮和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第 10 页。

其他星辰”。[①] 阿那克西曼德把这种观点推而广之，用以解释其他自然物的形成，发展过程。关于人的形成，他说，人是另一种动物变化而来的，实际上人是从鱼产生的，人在最初的时候很像鱼。阿那克西曼德把万物看作是物质世界变化发展的过程，具有极其宝贵的辩证法因素。这无论在对天体演化和动物进化等科学观点上，还是在辩证思维方法上都是难能可贵的。

阿那克西曼德在希腊哲学史第一次用物质内部的对立来说明物质的生灭过程，并试图揭示事物产生发展的原因。他初步猜测到物质内部存在着两种对立因素，用“无限”中分离出热和冷，热包围着冷，热又使冷变成湿气和空气。空气遇热后冲出热的包围，在太空中旋转，就形成了太阳、月亮等宇宙天体。湿气干燥后成为地球，过多的湿气集聚一起，就成了海洋。在水中产生了许多生物，第一批生物像鱼一样，这些像鱼的生物又转化为两栖动物，最后演化成人。宇宙间另外一些天空和世界，也都是从“无限”中变化生成的。由此可见，阿那克西曼德不仅看到事物内部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因素，而且看到这些对立并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处在永恒运动变化过程中。这实际已经直观地猜测到事物内部对立推动是事物发展动力的思想。不仅如此，阿那克西曼德还认为，世界万物变化发展，是由“命运”决定的，这里的“命运”可能是指事物变化的规律。如果违背了这种“命运”，那必然受到“命运”的惩罚。在阿那克西曼德的哲学思想中，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思想是符合历史进步方

---

① 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页。

向和科学精神的，它不仅具有极大的科学意义，而且为工商业奴隶主反对贵族奴隶主的斗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既然世界万物是由“无限”中分离出的热、冷和湿、干等转化而来的，人是由鱼变来的，那么贵族统治阶级所编造的神灵创造世界万物，上帝创造人类的传统观念就是一种谎言，工商业奴隶主变革社会的政治主张就是合乎自然规律和历史潮流的。这不仅对当时的政治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也反映了当时希腊社会趋向变革的时期的思想理论成果。然而，阿那克西曼德哲学思想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他虽然比泰勒斯的哲学思想进步了，但仍然没有摆脱感性和直观。他讲的“无限”仍然没有超出具体的物质形式，因而其辩证法思想也带有很大的自发性和主观猜测性。他提出的许多科学假说以及事物中对立物的转化等等，都缺乏严密的科学论证，因而在对许多复杂问题的解释中，不得不借助“命运”一类的宗教观念来表达。

3. 阿那克西美尼

米利都学派唯物主义哲学家的最后一位代表是阿那克西美尼，他是米利都人欧里斯特拉图的儿子，阿那克西曼德的门生。关于他的生卒年代，史家说法不一。一般认为他大约生于公元前588年，卒于公元前524年。阿那克西美尼的生活和实际活动没有留下什么记载，只知道他写过一本书，据第欧根尼·拉尔修说，那本书是用简单而纯朴的伊奥尼亚方言写作的。[①] 后来亚里士多德的门徒们可能见到过书中某些部分。这本书现在只留下一点残篇，现在研究他的思想主要依靠古代文献资料的记载。

---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1页。

阿那克西美尼认为，世界万物的本原是气。有关他的哲学思想，历史资料是这样记载的："阿那克西美尼说本原是无限的气。正在生成的，已经生成的和将要生成的都由此产生，众神和神圣的东西也不例外，其余的东西又从它们生成。气的形状是这样：当它处于最平稳的状态时，不为视力所见。但加热、变冷、潮湿及运动时就呈现出来。它处在不断运动之中。如果它不运动，则变化着的事物就不能变化。它通过浓聚和稀散表现出区别：当它发散而稀疏时，便生成了火。再者，风是浓聚起来的气；通过凝结，气就变成云；凝结程度再高一些，便为水；更高些则形成大地；当气浓聚到最密集的程度时即成石头。这样看来，对立，即热和冷是生成的最有力的因素。"① 由此可见，阿那克西美尼的"气"本原理论，主要在于通过"气"所具有的两种对立的势力的互相转化，来说明世界万物的生成。他提出了稀薄和凝聚的概念，并认为它是由冷和热两种对立的势力彼此变化的结果。正由于冷、热两种对立的势力的变化，气才发生了稀薄和凝聚，从而形成了水、土、火、气，这些元素是构成世界万物的基本物质单元。这些思想在当时那样的科学条件和认识水平上，是很不简单的。因为气之所以能产生不同的世界万物，这是由于空气的浓厚和稀薄的不同程度所致，这就说明，不同的物质形态来源于不同含量的气，世界万物的生成变化，不是来源于本原的质分离或转化，而是来自本原不同含量的结合。这是在人类认识史上，首先实现从由质说明质到由量说明质的转变，对后来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发展，具有

---

① 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1 页。

重要的影响作用，特别是对恩培多克勒，阿那克萨戈拉及德谟克利特的哲学思想，提供了理论准备。

阿那克西美尼认为，“我们的灵魂是气，这气使我们结成整体，整个世界也是一样，由气息和气包围着”。[①] 这说明，灵魂也是由气组成的。这实际上揭示了灵魂的物质性，是古代灵魂学说中的唯物主义倾向。然而，他却把灵魂这种精神现象同气这种物质现象混为一谈，没有揭示出二者的真实区别和联系，从而使这种观点表现出原始性和直观朴素性。在气和神的关系上，阿那克西美尼认为“气并不是众神所造，相反，它们都是来自气的”。[②] 在这里，阿那克西美尼对宗教和现实、精神和物质做了出色的回答，不仅在自然界，而且在精神世界都坚持了米利都学派的唯物主义传统。

阿那克西美尼思想中还包含有辩证法因素。他认为，气本身具有内在动力，由于这种动力的不断变化，才产生宇宙万物。这实际是说物质（气）是运动的，运动才有客观世界的发展变化，变化才有新的事物。在宇宙间，稀薄和凝聚是运动的两种基本方式，宇宙是由气的凝聚而形成的，但它又会因稀散而复归于气，这种又散又聚，无限循环，构成了千变万化的大千世界。另外，还有关于冷和热两种对立物的变化而使气凝聚或稀散的观点，都充分反映了阿那克西美尼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阿那克西美尼还提出了一些科学猜测。他认为云遇到冷就变成雪，雨冻结后成为冰雹。阳光投射在极浓厚的云上产

①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18页。

② 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2页。

生了虹。据说，他是第一个发现月光是阳光的反射的人，也是第一个把行星和恒星区别开来的人。

综观米利都学派的三个哲学家，他们的唯物主义思想，反映了希腊早期社会变革和人们征服自然的斗争实践。他们以研究宇宙整体为直接对象，努力探讨关于宇宙生动的理论，是一批具有勇敢探索精神的自然哲学家，朴素唯物主义者。同时，他们着力探讨宇宙万物的运动变化，并把这种变化归之于物质本身的变化，因而具有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和人类早期的其他思想观念一样，米利都学派哲学家们的思想理论，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的局限性。

（二）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关心人生和灵魂的命运，又把哲学同宗教结合起来

在公元前6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在希腊世界西部的南意大利，产生了毕达哥拉斯学派，这个学派以其创始人毕达哥拉斯而得名。毕达哥拉斯的生卒年代并没有确切的说法，他大概生于公元前570年前后，出生在伊奥尼亚的萨莫斯岛上。据说他的父亲谟涅萨尔库早期是个雕刻师，后来经商成为一个富裕商人。毕达哥拉斯可能在随父从商的实际应用中，产生了对数的兴趣和研究热情。① 毕达哥拉斯长期在埃及、巴比伦等地进行贸易和游历，深受东方文化的熏陶。40岁左右的时候，他才定居在意大利南部的克罗顿。传说毕达

① 参见格思里：《希腊哲学史》第1卷，第221页。

哥拉斯青年时代热爱学术活动及神秘的宗教仪式和祭典，他常到离萨莫斯不远的米利都就学于泰勒斯，泰勒斯因年事已高无法亲自执教，便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并指点他到埃及等地去游学。在泰勒斯和阿那克西曼德的影响下，毕达哥拉斯注重研讨世界本原。然而，他却背弃了米利都学派的唯物主义传统，掉转身来，把世界的物理原因归诸超自然的原因，从此，使宗教神秘主义向唯心主义转化。毕达哥拉斯定居克罗顿后，广招门徒，在那里逐步建立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盟会组织，大力开展宗教、哲学、科学活动。

克罗顿是一个希腊殖民城邦，长期处在氏族贵族奴隶主的统治之下，经济政治文化比小亚细亚沿岸地区的殖民城邦落后。毕达哥拉斯来到此地后，通过建立盟会组织，开展政治和学术活动，使那里的情况逐步有了改变。毕达哥拉斯要求盟会成员要有甘愿为盟会而牺牲的精神，抑制思想感情，锻炼自制能力，加强道德修养，经常反躬自省。他还要求盟会成员统一服装，统一供给，遵守统一的生活规程。这个组织对当地的政治、宗教和科学活动起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在政治上，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成为当地贵族政体的核心。毕达哥拉斯到克罗顿后，由于思想活跃，影响广泛，很快得到权贵和老人们的好感和信任。他被邀演讲，处处受到欢迎。在建立盟会组织的基础上，他不断整顿，改革和强化贵族政体，直接操纵政权。在宗教方面，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宣扬灵魂不死，轮回转世，认为一切生物是血脉相通的。在科学上，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积极开展数学、天文学等研究。由于科学成就突出，毕达哥拉斯被认为是学识渊博、智慧超人的人。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克罗顿执掌政权期间，影响非常广

泛，他们的思想也在整个南意大利以至在西西里岛传播开来。公元前6至前5世纪之交，毕达哥拉斯学派遭到了以库隆为代表的上层阶级和以涅农为代表的民主派两方面的打击。毕达哥拉斯可能是在库隆事件发生前就已离开克罗顿，逃亡到梅大那丁并死在那里。传说他是躲在缪斯神庙里饿死的。他的追随者则四处逃亡，当年建立起的同盟组织随之解散。公元前5世纪末同盟组织又恢复了活动，其后影响长达数百年之久。

关于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的哲学思想，内容比较复杂，我们在这里只能介绍他的一些基本思想原则。

数是万物的本原。毕达哥拉斯片面夸大数的作用，把数当做万物的本原，认为万物皆数，数是万物的原型，万物是数的摹本，世界万物按照数的比例存在和发展，数的原则统治着宇宙中的一切现象。那么，数如何作为万物本原，世界万物又如何从数中生成？欧尼根·拉尔修这样记载毕达哥拉斯的观点：“万物的本原是一。从一产生出二，二是从属于一的不定的质料，一则是原因。从完满的一与不定的二中产生出各种数目；从数产生出点；从点产生出线；从线产生出面；从面产生出体；从体产生出感觉所及的一切形体，产生出四种元素：水，火，土，气。这四种元素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互相转化，于是创造出有生命的，精神的，球形的世界。”[①] 毕达哥拉斯认为，数以“一”为基础，“一”如同神一样，产生出数，数有奇数和偶数，奇数是有限的，偶数是无限的。世界就是由奇与偶或有限者与无限者所构成，无限者是虚空或气，而有限者是火，火与气的相互作用构成宇

① 第欧根尼·拉尔修：引自《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0页。

宙。物质世界都是以数为基础的，比如说，1为点，2为线，3为面，4为体。再如，土为立方体，火为四面体，气为八面体，水为24面体，等等。毕达哥拉斯彻底背离了米利都学派的唯物主义方向，把数看作第一性的东西，并给数蒙上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这是典型的客观唯心主义宇宙观。这种观念，对以后的西方唯心主义哲学，特别是柏拉图、康德、黑格尔的唯心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然而，毕达哥拉斯把数作为世界本原的观念，在人类认识史上是一个很大进步。他把事物之间的联系及事物的运动变化归为数按一定“比例”的结果，这可以说是“规律”思想的最早萌芽。毕达哥拉斯在用数解释世界万物形成发展中，也包含一些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从“一”中引出奇与偶，有限与无限等对立范畴，这对辩证法的范畴也是重要贡献。但他却没有说明这些对立范畴之间联系转化的关系及其原因，这一点受到了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的批评。

关于和谐的理论。和谐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一个重要哲学范畴。和谐的理论与数的理论是紧密联系的。他们在细心观察的基础上，研究声音节奏的和谐，发现由于发音数量的差别，使其产生的声音的长短、高低、轻重不同。因此，音乐节奏的和谐是由长短高低轻重不同的音调，按一定的数量比例所组成。据说，有一次毕达哥拉斯路过铁匠铺，听到几个铁锤一起打铁时发出和谐的声响，他发现这些声音与铁锤的重量成一定的比例。① 毕达哥拉斯由此受到启发，认真比较了不同重量的铁锤发出不同谐音之间的比例关系，然后测定各种音调的数学关系。他用一个有活动弦马的琴弦做实

① 参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238—239页。

验，发现两弦之间的负重比例处于2：1时，发出8音度的谐音，3：2时发出5音度的谐音，4：3时发4音度谐音。据此，毕达哥拉斯得出结论，音乐的和谐由数的比例决定。他把这种和谐理论予以夸大，推广，去说明其他一切现象。毕达哥拉斯研究建筑、雕刻艺术，探讨按什么样的比例才会产生美的效果，提出最美的线形是长与宽成一定比例的长方形，亦即著名的“黄金分割”。

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运动和对立表明了和谐。数作为世界的本原，它们之间有一种使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比例和关系，这种比例和关系产生了和谐，和谐又产生了秩序。例如，天体之间存在的和谐产生了宇宙秩序。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看来：整个的天是一个和谐，一个数目。……例如，因为他们认为10这个数目是完满的，包括了数目的全部本性，所以他们就认为天体的数目也应该是10个，但是只有9个看得见，于是他们就捏造第10个天体，称之为“对地”。[1]这就是说，天体的和谐和秩序，主要是由完满的数目规定所造成的。10这个数目是完满的，所以天体除太阳、地球、月亮、金、木、水、火、土、银河系九大星体外，还虚拟了一个“对地”而成为10，以形成和谐。数目关系也造成了天体之间的和谐，从而使苍茫宇宙纷繁而不乱，多变而有序。他们还认为，天体运行中也发出各自的声音，每个天体由于体积大小和运动速度不同而发出高低不同的声响，而这种声响又是由天体之间的距离决定的。天体间和谐和运动中各自发出的声响与音乐里的音程有一定关系。毕达哥拉斯学

① 亚里士多德，《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19页。

派把由这种关系造成的音调称为“天体音乐”[1] 或“钧天之乐”。[2]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和谐理论，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和审美价值，在人类科学与艺术发展史上产生了一定影响。但这种对自然现象规律性的猜测，除了带有一种科学思维的萌芽外，大都与宗教神话一类的幻想联系在一起，因而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从辩证法的方面看，和谐理论虽然揭示了辩证法的某些因素，但它又片面夸大了事物的同一，忽视了事物运动变化中的对立和斗争，是一种不全面的辩证法思想。

灵魂转世说。毕达哥拉斯认为，灵魂是神圣的，不朽的，它可以脱离人的肉体而存在。根据亚历山大在《哲学家的启承》中的记载，毕达哥拉斯把灵魂分为感觉和理性两个部分，感觉部分会死亡，理性部分是不死的。灵魂和其他生物体一样，有血液、神经等物质基础，有心脑器官，也有语言表现出来的形式。[3] 这里，他给灵魂蒙上了唯物主义面纱。然而，毕达哥拉斯又认为“灵魂已经是不死的和可游动的，肉体对它来说是纯粹偶然的”。[4] 人在世时，灵魂被束缚在身体里，人死后，灵魂就轮回转世。灵魂可转变为另一个人，也可转变为别种生物。那么，灵魂为什么会转移呢？

---

① 参见［法］罗班：《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商务印书馆 1965 年版，第 88 页。

② 参见列宁《哲学笔记》第 274—275 页；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 1 卷，第 241 页。

③ 参见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第 35—36 页。

④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 37 页。

毕达哥拉斯认为是因为有罪，对罪的惩罚造成了灵魂的轮回。灵魂通过循环转世，才实现了完全的净化，由净化达到灵魂的得救。毕达哥拉斯这些唯心主义神秘主义思想，对后来的唯心主义哲学和宗教神话产生了较大影响。

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思想比较复杂，仅用上述几个方面是难以全面概括的。实际上，这个派别不仅是哲学的、科学派别，而且是一个政治的、宗教的派别。在哲学上，如果说米利都的自然主义哲学家们，主要是把哲学从神话中分离出来的话，那么，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则主要是关怀人生和灵魂的命运。因此，他们把哲学同自然世界、研究科学与宗教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形成了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思想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最早在人类童年时期的哲学思维中提出了一些抽象因素，这对后来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科学上，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也有重要贡献，他们从数与数之间的关系和比例中发现了一些公理。毕达哥拉斯发现了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等于其它两边的平方和，这就是著名的毕达哥拉斯定理或勾股定理。据说，毕达哥拉斯为此兴奋不已，还搞了一次大庆祝。① 毕达哥拉斯还发现了三角形的三内角和等于 180 度的定理。这个学派对天文学也有发现，据说他们率先提出的地球是行星、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等富有创见的观点，成为后来哥白尼太阳中心说的先导和前驱。

（三）赫拉克利特：原始朴素哲学的高峰

赫拉克利特约生于公元前 540 年，是伊奥尼亚的爱菲斯

① 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第 8 卷，第 12 页。

本地人，出身于一个名门贵族家庭。他是高举米利都学派唯物主义旗帜，较系统地发挥了朴素辩证法思想，在西方哲学史上为辩证法奠基的人之一。

赫拉克利特生活的时代既是一个动荡的时期，也是希腊文化取得灿烂成就的时期。他生活和从事哲学活动的那些年代是希腊早期社会急剧变动，希波战争紧张进行，希腊世界处在向古典时代转变的前夜。赫拉克利特的思想无疑反映了这一时代现实。赫拉克利特生活的时代，希腊文化领域已是群星璀璨，米利都的自然哲学家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及阿那克西美尼已经建立起米利都学派的基础并形成了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传统。萨摩斯岛上的毕达哥拉斯，把伊奥尼亚的文明之火在爱琴海以西的希腊殖民地城邦克罗顿点燃，在那里培育了影响深远而广泛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赫拉克利特吸取了米利都学派朴素唯物主义和自发辩证法，毕达哥拉斯哲学中抽象思维特征及片面夸大和谐统一等观点，从相反方向也给赫拉克利特辩证法以极大影响。另一方面，赫拉克利特出身于一个对希腊文化有重要贡献和影响的名门贵族之家，这对他熟悉和顿悟远古以来及当时各种思想文化典藉，深入思考和敏锐认识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无疑是一个重要条件。正是在这些文化成就和思想资料及家庭熏陶的基础上，赫拉克利特才在哲学上独树一帜，把希腊原始朴素哲学推向最高峰。

赫拉克利特哲学思想的基础，是对关于世界本原及其存在状态的说明，其命题是“世界是一团永恒的活火”。赫拉克利特认为，“火”是世界万物本原，作为一切存在物共同基础的世界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火是自然存在的，不是神创造的，也不是人创造的；火永远处在有一定规律或尺度

的运动变化状态之中。赫拉克利特关于世界本原的这些观点，是对米利都学派自然哲学的继承和发展。他坚持世界的自然存在，否定神或人创造世界，这在宇宙观上和神话与宗教划清了界限，因而在理论上对米利都学派的朴素唯物主义作了深化和发展。关于火的内容，在赫拉克利特那里更为复杂和丰富，他在物质性基础上包含了精神性的东西，他用火与灵魂和理性一起来说明世界的统一性，这比米利都学派更高一筹。

赫拉克利特非常强调火的变动性。他认为，火是惟一具有能动性、动变性的自然物。它无形体，却最活跃；变化多端，却无固定边际。火的这些特性在宇宙生成变化过程中的情形是这样的：火浓缩而变为气，气浓缩而变为水，水浓缩而变为土；土融解产生水，水蒸发产生气，气又返回到火。由于火的变换才产生万物，现实世界的一切都是火转换的结果。赫拉克利特说："一切转为火，火又转为一切，有如黄金换成货物，货物又换成黄金。"① 我们从赫拉克利特对以火为基础的世界变化过程的描述中看到，他的朴素唯物主义宇宙观和自发的辩证法观点结合得是那样紧密，以致列宁称赞说，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绝妙的说明。②

赫拉克利特哲学思想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他在说明世界运动变化中深刻论述了"万物皆流，万物常往"的道理。赫拉克利特着力勾画出一幅世界永恒变化的生动画面，在描述这个生动画面中的深刻思想，集中体现在这样一个著名的命题中：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自古以来多少哲人面对奔

①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1页。
② 列宁：《列宁全集》第38卷，第395页。

腾不息的河水发出万物生生不已的感叹。赫拉克利特全面阐发了这一哲学命题，说明一切都处在对立统一、流动变化过程之中。整个世界是燃烧又熄灭的永恒的活火，自然界是这样，社会和人的生活也是这样，生与死，睡与醒，老与少，升与降，曲与直等等，一切都是流动转变的。他对这一命题的许多论述成为十分精彩的名言，读来脍炙人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和罗素都强调指出他的哲学思想的这一特色。应该看到，赫拉克利特的这种发展观着重强调事物变化的绝对性，没有直接说明事物相对静止问题。后来他的学生克拉底鲁把他的运动变化的绝对性的思想推向了极端，提出人连一次也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因为河水总在不断流动，一条河流总在变为另一条河，这就否认了事物的相对稳定性，认为一切都永远处在瞬息万变之中，这就陷入了相对主义的诡辩论。

在西方哲学史上，赫拉克利特首次提出了“逻各斯”这个对后来哲学产生重大影响的哲学范畴。逻各斯是一个具有多种含义的古希腊语词，中文中的“逻各斯”只是音译而已。格思里等人从大量希腊古文献中把逻各斯的含义归纳为11种，其他学者的考证虽然很多，但都大同小异不出这个范围。根据考证，逻各斯可理解为：说、语言、说话、讲演、理由、意见、思想、理性；尊敬、声誉；收集、计算、份额、比例、量度等等。但这个概念在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思想中，则有规整万物，类似于某种客观规律性的意义。根据赫拉克利特残篇中的一些表述，逻各斯的哲学含义为：逻各斯是永恒地存在的；世界万物都由逻各斯而产生；虽然逻各斯是人人共有的东西，但许多人并不认识和理解它；人们应该遵从那既能指导万物又是人人共有的逻各斯。读到赫拉克

利特的逻各斯思想，不由使人想起中国先秦道家的老子提出的道的哲学范畴，在许多地方和赫拉克利特有惊人相似之处。老子认为，有那么一个浑然一体的东西，它先于天地而生，独自存在，永远不变；循环运行，永不停息。它为万物之母，化生天下万物。我不知道它的名子，便起了名称曰“道”。[①] 可见东西方古代人思维和神圣智慧也有许多相似之处。

在赫拉克利特看来，人们智慧就在于认识“逻克斯”，只有把握了逻各斯的变化规律，才能自觉按照自然规律办事。赫拉克利特不仅认为逻各斯是“人人共有的”，而且指出“思想也是人人共有的”。这表明人有思想能力和认识能力，这种能力、智慧是火所赋予的。赫拉克利特也是西方哲学史上最早指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的哲学家。他认为，虽然人人都有认识思想能力，但要达到真理性的认识却是十分不容易的事情，因为自然喜欢躲藏起来，“逻各斯”又是与事物表面形象有区别的东西，凭直观感性是不能把握住的。他说，如果你不善于运用思想的能力去透过表面形象去把握规律，而像聋子一样充耳不闻，那就不可能认识事物。他嘲笑荷马、赫西阿德、毕达哥拉斯等心目中富有智慧的人，说他们的智慧和博学只不过是一些对可见事物的认识，并没有透过可见事物去把握其背后的逻各斯。对于感性认识，赫拉克利特并不否认，他说“爱智慧的人应当熟悉很多的事物”，但不能停留在很多事物的表面。他认为，能够看见、听见和学习的东西，是他所喜欢的。这说明他也强调直接接触的感性活动的重要性。由此可见，赫拉克利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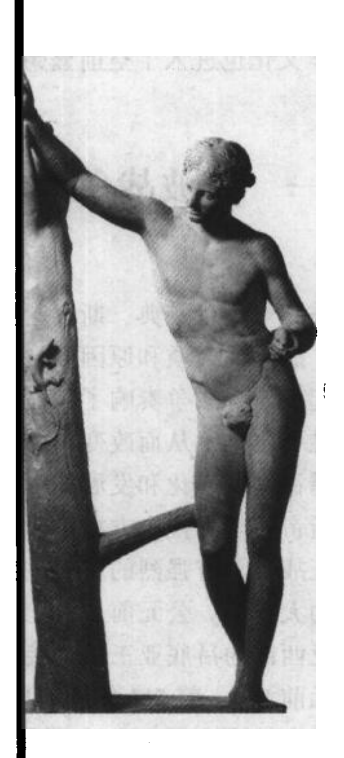
① 参见《老子》第25章。

“逻克斯”理论，企图在“火”的运动变化基础上，把客观事物变化的规律性与主观认识运动的规律统一起来，在世界物质性基础上寻求思维和存在统一的基础，这是非常可贵的。

赫拉克利特的思想十分丰富，除了以上著名思想观点外，他还对事物的对立和统一，生死和灵魂、宗教和神等作了深刻地论述。这些思想深刻地反映了那一时代的特征，是当时希腊社会急剧变动的反映和对这种变动的必然性所作的哲学概括。但由于当时希腊社会生产规模狭小，科学水平不高以及哲学家本人条件的制约，他的思想不仅是有自发性的朴素性，而且停留在缺乏科学依据的猜测上，因而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上，有的甚至是十分荒谬的。

我们通过对童年时期哲学的回眸，可以看出，从米利都学派到毕达哥拉斯学派，再到赫拉克利特，是古希腊哲学发展的一个圆圈。这三派哲学是希腊历史进入文明时代即将向古典时代变革时期的精神成果，是希腊哲学乃至整个西方哲学发展过程的开端或出发点，它同其它文明成果一起，是西方文明源头上熊熊燃烧的火炬。

第三章 希腊古典文明的盛期



- 希波战争与希腊古典文明
- 雅典民主政治
- 雅典的法律制度
- 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的繁荣

公元前5世纪，具有世界意义的希波战争爆发了。希波战争的胜利，不仅标志着希腊历史进入古典时代，而且标志着希腊古典文明的到来。这场战争，推动了希腊文明的发展，促进了整个西方文明乃至世界形势的变化。战后雅典人建立的同盟演变成为雅典帝国，经济、政治出现了繁荣和发展。雅典民主派极力主张前进与改革，“伯里克利时代”随即到来，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民主政治达到了全盛时期，希腊科学文化也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代。

一　希波战争与希腊古典文明

希波战争是以雅典、斯巴达为首的希腊城邦同波斯帝国的战争。战争的实质和原因，是波斯帝国的侵略扩张，希腊各邦奋起反击。战争奏响了一曲以小胜大，以少胜多，卫国保家的胜利之歌，从而改变了西方乃至世界形势，有力地促进了希腊社会的变化和发展。

波斯帝国是古代东方奴隶社会发展到帝国阶段的新秀，它善长征战，具有强烈的对外扩张性，最终成为古代东方文明地区的大帝国。公元前6世纪中期，波斯帝国已经消灭了小亚细亚西部的吕底亚王国，接着征服了小亚细亚各希腊城邦。公元前514－前513年，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率军渡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欧洲，占领了赫勒斯滂海峡和色雷色地

区，对雅典等城邦造成很大威胁。雅典等城邦所掌握的商业，现在却被依附于波斯的腓尼基商人所把持，波斯帝国不满足于此，野心勃勃妄图征服整个希腊本土。在这种形势下，希腊各邦只有奋起反击，进行一场反对波斯帝国侵略的战争。希腊境内到处燃起奋起反抗的火焰。公元前500年，米利都首先发动反对波斯的起义，这次暴动成为希波战争的导火线。起义爆发后，爱奥尼亚地区一些希腊城邦积极响应，米利都向希腊本土求援，雅典出动20艘舰艇，爱列特里亚（Eretria）也派5艘战舰东渡作战。米利都起义部队在援军帮助下取得胜利，攻克了波斯帝国在小亚细亚的总督府所在地萨尔迪斯，焚城而退。大流士得知这一消息后，挥师西进，安图踏平希腊。公元前494年米利都起义军被波斯帝国武力镇压了。据希罗多德记载，米利都大部分男子被杀，妇女儿童被押送波斯京城苏撒做奴隶，财富被抢光，城市被摧毁。① 此后，小亚细亚各邦被平复，大流士把侵略矛头直接指向希腊本土。



大流士一世（波斯国王）

公元前492年，波斯海陆两路大军沿色雷斯海岸向希腊进攻，结果海军在驶近阿陀斯海角时遇到大风暴，大部分舰艇沉没海底，两万海军葬身鱼腹。陆军在色雷斯受到当地土

① 参见希罗多德：Ⅵ，第19—21页。

著部族袭击，损失残重。大流士并不甘心，一面加紧备战，一面派使者到希腊各邦索取“土和水”，即要求希腊各邦降服于波斯。雅典和斯巴达坚决反对。波斯的使者被雅典人抛进深渊。而斯巴达人则把使者投入井里，讽嘲说：“井里有土又有水，要多少就拿吧！”大流士继续发动对希腊的进攻，遂即爆发了希腊人反击波斯侵略的两次大的战役。

公元前490年，大流士再次挥师进攻希腊。波斯海军越过爱琴海直扑希腊本土，先攻爱列特里亚，然后乘船在雅典附近的马拉松登陆安营，企图一战而拿下雅典。雅典全国紧急动员，万名重兵急赴马拉松反击，这就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马拉松战役。在此以前，斯巴达曾表示增援雅典，战斗爆发后雅典派人驰往斯巴达求援，但那时正是斯巴达全国举行重要宗教祭典之际，按惯例要在祭期告终后才能出兵。雅典人只好用自己的力量来卫国保家。面对数万波斯大军，雅典人以赤诚的爱国心，发动农民、工人、商人及一切能上前线打仗男子，着头盔铠甲，持盾握矛，以高昂的士气，密集的队形向前冲刺。这时，邻邦普拉提亚派来1000人支援，大大鼓舞了雅典人的士气。战斗打得非常激烈，马拉松平原上，雅典人以一当十，英勇顽强，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和熟练的战术，向不可一世的波斯军决以死战。波斯骑兵经常夜间放马于沼泽地，受阻后不能及时返回。雅典人便在清晨向波斯军突袭猛攻。他们知道波斯军战斗中惯于把主力放在中央，就把自己的军队分为两翼，一旦两军交战，雅典军在波斯军强大的压力下向后退却，而两翼则迅速向敌军纵深插入，形成左右夹击，然后包围聚歼。波斯军阵容大乱，伤亡惨重，溃败者狼狈窜上舰船，离岸逃遁。雅典人大获全胜，据记载，波斯军阵亡6400人，而雅典方面阵亡只有192人。

雅典人以高昂的士气和巧妙的战术，奏响了一曲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胜利之歌。马拉松战役胜利后，长跑健儿斐力必德飞奔回雅典报捷。他一口气跑了40多公里，为的是让雅典人早一点知道这惊天动地的喜讯。然而，在到达雅典城后，他只说了一句“雅典得救了”，便力竭气绝，扑地晕死。为了纪念马拉松战役的胜利和长跑健儿斐力必德可歌可泣的壮烈事迹，人们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特设了一个竞赛项目——马拉松赛跑，此项比赛一直沿续至今。

马拉松战役后不久，大流士就病死了。其子薛西斯继位，更加紧准备征服希腊。雅典人经过马拉松战役，懂得了怎样对付波斯人的侵略。他们修造船舰，加紧备战，联合希腊其他城邦结成反抗波斯的同盟。波斯人则在各地强征人、财、物，以充实军力随时准备向希腊再次宣战。公元前480年，波斯国王薛西斯亲自率领海陆大军，驾驶战舰，沿色雷斯海岸分海陆两路又一次侵入希腊。波斯军号称百万①，气势汹汹。而希腊联军则只有11万陆军，海军有400艘战舰，显然处于劣势。战争形势十分严峻。但希腊人决心以赤诚的爱国心，勇敢顽强的意志和无比的机智战胜侵略者。战争的第一回合是著名的温泉关之战。温泉关傍山倚海，号称天险，希腊军以斯巴达国王利奥尼达斯统帅的300名战士为核心，率精兵屯守，准备随时迎战波斯侵略者。波斯人多次进

① 据希罗多德《历史》第7卷，第184页—185页记载：波斯部队战斗人员达2，641，610人。据今人考究，在当时浮桥及其它运输工具条件下，绝不可能有数百万人在短期内渡过海峡。希罗多德显然是过分夸大了。而那时有30—40万战斗人员，加上海军的千余艘舰船上的15万水兵及皇帝的宫廷侍从和后勤人员，波斯军在50万人左右，则是完全可能的，这在当时也是空前庞大的部队了。

攻不能得手，不可一世的薛西斯垂头丧气。这时，一个山民向波斯人指点小道绕至温泉关背后，于是战争势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利奥尼达斯指挥守军迅速撤离，自已率300名斯巴达战士严防死守，誓与温泉关共存亡。经过激烈鏖战，终因寡不敌众，温泉关失守，利奥尼达斯和他们的士兵们全部壮烈牺牲。直到现在，温泉关当年将士们的殉难地还立有用血泪凝成的碑铭。希腊人英勇保国的精神名扬千古。我国鲁迅先生于1903年发表《斯巴达之魂》一文，歌颂斯巴达武士之魂与地球共存。

温泉关失守后，波斯军长驱直入中希腊地区，主攻雅典。雅典人在海军统帅特米斯托克利劝导下，将妇女儿童和财物转移到附近的岛上去，把成年男子应征入队，准备在萨拉密湾与波斯人决一死战。决定胜负的萨拉密海战爆发在即了。波斯军人入侵雅典后烧杀掠抢，骄横野蛮，更激起雅典军民奋起反击的坚定意志，加之有温泉关战役300名战士视死如归战斗精神的鼓舞和斗争经验，他们信心百倍，斗志昂扬。公元前480年9月22日，萨拉密海战打响了。波斯舰队封锁了狭窄的海湾口，并跃跃欲试对希腊海军舰队呈包围之势。在这生死存亡的时刻，特米斯托克利沉着指挥雅典海军以优势力量反扑波斯舰队，他们纷纷从侧面猛烈撞击波斯船只，刹时，萨拉密海湾杀声震天，浓烟滚滚，波斯军虽然舰队宏大，人多势众，但在水域狭窄的战场和英武无比的雅典将士面前完全丧失了作战能力，舰船接二连三被击沉。入晚战斗结束，拥有千余艘军舰、曾不可一世的波斯军溃不成军，300余艘战舰被击沉，而希腊军只损失40艘。雅典戏剧作家埃斯库罗斯亲身参加了希波战争，抗击波斯人的侵略。他在其剧作《波斯人》中描写当时战斗情景时写道：

初始，如流的波斯舰队还能够支持；
一旦许多战舰都挤在狭港里的时候，
我方的舣舰不但不能顾及彼此，
而且每个铜船头却碰到别一艘，
就把全船的桡扁撞得破碎支离，
但是希腊的舣舰就不肯放过良机，
围着我们攻打，弄得船翻舰灭，
汪洋大海上，一刹间看不见波涛，
只见破船的碎片和死者的尸体，
海滩上，礁石上都堆满了尸首。
其余的波斯战舰就一艘跟着一艘
在纷乱中遁逃……①

原来登临附近山头上观战准备看一场好戏的薛西斯此时羞愧不堪，再也无心恋战，便匆忙御驾回朝。希腊军乘胜进攻，消灭波斯余部，夺取了最后胜利。

希波战争以希腊的胜利而告终，它引起了世界历史的变化。如果波斯人入侵希腊的野心得逞，那么刚刚燃起的希腊文明火炬可能被熄灭。希腊的胜利严厉打击了波斯的扩张野心，使希腊古典文明得以发展，后来传至罗马延及欧洲，逐渐形成西方文明。由此可见，希腊人在希波战争中的胜利，不仅保卫了希腊的领土和城邦，而且保住了希腊的文明，促进了希腊文明的发展，成为希腊古典文明的繁荣和走向盛期的标志。

---

① 埃斯库罗斯：《波斯人》第412—422行。转引自［苏］B·C赛尔格叶夫著《古希腊史》缪灵珠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第223页。

二　雅典民主政治

萨拉密海战以后，希腊与波斯之间的战争时断时续，一直进行到公元前449年。这时期，希腊历史发展中最重要的事件是提洛同盟的形成和雅典海上霸权的建立。为了继续对波斯作战，雅典与爱琴海岛屿和小亚西海岸的许多希腊城邦结成同盟。由雅典领导，史称雅典海上同盟。由于同盟会议和金库设在提洛岛，因而又称“提洛同盟”。约有200多个城邦加入同盟，各邦在同盟中一律平等，组成共同舰队，有钱的出钱，有船的出船，其中雅典具有300艘三列桨大船，因此拥有领导权、金库的管理权和舰队的指挥权。公元前468年，在雅典指挥下，同盟齐心协力，英勇作战，使波斯军大败于小亚的攸里麦顿河口，雅典势力日益强大。公元前454年，提洛同盟金库从提洛岛移到雅典。5年后即公元前449年，雅典又率军在塞浦路斯岛大败波斯军。同年双方缔结和约，波斯军放弃对爱琴海和黑海一带的统治，宣布承认小亚希腊各邦的独立。至此，希波战争最后结束。

希波战争后，希腊社会经济进入繁荣时期。农业生产技术不断革新，出现了黍、蔬菜、小麦轮种；开始使用绿肥和利用灰烬、石灰石等人工肥料；橄榄、葡萄等园艺业在雅典、米利都等城邦发展很快，橄榄油不仅供国内食用和照明，而且成为重要出口产品。和农业相比，手工业发展更快。在雅典，有了20几种手工行业，出现了行业内部分工，开始划分粗、细工种。许多手工业产品盛销地中海和黑海各

地，特别是雅典产的“红花瓶”极负盛名，图案精细，外观雅致，光彩夺目，倍受欢迎。造船业有很大发展，雅典已能制造排水量250吨的商船。金、银、铜、矿业也很发达。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工商业繁荣，各个城市建立了专门经销商品的集市场地，海外贸易十分发达。特别是雅典，贸易范围更为广泛，皮里优斯港成为爱琴海上著名的经济商港，东西方许多国家的皮革、羊毛、毛毯、亚麻、衣料、大麻、木材、橄榄油、葡萄酒、陶器和各种矿产品等商品，都在这里集散。商业的繁荣和发展，也促进了货币及金融业的发展。

希腊经济的不断繁荣，加之在雅典直接指挥下，全盟同心协力，在与波斯帝国的作战中屡立战功，提洛同盟特别是作为盟主的雅典，声誉大震。雅典开始居功自傲，把自己凌驾于各邦之上，原来雅典和各邦的那种平等关系很快发生变化，提洛同盟已经变质，雅典同其他城邦成为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这时，同盟实际上成了雅典帝国的代名词。雅典常常以盟主的地位，强迫其他希腊城邦缴纳钱物，不从者则兴兵征讨；对于退盟的城邦，更是以武力进行镇压。公元前466年，雅典悍然出兵镇压退盟的那克索斯，次年，塔索斯退盟也遭到镇压，最后被迫投降，拆毁城墙，交出战舰，服从雅典统治。公元前454年，在未经同盟会讨论的情况下，雅典把同盟金库移至雅典，从此以后，同盟会议再未召开，同盟的一切都由雅典的独裁命令来决定。希波战争结束后，按说同盟已完成使命失去存在意义，但雅典却不放弃对加盟城邦的统治，对各加盟城邦钱物的索取和政治压迫反而变本加厉。盟金份额的划分和盟金开支等重大问题，都由雅典决定；爱琴海上各战略要地，都有雅典军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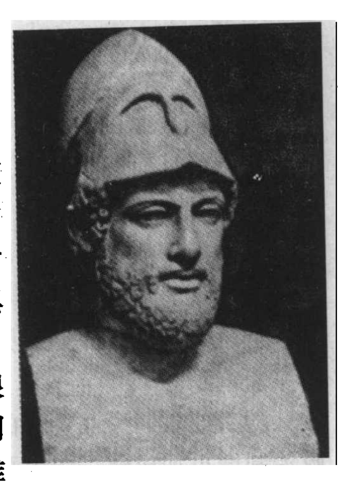
移民驻守；违命、退盟之邦自然遭到残酷镇压。

在雅典帝国对各盟邦残酷统治的同时，雅典内部在民主政治方面却继续发展，以至成为希腊古典文明的集中代表和民主政治的灯塔。由于雅典战胜波斯，建立海上霸权主要依靠的是海军，因而海军在国家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海军的成员主要是平民（第四等公民），他们强烈要求民主平等，积极参加和支持与贵族奴隶主的斗争。在斗争中锻炼和造就了民主派的优秀代表人物，即所谓“平民领袖”，其中杰出的人物有厄弗阿尔特和伯里克利。厄弗阿尔特经常在500人议事会和公民大会上攻击贵族会议成员，极力主张限制地主贵族的特权，不久就遭到暗杀。伯里克利继承前人事业，成为民主派的旗手。这是一位有胆识、有谋略，坚毅刚直、气度不凡的政治家，他所开创的民主政治把雅典推向一个发展的极盛时期，以至马克思称赞说，“希腊的内部极盛时期是伯里克利时代”。①

伯里克利出身雅典的名门世家，他的父亲是希波战争的名将，母亲是被称为“雅典民主制之父”的克里斯提尼的侄女，从母系来算，他恰是渎神者麦加克利的第六代外孙。伯里克利童年时代，受过完备的贵族式教育，曾就读于富有民主科学思想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门下，在政治学、文学、历史学、军事学等方面造诣很深。在政治倾向上，他既代表工商业奴隶主利益，是殷富公民的民主政治家，又是第四等级平民大众的代言人。他和贫苦民众萍水相逢，在民众眼里，他是一位富有而不骄横，权大而不腐败的政治家。人们传说，伯里克利在雅典只知道一条路，那就是

①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13页。

通向公民大会场和500人会议厅的路。伯里克利风度超人，舌辩演说极为动人，并且精娴韬略，遇事冷静，处事果断，分析问题能洞识机遇，因而多次当选为首席将军。他凭其智慧和出众的才华赢得民众的极大拥护，在雅典享有很高的威望。



伯里克利

在伯里克利领导下，雅典很快走向繁荣，成为希腊古典文明最集中的代表。希波战争前，雅典只是一个古老的半农村城市，到了伯里克利时代，便一跃而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大城市，豪华富丽使希腊其他城市为之失色。大批哲学家、作家、学者、艺术家等，纷纷跑到雅典来施展才能。雅典在伯里克利领导下，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社会稳定，国泰民安，真可谓是一个太平盛世，黄金时代。那时候，在国内公民之间没有对立和倾轧，到处是一片祥和气象。国家升平，海内统一，雅典国家达到富强的顶峰。伯里克利的传记作者普鲁塔克、史学家修昔底得，都对伯里克利给予很高的评价。一位与伯里克利同时代的人曾自豪地说："假如你未见过雅典，你是一个笨蛋；假如你见到雅典而不狂喜，你是一头蠢驴；假如你自愿把雅典抛弃，你就是一头骆驼。"

伯里克利最大的贡献和成就，在于他推动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从总的方面说，伯里克利在雅典的民主改革主要是削减贵族会议和执政官的权力。他几乎剥夺了贵族会议的

所有权力和各执政官的司法权力，只让那些终身任职的贵族会议成员审理极少发生的凶杀案，给各执政官普通案件的初审权和少量罚款的权力。这一改革，使高级官吏的专断势力受到打击。同时，伯里克利宣布所有官吏一律实行津贴制，这就给下层公民参政提供了条件，增加了公民的权力。这种平民政治的实质，是广大普通公民在雅典这个文明圣地掌握了国家的最高权力。把口头上的民主制变为实际上的民主制，把少数人的民主制变为多数人的民主，这就是伯里克利的主要贡献。

随着奴隶制商品经济的繁荣，伯里克利开创的雅典民主政治制度更加成熟，内容更加丰富。

首先，各级官吏面向公民，以抽签方式选举官吏，轮流执掌政权。除军官和司库官投票选举外，其他官吏，一律在年满30岁的公民中以抽签方式产生。各级行政官员任期都是一年，不能连选连任。在这种情况下，雅典公民可不受财产限制而经抽签担任各级官吏，这在古代可以说是最彻底的民主选举制度了。对于执政官这类最高的官职，一般需要先经各地区部落选出候选人，再从候选人中抽签选出担任本职务的人。其他如500人会议议员，陪审法庭的审判员则在各选区直接从公民中抽签产生。在希腊人看来，抽签的结果完全是天意所指，因而是有神圣而不可更改的意义。抽签选举官吏的制度，给每位公民提供了广泛而平等的参政机会，公民在抽签面前人人平等。抽签选举官吏的办法是十分严密的，比如500人会议的议员由30岁以上的全体公民抽签选出，议会设立一个主席团。当时雅典共10个选区，每个选区选出议员50人，每一选区的50位议员轮流组成主席团，负责日常工作，任期各为一年的十分之一，即36天。因此，

雅典国家每年有10届政府。每个主席团设主席一人，每天早上抽签决定，任职时间一天一夜，不得延长，不能连任。在这一天里，他全盘负责主席团工作和500人会议各项活动，如同国家元首一样。雅典的抽签选举制及公民轮流执政的制度，彻底否定了政治上的特权，一个人官职再高权力再大，都无法把太多的权力集中于自己手中，即使掌握大权的人，由于任职时间和不能连任的制度限制，使他也无法网罗党羽，形成独裁势力，这就不会产生个人专权。

抽签获任的官员，必须在神的面前庄严宣誓。公元前4世纪一位演说家曾记述了审判员获选任职后的誓言："我将根据法律和公民大会及500人会议的决定行事。我既不赞成僭主政治，也不赞成寡头政治。我不听反对雅典民主政治的人们的话，不允许废除债务，重分雅典人的土地和房屋。我将不让被流放的人和被判死刑流亡国外的人回国。我不会违犯法律和法令把住在城里的人赶走。我将不允许在同一年担任两项公职。作为审判员，无论是我本人，还是经过第三者，我都不会接受礼物。无论是对被告还是原告，我都以同样态度听取他们的意见，并且我将就事情的实质作出判断。如果我违反这些义务中的任何一项，那就让我及我的家庭遭到各种诅咒。"① 从这篇誓言中可以看出，处在雅典民主政治盛期的公民，已有了较高的素质和觉悟，尽管这些思想是那样的原始朴素，甚至带有宗教色彩理想化倾向，但在古代那样的条件下，公民有那样的认识水平，还是难能可贵的，以至伯里克利对他们领导的雅典民主政治也大加赞颂，断言雅典是"全希腊的学校"。

① 廖学盛：《雅典民主政治》，载于《人类历史的进程》第23页。

其次，公民大会的权力至高无上，政府机关处于从属地位。同其他国家不同，雅典的最高权力机关不是政府或议会，而是每个公民都能参加的公民大会。公民大会成了名副其实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在直接民主制下，每个公民都是这个大会的成员，都有权发言和投票表决国家的重大事情。公民大会每隔 9 天到 10 天举行一次，会场一般设在卫城以西的普尼克斯岗。斜坡形的会场前，有一块用巨石凿成的平台，那就是主席台。台前还设有一个供祭祀用的祭坛，台后放一块木板，那就算主席的座位。每次会议的前几天，一般要在会场上公布会议讨论的方案，开会当天传令官一大早就开始在大街上高声呼叫，公民们听到叫声就放下手中的活纷纷到普尼克斯岗。公民大会组织严密，检查非常严格，在会场入口处，有 6 位专门检查员和 30 名助手，认真地按照名册检查核对到会的每一个人，外邦人、妇女、奴隶等一律不许进入会场。会场周围，还有森严壁垒的保安，那是由西徐亚的弓箭手们组成的警戒队伍，专门维持会场秩序。

公民大会的形式既隆重又热烈，气氛非常活跃。一开始，传令官用宏亮的嗓门宣读经 500 人会议审核过交公民大会讨论的提案，接下来进行热烈的辩论，赞成者和反对者轮流登台发言。发言者在发言时，赞成的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反对者则发出不同的怪叫声。有时候，会场上群情激奋，此起彼伏，一派喧腾热闹景象。辩论结束后，开始投票。对于一般议案，可以用举手进行表决，如果是选举或放逐等重大事情，则采用抽签或投票的方式。频繁的公民大会讨论的议题相当广泛，除了审查公职人员、制定法律、讨论国家安全、国家债务、对外政策、决定宣战或媾和、授予或剥夺公民权等重大问题外，还讨论缔约等日常事务。如果遇

到战争等非常时期和紧迫事情，公民大会则随时召开。有时候，公民大会可以允许公民就任何问题自由发言，公民当家做主的城邦理想体现得非常充分。

在雅典，政府完全从属于公民大会。广大公民要求做的事，政府必须照办；多数公民反对做的事，政府就不能再做。政府不能违背公民的利益和意志，只能根据大多数公民的意见去行事，这和现代西方所谓的民主国家把议会当做国家的最高权力，广大群众处于无权地位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第三，监察制度十分严密，公职人员必须廉洁从政。雅典的官吏一般任职时间都比较短，一般只有一年多。就在这样短暂的时间里，都有许多严密的监察监督制度，这些制度使国家的公职人员必须廉洁从政，不得胡作非为。官吏在上任前，首先要接受资格审查，如发现问题，就要交法庭裁决，以决定是否可以任职。对于执政官员和将军，公民大会每年要进行10次信任投票，以考察其称职与否。如多数公民对某一官吏投不信任票，这位官吏就得接受法庭审讯。如有问题，重者受到刑罚，轻者处以罚金；没有发现问题时，就恢复职务。官吏任职期满，还要对其任职间的活动和经济账目进行审查。如发现贪污、受贿等问题，还要交法庭裁决，判决有罪者，处以贪污或受贿额10倍的罚款。雅典民主政治鼎盛时期的这种严密的监督制度，要求城邦任何公职人员，无论职位高低，都必须廉洁从政，勤政为民。即使职位再高的官吏，也不能脱离公民大会而擅自决定国家军政大事，相反还要受到公民大会和500人会议的经常监督。对于权势过大难以约束的官吏，还用陶片放逐法予罚处。譬如说，对于雅典的将军那样的官吏，除了用上述制约来监督

外，对违纪者还需要用陶片放逐法进行制裁。由于这类官吏不通过抽签产生，而且可以连选连任，权势大，任期长，公民难以控制。雅典在执行民主监督制度方面，对违法官吏的处置是残酷无情的，不论你功勋多大，威望多高，依法惩处毫不留情，从罚款到放逐直至死刑。泰米托克利在雅典可谓是功劳卓著的人，深受人们拥戴。希波战争中，雅典人在马拉松战役后从劳里翁银矿获得 100 塔兰特的钱款，当时有人主张把这笔钱分给公民们，泰米托克利坚决反对，他说服公民大会用这些资金建造了一百多艘三列桨战舰。结果这批战舰在波斯占领雅典时，对于转移雅典全体公民，并在萨拉密海战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当波斯军入侵雅典后，泰米托克利力排众议，巧施计谋把波斯军诱入狭窄的萨拉密湾，和其他将领一起导演了著名的萨拉密海战，几乎把波斯海军全部歼灭，从而奠定了希腊人在希波战争中胜利的基础。战后评功时，各国将领除每人投了自己一票外，都不约而同地投了泰米托克利一票，泰米托克利成了希腊最负盛名的英雄。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英雄，犯了贪污受贿、侵吞巨款，勒索其他城邦的钱物、私通敌国等罪行后，也要从严惩处。雅典对这种屡建奇功而权势过大的特殊官吏，采取陶片放逐的特殊办法处理。每年第六届主席团任期中，有一个法定议案，就是公民大会举行一次投票，看看是否有违纪违法的人需要放逐。会上每人领取一块瓦片，上面写上自己认为需要放逐的人的名字，再由专人进行统计。瓦片少于 6000 片，即无效，瓦片超过 6000 片的人中得票最多的就被放逐 10 年。泰米托克利就是用这种方法被驱逐出雅典的。在雅典，公元前 5 世纪的许多著名政治家和官吏都受到公民大会程度不同的惩罚。贵族出身的客蒙将军在希波战争中也

战功卓著，他是名副其实的沙场老将，雅典帝国的开国元勋，但他也遭到放逐。连伯里克利本人也因擅自动用公款而遭到过罚款。雅典的这套监督机制，解决了官吏腐化堕落、政治腐败，个人专断等问题，它使不法官吏无可乘之机，公民真正当家做主，有权参政议政，管理国家。这对后来许多国家的民主政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四，民主产生陪审法庭，以投票方式判决案件。陪审法庭是雅典的最高司法与监察机关，它的职责范围很宽，权力很大，不仅审理诉讼案件，而且兼管官吏的资格审查，纪律检查，对公职人员进行考核，并批准其工作报告。不仅审理国事罪、渎职罪和"不法申诉"[1]，而且也参加立法工作，对公民大会的决议有最后的核准权。陪审法庭的审判员叫陪审员，法庭拥有6000名陪审法官，由每个部落在30岁以上的公民中各抽签选出600人组成，任期为一年，不能连任。这些法官被分配到10个法庭，每庭500人，共计5000人，其余的1000人为候补审判法官。每个法官到哪个法庭，不是由本人选择，也不由执政官指派，而是由抽签决定。法庭审判什么案件，也不由法庭自己挑选，而是临时抽签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和被告事先不知道由哪个法官来审判，陪审员开庭前也不知道审判谁。当事人想贿赂法官是办不到的。陪审法庭的审判程序也很特别，当原告和被告及证人陈述完之后，陪审员不是进行商议，而是根据自己的判断直接投票，得票多者为胜诉，得票少者为败诉。票数相等则判原告败诉。

---

① 指不符合法定规程的申诉。500人会议及公民大会的决议如果违背法律或不符合立法程序的，任何公民都可以提出抗议，进行"不法申诉"。

雅典法庭的产生和审判过程有很大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它和那种一人判案、贪赃枉法，法官屈从权势，徇私舞弊的司法制度相比，具有极大的公正性。在雅典司法制度下，当事人无法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贿赂那么多的陪审员，陪审员投赞成或反对票全凭自己的判断和良知，不受外界任何影响，不担任何风险，这就保证了审判的自主性和公正性。如此严密的审判程序，阵容庞大的陪审员队伍，所作出的审判结果，必须无条件执行。在雅典，无论什么人，违法犯罪后，只要陪审法庭作出判决，他就必须老老实实接受制裁，这充分表明了雅典法庭的权威性。

在世界古代历史上，雅典民主政治具有最典型、最深远的意义和影响，是希腊古典文明中空前绝后的成就。据修昔底德在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记载，伯里克利曾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中，对雅典民主制备加赞颂。他说："我们的政体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体，就是因为我们政府为了多数人而不是为了少数人。我们的法律，在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保证人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无所偏私；尽管人们的社会地位有高低不同，但在选拔某人担任公职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他的阶级出身，而是看他有没有真才实学。任何人，只要他能对国家有所贡献，绝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我们在政治上所享有的这种民主自由，也广泛地体现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① 然而，即使这样的民主制度，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从阶级本质上说，他们是对奴隶实行专政的一种奴隶制民主。在这种制度下，"奴隶

①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克劳莱之译本，《现代文库》版，第109页。

没有任何权利，始终是被压迫阶级，不算是人”。[①] 雅典的民主制只是雅典公民内部的事，奴隶，妇女、外籍人是不能享受这种民主自由的。在对外政策和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雅典并没有什么民主可言，提洛同盟演变为雅典帝国，残暴的帝国政策和对邻邦的践踏蹂躏，都暴露出奴隶制民主的虚伪本质。尽管如此，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雅典民主政治对雅典的经济和文化发展起了极为进步的推动作用，从而使雅典成为希腊古典文明的中心和摇篮。

三　雅典的法律制度

雅典的法律制度，是希腊文明的重要内容。早在革拉古改革时期，雅典的立法活动就开始了。以前，雅典城邦使用习惯法，习惯法通常是秘密地援用，氏族贵族为了庇护本族，迫害平民，时常按照自己的意图解释法律。为了公正执法，广大平民强烈要求制定成文法。革拉古改革中，首先制定了成文法。革拉古的法律广泛采用重刑，以严酷、残暴而著称。法律对盗窃、纵火等罪都要处以死刑，甚至偷懒盗窃水果和蔬菜等也与杀人、渎神同罪等罚。所以，有人说革拉古的法律是用血写的，他课罪从重，处刑严峻是极为著名的。他的立法除了有关杀人罪的部分外，其余没有保留下来。公元前594年，梭伦当选为执政官员，他勇敢地进行立法改革，制定了许多法律。他的法律公布在16块白色木板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50页。

上，让所有官吏和民众都要发誓遵守。这些法律没有完整地保存下来，从已知的残篇中可以看出，梭伦立法的主要内容有：颁布“解负令”，清除一切债务奴役制；按财产多寡把居民划分为4个等级，并规定了各等级的社会地位和权利；强化了民众大会的作用，各个等级有权参加，由它选举官吏，决定国家大事；他还规定了许多有利于发展工商业的法规。梭伦立法进一步巩固了雅典的私人所有制，使整个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发生了大变化，为雅典奴隶制经济特别是工商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平民领袖克里斯提尼当选为执政官后，也进行了立法改革，他首先撤除了原有的4个部落，把整个雅典划分为10个选区，完全以地域划分居民代替了按血缘划分居民，同时，大力推行奴隶制民主政治。此后，雅典制定了“陶片放逐法”，对那些违害国家的危险分子进行放逐，规定10年后才准回国。希波战争胜利后，雅典和希腊的许多城邦进入了经济繁荣时期。与此相适应，雅典确定了奴隶主民主政治，并获得高度发展，特别是伯里克利时代制定了法规，极大地促进了雅典的政治和法律的民主化进程。

雅典法律的内容很丰富。关于所有权问题，公元前5—前4世纪，土地、房屋等不动产和奴隶、牲畜等动产都可以进行自由买卖。但雅典初期的立法中还没有明确表示所有权的词语，那时的私有制还带有公社所有制的性质，不过私有财产还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各届执政官上任就职时，都向公民宣布要保护每个公民的私有财产。一旦公民的财产所有权受到损害时，可向司法机关诉讼，法律予以保护。

相比之下，雅典的债法比较发达。那时候，雅典债的类型有两种，即因契约而产生的债和因损害赔偿发生的债。前

者为契约债务，亚里士多德称为自由之债。它是双方当事人之间通过协商达成的一种协议，一般情况下，契约采取书面形式，以便保留证据。契约中规定的项目，当事人必须严格遵守，不得毁约。要保证债的履行，防止当事人一方毁约，需要有担保。最早是债务人的人身作担保，债务人逾期不还债，便被沦为债奴。梭伦改革中，规定只有从国外赎身回国的公民到期不还所借的赎身费被沦为奴隶，而国内公民因负债而变为奴隶的做法则被废止。在雅典，有很多类契约，但最多见的是借贷、合伙和租赁。借贷契约方法很简单，通常以口头订立，其借贷利息相当高，一般年利在 12%—18% 之间，有时高达 30%。合伙契约是两人以上相互达成某种协议，各自出资，合伙经营以达到共同经济目的而缔结的一种契约。这种常见的契约在造船等商业性经济生活中起重要作用，往往用书面形式签订，签约时证人必须到场。签约后合伙人按照契约规定各以一定的物品或金钱作为合伙资本。在经营过程中，如管理不善造成损失时，由合伙人共同负责。租赁契约在雅典也很流行，奴隶、牲畜、船、土地、房屋等都有可以作为租赁对象。一旦契约签订后，出租人必须按规定时间将物品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必须按时交纳租金，如有到期不交付者，法律保护出租人利益，将出租物品收回。因损害赔偿的债务，指的是公民的人身或财产受到损害后，受害人请求赔偿损失而与加害人的一种债务关系。一般情况下，赔偿金的数额往往超过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加害人无力赔偿或受害人起诉时，则成为法律惩处的依据。

在犯罪和刑罚方面，雅典主要受理背叛国家、欺骗民众、渎神等国事罪，此外，对于破坏家庭罪、侵犯人身罪、

侵害财产罪也予以受理。雅典常用的各种刑罚有死刑、剥夺自由、出卖为奴、烙印、放逐、罚金、鞭笞等。在执行这些刑罪时，不同阶层的罪犯有不同的处刑方式。奴隶犯罪处罚肉体，自由民则处罚财产。但在雅典，少数人犯了罪即使处以死刑，执行时也尽量采取温和方式以减轻服刑时的痛苦，通常，让犯人服用慢性毒药，直至心脏衰竭慢慢死去。对于犯死罪的奴隶，受刑则是残酷的，他们或者用棍棒被活活打死，或者被从悬崖上推至万丈深渊摔死。在雅典刑事法中，还要许多原始公社时期的习俗。比如，在一定情况下，法律也允许复仇的行为，当男子发现其妻或姐、妹、女儿与人通奸，他可以将与之通奸的男子处死。再如，刑事案发后受害者及其亲属也可以和犯罪者订立赔偿契约，当犯罪者交纳赎罪金后案子可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私了。同时，如果受害人表示宽免，或在临终前同意赦免加害者，那么别人则不得对凶手进行任何处罚。

雅典的法律在婚姻、家庭与继承关系上，很多方面继承了希腊人的习俗。在婚姻方面，荷马时代流行的买卖婚姻在雅典仍有很深的影响，这种买妻婚一般是以岳父与女婿签订契约来实行，女婿必须向其岳父交纳一定的财物，岳父也向女婿赠送礼品。交了买妻费，还要举行隆重的订婚仪式，不举行订婚仪式，婚姻关系不能成立。在伯里克利时代，男女双方结婚年龄很悬殊，晚婚男子的婚龄一般近 30 岁，而要求新娘的年龄在 15 岁以内。后来差距更大，甚至提出男子 37 岁，女子 18 岁为结婚的适当年龄。雅典实行一夫一妻制，但实际上，这只是对妻子的要求，法律允许男人与妻子以外的女人通奸。当战争结束后男子数量减少时，男性公民进行重婚，法律也是准许的。那时妻子处境很糟，离婚要经

过很复杂的手续，而男子却有很多特权，他可以随意把妻子赶出家门，也可以自由离婚。梭伦改革以前，家长在家庭中有绝对的权利，在必要的时候，家长可以将妻子、儿女逐出家门甚至卖为奴隶。直到梭伦改革后，这种特权才受到了法律上的限制。在雅典，只有男子有继承权。家庭中兄弟之间可以共同继承遗产，不过长子要比其他兄弟得到的财产份额稍多一点，而女子只有到出嫁时才能从兄长那里得到嫁妆。以前，雅典通行法定继承。法律规定的继承顺序是儿子、兄弟、侄、叔伯及堂兄弟，死者如有儿子，女儿是不能继承的，如无兄弟侄辈时，姐妹及甥女辈才能继承。梭伦改革后，则实行按遗嘱继承财产。法律规定，立遗嘱者只有在精神正常情况下且不受任何物质和精神强制时，所立遗嘱才有法律效力，未成年人、养子、妇女立的遗嘱不能作为法律依据。

雅典的法庭和诉讼制度也比较严密。有比较复杂的司法审判机关。除了国家机关和官吏行使职权外，还有专门的司法审判机构。有专门审理故意杀人、毒害和放火案件的阿留帕克最古老的司法机关，有专门审判教唆杀人、误杀、致残及杀死异邦人案件的埃非特法院，梭伦改革中专门设立了陪审法庭，还有专门审理财产纠纷案件的 40 人法院，专门审理民事纠纷案件的迪埃德特以及专门审理海外贸易、破坏宗教仪式和秩序等的专门法庭。雅典法律对起诉权有严格规定，在那里真正享有起诉权的是雅典男性公民，奴隶是没有起诉权的。外地人要起诉，必须经过他们的“保护人”。在诉讼中，私人诉讼和公共诉讼是两种基本形式。私人诉讼只能由受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提出，在未结案前可以暂时停止。诉讼只能取得赔偿或罚款；而公共诉讼则由任何完全享

有公民权利的公民提出，案子必须进行到结案为止，诉讼结果只能惩罚犯罪者。雅典法律的诉讼过程分为审查和裁判两个阶段。审查结束后，便确定裁判日期。在裁判大会上，法官首先宣读原告的申诉书和被告的答辩书，然后原告和被告进行辩论。最后法律官员采取秘密表决的方式进行判决，当票数相当且法官放弃表决时，被告则判为无罪，当事人不服判决，可向陪审法庭上诉，陪审法庭的判决作为最终裁判，不得再申诉。

四 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的繁荣

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下，希腊的奴隶制经济达到了最大的繁荣和发展。

公元前5世纪，希腊各邦的许多生产部门已广泛使用奴隶。那时奴隶生产规模较小，奴隶主之间的差别不大。在雅典以收入情况看，第一等级一般为500麦斗，而第二、三等级分别为300和200麦斗。从田产数和使用奴隶的数量情况看，第一等级一般有田125亩左右，使用奴隶30—25人之间，而第二、三等级一般有田分别为80亩和40亩左右，使用奴隶分别在18—15人及5—3人之间，这种差别不大的特点，与希腊城邦小国寡民的状况相联系，但也与当时处在民主政治盛期的公民政治密切相关。从各等级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和所起的作用看，第三、四等级占奴隶经济的比重

比第一、二等级大，小农和小手工作坊经济占优势地位。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还构成古典社会全盛时期的经济基础。"① 由于商品生产中大量使用奴隶，使雅典经济中商品经济的成份比自然经济成份大，从而使工商业及农业中的商品作物得到空前发展。雅典成为公元前5世纪爱琴海乃至地中海地区最大的手工业生产中心和商业贸易中心。希腊人常常启动商船，满载着葡萄酒、橄榄油、金属制品、大理石、铜、铝、陶制品等商品，开往黑海沿岸、西西里岛及意大利半岛的南部进行交易。从埃及、黑海沿岸、米利都、迦太基、阿拉伯、马其顿、色雷斯等地进入希腊交易的商品很多，除了谷物、皮革、牲畜、羊毛、毛毯、香料、木材、大麻外，还有非洲的黄金、象牙，北欧的琥珀，印度的宝石，东方的工艺品等海外特产。雅典以及希腊许多港口帆樯林立，百货如山，无论是生产和贸易，都出现了十分繁荣的景象。

希腊繁荣的奴隶制经济，带来了昌盛的科学和文化。希腊，特别是雅典人，成为光辉灿烂的文化的创造者。在伯里克利时代，希腊的自然科学、文学艺术、哲学、史学等优秀人才层出不穷。其成果似银河群星，异彩纷呈。可以说，奴隶制经济带来了经济繁荣和文化昌盛。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②

①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71页。
②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0页。

（一）自然科学

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自然科学尚未有条理性，还没有进入实验阶段，但那时在数学、几何、物理、天文、地理以及医学等方面的知识已逐渐朝着系统理论的方向发展。希波战争后，希腊有了良好的经济、政治环境，人们对科学的探索充满了自信。他们从自然和现实出发，抛弃宗教神学观念，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其中不乏天才洞见。希腊人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对希腊社会生活和文化教育领域产生极大影响，使希腊处处洋溢着浓厚的科学气氛。

泰勒斯被称为希腊天文学的奠基者，他曾周游各地，学习巴比伦人、埃及人的天文学、数学等知识，已能够计算出下一次日食和月食发生的时间。在他以后，希腊的天文学发展较快，已经达到可以预告日食的程度了。地理学家赫卡泰厄斯在著有《谱系志》后，又写一部《大地巡游记》，堪称西方第一本地理学著作。有人说他曾绘过一幅世界地图，他被称为"地理学之父"。数学方面，继毕达哥拉斯之后，也有较大发展。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方面也有较大发展，特别是医学发展很快。出生于爱琴海东部科斯岛上的希伯克拉底，具有"医学之父"之称，他是西方历史上第一个以勇敢的科学精神把医学从巫术神道中解放出来的科学家。他自幼随父从医，曾漫游过希腊诸邦、小亚、黑海、北非等地，医术高明，著作甚丰，《希伯克拉底文集》充分显示出这位医学科学家丰厚的科学成就。他的医学成果的最大成就是把医病从巫术迷信中解放出来，从疾病的生理根源和人的生存环境中寻找治疗途径，从而使医学真正成为科学。特别是他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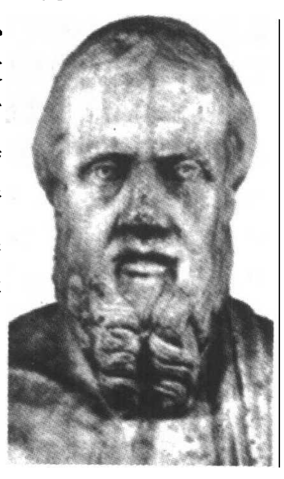
出体液学说，在西方医学和生理学中产生重大影响。希伯克拉底认为，人体由血液、粘液、黄胆、黑胆四胆组成，这四种体液构成了人的四种气质：多血质、粘液质、胆液质和忧郁质。他认识到人的一切疾病都有其自然原因，医生医病一定要究其根源，对症下药，用科学方法进行治病。希伯克拉底非常注重病人的饮食习惯、生活方式，他强调自然疗法，不轻易施药，强调通过自然力达到康复，必需用药时因人而定，并预先分析用药后病性发展趋向和可能产生的后果。在当时科学不很发达，医学还很幼稚的情况下，希伯克拉底这种科学探索中的求实精神和研究方向，是难能可贵的。特别是希伯克拉底留下的那篇惊世骇俗的《誓言》，字字千钧，语重心长，不仅对医学，而且对整个西方文化都产生重大影响。他强调医学工作者的德和社会责任感，告诫医学工作者一定要有济世救民之心，竭尽全力，救死扶伤，治病时要设法解除病人痛苦，不以毒药授人，给病人带来危害，决不能单纯用自己的医术和药物牟取暴利。医者不要接受病人的贿赂，不勾引异性，不泄露他人的隐私。希伯克拉底这些真知灼见，已经大大超出医学科学领域，不仅是古希腊文明中人道理想的体现，而且对世界医学道德乃至人文精神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史学成就

西方最早的历史，只是神话和故事的堆砌。尽管《荷马史诗》带有最早的史迹，但绝称不上历史著作。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爱奥尼亚等地出现了以散文体写作的“纪事家”，这些人的作品范围广泛，而且有闻必录，但竭力要求记载必

须与事实相符。这种求真精神的写作风格，成为希腊史学形成发展中的宝贵传统。公元前5世纪，希腊史学取得了光辉的成就，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两位杰出史学家宏大的著述，如同古典盛期学术领域的奇葩，大放光辉。

希罗多德于公元前484年生于小亚细亚西部的哈利卡纳苏斯城，其家族在当地很有名望。父亲吕克瑟司富于资财，叔父帕息斯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希罗多德从小勤奋好学，不仅酷爱《荷马史诗》，而且非常熟悉爱奥尼亚“纪事家”的作品，热心野史轶闻，喜欢四处漫游，因而见多识广。公元前447年，希罗多德到了雅典，在这里留居了一个时期，与伯里克利等人交谊甚笃，对雅典的奴隶主民主制倍加赞扬，很快成为伯里克利圈子里的人物。公元前443年，希罗多德参加了雅典在南意大利建立图里邑殖民城邦的活动，并被正式接纳为该城公民。后来他一直定居在这里，并专心著述《历史》一书，约于公元前425年在此地逝世。



希罗多德

《历史》（即《希腊波斯战争史》）是希罗多德在希腊史学乃至整个西方史学中竖起的第一座丰碑。全书眼界开阔、气势宏伟，资料丰富，文笔生动，在古代史学界实属罕见。因此，希罗多德被后来罗马哲学家西塞罗誉为“史学之父”。《历史》一书用伊奥尼亚方言写成，原先并未分卷，后来亚

历山大里亚的校注者们才把它分为九卷,① 从全书的内容来看，又可分为两大部分。从第一卷至第五卷第二十七节为前半部，主要论述波斯帝国的扩张，以及小亚细亚、埃及、利比亚、西徐亚等国的情况。第五卷第二十八节以后为下半部，专门叙述希波战争的经过。从全书的体例和内容看，前半部好似爱奥尼亚“纪事者”的作品风格，多为道听途说，不很可靠，而后半部则着力求真，所记载内容大部分是事实。这也可以看出希罗多德学术思想的发展过程，他从轻信传说到务求真实，表现了一位历史学家的高度责任感。希罗多德一生除了写作《历史》外，还写有《亚述人叙事》，但已经失传。从他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颇具风格的学术特点：

第一，视野宽阔，史料丰富。《历史》虽写希波战争史，但实际上写的是当时希腊人所知道的整个世界的历史。书中不仅记述了埃及、巴比伦、叙利亚、波斯、西徐亚等的历史，而且描写了各国的地理位置、居民情况、政治制度、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及轶闻趣事。全书取材宏富，广泛涉及经济、政治、法律、历史文献、神话传说及文学艺术等材料，而且使用了大量的古迹和现实材料以及农学、医学、地质学、人类学等方面的资料。这些材料不一定可靠，甚至有荒诞之处，但作者力求全面反映当时的历史面貌，四处奔走广泛收集素材的精神是可贵的。

第二，务求客观真实，描写生动细腻。尽管希罗多德在书中有一些失于轻信的地方，但他主观上还是为了报道当时发生的和人们所说的一切，其中有些是连他自己都不一定相

① 古代作品中的一卷，大约相当于今人所谓的一部分或一章。

信的事实。但他对记述的事情力图客观、公正。希罗多德有深厚的文学功底，词汇丰富，文笔流畅，简略得当，描写生动细腻。在描写波斯人受专制暴君统治时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波斯王大流士在一次率部队进军希腊途中，有位吕底亚贵族设宴招待他及其随行，宴席备得很丰盛。席间，这位贵族富翁对皇帝说，他有5个儿子都在部队中服役，请求能否让其中一位留在自己身边。大流士听了勃然大怒，厉声吼道："你是我的奴仆，你必须把你的一切奉献给我，包括你的妻子在内。"说完即下令把他的儿子劈成两半，放在部队行进的道路两侧示众。希罗多德还讲了一件令人作呕的事情：一位在皇帝那里失宠了的贵族被皇帝请去吃饭，当他饱餐一顿，吃完面前的肉后，侍从又端上来一只篮子，他揭开盖子一看，里面装的是他独生子的头、手和脚。这时，皇帝高兴地走来问他："你知道你刚才吃得津津有味的是什么肉吗?"这位贵族深知当奴才的规矩，连连说："我知道，我知道。凡是皇帝高兴的事我都高兴。"这些描写波斯皇帝残忍暴虐的典型事例，描写得生动、具体，有很大的感染力。

第三，注重道德教诲，赞颂民主自由。希罗多德注重用历史向世人进行道德训诫。他认为国家兴衰，人生的荣辱，都是遵循因果报应的。大流士·薛西斯那种专制暴君，最终必然兵败身亡。而历史上善做好事的人则必然遗爱在民，流芳百世。他还用下面这个故事说明每个人都有他的价值，不管其怎样弱小无援，从道德伦理上对有罪和无罪不能一律惩罚。他说：有一天，科林斯当局派了10个人到一户人家去，奉神意处死这家一个小孩，据说这个小孩长大后会毁灭科林斯。孩子的妈妈以为这些人是友好来访者，便热情地从里屋抱出小孩递到其中一个人手上。这10个人在途中商议，谁

第一个抱住小孩，就把小孩摔死在地上。可是，这小孩一到客人怀里便向他咧嘴微笑，十分可爱。这个人就下不了决心了，只好把小孩交到同来的人手里。就这样在10个人中间传递，谁也下不了手，最后还是把小孩交给他母亲，出门走了。一出门便相互责怪，特别是抱怨第一个抱小孩的人。希罗多德对雅典民主制大力赞颂，对民主自由十分推崇。他认为，雅典打败波斯帝国的重要原因，是由于雅典公民享有充分的民主自由，有了民主和权利平等，才使得雅典人变得英勇盖世。

虽然，《历史》在内容和形式上也还存在着较大的局限和错误，但它毕竟是西方乃至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世界性的历史巨著，为我们了解古代希腊、西亚及北非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它不愧为历史上的一座丰碑！

希腊另一位大史学家是修昔底德。他大约生于公元前460年，出生地是雅典，他出生于富裕的贵族门第。修昔底德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生活的年代，正是雅典文明发展的盛期，那时候的政治、文学艺术、哲学思想、历史著作等文化成果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修昔底德已到而立之年，因而对那场战争有了充分的观察、认识和思考。在战争开始时，他也直接上前线参加作战。公元前424年，修昔底德率海军舰队驻防色内斯附近的塔索斯岛。驻守安菲波里斯的雅典将军倏克科受斯巴达军围攻，情况十分紧急，向他求援，但等他移师前往、赶到安城时，那里早已失陷。雅典当局认为他贻误军机，他因此被革职流放，长期避居色雷斯。当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后，修昔底德就认识到这场战争意义重大，从而关注战争进展，收集大量素材。在被流放的20年中，他广泛游历于伯罗奔

尼撒及西西里各地，记录各方面资料，详考战争过程。公元前404年战争结束，修昔底德受到特赦返回雅典，他凭亲身作战的经历和广泛收集到的资料专心战争史的著述。修昔底德为写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付出了毕生的精力，这部巨著还未最后完稿他就猝然与世长辞，以至史稿最后一句犹不完整。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按年代记述战争过程的，共分八卷，大致内容是：第一卷写战争的起因，第二至四卷记述战争第1年至第9年的战事，第五卷写战争第10年至16年，第六至七卷写战争第17年至19年，第八卷写战争的最后阶段，即第19年至21年。从形式和内容上看，第八卷尚未写完。这部战史巨著，是古代史学中求真记实的最高成果。和希罗多德相比，修昔底德无论在史学思想和治学方法上都有更显著的特征。从治史目的上看，希罗多德写《历史》的目的“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的光彩，特别是为了使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①] 而修昔底德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重诸永远的”。[②] 他要告诉人们利用过去史事来预见未来，牢记前事，垂训未来，把史著作为千秋万世的宝籍。在治史方法上，修昔底德着力当代真人真事，对收集的资料详加考证，决不道听途说，而且处处坚持科学、求实的态度，所记史事务求真实。在对事件的发展分

① 希罗多德：《历史》，中译本，第167页。

②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8页，谢德风先生根据华而纳英译本译。

析中，注重因果关系，注意经济政治因素在历史发展中作用，以哲学的眼光来审视和理解历史，歌颂民主制度，赞扬法治精神。由于修昔底德的科学求实精神，这部史书一直作为西方古典史学的名著，对后来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直到今日，了解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实还要依据此书，它的史学价值和治学精神使后来的史学家和思想家们赞叹不已。马克思早在中学时代就读过这本书，后来在《资本论》中也多次引用修昔底德的记述，他在致考茨基的信中曾说："修昔底德的著作，令人感到新鲜。"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中，也多次引用修昔底德史著中的观点和史例。

当然，作为古代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著作不免有其缺陷。比如，他用抽象的人性解说历史，部分内容取材狭隘，涉及战争外的希腊文化较少，记述事件不用具体日期，而用季节等等。但这些丝毫不失修昔底德对史学的贡献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历史价值。

（三）文学艺术

古典盛期，希腊文学艺术最主要的成果是雅典的戏剧。雅典戏剧分悲剧和喜剧，其中悲剧成就更为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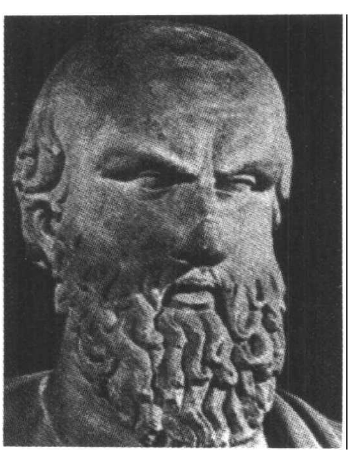
悲剧来源于酒神节时咏唱的颂歌，"酒神颂"是悲叹酒神狄奥尼索斯在尘世遭受的痛苦并赞美他的再生。由于歌咏者身披代表酒神随从的山羊皮，因而悲剧（Tragedy）一词原意为"山羊之歌"，后来发展为悲剧后，多以神话传说为题材，成为表现各种受命运支配的悲剧故事剧作，这些悲剧带有相当深厚的宿命论色彩。最初的悲剧是举行酒神祭典时的

表演。到奴隶制民主制时代，伯里克利兴建大型露天剧场，发放观戏津贴，于每年春季举行盛大的戏剧比赛，戏剧剧场成为当时民主政体用以实现政治、道德、教育和文化生活的中心。希腊悲剧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它是雅典奴隶制民主政治的产物，并直接为其服务。在艺术形式上，悲剧把抒情诗和戏剧成份有机结合起来，演员朗诵对白，合唱队咏抒情诗。悲剧一般有固定的程式，分开场院、进场院、3到5个戏剧场面、退场4个部分。在表演形式上，在歌唱队外增加了一个“演员”来扮演某种角色，后来又增加到3个，每个演员都穿高底靴，带面具，可轮流扮演不同人物。合唱队由最初的几人增至15人。他们跳舞唱歌，或对剧中人表示同情，发出感慨，或向观众解释或预示剧情发展趋势。希腊悲剧往往通过剧中人出人意料的不幸，表现人与命运的冲突。内容上主要写古代民主政治斗争，剧情虽然抒写了一曲曲悲歌，但中心贯穿着反对独裁、侵略和压迫的斗争精神，歌颂为自由和正义斗争的崇高壮烈的英雄主义行为和爱国主义思想。即使取材于神话传说的悲剧，也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和深刻的思想教育意义。

到公元前5世纪，希腊悲剧达到空前繁荣时期，出现了大批悲剧诗人和剧作家，上演了很多悲剧作品，其中最负盛名的悲剧作家有3个：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

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前456年）出身贵族，生于雅典附近的厄琉西斯小镇。他的家族积极参加反对波斯人侵的战争，他本人也参加了马拉松、萨拉密等战役。他是希腊悲剧的创始人，很早就开始写戏剧作品，留下遗作72部，现存在仅有7部。他的作品在雅典戏剧竞赛中13次获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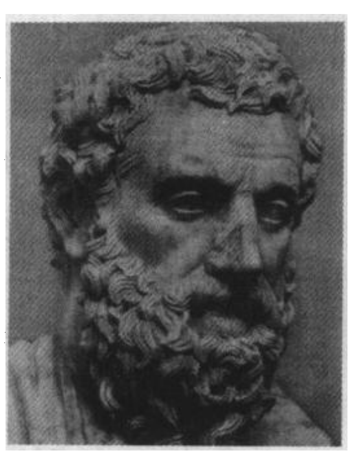
现能知道准确演出年代的作品有《波斯人》、《七将攻忒拜》、《被囚的普罗米修斯》及《俄瑞斯忒亚》三部曲《阿伽门侬》、《奠酒人》、《报仇神》等。埃斯库罗斯在悲剧艺术上的最大贡献是给剧中增添了第二个演员，从此，戏剧的特征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它有可能为观众直接表现戏剧的冲突。特别是吸收了第三个演员后，戏剧的情况发生了更大的变化，这时，观众在观戏时的注意力也从合唱队转向剧中人，亦即转到演员身上了。埃斯库罗斯在戏剧上的成就对后来艺术和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别林斯基称他为“希腊悲剧的创造者”，恩格斯则赞誉他为“悲剧之父”，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在伏尔泰、歌德、席勒、雪莱、拜伦和利奥帕尔等人身上，都可以看到埃斯库罗斯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埃斯库罗斯

索福克勒斯（约公元前496—前460年）是伯里克利时代雅典艺术风格最典型的代表，是第二位著名的希腊悲剧作家。他出身名门望族，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并很早就开始悲剧创作。据说他一生写过123个剧本，但流传下来只有7部，其中《安提戈涅》和《俄狄浦斯王》最为著名。他得过24次戏剧奖，是希腊获奖最多的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在政治上属于温和的民主派，主张民主政治，反对独裁，他与伯里克利交谊甚笃。在戏剧艺术上，索福克勒斯利用倒叙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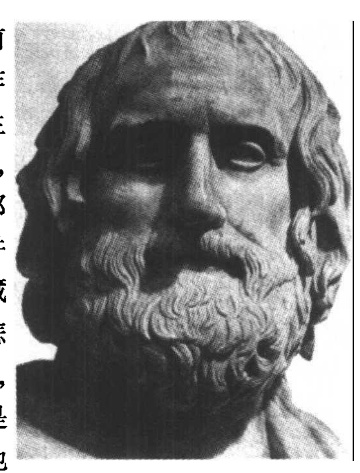
法，使剧情发展自然、合理，随着环环相扣，跌宕起伏的情节，一步步把戏剧冲突推向高潮。他最出名的代表作《俄狄浦斯王》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十全十美的悲剧"。该剧借用一个古老而惊心动魄的故事反映了当时的现实，表现了人与命运的冲突。忒拜国王拉伊俄斯从神谕那里得知，他的儿子命中注定要杀父娶母，他因此抛弃了自己的婴儿——俄狄浦斯。不料俄狄浦斯被科任托斯国王的牧人怜悯，反倒成为国王玻吕玻斯的养子。俄狄浦斯长大后也从神谕那里得知他必将杀父娶母的命运，他决心反抗和逃避这杀人乱伦的可怕命运，因而离家出走，迈向忒拜的大路。在一个路口，他因同一老人发生争执，动怒打死了这个老人，此人正是他的父亲。他在忒拜猜破了人面狮身的女妖的谜语，为人们除了苦难，因而被忒拜人拥戴为王，并娶了前王的王后为妻，这个王后正是他的生母。这时，俄狄浦斯已经成了杀父娶母的罪人，但他自己却毫无所知。此后，忒拜发生瘟疫，神谕说，只有把杀害国王的凶手驱逐出镜，瘟疫才能平息。为了解除城邦和人民的灾难，俄狄浦斯想方设法追查凶手，结果发现凶手就是他自己，娶母的预言也应验了。他悲忿欲狂，百感交集，一气之下刺瞎了自己的眼睛，并请求放逐，以赎罪孽。


索福克勒斯

《俄狄浦斯王》通过描写个人意志与命运的冲突，表现

了雅典奴隶主民主兴盛时期的社会现实和矛盾心理。俄狄浦斯是一位意志坚强、爱国爱民的国王，他诚实聪明，道德高尚，关心民众，崇高无私。而命运的安排却如此不公平：他坚守崇高的道德原则，却要承受前人的罪恶；他越不屈服命运，坚决反抗的命运力量，却越是步步陷入不可抗拒的命运罗网；他要真诚地为城邦和人民解除灾难，命运却让他走向自我毁灭。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幕英雄壮举，告诉人们命运是不可抗拒的。这反映了当时雅典人面对现实，一方面相信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对于社会灾难感到惶恐无能为力的悲愤情绪和矛盾心理。《俄狄浦斯王》标志着希腊悲剧艺术的成熟，它已达到完美的艺术境界，被后来许多文学家、哲学家所推崇。

欧里庇得斯（约公元前485—前406年）是希腊悲剧作家中第三位著名人物。他出生于贵族家庭，受过很好的教育，早年热心研究哲学，常和阿那克萨哥拉及智者学派接近，并且拥有他那个时代最丰富的藏书。他一生大约写过90多部悲剧作品，现存下来的有18部，获奖作品5部。欧里庇得斯是当时民主倾向最强的作家，他反对非政治战争，反对压迫妇女，拥护民主制度。他的作品虽然也取材于神话和英雄传说，但他却表现出更多的现实主义成份。和索福克勒斯善于描写美化了的、理想化的人物相



欧里庇得斯

比，他在人物刻画上则着意描写人物的真实形象。他的作品社会现实性特别鲜明，现实的日常生活，农民、奴隶、儿童和仆人的心理活动都成为悲剧故事中的内容。他特别关注妇女的命运，流传下来的悲剧中有 12 部是描写妇女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美狄亚》。希腊悲剧在索福克勒斯手里，已经达到十分完美的地步，欧里庇得斯的贡献主要是运用揭露社会矛盾的写实手法，来深刻细腻地描写人物的心理，把悲剧与喜剧结合起来。欧里庇得斯的艺术成就，对后来的欧洲文学影响颇深，他在罗马早期的剧作家那里享有很高的威望。

希腊悲剧之后出现了喜剧。喜剧是由民间祭祀酒神时的狂欢歌舞和滑稽戏演变而来的，它取材于现实生活，剧情、人物形象、动作、语言都带有很大的夸张、滑稽性，在粗俗、荒诞中表现人们普通关注的严肃的主题，揭示生活的本质，因而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公元前 5 世纪，雅典产生了克剌提诺斯、欧波利斯和阿里斯托芬三大喜剧诗人，但只有阿里斯托芬留下一些完整的作品。

阿里斯托芬（约公元前 450—前 385 年）生于雅典，他的创作使喜剧达到高峰，恩格斯和果戈理称他为“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一生共写了 40 多部喜剧作品，但现存的只有 11 部，这些作品好像一面凸凹不平的镜子映照现实生活。其中《骑士》、《马蜂》暴露出那些政治野心家利用民主制欺骗民众，《蛙》、《云》反映了文坛上的不良现象，《女公民大会》、《财神》表现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和党派斗争，《鸟》以神话幻想题材讽刺冒险家为雅典人带来的苦难，《阿卡奈人》、《和平》等剧则表达了雅典人热往和平，反对内战的愿望。在艺术表现形式上，阿里斯托芬广泛采用象征，拟人等


阿里斯托芬

手法，把民间朴素生动的语言和城市里高雅语词有机结合起来，使剧中美丽的诗句和粗犷的场面融为一体。他的喜剧好似童话里的一棵树，树上既有奇花怒放，又有夜莺笑语歌唱，生动丰富，绚丽多彩。阿里斯托芬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很大，哲学家柏拉图为他写的墓志铭中写道：秀丽之神想要寻找一所不朽的宫殿，毕竟在阿里斯托芬的灵府里找到了。

除了戏剧文学外，古典盛期在艺术方面也有很大发展。在艺术创作上，希腊人更注重英雄形象的塑造，以充分表达马拉松和萨拉密战役胜利后希腊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宙斯青铜像和希腊战士青铜像，是艺术家们塑造理想的典型形象与高超的写实技巧的完美统一。还有《掷铁饼者像》，把运动员弓身掷饼的瞬间动作表现得极为生动，富有神韵。《持矛者像》形象塑造坚实有力，堪称人体雕塑的楷模。这时期，以雅典为中心的建筑雕刻艺术也取得很大成就。在建筑风格上，出现了第三种柱式，即科林斯柱式。这种柱式建筑实际上是爱奥尼亚的变体，它的特点是追求华丽的装饰，其主要贡献是有更多装饰的柱基和新式的柱顶。柱顶的形状看起来像是一个口朝上的钟，它上面围有两排叶形饰，很像一簇巨大的、颇具装饰性的叶子出现在高高的柱顶上端。这时的大型建筑主要是神庙，典型的建筑物是帕特嫩神庙，它无疑是古希腊最伟大的建筑，由3位艺术大师设计建造而成。帕特嫩神位于卫城之巅，庙身用洁

白的大理石砌成，庙长约70米，宽约40米，四周竖立着46根高10.4米的多利亚式拱柱，庙堂东厢巍立着用黄金和象牙雕塑成的雅典娜神像。庙四壁和门廊上刻着表现神话故事和当年雅典人社会生活的浮雕。整个建筑匀称和谐，壮丽辉煌，象征着希腊人的勤劳和智慧。这时期的雕刻艺术也是前无古人的，它以体态健美、形象逼真、比例匀称而著称，特别是成熟的现实主义技巧和善于刻画女性柔美及个人心理的艺术风格，受到人们普遍称赞。

第四章 古典盛期的智慧之光



- 巴门尼德:哲学走向科学的转折点
- 恩培多克勒和阿那克萨戈拉:原子论的理论准备
- 德谟克利特:原子论唯物主义的最高成果
- 普罗泰戈拉:自然哲学向人学的转变
- 苏格拉底:高唱“美德”和真善之歌

希波战争后奴隶主民主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的快速发展，使雅典和整个希腊达到了历史上空前的繁荣境地。古典盛期的希腊哲学，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一时期，希腊人在辩论和交流中，开始发现逻辑思维的方式和规律，使人的思想能动性得到高度发挥；并且开始从对逻辑思维和人的认识的重视与研究中，去深入探索一切政治、伦理道德和自然科学的问题，探讨以城邦自由公民的命运为本位的人本主义。从巴门尼德到古典后期的亚里士多德，都是依靠这种逻辑思维的力量，把原始朴素的哲学观念推向系统化的哲学理论。

一 巴门尼德：哲学走向科学的转折点

巴门尼德出生于爱利亚的名门望族。关于他的生卒年代，他本人没有留下任何材料，后来人说法不一，一般认为在公元前 6 世纪末到前 5 世纪之间。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中叙断了巴门尼德与芝诺去雅典和苏格拉底会面，共同讨论哲学问题的情景。柏拉图说："巴门尼德和芝诺曾在泛雅典娜大节来到雅典；巴门尼德这次访问雅典时大约 65 岁，虽已年老，头发雪白，但是相貌堂堂。……而苏格拉底这时年纪还很轻。"根据苏格拉底的可靠年代推算，那次相会大约在公元前 450 年前后，巴门尼德可能生于公元前 525 年—

前510年，卒于公元前445年左右，这还可以从苏格拉底本人的话中得到印证。据柏拉图在《泰阿泰德》中记载，对话人苏格拉底说："巴门尼德年老时我见过他，那时我年纪还轻，我觉得他的话深奥难懂，高不可攀。"

巴门尼德早年积极从事城邦的政治活动。他的活动中心是地处希腊西北部的爱利亚城邦。据说巴门尼德曾以立法者身份为他的母邦立过法，爱利亚的执政官每年要他们的公民宣誓遵循巴门尼德为他们立的法。在哲学思想上，他反对赫拉克利特的学说，深受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影响，但又不完全赞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学说。他与早年曾信奉过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决裂后，接受了色诺芬关于神是惟一的、绝对不动的思想，从而创立了关于"存在"的理论。巴门尼德是爱利亚学派的主要代表，正如黑格尔说的："巴门尼德在爱利亚学派中是一个出色的人物。"① 巴门尼德的哲学思想集中表现在《论自然》中，这部著作分为序文、关于真理和关于意见3个部分。巴门尼德哲学思想的中心主要是论述了存在与非存在、真理与意见的对立。

巴门尼德关于认识真理途径的论述，表明哲学中最初逻辑思维开始形成。巴门尼德以女神的启示形式叙述他的思想，又以逻辑思维中的推理来论证其理论。他说他由太阳女儿引路乘太阳车在天上旅行，正义女神为他打开门，并亲切地接待了他，还对他说：年青人，你应当研究所有的事情——圆满真理的不可动摇的核心，以及不包含真实信念的凡人们的意见。他又以女神口授的形式分别阐述了认识真理的途径和意见的途径。在女神的启示下，巴门尼德用逻辑思想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261页。

和推理论证的方式阐明关于存在的理论。在巴门尼德看来，"真理"只有一个，那就是关于"存在者存在"这一可以思维、言说和论证的知识。巴门尼德认为，赫拉克利特以及大体与之相似的朴素意识，不是"真理"，而是"意见"。存在和非存在构成巴门尼德全部哲学思想的基础和出发点，对此有两条不明的研究途径：一条是存在者存在，它不可能不存在；另一条是存在者不存在，非存在必然存在。他认为，赫拉克利特关于存在和非存在同一又不同一，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向的观点，是一些不明事理，摇摆不定，无所适从的人的主张。它同第二条途径一样，也是虚假的。而第一条途径不受感觉和经验支配，他用理智来判断，用思维来推论。从这个前提出发，他论述了存在的几个基本特征：第一，存在是永恒的。它是没有产生的，同样也没有消灭。第二，存在是不可分的。存在是一，是连续的整体，它充满一切，遍及一切，是完满的，没有缺陷的。第三，存在是不动的。他认为，存在是不动的，无始亦无终。因为，产生与消灭已经被赶得很远，存在永远是同一的，居留在自身之内，并永远固定在同一个地方。巴门尼德反复强调，从感性事物中来寻找事物本原是不可能的，而应超出感性事物去寻找本质的东西。因为，感性事物是生灭不已，无限多样的，是有局限性的。

巴门尼德的世界观，可以用一个概念来表述，这就是"存在"。如前所述，他认为真实的世界是"存在者"，它是惟一的，不可分的，没有运动和生灭的。"存在"这个词是从希腊文中的"是"变来的，它既表示"有"（存在）这一抽象含义，又表示"存在者"及"是其所是者"。在他看来，说"是"即肯定某种东西时，同时也就肯定了某个对象

"有"（存在）了。存在是真实的，感性世界是虚假的；存在的不动、不生不灭是真实的，运动和变化是真实的。巴门尼德是把运动变化着的现实世界宣布为假象，而把从中抽象概括出来的"存在"宣布为真理，这个"存在者"不能靠感性来认识，而只能靠抽象的逻辑思维来把握。

巴门尼德哲学的本质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但如果我们深入到那被谬误的迷雾笼罩着的思想体系内部，就可以发现其中哪怕是微乎其微的真理颗粒。巴门尼德的存在论，揭示了"无中不能生有，有也不能成为虚无"这一简单的道理，并对其进行了哲学上的论证。这是希腊哲学史上前苏格拉底阶段哲学发展中的一次转折，这个转折的标志就是巴门尼德。因为，此前的人们往往从某一具体的物质形式或物质的量的属性中寻找万物统一的本原，并以此解释和说明自然界的现象，在哲学思想上一般都缺乏推理和论证。而巴门尼德的思想则标志着西方哲学史上最早的逻辑思维的产生，第一次强调感觉和理性的区别，提出理性高于感觉，高于意见。他撇开具体的物质形态，抽去事物量的属性，依靠抽象思维，推出一个最一般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存在，创造了推理和论证的逻辑思维方式，把人类思维和认识推向一个新的水平。另一方面，巴门尼德的存在论也为科学发展奠定了一块基石，是哲学走向科学的新起点。从混沌的表象蒸发出抽象的规定，再从抽象的规定到达最简单的规定，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科学方法论。人们的认识必须从感性开始，但这只是认识的起点，而科学知识的起点则是认识的第二个行程，即用明确的概念形式和逻辑必然联系的概念体系阐明对象，

使认识达到“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①]由此可见，从感性具体到单纯的抽象规定这一认识第一行程结果，是第二行程的出发点。科学的认识就是由这里开始的。巴门尼德的“存在”，虽然有其唯心主义的内容，但在思维方式上，他提倡撇开感性表象，通过抽象的逻辑推理去把握真实的世界，这无疑是哲学走向科学的一个新起点，是人类思维变革的一次重大转折。巴门尼德的思想对后来的原子论、种子论及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存在说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有人说，在某种意义上，没有巴门尼德的学说，就没有后来各家哲学中关于存在的争论和发展，就没有亚里士多德的本体概念和科学学说，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二　恩培多克勒和阿那克萨戈拉：原子论的理论准备

在古希腊哲学中，恩培多克勒和阿那克萨戈拉直接继承了伊奥尼亚唯物主义的传统，反对把某种具体的感性物质作为世界本原，主张世界本原的多元论，即认为构成宇宙万物的物质元素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随着自然哲学的发展，原子论产生了。原子论学派继承伊奥尼亚哲学的唯物主义倾向，吸取了南意大利哲学特别是爱利亚学派用思想的抽象概括来寻求非感性的、统一的、稳定的本原的思想，创立了原子论的世界本原学说。从泰勒斯到德谟克利特，使希腊

①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页。

原子论发展到最高峰，而恩培多克勒和阿那克萨戈拉的哲学和科学思想，则为原子论的进一步发展做了直接的理论准备。

（一）恩培多克勒

恩培多克勒（约公元前495—前435年）出身于西西里岛上一个富庶而活跃的城邦阿克拉加斯。那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岛上农业和海外贸易中心之一。阿克拉加斯又是一座文化古城，不仅依山傍水、景色宜人，而且有许多庄严而规模宏大的神庙。繁荣的奴隶制经济和工商业贸易，为科学和哲学等文化的萌芽发展及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恩培多克勒风茂年华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度过的。他的家庭十分富有，在政治上是奴隶主民主派。恩培多克勒坚决支持奴隶主民主派反对僭主政治的斗争，是一位杰出的奴隶主民主政治家。但他一生最大成就在文化学术方面，他是杰出的自然哲学家，也是著名的医生和自然科学家，还是一位修辞学家、演说家、诗人。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说的："哲学家、预言家、科学家和江湖术士的混合体，在恩培多克勒的身上得到了异常完备的表现。"①

恩培多克勒的著作有《论自然》和《论净化》，是用诗歌体写成的，据说共有五千多行，但现今保存下来的残篇仅有450行左右，这已经是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们的著作片断保留下来最多的了。恩培多克勒在哲学上的突出贡献，主要是提出了"四根说"、"爱憎说"和"流射说"。

---

①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第83页。

四根说是恩培多克勒哲学思想的核心，是他在回答世界本原问题上对哲学史的一个重要贡献。在《论自然》中，恩培多克勒在吸收泰勒斯的“水”、阿那克西美尼的“气”、赫拉克利特的“火”等思想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土”，建立起“四根说”。恩培多克勒对他的弟子包萨尼亚说：“你首先要听到那生化万物的四个根，照耀的宙斯，养育的希拉，爱尔细，以及内斯蒂，它的泪珠是凡人的生命之源。”[①] 恩培多克勒借用古希腊神话中神祇来比喻他说的火、气、土、水四个根。认为宇宙万物就是由这四个根（元素）组成的。在他看来，“只有这四种元素，它们互相穿插，变成了形形色色的事物”。他还说：“从这些元素中生出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事物，生出树木和男人女人，飞禽走兽和水里的鱼，以至长生不死的尊神。”[②] 在恩培多克勒看来，具体事物之间的差别，是由于构成事物的四种元素按不同比例结合造成的。如四种等量元素混合构成了肌肉，两份水和两份土与四份火混合形成骨头，火和土与双倍的水结合造成神经，他诸如此类地解释血液、金属等等。恩培多克勒认为，人们常说的产生和消灭，只不过是各元素的混合与分离而已，由于这四种元素的结合和分离，才使世界上的万物处在不断的运动和变化之中。然而，恩培多克勒又认为，作为万物之根的四种元素本身都是不变的，它们既不能互相产生，也不会消灭，是永恒的，不变动的。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既然元素本身是不运动的，那么它们之间结合与分离的动力又是什么呢？这种原因与动力在四根内部显然是找不到的，那就只能

---

①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41 页。

②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42 页。

在外部寻找。恩培多克勒又认为，“爱”和“憎”是永远存在的，也是事物的本源，因而是各种事物结合与分离的原因和动力。

恩培多克勒认为，“爱”能使几种元素结合起来，形成万物，“憎”则使各种元素分离开来，使万物分解。因此，“爱”是四根和事物彼此吸引、结合、和谐、一致的原因和动力，“憎”则是它们彼此排斥、分离、瓦解、对立的原因和动力。由于四根与爱恨的存在和相互作用，才有万物的产生和灭亡，才使千姿百态的事物生生不息，色色流转。正如恩培多克勒说的，“在一个时候，一切在‘爱’中结合为一体，在另一个时候，每件事物又在冲突着的‘憎’中分崩离析”。[①] 爱恨这两种力量不仅是永恒存在的，而且它们之间的对立和斗争是普遍的，广泛存在于社会和自然界事物之中。那么，爱和恨是怎样互相结合与分离形成万物的呢？恩培多克勒认为最早的时候，世界上爱处于绝对支配地位，把一切元素结合成一体，整个宇宙成为一个混沌的球体，憎被挤到球体的边缘。到后来，憎的力量加强了，逐步侵入到球体的内部，促使已结合起来的各种元素分解开来。当憎占绝对优势时，四元素就完全分离开了。最后，爱又打入内部，各元素又逐渐结合融为一体。接下来，又开始新的分解过程。这种过程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使事物得以存在和发展。

恩培多克勒的爱憎说，在西方哲学史上产生了积极影响。关于事物生灭的动因问题是古希腊早期哲学家们十分重视的问题，在伊奥尼亚的自然哲学体系中，虽然动因问题是

①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43 页。

重要的命题之一，但都没有说明运动的起源，赫拉克利特把对立的斗争作为运动的源泉，这是对古代哲学的重大贡献。毕达哥拉斯把运动归结为数的和谐和变化，这无疑带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机械论的性质。恩培多克勒把爱与憎作为万物变化生灭的两种动因和力量，并把它们和四种元素（四根）同等看待，为认识事物的动因问题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尽管他对此还没有表述得很清楚，但他把动因问题提到始基高度，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恩培多克勒用四根和爱憎理论建立的宇宙循环论，虽然带有形而上学机械论性质，但其中也有不少辩证法的因素。其中把爱与憎作为对立统一、相续消长的两种运动力量的思想，在阐述宇宙生成演化中提出元素间同者相吸、异者相斥的观点等等，无论是对古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还是对古代西方科学发展，都产生了重要作用。

恩培多克勒还用四根说来阐释认识论问题，力图揭示人的认识能力与构成事物的各种元素的结构之间的联系。恩培多克勒认为，元素结合的比例决定人们聪明和愚蠢的程度。人体的各种元素均匀地或近乎均匀地结合在一起时，人就变得聪明、富有智慧，反之亦然。

那么，人的聪明和智慧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人是怎样感知和认识事物的呢？恩培多克勒首先注意了认识的途径问题。他认为，客观事物是人感觉和认识的对象，人的感官如视觉、听觉、味觉以及其它感觉，都是认识的可靠途径。他还从感觉与感觉对象的联系上说明人的感官是完全可以认识客观对象的。人的感觉和感觉对象一样，都是四根结合而来的，都受爱憎支配。由此可见，在恩培多克勒那里，认识的主体和客体是一致的，它们共同存在于由相同元素组成的物

质世界本身。认识的过程也是元素自己认识自己的过程，所以，感觉和感觉对象的物质基础是统一的。在此基础上，恩培多克勒提出了“流射说”。他首先说明了人的感官的结构和本质，提出了“流射”与孔道的观点。他用眼睛的构造来说明视觉的本性，认为眼睛中间是火，周围是土和气，水与火的孔道一条隔一条。通过火的孔道看到亮的万物，通过水的孔道看到黑暗，各种颜色都由流射带给视觉。① 他还以耳朵的构造来说明听觉的本身，以呼吸来说明嗅觉的产生。

在上述思想的基础上，恩培多克勒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流射说”。他认为人们感觉器官和对象事物之间有一种流射的交感关系，感觉就是由此而生的。在他看来，人通过感觉器官上的孔道可以向认识对象发射出非常精细的“流”，认识对象也可以向认识主体（人）射出同样的物质流，这两股物质流在通过感觉的孔道时交成相遇，由此产生了人的感觉。这种流射说虽然在认识论中带有机械唯物主义倾向，但它毕竟为原子唯物主义认识奠定了基础。恩培多克勒由“流射说”进而触及到智慧即理性认识问题。他认为智慧高于感觉，“智慧”是对事物“全体”的认识，智慧器官是心，人不是用脑来思维，而是用血液来思维，特别是用围绕着人心的血液来思维。这些思想虽然对于人类认识史的发展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总体说来是一种猜测，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他用物质粒子的“流射”来说明感觉的产生，用元素结合的比例和血液微粒的大小差别及分布状况来解释人的聪明与愚笨，他虽然肯定四根、智慧高于感觉，但又未对其加以本质区分，等等，这都反映了他思想中的幼稚和局限，仍未摆脱

①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44——45 页。

朴素唯物主义的原始性质。

恩培多克勒在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生理学和医学等古代自然科学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古代自然科学史上具有一定影响。他的自然科学理论和自然哲学一起，为希腊文明增添了光彩夺目的一页。如果把泰勒斯到德谟克利特哲学思想发展看做一个圆圈的话，那么，恩培多克勒则是这个圆圈上的一个环节，他通过对前人思想成果的综合、创新、继承、发展，把西方古代唯物主义推向一个新阶段，对后来科学和哲学的发展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二）阿那克萨戈拉

阿那克萨戈拉（约公元前500—前428年）生于小亚细亚伊奥尼亚的克拉美奈，20岁时离开家乡来到雅典。他一生的主要活动在雅典，在那里居住了30年。那时，正是雅典民主政治的鼎盛时期，他在雅典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并对雅典和希腊世界产生了影响。阿那克萨戈拉和当时民主政治的领袖伯里克利是亲密朋友，积极支持伯里克利的政治活动，甚至他的命运都与伯里克利的民主政治息息相关。据说，伯里克利执政末期，他的政敌以渎神罪判处阿那克萨戈拉死刑。这时候，伯里克利上前对众人说，大家看看我在政治抱负上有没有什么过失，众人回答说没有，伯里克利接下来说："那好吧，我就是阿那克萨戈拉的学生，你们不要被诬陷所动而处死他，我希望把他释放。"于是阿那克萨戈拉才免于死刑，后来被流放在伊奥尼亚的朗普萨柯，最后死在那里。阿那克萨戈拉一生勤奋学习，酷爱科学，善于思考，他的主要论著有《论自然》，但已失传，只有一些残篇。他

在哲学上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种子说”和“心灵说”。

1. 种子说

阿那克萨戈拉认为万物的本原是种子，他说：“结合物中包含着很多各式各样的东西，即万物的种子，带有各种形状，颜色和气味。”① 那么，什么是种子呢？阿那克萨戈拉认为，“种子”是组成事物的相同的微小的物质颗粒。阿那克萨戈拉时代的哲学和医学中普遍使用“种子”这个概念，那时人们认为，种子是双亲体内一切基本构成成份的复合物，种子使这些成份逐渐生长成新的有机体。同时，种子也在特定的环境里按照相似性原则，在由环境提供的与之同类的物质材料营养下生长。但阿那克萨戈拉说的种子和其它哲学、医学著作中的种子概念有不同意义，他更注重“一小块”、“微粒”，认为它们是构成事物的“最初的元素”。例如，黄金是由许多小的黄金微粒构成的，肉是由许多肉的微小的部分组成的。罗马哲学家在《物性论》中这样解释阿那克萨戈拉的种子说：“在他看来，骨头是由许多小骨头合成，肌肉由许多小肌肉合成，血液由许多混和在一起的血滴造成，金子由许多小金片造成，土由土的部分造成，火由火的部分造成，水由水的部分造成，其余的一切他也认为是这样造成的。”② 我们可以看出，种子和由种子构成的物体具有相同的性质，因而亚里士多德和卢克莱修又把种子称为“相同的部分”，到了近代，一些学者又称其为“分子”。

阿那克萨戈拉确定了种子的特性。第一，他认为，作为

①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第 38 页。

②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版，第 68 页。

物质的种子是永恒存在的，没有产生，也不会消灭。各类种子彼此独立，不能互相产生和转化。肉的种子不能来自非肉的种子，头发的种子不能来自非头发的种子。阿那克萨戈拉用这种关于种子永恒不变的思维，力图说明物质世界和客观事物的客观实在性。第二，种子无论在种类和数量上都是无限的。有多少种事物就有多少种种子。世界上的事物是无穷无尽的，种子也是无穷尽的。在数量上的无限性，实际上是数目的无限性，这种无限不仅指整个世界是由无限多样的种子组成，而且指万物始基的微观结构是无限小的。种子是可以无限分割的。再小的东西里总还有更小的，甚至许多种子的微小是不易被我们察觉到的。

阿那克萨戈拉认为，事物的生灭转换都是由种子而来。他认为，虽然种子之间是不能相互产生和转换的，但一个具体事物都是由不同种类的种子结合而成的。事物的性质是由其中包含最多的种子的性质决定的。阿那克萨戈拉用种子数量的增加或减少、混合与分离来说明事物的变化和性质，这无疑是赫拉克利特自然辩证法思想的退步，但同那些只把事物看做质的变化而忽视量考察的哲学家们相比，阿那克萨戈拉又是认识史上一个巨大的进步。阿那克萨戈拉又认为，每件事中都包含着每件事物的一部分，“一切都包含着一切”。[①] 他企图从“一”与“多”的关系中来说明客观物质世界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这既表达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又包含着朴素辩证法的观点。

总起来说，种子理论坚持用物质本身说明物质世界和客观事物，这是对伊奥尼亚唯物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发扬；种子

---

①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38——39 页。

理论用物质微粒的结合和分离说明事物构成和形成过程，为后来的物质结构理论特别是原子论奠定了基础；种子理论中关于联系的思想，一与多的观点，物质无限分割的思想，事物的对立与共居的思想等等，都包含了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这些认识成果表明了古希腊自然哲学在解决世界本原的问题上的重大突破，是以后更高形态的物质理论的萌芽和准备。

2. 心灵说

恩培多克勒用“爱”和“憎”来说明事物生灭变化的动因，阿那克萨戈拉则把“心灵”（音译为“奴斯”）看作原始混合物分离出万物的原因和力量。这个学说，对后来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阿那克萨戈拉认为，心灵使原始混合物发生旋转，形成涡旋。“它是万物中最细小的，也是最纯的，它洞察每一件事物，具有最大的力量。对于一切具有灵魂的东西，不管大的或小的，它都有支配力。而且心也有力量支配整个涡旋运动，所以它是旋转的推动者。这旋转首先从某一小点开始，然后一步一步推进。凡是混合的、分开的、分离的东西，全都被心所认识。将来会存在的东西，过去存在过现已不复存在的东西，以及现存的东西，都是心所安排的。”① 由此可见，心灵是推动种子的结合与分离，亦即推动万物运动的动因和力量。根据阿那克萨戈拉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心灵有这样的属性：它具有独立性、自主性，不与事物混合；它是永恒的、无限的、无所不在的；它有能够支配和安排一切的最大的力量；有能够认识一切的最大的洞察力；它是最纯粹

①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9页。

和最精细的；是一切的推动者。阿那克萨戈拉力求用心灵说来解释宇宙的形成和事物的运动。在他看来，世界是杂乱无序的，也无变化和运动。由于心灵的冲击作用，形成了涡旋，原始混合的种子开始分离，分离中又造成了同类的结合，由此形成了各种事物。值得注意的是阿那克萨戈拉在古希腊哲学发展中第一次把心灵作为万物产生和运动的原因和支配力量，使物质和意识形成对立，由此开始了古希腊哲学由唯物主义自然哲学向苏格拉底及柏拉图唯心主义哲学的转变。

阿那克萨戈拉之所以第一次在哲学史上把精神和物质对立起来，并把心灵作为存在于万物之上的主宰者，这可能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希腊精神有关。古典盛期的希腊人特别是雅典人，不仅挥师疆场战胜了波斯，而且在本国实行了民主政治，社会和生活蒸蒸日上，欣欣向荣，这就容易使人们滋长雅典人的思想或心灵支配一切的观念。仿佛他们的思想或心灵具有很大的独立、自主性，可以成为万物的派生物或最高主宰了。不过，心灵学说对后来哲学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哲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发生过重要影响。

阿那克萨戈拉还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说明了人的认识论观点，他主张认识起源于感觉，但又诊断感觉不能完全认识事物，“由于感官无力，我们才看不到真理”。① 感官的无力也就是感官的局限性，他举例说，我们吃面包和水，可以长出头发、血管、肌肉、神经等，面包和水中包含着这些东西的种子，而我们的感官都感觉不到这些种子。所以，要认

①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40 页。

识种子，把握事物的本质，只有借助于理性。在这里，我们高兴地看到，阿那克萨戈拉已经开始接触感性与理性的关系了。

阿那克萨戈拉对科学也有重要贡献，他在宇宙生成、生命问题及心理学、天文学等方面都有较深的研究和初步的成果。它不仅开创了雅典哲学的新时代，而且形成了以种子理论为基础的科学精神和以心灵学说为基础的理性主义，这对后来科学和粒子学说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　德谟克利特：原子论唯物主义的最高成果

德谟克利特是古希腊最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所创立的原子论唯物主义哲学体系，是古希腊自然哲学发展的最高成果，是西方古代哲学繁荣和灿烂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他对早期希腊各派哲学进行了系统研究，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建立起较为完备的自然哲学体系，从而把古代唯物主义推向高峰，在西方哲学和科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德谟克利特于公元前460年生于希腊本土东北端的阿布德拉，这是一个由色雷斯所建立的殖民城邦，德谟克利特一生的哲学和科学研究活动主要在那里进行。德谟克利特的老师留基波最早在阿布德拉提出了原子学说，他把原子说传授给了德谟克利特。因此，讲到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必然和留基波相联系，但德谟克利特是最著名的代表。德谟克利特从小勤学好问，潜心苦读，孜孜不倦地探求科学真理。他不

满足于只从书本中吸取知识，决心走出书屋到广阔的世界和现实生活中去获取丰富的经验知识。他为了追求知识、探索真理而到处游历，曾到埃及学习几何，去过波斯与星相学家相识，还可能去过雅典和印度。他自己说："在我同辈的人当中，我漫游了地球的绝大部分，我探索了最遥远的东西；我看见了最多的土地和国家，我听见过最多的有学问的人讲演；构画几何图形并加以证明没有人超过了我，就是埃及所谓丈量土地的人也未能超过我。"① 渊博的知识，使他能洞察一切，甚至料事如神。据说在一个夏天的收麦季节，他说天气会下雨，劝大家停下割麦，先去收已经割下的麦子，果然一会儿暴雨倾盆，不听话者受到严重损失。他四处游历，耗尽全部家产才回到家乡。阿布德拉城的法律规定：耗尽前辈财产不事生产的人，要被驱逐出境，死后不能深葬在本国土地上。但德谟克利特向人们宣读了他的科学著作，结果公众叹服不已，不仅未驱逐他，反而给他一笔钱，为他立了雕像，死后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由此可见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颇得人们的拥戴。德谟克利特著述甚丰，他的著作涉及的范围极其广泛，以致马克思、恩格斯称他是"经验自然科学家和希腊人中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② 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著作连一篇完整的也没有保留下来，现在只留下一些残篇。残篇可见他的论述涉及到哲学方面如论自然、理性、感觉、心理、人性、伦理、逻辑和思维等，还有自然科学如天文、气象、声、光与磁现象、数学、地理、动植物学、医学等，还有历史、诗歌、韵律、美学、音乐、绘画、语言和

① 转引自马克思《博士论文》，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57 页。

②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146 页。

文字等，还涉及到农业、土地丈量、战略战术、养生、饮食等知识。德谟克利特受到当时和历代人们的尊敬和爱戴，有人说他是论说的大师，第一流的人物。罗马学者西塞罗赞扬他的著作富有诗意，雄姿生动，修辞俏丽，行文潇洒，有一种雄辩的风格。

（一）原子论：古代唯物主义宇宙观最高成就

关于世界的本原问题，古希腊哲学家曾进行过许多很有价值的探讨。德谟克利特博采众长，在唯物主义原则基础上，深入探讨物质内部结构，寻求万物的共同始基，从而提出了原子论的宇宙观，并以此建立了他的哲学思想体系。原子论是古代唯物主义宇宙观的最高成就，它是人类认识史乃至文明史上一次巨大的飞跃。

原子（Atom）在希腊文中的原意是“不可分割”。在德谟克利特那里，原子是一种最小的，不可分割的物质微粒。原子的属性是：它具有“充实性”，即很小，不可见，内部密集充实无空隙，没有“虚空”，因而是不可分割的；各种原子的质是同一的，每一颗微粒就像是同一块金子上分离的屑粒，它们只有形状大小不同，没有质的不同；原子的内部属性和外部属性是不同的，每个原子的内部是不动的，不变的，而外部在任何力量作用下则是可变的；原子作为整体是能动的，在虚空中能任意移动，处于急剧、凌乱的运动，并在运动中互相碰撞、冲击，从而形成多种事物。同“原子”相联系，“虚空”也是原子论哲学中更具创造性的概念。“虚空”就是空洞的空间，也就是原子运动的场所。原子和虚空虽不可见，但都是客观实在。德谟克利特把原子叫做“存

在”，把“虚空”叫做“非存在”，“非存在”并不是不存在，而只是相对于充实性的原子来说，虚空是没有充实性的。从实在性上说，存在和非存在是同样的。在宇宙中，虚空把无数的绝对充实的原子分开以形成空间，为原子的运动提供场所。在西方认识史上，首先提出“虚空”、空间的范畴，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把“非存在”（虚空）和“存在”（原子）都看做实在，这无疑是对爱利亚学派的一个挑战。赫拉克利特曾系统地说过世界既存在又不存在，爱利亚学派肯定存在，排斥非存在，这样就无法解释运动和变化。德谟克利特则认为，没有虚空，原子间不会有空隙，它就不可能分离存在，世界万物不可能区别开来。所以，运动的原因是虚空，世界上的事物正是由于虚空而运动。他肯定了宇宙中既有“存在”，又有“非存在”，第一次提出了“虚空”这个明确具体的“非存在”概念，既完善了赫拉克利特的理论，又坚持了爱利亚学派的合理思想，从而为科学地说明万物生灭、永恒运动的世界提供了依据。

那么，原子怎样形成宇宙万物呢？德谟克利特说，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无数原子，在虚空中上下左右做急剧而零乱的运动，它们彼此冲撞，形成一些涡旋，在涡旋运动中形状不同体积不等的原子互相结合起来，由于原子结合中排列次序或位置不同，因而形成了各式各样的混合物。世界上的事物之所以形形色色，千姿百态，就是由于它们内部原子大小形状和排列次序不同造成的。事物的声、色、味、冷、热的差异，也是由于其内部原子构成不同。事物的性质随着其内部原子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宇宙的“虚空”（空间）是无限的，原子在虚空中的运动也是永恒的，这才构成了茫茫宇宙的无限多样性。

在西方哲学史上，原子论首次提出了必然性的范畴。德谟克利特说："一切都遵照必然性而产生。"他认为，一切事物都有其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原子涡旋运动，原子的涡旋运动是一切事物形成的原因。这种关于必然性的思想，可以说是对阿那克西曼德的"命运"说和赫拉克利特"逻各斯"即关于规律性思想的发挥和发展。在这里，充分表现了德谟克利特的唯物主义决定论，后来苏格拉底、柏拉图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明确地加以反对，亚里士多德甚至对他忽视目的论，把"自然界一切作用都归之于必然性"① 大为不满。应当肯定，德谟克利特坚持从唯物主义原则出发，重视探讨事物的原因，肯定事物发展是由必然性决定的。但他不懂得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在强调必然性的同时，又否定了偶然性的存在，这又失之"轻率"。从事物的真实联系和发展过程来看，必然性和偶然性是一对辩证统一的范畴，二者不仅同时存在，而且必然性往往通过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并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德谟克利特在解释宇宙间事物生成变化中否定偶然性存在，把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归结为必然性，这就有可能导致宿命论。

原子论虽然具有一定的创造性，放射出科学精神的光彩，但它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首先，原子论只是一种猜测，还缺乏科学的依据。其次，它带有机械性和形而上学性。物质与运动，时空具有不可分割性，但德谟克利特不懂得空间是物质的存在形式，物质和空间不可分割的道理，而把原子虚空割裂开来，他把一切运动形式看作原子在空间的排列、组合，把事物的性质归结为原子的聚合和排列不同所

---

① 《古希腊哲学》第99页。

致等等，都带有明显的机械性和形而上学性。

（二）影象说：朴素唯物主义的反映论

德谟克利特继承和发展了恩培多克勒的“流射说”，在原子论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认识论学说——影象说，精彩地阐述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

在德谟克利特看来，客观事物表面不断地流射出一些极细的东西，叫做“影象”。这些影象从物体中流射出来，透过空气，作用于人的感官和心灵，便产生了感觉和思想。那么，感官怎样接受物体的影象呢？德谟克利特受恩培多克勒思想的启发，认为人的感官具有大小不同的孔道，事物的影象和孔道接触才有感觉，不接触则没有感觉。人的各种感官的感觉都是如此，影象通过空气进入耳朵的孔道产生听觉，影象通过空气进入眼睛的孔道产生视觉，味觉和触角是不同形状的物质原子刺激舌头和身体的结果。而思想则是更为精细的影象通过人的心灵所产生的。总而言之，在他看来“感觉和思想是由钻进我们身体中的影象产生的；因为任何一个人，如果没有影象来接触他，是既没有感觉也没有思想的”。①

在德谟克利特的影象说中，感觉和思想的发生过程体现着从事物到感觉和思想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那么，感觉和思想之间有没有联系呢？德谟克利特认为，感觉只能感知事物的色、声、味等表面现象，至于这些现象背后的本质即原子和虚空单靠感觉是不能认识的，只有依靠思想或理性才能

①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0页。

把握。德谟克利特把感觉称做“暗昧的认识”，亦即哲学上后来说的感性认识，把思想称做“真实的认识”，亦即后来哲学家所说的“理性认识”。在他看来，事物本质性的东西隐藏在事物的内部，不能被感觉所认识，只有靠理性才能把握。可见，理性是高于感觉的。德谟克利特力图揭示感觉和理性的真实关系，他认为感觉是认识的起点，排斥和“打击”感性就要“失败”。[①] 可见，他既看到感觉这种组成认识的局限，又肯定理性对认识的作用，但又不排斥感性，夸大理性，这种关于感性和理性认识关系论述的分寸把握得多么出色！

德谟克利特还指出，感觉是事物的影象透入人的感官的孔道而形成的，影象在未透过感官孔道前先有一个在空气中经过的过程，这个过程有时可能造成错觉和幻觉，引起感觉和原物之间的差别。德谟克利特把这种现象叫做“约定”的特点。按照这种说法，事物并没有人们感官所感觉到的那种性质，这些感官所感觉到的事物性质，不仅有事物本身的属性，而更重要的反映了人的感官的状况。因为人的感官具有不同的性质，酸、甜、苦、涩的感觉因人而异，但这并不排斥人有相同的感觉。人的相同的感觉，反映了人的共同的约定。颜色和味觉都有“从俗约定”的特点。在这里，德谟克利特已经触及到认识客观性和主观性、绝对性和相对性的问题了，但他不可能理解和说明这些现象之间的关系，而只强调了主观约定属性，这又是片面的。

①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50——51 页。

（三）无神论思想和社会政治伦理观

德谟克利特用原子与虚空来排斥神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他嘲讽早期希腊宗教盲目崇拜神的观念，认为太阳、月亮都不过是宇宙中炽热的物块，如果把它们当做主宰世界的神来崇拜，那是十分可笑的。他指出："人们在祈祷中恳求神赐给他们健康，而不知道他们自己是健康的主人。"① 他反对把神看做一种超自然的不朽的精神实体，主张人应当靠认识自然来造福于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德谟克利特认为所谓神不过是一种或"善"或"恶"的形象。人们造神，崇拜神，是因为人们对自然现象的恐惧和无知。他说："古代的人们看到雷、电、霹雳、天体会合、日蚀、月蚀等天空中发生的事件，就惧诸神了，相信他们是这些事件的原因或主宰。"德谟克利特力图解释关于神的观念的产生，他认为那些自然现象并不神奇，人们不要盲目崇拜，在强大的自然现象中，不必恐惧和悲观，而要相信自己的力量。他说天上的星是石头构成的，太阳是一块燃烧着的石头，银河是无数很小而相连的星所发的光的焦点，这些是因为紧紧挤在一起而相互照耀着。德谟克利特在说明自然现象时，完全否定和排斥了神的存在，并揭示了人的认识中神灵观念的心理根源，这在古代是多么难能可贵！

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问题上，德谟克利特坚决反对用神的意志来解释。他说，在人类早期，人们过着原始的群居生活，人不穿衣服，不用工具，没有固定住所，那时没有人压

---

①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第 53 页。

迫人，没有战争，大家过着安详和平的生活。后来发现了火，有了农业，再后来有了手工业，逐渐建立了国家。他认为，人们的劳动技能是在人的物质需要前提下产生的，它直接推动着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德谟克利特还认为，人的许多技能是从自然中学习和摹仿而来的，比如修造房屋是从燕子那里学来的，纺织缝补是从蜘蛛那里学会的，唱歌跳舞是从黄莺和天鹅那里学来的。在远古那样落后蒙昧的条件下，人们决无拨弦弄琴的情趣，奏乐歌舞那样的活动是生活富裕后的产物。这些观点，抛弃上帝、神灵创造一切、主宰人类的观念，提出了朴素的社会进化思想，初步接触到社会历史中人的物质需要和社会进步的关系，为后来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奠定了基础。

在社会政治观上，德谟克利特极力拥护奴隶主民主制，反对奴隶主贵族专制。他认为民主制是很好的政体，奴隶主贵族专制是不好的。他说“在民主国家时受穷，胜于在专制里享福，正如自由胜于受奴役一样”。[①] 但他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所拥护的民主制是十分有限的，是建立在奴隶主对奴隶的统治的基础上的。作为一位奴隶主思想家，他在维护奴隶制这个根本问题上，态度毫不含糊。他把奴隶主美化为天生“优秀的人”，命中注定了来发号施令。而奴隶不过是一种工具而已，只能甘受奴隶主统治。应该像使用我们身体里的四肢一样来使用奴隶。他主张对那些不服从奴隶制法律的危险的暴民，要像对付毒蛇与猛兽那样，实行无情的镇压。他还仇视妇女，认为妇女不得参与政治，让她们动口动舌是危险的。

①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第 53 页。

在德谟克利特生活的时代，特别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希腊奴隶主民主制开始走下坡路，各城邦之间贫富两级日益分化，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德谟克利特关心社会政治命运，以敏锐的观察力注视社会危机，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社会政治观点。他呼吁团结，反对内战，揭露社会阴暗面，尖锐地指出，两极分化是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责骂大奴隶主聚敛财富、守财奴贪得无厌，这是社会肿病中最恶的癌瘤，是社会崩溃的致命祸根。这些人如同在刀尖上跳来跳去，弄不好就完蛋。他劝奴隶主们达到中等财富就可以，大奴隶主要多为生活贫困的人着想，多给他们一些帮助和恩惠，这样才能带来恻隐之心、团结、友爱、互相之间的齐心协力。德谟克利特对奴隶制潜伏的危机深表忧虑，他提不出什么良策大略，只主张制定好的法律，建立好的政府，劝谕人们尊敬法律、官长和最贤明的人，人人都要做“好人”，要有好的思想、言语和行动，他认为这比法律动力更大、更有效。为此，德谟克利特也提出了他的社会伦理观。

德谟克利特的社会伦理观的核心是“怡悦”。怡悦就是人的灵魂的宁静，是把人引向正义、善良、符合法律规范的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这是一切行为的标准与目的。那么，怎样才能达到怡悦呢？首先，要靠节制。人的生活并不在于一味追求物质上的享受，真正的幸福或快乐应该是节制享乐和净化灵魂。但他并不否认必要的物质享受，他说如果一生没有宴饮，就好像一条长路没有旅店一样。可是，肉体的快乐瞬息即逝，极易幻灭。他说，人的内心有各种各样坏的性欲，如果放任自流，让它们支配人的行为，社会沉溺于口腹之乐，就会蒙蔽灵魂、毁坏身体。因此，要节制欲望，制约一切无益享乐，以达到身体和灵魂的和谐一致。其次，要靠

理智。理智能够使人达到心灵的安适和宁静。人们只有通过理智，才能洞悉世界和人生，才能避恶从善，驱除烦恼，最后达到高尚、安适和宁静的精神境界。他说那些没有理智的人不懂得人的死亡解体是原子运动的自然法则，终生虚构关于人死后来世生活的荒诞神话，受烦恼与恐惧的折磨。他十分强调理智、智慧的作用，认为理智就是灵魂的善，坚定不移的智慧是最宝贵的东西，胜过其余的一切，比财富更有价值。真正的幸福不在于占有黄金和畜群，而在于灵魂的改善，聪明才智的培养，个人道德和人性的陶冶。只有这样，才能造就一个好公民。

总观德谟克利特的学说，他集古希腊早期哲学之大成，把古代唯物主义系统化并推向了高峰。他的思想同后来出现的柏拉图的唯心主义哲学形成鲜明对立。尽管他的学说还有种种局限性，但他对后来科学和哲学的发展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四　普罗泰戈拉：自然哲学向人学的转变

公元前5世纪的下半叶，在希腊出现了以雅典为中心的智者运动。智者运动是在古希腊奴隶主民主政治条件下产生的。希腊民主制的政治环境，带来了活跃的社会文化生活。政治文化生活的锻炼，又促进了逻辑思维能力和能言善辩文化素养的提高。于是，智者运动在以雅典为中心的希腊各地产生了。

智者原指有智慧的人，公元前5世纪后，智者专指以收

费收徒传授知识为职业的教师。这些人有很高的雄辩才能，精通逻辑和修辞，辩论中靠严密的逻辑和华丽的词章打动人心。智者们关心社会伦理问题，熟知天文、地理、算术、物理、历史、法律、逻辑、修辞等知识，所以演说、辩论起来出口成章，言辞动听，击中要害，有根有据，吸引广大听众。智者们教授青年人如何辩论，诉讼，演说，参政，处理公务和家庭事物。在当时最活跃、最有影响的就是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等，普罗泰戈拉可以说是智者的创始人。

普罗泰戈拉（公元前481—前411年）和德谟克利特是同乡人，生于阿布德拉。他曾周游希腊各地，到过雅典，而且在雅典度过了大部分时间。他极力赞美和拥护古希腊的奴隶主民主制度，认为那是最好的国家制度。他与伯里克利结为挚友，积极支持和参与伯里克利倡导的民主政治活动。在学术上，普罗泰戈拉精通诡辩术、文法和修辞，对于长篇演说和问答法尤为擅长。他一生的著作主要有《论真理与反驳》、《论德性》、《论神》，可惜已经失传，仅留下几条残篇。关于他的活动和思想，后来人主要是依据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著作中所提供的资料。

普罗泰戈拉的哲学思想是西方哲学史上一个重要转折。在他之前，希腊哲学形态基本上是以“自然”为对象的自然哲学，哲学家们致力探求的中心是自然界的本原（那时的自然也包括社会人事在内），用以解释世界上万事万物的生成的原因。普罗泰戈拉首先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关键性的思想，从而实现了从自然哲学向以人为中心的人本哲学形态的转变。尽管苏格拉底在这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发生了特别重大的影响，但普罗泰戈拉毕竟是首先明确揭示这一转变的人。

从普罗泰戈拉的著作残篇和后人的记述来看，他的哲学思想首先表现在感觉主义的认识学说中。普罗泰戈拉说："知识就是感觉。"① 强调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这无疑是正确的。认识从感觉始，每个人通过自己的感觉经验来判定万物的存在及其性质。我们的认识依赖于存在，感觉到的才是存在的。"神"这种"存在"我们不能直接感知，因而就不能承认它的存在。这比起巴门尼德和柏拉图等的唯心主义来说，显得很有正确性。但普罗泰戈拉把感觉等同于认识，这又走向了片面。感觉毕竟不是客观真理，在人的认识中，感觉也好，思想也好，都带有主观特性，认识的正误不能在感觉这种认识范围中去判定，而只能在与认识相关又与认识不同的客观实践中去鉴别。所以，普罗泰戈拉忽视实践和在实践、感觉基础上的理性认识，这是片面的，错误的。

从知识就是感觉这一命题出发，普罗泰戈拉又引出了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即"人是万物的尺度"。他说："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② 这是普罗泰戈拉的著名论题。这里的人"实际上是指个别的人"。柏拉图解释这一命题说，事物对于你，就是它向你呈现的那个样子；对于我，就是它向我呈现的样子；"同样的风在刮着，然而我们中间的一个人会觉得冷，另一个人会觉得不冷"。在他看来，风对于不同人呈现出不同的样子。因而事物的存在对于每个人来说，就是他所感觉的那个样子，事物的本性依赖于人的感觉。③ 亚里士多德在对这

① 《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33页。

② 《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33页。

③ 柏拉图《泰阿德篇》，《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55页。

一命题的解释中也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意思不过是说，每个人所感知的都是一样确实的。若是如此，那么，事物就是既存在，又不存在；既是坏的，又是好的；而且，所有别的相反的陈述都是真的，因为某一个东西，某人觉得是美的，别人常常觉得是不美的；这样，每个人的感觉都是尺度。"① 普罗泰戈拉这一命题中的"尺度"，实际上是指规律、本质，真理、人是万物的尺度。按照他的观点，个人感觉就是真理。因为，每个人都有感觉，这些感觉都是真实的，因而人人都可以认为自己的感觉、意见符合事物规律，是真理性的。在这里，普罗泰戈拉已经走到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去了。

"人是万物的尺度"在当时有很强的反传统思想倾向。首先，他提高人的地位，贬低神的作用，反对传统神学观念，坚持人本主义思想。当时，宗教神学用"神意"来说明世界形成、知识来源和一切社会政治问题，把人的认识说成是神赐的，人的一切依赖于神，从属于神。"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命题表明：神意不再是衡量一切的尺度，只有人和人的感觉才是判定一切的准绳。这种思想，反对了宗教神学，树立了人的尊严和权威，洋溢着人本主义观念和精神。其次，这一命题强调了相对主义思想。既然世界上一切都是以人为"尺度"的，那么世界也就不存在绝对的、永恒不变的东西，一切以人及其生存环境和需要为转移。普罗泰戈拉在朴素唯物主义基础上肯定万物都是运动变化的，没有什么永远常存的东西，但他又错误地把一切都看作相对的，这就由相对主义转向了主观唯心主义。

---

①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

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命题，也体现了社会约定论的观点。普罗泰戈拉认为，尽管每个人的判断可能都是真的，但绝大多数人公认的判断应该被视为较好的，更真的判断。因此，人们普遍认为某种国家制度、法律、道德规范比较好时，它就是合理的，就得以存在。这也就是说，国家制度、法律、道德不是由自然和神意产生的，而是人们约定的产物，它们是相对的，可变的。当它们对社会，对约定人有好处时，它们才是好的，才能存在，反之则是坏的，应当抛弃。因此，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和需要来衡量和规定国家法律和道德规范。换句话说，国家制度、法律、道德的兴废都是以人为“尺度”的。普罗泰戈拉在此走向了片面性、绝对化，陷入了唯心主义历史观。但他的社会约定论在当时条件下，又是对神意决定论的否定。他勇敢地反对“神意”决定国家、法律、道德传统观点，用相对的、可变的思想，打击了传统的国家、法律、道德不可侵犯的观念，反映了奴隶主民主派的愿望和要求；同样，社会约定论认为，国家制度、道德、法律的存在价值应当从它们的“好处”即效果中去衡量，这与依靠主观想像或用宗教迷信判别的传统观念来比，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但是，约定论不能理解国家、法律、道德的本质，不能说明它们产生的社会性历史根源，夸大事物的相对性，离开国家、法律、道德的社会阶级根源片面强调它的“好处”等等，又是片面的、错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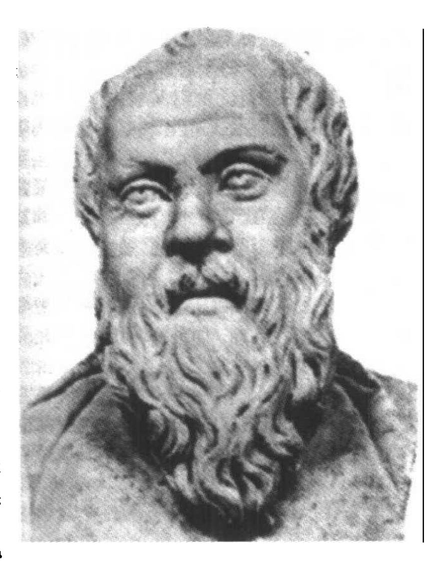
普罗泰戈拉在古希腊哲学和科学史上享有重要地位。他的哲学思想标志着古希腊旧的自然哲学的终结。从此，哲学的中心由自然转向社会和人本身。他对教育学、形式逻辑、语言学，特别是语法及其分类等科学，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对后来的哲学和科学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五　苏格拉底：高唱“美德”和真善之歌

正在古希腊原子论哲学和智者运动蓬勃发展的高潮中，雅典出现了苏格拉底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上，苏格拉底首次在人类精神世界里奏响了一曲关于真善美的理想之歌。

苏格拉底约公元前468年生于雅典。他是雅典公民，父亲是一位雕刻匠，母亲是一位助产婆。早年，苏格拉底继承父业，学过石匠及雕刻手艺，后来放弃了这一门手艺，对哲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便致力于哲学和社会活动。据说，苏格拉底脾气古怪，冬天常不穿鞋，光着脚到处乱跑。他和雅典智者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从不设教席，只和有兴趣的人讨论和论辩。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他已是30多岁的中年人，这位哲学家亲自参加了这场战争，目睹了雅典及其帝国崩溃的全过程。他曾3次参军作战，在战斗中拯救过战友生命。他参加后两次战役的时候，已是40多岁的人了，却仍表现出英勇的爱国主义情怀。战争结束后，雅典的贵族在斯巴达支持下，重建贵族寡头政权，出现了三十人暴政的政府，被称为“三十僭主”的统治。公元前404年，在贵族寡头执政8个月后，民主又起，推翻了三十僭主统治，重建民主政治。可是，在民主制恢复之时，苏格拉底即遭到了杀身之祸。公元前399年，他被指控为破坏青年和信仰新神之罪。他以自己敏捷的思维，独特的论辩术在法庭上为自己申辩。他毫不畏惧，侃侃而谈，从容不迫，但这一切都徒劳无功，他最终被判处死刑。那是一个春天的黄昏，被判了死刑的苏格拉底

利用最后的日子和朋友们说了一天哲学问题。天不早了，朋友们说，我们该怎样埋葬你呢？苏格拉底仍然风趣地说：随便你们吧！只要你们抬得动我，不让我滑掉到地上就行。你们要埋的不过是我的身体，爱怎么埋就怎么埋吧。说完他就去洗澡，出来时妻子带着几个孩子来与他诀别，还未等狱吏带毒酒进来，他就把母子几个打发走了。当狱吏把毒酒杯递在他手上时，他洒了一点在地上，做为对神的祭奠，然后，一口气喝下毒酒。身边的朋友想到将失去这样一位慈善的哲人，不禁失声痛哭起来。苏格拉底不太高兴地说：朋友们，怎么能这样？我之所以不让女人呆在这儿，就是害怕她们恸哭喧闹。我不是向你说过吗，人应当平静地了结他们一生。当狱吏把一块布蒙在他脸上让他安然而去时，他突然把布揭开，像记起什么大事似的对身边的朋友克里多说了最后一句话：克里多呀，我还欠阿斯莱庇尤斯一只公鸡，你别忘了帮我送一下①。然



苏格拉底

① 按照古希腊习俗，医生给一个人治好病好，这个人要送一只公鸡给医生以示感谢。苏格拉底可能受审前看过病，未及时送礼就被判刑了。

后，他轻轻动弹了一下自己的身体，就安然地离开了人世。[①] 就这样，苏格拉底以他巨大的人格力量和刚正的浩然正气，从容地接受死刑，终年69年。

苏格拉底貌不惊人，但谈话极富魅力。他常在街头，集市等公共场所与各种人交谈，常常吸引很多听众。他与人谈话涉及的内容很广泛，但特别注重道德问题。在他周围，有一批得意门徒，柏拉图、克里底亚、色诺芬等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就是其中著名代表。他一生没有留下著作。关于他的哲学思想，一方面来自色诺芬的《回忆录》，另一方面也是重要方面来自柏拉图写的哲学对话。此外，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等著作也记载了苏格拉底哲学思想的有关资料。这些材料中记载的关于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认识人自己：人生和哲学的要义

苏格拉底在年青的时候，曾很热情地追求过自然哲学知识，并极力寻求事物形成发展的原因。他认为，人们远远没有懂得事物的真正原因，甚至自己也不能说明自己。那些自然哲学家们只是在物质范围内说明由何物组成了何物，这样解释并没有说明事物的真正原因。他认为，哲学不仅要回答组成事物的“是什么”，而且更应该说明“为什么”组成这种东西及为什么能够组成这种东西。他非常推崇阿那克萨戈拉在书上写的心灵规整万物是万物的原因的说法。但当他谈到阿那克萨戈拉事实上并未用心灵来解释事物秩序的原因，

① 柏拉图：《斐多篇》。《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64页。

而仍归因于气、以太、水这类东西时，又感到失望。苏格拉底批评自然哲学家“丝毫不想好这种担当一切、包罗一切的力量。然而这正是我最乐意知道的本原”。[①] 在他看来，世界上事物的根本原因，不在孤立的具体、自然物质的属性之中，而是在整个宇宙系统中，是一种支配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一种适应性、合目的性，其中“好”即“善”是说明事物宇宙和谐地、有秩序地运行，万事万物各得其所的根本原因。这样，苏格拉底就由自然哲学转向了“人”，由“自我”转向了“善”。可以说，在西方哲学史上，苏格拉底第一次在真正的哲学意义上发现了人“自己”即“自我”，这是他的哲学思想的重大历史意义之所在。

古希腊著名的德尔斐神庙的墙上，刻着一条格言：“认识你自己!”德尔斐是希腊北部的一个小城镇，依山傍水，风景迷人，早在公元前6世纪初就在那里举行过泛希腊纪念阿波罗神的庆典，从而成为希腊一个游人如云的著名胜地。之所以如此，据说主要是阿波罗神给人的各种预言特别灵验。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与这个地方有很大关系。特别是“认识你自己”那条格言，既是一条道德命令，又包含着启迪人的智慧，引人思考的深邃的哲理。在希腊有许多注重研究哲学的人，但真正从深刻的哲学意义上理解和说明“认识你自己”这句格言的是苏格拉底。在他那里，哲学的最高意义和中心主题是关怀人，研究人，认识人类自己。

尽管以往的哲学家们不同程度地重视对人的研究，但苏格拉底却把这个问题提到了新的高度。他认为智者特别是普罗泰戈拉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自己，他们只说明了人的感觉

① 柏拉图：《斐多篇》。《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64页。

或感官欲望，而没有揭示出人有灵魂有思想，有追求真正的善的本性。真正的善是灵魂中道德的善。对于人来说，认识自己的本质在于追求善，而最大的善是致力于自己灵魂的净化。哲学的任务和目标，就是要努力唤起人们认识他自己的这一本质。由此可见，苏格拉底已把德尔斐神庙里的这句格言变化成了一套新的哲学观念，上升为真正的哲学。正如黑格尔说的：智者们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这还是不确切的。而“在苏格拉底那里，我们也发现人是尺度，不过是作为思维的人；如果将这一些以客观的方式来表达，它就是真，就是善”。[①] 苏格拉底经常谈的是什么叫正义和不正义，什么是善是恶，什么是勇敢或怯懦，什么是明智或不明智，什么是治国之本，等等。[②] 苏格拉底认为，一切事情都用物质性的原因来解释是说不通的，事物真正的原因不在于自然、物质方面，而在于心灵、灵魂，在于你把一切认作“好”，认作合乎道德的“善”。他听有人说阿那克萨戈拉在书里说，心灵是安排一切的原因，感到非常高兴，并对此大加赞许。但他又认为阿那克萨戈拉的“心灵说”是不彻底的，还没有摆脱自然唯物主义。苏格拉底说，自然唯物主义的种种说法说明不了问题，只有心灵安排一切的能动性才是真正的原因，心灵总是按照“好”的目的来安排一切，一切事物的存在和发展也都是追求一种完满性的原则。他认为人之所以有腿用来走路，有手可以拿东西，有舌可以用来发出声音，都是由于有一种好的目的，整个世界都有这种目的性。于是，目的论就成了苏格拉底的世界观，并由此形成了他的哲学思想的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三联书店第62页。

② 色诺芬：《回忆录》，《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61页。》

一个特征。

把目的上升到哲学的范畴是有重要意义的。这是因为，人的能动性决定了他的全部是通过有意识的目的来进行的，因而“目的”同人的一切自然的、社会的、生活的关系极为密切，成为贯穿人在感性、意志、思维和各种行为中的一个中心点。要从根本上把握人的精神能动性，就应该抓住这一点。但苏格拉底只看到“目的”对人的活动的精神能动性，便以此作为人及万事万物产生和发展的基础，这就走向唯心主义。在苏格拉底看来，整个宇宙都服从于“目的”，服从于“好”和“善”的原则，而决定“目的”、“好”和“善”的力量又是神。神把宇宙间万事万物设计得完美无缺，并不断追求最好的目的，从而才使世界变得如此有秩序、有意志，并成为完好的统一整体。于是，苏格拉底成了神的崇拜者。据说，苏格拉底的学生凯洛丰为了知道是否有人比自己的这位老师更富有智慧，特意跑到德尔斐神庙去问神。庙里的先知宣称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聪明了。神的话使苏格拉底感到很吃惊，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智慧，神却说没有人再比他更聪明。为了证明神的话是错的，他试图找出一个比自己更聪明的人。他拜访了一些政治家、文学家、技艺师，发现这些人并不都很聪明，有的甚至极其愚蠢。这时，他开始认真思考神的话。他认为，神之所以说自己比别人更有智慧，只是因为自己承认无知。他得出结论：只有神才是最智慧的，神的话是在说明人的智慧是微不足道的，他是借我之名好像在说：“人们呀，一个人若像苏格拉底那样知道自己的智慧是微不足道的，他就是最智慧的。”他由此四处奔走，探索真正的智慧，考察人们理智能力和水平。这件事不论是否真实，但它确实代表了苏格拉底的思想倾向。

由此可见，苏格拉底给德尔斐神庙里“认识你自己”那句格言赋予了哲学新意。他把“善”作为哲学的本体，这种精神性的最高的善是普通的、绝对的、客观存在的，所以，他的这种哲学的特征是客观唯心主义目的论。“客观”存在的“善”，不是存在于感性物质世界里，而是存在于神的世界里。苏格拉底的这些思想，不仅直接影响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而且对中世纪乃至近代的哲学和神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西方哲学史上一种渊远流长的理论。

（二）美德即知识

道德问题是苏格拉底哲学的主题，认识和达到真正的善，是苏格拉底研究哲学的最高目标。

在苏格拉底之前，许多哲学家也都涉及了认识和道德问题，但都没有像苏格拉底那样注重对人类认识和道德联系的研究。他强调人要认识真正的自我，即认识自我的灵魂或理智，因为灵魂或理智能够使人头脑清醒、明辨是非。所以，人要特别关心自己的灵魂，只有把自己的灵魂或理智看作至高无上，才能懂得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才能成为一个高尚的、有道德的人。那么，什么又是道德呢？苏格拉底说：美德即知识。① 这个命题构成了苏格拉底关于道德问题的基本思想。在他那里，道德与知识是统一的，这既把道德提高到知识的水平，使道德更加科学化，同时又把知识提高到社会的水平，使知识社会化。他认为，没有知识就做不出符合道德的行为；有了知识，懂得了道德的本性和善的概

① 柏拉图：《美诺篇》，参见《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64页。

念，就能作出符合道德、合乎善的事情。所以，最高的知识就是对善的概念知识，“美德即知识”，也就是美德即关于善的概念的认知。

苏格拉底认为，人的道德行为来源于知识，以知识为基础。因此，应该把道德放在首位。一个有知识的人，懂得什么是善，他决不会从恶。相反，一个缺乏知识甚至没有知识的人，不可能懂得善的含义，他就不可能为善。善之为善，是完全的，绝对的善，不包含任何恶的善。不知善，没有善的知识，决不会为善。由此可见，善出于有知，恶出于无知。那么，善的知识从何而来呢？苏格拉底认为要通过教育。知识、智慧是教育的结果，道德、善也是可以教育的。他非常重视道德教育，强调通过教育途径使人获得道德知识，懂得什么是善恶，用知识和智慧武装人的心灵。只有这样，才能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可是，按照这种理论，又怎样解释那种“明知故犯”的人的行为呢？即有的人明知那样做是不道德的，但他硬要那么去做，这是为什么？苏格拉底说那仍是无知的表现。因为如果他真的懂得那样做是不道德的，他就不会去做；他之所以去做那种不道德的事，证明他仍然是无知的，还没有真正懂得善的知识。所以，在苏格拉底看来，人是不会有意为恶的。因为，对善的向往是为一切人所共同的，没有人只想作恶。[①] 只要有知识，就能深明大义，弃恶从善。而那些无知、愚昧的人，根本谈不上什么道德，甚至做不出善事也不知何为恶事，有可能把恶当做善。在他看来，不知善恶的那种愚蠢的人，做了恶事还以为是做善事的人，这种人比起那

① 柏拉图：《美诺篇》，参见《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60页。

种有意为恶的人来说，是更糟糕的。苏格拉底以理性（知识）来作为判断道德行为的标准，显然是片面的、错误的、不符合社会现实的。但这种理性主义伦理思想也包含着有价值的成份。他把知识与行为、道德与认识结合起来，为道德行为科学化及道德行为的价值判断奠定了理论基础，从而在伦理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精神助产术

苏格拉底没有对真善美提出明确的意义，他却在追求和探索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生动而能启迪人思考的哲学方法，这可以说是他对人类思维的一个重大贡献。苏格拉底方法论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问答法。这是通过提出问题、回答问题来反复诘难、盘根问底的方法。它是从对话者的观点或定义中引出矛盾，使其陷入窘态，从而迫使对方否定自己原来的观点，启发他认识到自己的无知，增强进一步求知的欲望。苏格拉底的这种方法，旨在引起和揭露对方思想中的自我矛盾，启发对方思想的提高和完善，这是符合人的思想发展规律的。

第二，助产术。苏格拉底认为，人们关于美、正义、勇敢、善等知识和定义，不是人的主观随意的观念，而是在人出生前原有的灵魂中就具有的东西。这些知识本来就存在于人们的心灵里，好像胎儿在母腹里一样。然而由于肉体和感官的压抑和迷惑，人们把这些知识忘记了，使它们和别的事物混杂一起，造成是非模糊，抓不住要领。苏格拉底的方法就是在讨论问题的过程中，通过各种不同意见的对立和冲突，特别在否定已有的意见之后，不断发现新的意见，产生

新的认识。这种新的意见和认识就是早先以潜在的方式存在于人的心灵中的那些知识。通过谈话，进行启发，就把杂质清除了，成为真正的知识。苏格拉底说，这就好像一个胎儿从母腹里产生出来似的。苏格拉底的方法也就像助产婆帮助胎儿出生那样。苏格拉底的母亲是一个助产婆，他的这种方法是从他母亲那里受到启发的。黑格尔说，这种方法就是"帮助已经包藏于每一个人的意识中的思想出世"。① 所以，一般把苏格拉底的方法称为"助产术"。

第三，归纳定义法。这是苏格拉底归纳论证从中寻求一般定义的逻辑方法。亚里士多德说："有两样东西完全可以归功于苏格拉底，这就是归纳论证和一般定义。这两样东西都是科学的出发点。"② 苏格拉底讽刺、否定个别的、偶然的、错误的意见之后，通过助产术找到普遍的、必然的、正确的知识和结论。在他以前的古希腊哲学史发展中也有这样的经历，但苏格拉底自觉地把由个别到一般的思想经验概括成为一种方法，确是对人类认识和思维的重要贡献。在归纳基础上，苏格拉底及时对找到的结论进行表述或加以定义，这种通过助产术、归纳法做出定义的方法，就是古希腊哲学史上本来意义上的辩证法，即通过谈话、回答、论辩来揭露矛盾、克服矛盾、寻求知识和真理的方法。苏格拉底的方法就是这样一种揭露思维中的矛盾，寻求概念和定义的思维的、概念的辩证法。

在西方哲学史上，苏格拉底的方法论具有重要影响。他初步揭示了认识个别到一般的过程，为后来形式逻辑中的归

---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7页。

②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58页。

纳法奠定了基础。他强调认识的相对稳定性和确定性，对后来形式逻辑中的定义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苏格拉底哲学中的唯心主义观点和方法，为柏拉图理论做了理论上的准备。

第五章 古典后期的文化成就

- 古典后期希腊世界的政治变革
- 柏拉图：攀上希腊古典哲学的高峰
- 亚里士多德：西方古典哲学的灯塔
- 继续发展中的科学文化



在希腊文明史上，公元前4世纪称为古典后期（实际上古典后期在公元前330年结束）。古典后期的希腊文化，成为希腊古典文明更加光辉灿烂的一页。

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作为经济基础的奴隶制经济仍继续发展，但农民和手工业者大量破产，奴隶数量与日俱增，城邦制度已不能继续适应奴隶制经济发展，从而导致了城邦危机。但是，希腊古典文明并没有随着城邦的危机而暗淡没落，反而有所创新和发展。特别是在哲学上，产生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样伟大的思想家，把希腊乃至西方古典哲学推向高峰。在科学、文学、史学、美学和艺术方面也取得了更为突出的成就。

一　古典后期希腊世界的政治变革

由于雅典的对外扩张，引起雅典霸权控制下各同盟国的强烈反抗和希腊另一霸国斯巴达的敌视和反对。雅典和斯巴达都想称霸全希腊，由此矛盾日益加剧，不可调和。两霸相争，必有一战，斯巴达和雅典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史称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从公元前431年至前404年，持续了27年，席卷了整个希腊。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希腊历史的转折点，从此希腊城邦由繁荣逐步陷入危机。这是由奴隶制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也是由奴隶制国家发展的规律所决定的。

城邦危机首先表现在，奴隶制经济的发展破坏了城邦经济基础，强化了奴隶主的统治，从而加剧了社会内部矛盾，导致了大大小小的战争频仍不断。战争成了补充和提供奴隶的主要来源，一场战争下来，胜利者屠杀失败者男丁，而将妇女、儿童卖为奴隶。奴隶主们借机大发横财，他们使用更多的来自不同城邦、性情温和的奴隶从事生产，为自己创造财富。随着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实力雄厚的大奴隶主兼并土地，发展大手工业，财富剧增；小所有者越来越多的陷入破产。公元前4世纪，奴隶制大农场和奴隶制大手工业作坊的比重逐渐增大。那些在战争中大发横财的富人不仅从事土地投机经营，而且还大量从事粮食、工业原料的投机活动。战争使贸易关系遭到破坏，这时国家也无力筹措粮食，特别是那些依靠外地输入粮食的城邦，粮食供应严重不足，饥荒战乱使那些粮食投机商大发横财。随着高利贷业和金融业的发展，财产分化更为加剧，小农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那些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不是沦为游民无产者，就是充当雇佣兵，为那些财富横溢的大奴隶主去卖命。这一切充分表明希腊古典城邦小农和手工业者的经济已遭到严重破坏，他们与大奴隶主的矛盾日益激烈。大奴隶主为了巩固自己的剥削和压迫，对贫民肆意镇压，城邦危机日益加剧。

财产的剧烈分化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使许多城邦都爆发了反抗大奴隶主的贫民起义。例如，公元前399年，在斯巴达发生了破产公民基那敦组织起义的密谋。那时在战争中发了财的人大肆聚敛财富，而许多人失去了份地，丧失了公民权，成为“下等人”。基那敦就属于这种人。他看到城乡到处都是伺机而起的同盟者，便派人同希洛人和皮里阿西人

联络准备发动起义，可惜由于叛徒告密，起义遭到扼杀。但它表明自由民中的穷苦人已经同奴隶站在一起，来反对奴隶主了。公元前392年，在科林斯爆发了贫民反抗奴隶主贵族的武装起义。那些奴隶主贵族逃到神庙里钻进神坛或神像下避难，但起义者不信神，勇敢地打进神殿，毫不留情地杀掉了他们。公元前370年，在亚尔果斯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起义群众以棍棒为武器，击杀奴隶主1500多人，没收和分配了奴隶主的财产。这些起义表明，那时各城邦内部斗争是何等激烈！每个城邦，不管它多么小，都分成两个敌对部分，一个是穷人的城邦，一个是富人的城邦。穷人和富人"势不两立的激流已经到了这步田地，富人宁肯把钱投入海中，也不愿救济穷人；而最穷的人则不以占用富人的财产为满足，必欲剥夺他们的财产而后快"。①

从外部关系上看，希腊各城邦混战不已，社会危机愈演愈烈。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斯巴达成了全希腊的霸主。以前属于雅典统治的提洛同盟各邦，现在又落入斯巴达的统治之下。斯巴达不仅向这些属邦征收更高的赋税，而且干涉他们的内政，强迫他们推行寡头政治，还派员监督驻守各邦。斯巴达的横征暴敛、倒行逆施引起了各邦强烈不满，他们伺机进行反抗。加之斯巴达的老盟邦科林斯、墨加拉等在战争中出了大力，可斯巴达在战后却把他们置之度外，独吞胜利果实，这必然引起老盟邦无比愤怒，从而变良友为仇敌。公元前399年，斯巴达与波斯发生战争，波斯利用斯巴达和希腊各邦日益加深的矛盾，鼓动并资助各城邦反抗斯巴达。公元前395年，由底比斯发起，雅典、科林斯、墨加拉、亚尔果

① 伊索克拉底：《亚奇达姆斯篇》，第67页。

斯等邦揭杆而起，组成了反斯巴达联盟。在雅典人科农指挥下，斯巴达海军大败于克乃达斯海角，斯巴达海上霸权被消除了。这场战争由于主要在科林斯地峡进行，因而史称科林斯战争。战争以斯巴达失败和波斯胜利而告终，但小亚诸希腊城邦及塞浦路斯等岛都落入波斯手中。野心勃勃的斯巴达不甘失败，继续加紧对其他希腊城邦武装干涉，出兵占领底比斯，在那里建立寡头政体，企图重振霸权。这当然引起其他城邦的反感和愤慨。公元前 379 年冬，流亡于雅典的民主派以佩罗庇达为首领，重返底比斯，赶走斯巴达驻军，推翻寡头统治，重建民主政权。从此，底比斯日渐强盛，成为希腊大邦，恢复以它为首的彼奥提亚同盟。虎视眈眈的斯巴达岂能接受底比斯兴盛的现实，更不能容忍底比斯成为彼奥提亚同盟的领袖。它要求底比斯解散同盟，而底比斯则指责斯巴达必须放弃对伯罗奔尼撒同盟的领导权。双方矛盾骤然加剧。公元前 371 年，斯巴达和底比斯在彼奥提亚的留克特拉决战，底比斯在杰出的军事指挥家伊巴密侬达率领下，以新的方阵战术，大败斯巴达军，底比斯遂成为希腊霸主。次年（公元前 370 年）伊巴密侬达率 70000 大军冲入伯罗奔尼撒，所向披靡，一路获胜。岌岌可危的斯巴达虽保住了城池，但所把持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却被瓦解了。斯巴达遭受沉重打击，从此大伤元气，再也未能恢复。底比斯却兴旺发达，盛极一时。这又引起雅典的嫉妒。雅典害怕底比斯与它争雄斗胜，转而又和斯巴达结盟，以与底比斯对抗。公元前 362 年，伊巴密侬达率底比斯军与雅典、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阿卡地亚的门丁尼亚决战，底比斯虽然获胜，但主将伊巴密侬达却阵亡疆场。底比斯顿时人心涣散，群龙无首，维持 10 年的霸权也随之衰落。早在科林斯战争中，许多城市都和雅

典结成第二次海上同盟，有70多个城邦入盟，各邦都实行自治。这时，雅典又摆出霸主的架势，企图恢复海上霸权。它加强了对同盟各邦的压迫和勒索，这又引起同盟邦的反抗和斗争，于是爆发了同盟战争（公元前357—前355年），结果是第二次海上同盟宣告解体。曾在希腊文明中做出很大贡献的希腊各城邦，这时普遍衰落下去。到了公元前4世纪，各城邦已经丧失了任何生命力。这种危机的加剧，为马其顿的兴起和对希腊的征服提供了条件。

在希腊北部边陲，居住着马其顿人。马其顿人是希腊人的一支。希腊北部是一片地域辽阔的多山之地，加之族系复杂，社会进化较慢。当希腊各城邦高度发展并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成果时，马其顿人还处在氏族到国家转变的过渡阶段，因而文明的开始比其他希腊人晚些。约公元前6世纪，马其顿人开始建立国家组织。希波战争期间，马其顿人站在希腊人一边，曾把波斯人的军事机秘透露给希腊人。在马其顿人看来，他们和希腊人是同族近亲。随着马其顿人和希腊之间交往逐渐加深，希腊各邦先进的文化也传入马其顿。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和战后，马其顿逐渐发展强盛起来，与希腊的交往也日益密切。马其顿的真正的强大，还是在国王腓力二世时期。腓力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军事统帅，他年轻时曾在底比斯做过人质，住在伊巴密侬达家里，在那里他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熟悉了希腊各邦的形势。腓力执政后，全面实行了改革。在政治上，他加强了王权，控制了贵族会议和公民大会，割除了部落首领的军事力量，把军事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在经济上，大力推行币制改革，采用金银复本位制，以适应希腊用银、波斯用金的情况。马其顿自铸金币，与银币并用，规定金银币的兑换率，从而大大促进了它和希

腊、波斯之间的贸易。腓力最重要的改革是在军事上，他召募了一大批马其顿牧民，学习和仿照底比斯军事经验，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他改变了马其顿作战阵势，创立了著名的密集而纵深的马其顿方阵。这种方阵以执矛持盾的步兵组成密集的正方形阵势，以成排的长矛为进攻武器。密集的长矛，坚如铁壁的盾牌，是古代军事上使用火器以前最成功的一种军阵。步兵方阵两翼是骑兵，还有轻装步兵护翼。作战时重装步兵担任正面攻击任务，而轻快的骑兵则迅速从两翼冲出，从侧面进行包围，以获全胜。

有了这样一支强大的部队，马其顿就成为希腊半岛上武力强悍、锐不可挡的国家了。腓力依靠这支武装力量，利用希腊城邦之间的矛盾，占领了爱琴海以北广大地区。他不仅大力进行军事威胁，而且利用外交手段和金钱收买方法，拢络了一批希腊各邦亲马其顿的政客。他凭借强大的军事攻势，挥师南下，征服整个希腊。当时，希腊各邦都有亲马其顿派和反马其顿派，特别是在雅典，两派斗争更为激烈。以雄辩家伊索克拉底（公元前436—前338年）为首的亲马其顿派，主张投靠马其顿，拥护腓力做各邦统一的帅领，率领各邦向外扩张，这一派主要由大奴隶主组成。以大演说家德漠斯提尼（公元前384—前322年）为首的反马其顿派，强烈呼吁希腊各邦团结一致抗击马其顿，坚决制止马其顿的扩张，以捍卫希腊各邦的独立和自由，这一派主要由那些与海外贸易有密切联系的工商业者组成。德漠斯提尼以赤诚的爱国之心和无与伦比的雄辩才能，发表了一系列反马其顿的演说，后来结集为《斥腓力》。在反马其顿派积极努力下，于公元前340年建立了由雅典、墨加拉、科林斯等邦组成的反马其顿同盟。然而，面对强大的马其顿方阵，这个同盟仍然

显得苍白无力。公元前388年，腓力率军在中希腊的喀罗尼亚同反马其顿同盟军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希腊各邦以失败告终。这次战斗使希腊半岛上那种城邦林立的局面宣告结束，希腊各邦在军事、外交上完全被马其顿控制。从此马其顿对希腊半岛实现了真正统一。公元前337年，腓力召集希腊各邦权贵集会于科林斯，除斯巴达外，其他各邦都参加了。会上宣布，成立希腊同盟，由马其顿王担任盟主，各邦要把军队交出来由盟主指挥。会议还决定巩固奴隶主的私有财产，不许重新分配土地，不许取消债务和解放奴隶。此后又举行了向波斯人宣战的集会。科林斯会议是希腊城邦时代宣告结束的标志，是希腊历史及其文明发生变化的重要转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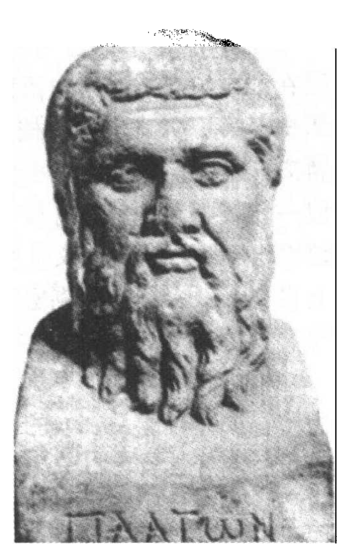
二　柏拉图：攀上希腊古典哲学的高峰

由苏格拉底所开辟的古希腊哲学研究的新方向，被“苏格拉底的惟一‘继承者’——柏拉图”① 所继承和发展，建立了一个以理念论为基础的包括本体论、认识论、自然哲学、伦理学、国家学说和美学等庞大的唯心主义体系，攀上了希腊古典哲学的高峰。

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出生于雅典一个古老

① A、E泰勒：《苏格拉底》，1955年波士顿版，第183页。

的名门贵族家庭。母亲是梭伦的后裔，其叔父克里底亚以及好几位亲戚是雅典三十僭主统治集团内的人物；父亲家谱可以追溯到古雅典王卡德鲁斯。高贵的家庭使柏拉图自小就受到了当时可能有的最上等的教育。他曾致力于学习绘画、写诗和写悲剧，参加体育活动，表现出聪颖的禀赋和多方面的才能。这样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也使他自小就鄙视民主制，立志改革政治。



柏拉图

柏拉图约在20岁左右开始师从于苏格拉底，学习达8年之久。他系统地学习并接受了苏格拉底的概念论和寻找同类事物定义的哲学研究方法。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雅典重建的民主政体判处死刑，此事不仅使柏拉图更加痛恨民主制，而且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从此，柏拉图不愿直接参与政治活动了，而是一心一意要纪念苏格拉底，集中转入对哲学的研究。柏拉图随即离开雅典，先后到麦加拉、昔勒尼和南意大利学习，既接触和研究巴门尼德哲学，又吸取了毕达哥拉斯的数论，还实地考察了一些哲学家是如何治理国家的。据说他还到过埃及，在那里学习天文学，考察过埃及的制度和文物。公元前388年，40岁的柏拉图在西西里曾得到叙拉古的僭主奥尼修一世的优遇，结识了狄翁，并企图在这里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但未能如愿。

经过10年来的游历和挫折，约在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在雅典纪念英雄阿加德穆的圣殿附近的园林中创建了欧洲历史上第一所固定的学校——“学园”，此后虽然又两度短暂离开雅典前往西西里去实现其理想政治图式，但基本上是以一名教师和作家的身份专门从事哲学研究和教育事业。他培育出了不少在西方文化史上占有卓越地位的学者，如亚里士多德、欧多克索、克塞诺克拉底、泰阿泰德、斯彪西波等等。80岁猝然去世时，他正在写作《法律篇》。

柏拉图一生写下了大量著作。现有的30多篇对话和书信，有少数可能是别人的伪作，但大多数是可靠的。其哲学思想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早、中、晚3个时期。早期主要反映的是苏格拉底的思想和柏拉图的不成熟思想，著作有《申辩》、《克里托》、《卡来第斯》等；中期反映了比较典型的柏拉图哲学思想，代表作有《美诺》、《斐多》、《会饮》、《理想国》、《斐得罗》等；后期反映了柏拉图哲学思想的变化，以及对中前期一些思想的修正和补充，主要著作有《巴门尼德》、《智者》、《蒂运欧》、《法律》等。古希腊哲学正是从柏拉图开始，才有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柏拉图的唯心主义体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思想：

（一）理念：真实存在的本体

在西方哲学史上，“普遍”或“共相”问题始终是古希腊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柏拉图的“理念”说和“共相”问题有密切的关系。

柏拉图认为，“理念”是世界万物的根本原因或本原，他说：“一方面我们说有多个的东西存在，并且说这些东西

是美的，是善的等等。……另一方面，我们又说有一个美本身，善本身等等，相应于每一组这些多个的东西，我们都假定一个单一的理念，假定它是一个统一体而称它为真正的实在。"① 这里讲的美本身、善本身，就是美的"理念"，善的"理念"。客观世界的一切具体事物之所以具有如此这般的性质，成为如此这般的事物，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如此这般的"理念"和另有了这些"理念"才成为它们。因此，"理念"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比具体个别事物更真实存在着，是万事万物的真正原因或本原。"理念"之所以能够看成事物的本原，是因为"理念"具有普遍性，它是事物中的普遍性质和本质，它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超感性。柏拉图说"作为多个的东西，是我们所能看的，而不是思想的对象，但是理念则只能是思想的对象，是不能被看见的"。②

第二，不变性和永恒性。在柏拉图看来，理念是永恒不变的，而具体的东西是不稳定、变化的。如美有各种各样的、程度不同的美，但美的理念即美本身，却始终如一，是不变不动的。

第三，绝对性。柏拉图曾以苏格拉底的口吻在《斐多》篇中讨论什么是美时指出："如果有人向我说，一件东西之所以美，是因为它有美丽的颜色、形状之类，我是根本不听的，因为这一切把我闹糊涂了。我只是简单、干脆、愚笨地认定一点：一件东西之所以美，是由于美本身出现在它上

① 《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78—179页。
② 《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79页。

面”。[①] 这就是说，美的具体事物都是相对的，总有不完美的缺陷存在，而美的理念则是绝对的，绝不会既美又丑。

第四，客观真实性。柏拉图认为，客观世界的各种具体事物虽然是可感知的，但却是不真实的、虚幻的，理念虽然不可感知，但它却是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想像为转移的、惟一的、真实的客观存在。

第五，完善性和目的性。“理念”具有伦理价值，服从一种善或“好”的目的。在柏拉图看来，人的一切行为都受善的目的支配，而善就是一切人在事物中追求的普遍“理念”，把它引申扩大为整个世界观，就是世界万物都以这个最高的普遍者——善的“理念”为目的。

第六，单一性和多数性。在柏拉图看来，同类事物中只有一个同一的“理念”，但不同类型的事物又有相应的不同类型的理念。所以，万物必有与之相应的理念。

第七，等级性。柏拉图认为，理念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具有一定的等级。他将理念大体分为：最低级的具体事物的理念，然后依次为：性质、关系的理念，艺术、道德的理念，最高的则是善的理念。

既然理念是真实的存在，又是多中的一，那么，理念与感性世界的具体事物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为解决这一问题，柏拉图提出了摹仿说和分有说。所谓摹仿说，就是认为，理念是事物的范型或蓝本，事物则是理念的摹本，事物之所以存在，是由于摹仿了理念。他在《理想国》中指出，工匠造床是以理念之床为范型的，画家画画是以理念之

①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73页。

画为蓝图的。① 分有说则是柏拉图的独创，他认为，个别事物的存在，乃是分有了理念的存在，他说："一个东西之所以是美的，乃是因为美本身出现于它之上或者为它所'分有'。"② 由此可见，理念论的提出，表明柏拉图已十分注意个别与一般，个性和共性的关系问题。

（二）知识是对理念的认识

知识的问题在柏拉图的哲学中始终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并与理念论密切相关。柏拉图认为，知识的对象并不是人的感官所感知的"可见世界"（现实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不断变动、不完全真实的，只有理念世界才是知识的对象，因为理念世界是永恒不变的真实存在。因此，感觉、知觉并不是真正的知识，而是"意见"，只有认识到理念或者说认识到事物本身，才是真正的知识。为此，柏拉图把认识分为4个等级：最高的认识是理性，其认识的对象是善本身和隶属于善的理念，这样的认识就是辩证法；其次是知性或理智，其认识的对象是并非直接隶属于善的理念，即他所谓的数理实体，这种认识的结果就是数学和科学；再次是信念，其认识对象是实际事物，这样的认识是常识；最后是想像或猜测，其认识的对象是事物的肖像，它产生出来的认识则是幻觉或错觉。前两种叫知识，后两种叫意见。

那么，理性究竟如何才能达到对于理念的认识呢？柏拉图通过吸取奥尔弗斯教派、毕达哥拉斯和苏格拉底的灵魂不

① 参见柏拉图：《理想国》。
② 《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77页。

死、灵魂转世说，提出了“回忆说”，从而解决了这一问题。

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和理念一样是先于肉体而存在的。灵魂在进入肉体之前，就已居于理念世界之中，对理念早已有了认识，只是由于在灵魂进入肉体时，受肉体的玷污，暂时将理念知识忘记了。为了重新获得这些理念知识，就必须通过学习，借助于感觉，重新把它们回忆起来。他说：“我们灵魂就在我们出世以前存在过”，“如果是我们在出世前获得了知识，出世时把它丢了，后来又通过使用各种感觉器官能重新得到了原来具有的知识，那么，我们称为的这个过程，实际上不就是恢复我们固有的知识吗？我们把它称为回忆对不对呢？完全对”。①

由此可见，柏拉图的知识论虽然包含不少有价值的因素，但他把认识过程中的感性和理性两个阶段对立起来，抬高理性，贬低感性，则是极其错误的。

（三）“辩证法”：获得“理念”的逻辑方法

柏拉图认为，“辩证法”是一种问答法，它研究的对象是绝对的“美”、“善”等的“理念”，因此，它是关于如何获得绝对的真实存在的知识的科学。它通过各种“假设”，逐步上升到最高的本原或第一原理，从“理念”出发并借助于理念达到理念，而不需要任何感性的东西的帮助。所以，“辩证法”是研究最高原理的，是一切科学的顶石，没有别的科学能比它更高。“只有它才能达到第一本原，这种逻辑方法是神通过一位新的普罗米修斯之手赐给人们的一个上天

---

①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81—82页。

的礼物，在赐给人们时带着一道闪光灯。它是不死的、能多次再生为人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中早已得到的关于存在的一切知识的回忆过程。"① 由此可见，柏拉图的"辩证法"是通过反复辩难来寻求真理的一种方法，它完全撇开了感性事物，从"理念"出发，依据"理念"揭示理念之间的关系，最后上升到无矛盾的善的理念。很明显，这种获得"理念"的逻辑方法是对苏格拉底"精神助产术"的进一步发展。

（四）宇宙生成论：神创说

自然是什么？世界是什么？这些问题是早期哲学家共同关心、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柏拉图自然也回避不了。他从反对自然哲学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出发，提出了以理念为中心的宇宙生成论。

柏拉图认为，自然界本来存在一种作为万物的基础和材料的东西——物质（质料），但由于这种物质是可变的，无定形的，没有确定的性质和存在形式，所以，它是不可感觉和不可理解的。只有被"理念"（形式）所规定才能成为具有一定形状、性质、秩序的现实存在物，才能成为可感觉、可言说、可定义的东西。因此，自然界的事物之所以能够被人感觉、言说和定义，关键在于物质和理念。其中理念是主要的原因，它决定着事物的本质，使其成为可被感知和能理解的存在。物质是次等的、被动的，是事物存在的条件和手段，是为了理念的存在。

不动的理念何以能规定物质呢？柏拉图认为，在世界之

① 转引自杨适《哲学的童年》，第514页。

先存在着“创造主和父亲”，创造主为了使理性充满整个宇宙，使物质和理念结合而成为具体的东西，首先创造了宇宙灵魂。他说：“他（指创造主——引者注）创造世界的时候，他便把理性做到灵魂里边去，把灵魂放到身体里边去。”① 物质自然界由于宇宙理性的作用，具有了理性和生命，于是杂乱无章的物质有了形体和秩序，分化出了水、火、土、气4种元素。然后从这4种元素中产生出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东西。由此可见，在柏拉图看来，宇宙的生长过程，也就是神运用理念规定物质和物质摹仿理念的过程，也是自然界从混沌杂乱无章到逐渐清晰并能够被人感知和理解的过程。神之所以要创造世界，是因为他善，没有嫉妒，愿意使万物像他自己。

（五）理想国：用哲学改造国家的社会政治方案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民主制的衰落，贵族制的复辟等社会政治生活表现出来的罪恶丑行和不义，促使当时包括柏拉图在内的人们不得不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才能使人们的灵魂和国家的政治变得纯洁和合乎正义？建立一个合乎正义的理想国家的条件和方法是什么？在《国家篇》中，柏拉图向人们展示了他对这一问题思考的结果：要实现正义之邦，关键在于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特别是保证统治者和兵士阶级的良好教育。

① 《古希腊罗马哲学》，第209页。

柏拉图认为，国家中的公民应分为3个等级：最高等级的监护者，又叫哲学王，他们是统治者，凭借智慧发号施令，治理国家，并把具有各种职能的等级安排得各尽其本分，保证国家的统一和秩序；其次是作为统治者的辅助者——士兵，又叫武士，他们用武力帮助最高统治者实行统治，其美德是勇敢；最低一级的是农工商人，他们只有一种职能，那就是服役，供养兵士和监国者，其美德是服从。这3个等级中，前两种只是少数人，而后一种是多数人。这种等级的划分是完全世袭的，各等级中的儿童也可以由于优劣而提高或降低其等级。为了培育能治理国家的统治者，柏拉图主张孩子们必须接受严格的教育和锻炼，对教育实行严格的检查制度，从母亲和保姆教养儿童时起，只许给孩子讲官方规定的故事，将最优秀的培养成哲学王。

为了保证国家的统一，保证正义和监国者、士兵阶级的纯洁性，柏拉图强调统治阶级不得有私有财产，他们要住在一起，一起用餐，手中不得持有金银、货币及其他金银制品，下层阶级的私有财产也要保持适当限度，以避免贫富冲突危害国家。显然，柏拉图的这种理想国虽然以哲学和智慧为形式，实质不过是对斯巴达贵族统治国家的制度进行加工的产物，从政治上反映了他所代表的奴隶主贵族派反对民主派的倾向和复辟要求。他自己的3次西西里之行的失败表明，用这种哲学改造国家的社会政治方案仍然是行不通的。

（六）后期理念论

柏拉图提出理念论的目的，是为了确立普遍的共相存在作为自然界万事万物的本原。但是，前期理念论中存在两个

根本问题：一是将“理念”与感性个别事物相割裂；一是“理念”与“理念”之间相割裂。随着柏拉图思想的成熟，他试图探索用新的方式来改进“理念论”，从而引起了后期思想的变化。

针对其前期理念论中存在的矛盾，柏拉图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点是关于分离和分有的问题。他指出：如果说每个个别事物分有了理念，那么，它们是分有了理念的整体，还是分有了理念的部分？如果是分有了整体，那么有多少事物就有多少理念，这样，同类事物的理念必然变成了“多”，而不再是“一”了，这与他同类事物的理念的单一性的规定就相矛盾了；如果是分有了部分，这同样破坏了理念的整体性，因为理念作为同类事物的共性，是不能划分为许多部分的。为此，柏拉图在《巴门尼德》和《智者》篇中，提出了理念结合论。

在《巴门尼德》第二部分里，柏拉图就“一”是“一”还是可以“多”的问题，通过 8 个假设所构成的 4 个对立面，说明了理念不是绝对、孤立的，而是可以相互结合的，甚至相反的理念也可以相互结合，从而改变了前期理念论的绝对纯粹性和不矛盾性的思想。为了论证理念之间可以结合，柏拉图在《智者》篇中，又提出了“通种论”。所谓“种”就是指最大的理念或范畴，“通种论”则是指研究最大的理念之间的分合关系。在此基础上，柏拉图探索了 4 个方面的分合关系：一是“存在”同运动、静止的分合关系，认为“存在”和运动、静止是可以结合的，“运动”、“静止”和“存在”也是可以结合的；二是“运动”和“静止”的分合，他指出，运动与静止虽有不同，但运动在做他们不变的旋转时，事物就表现为静止，同时又确实在运动，因此，二

者可以结合；三是“同”、“异”与“存在”、“动”、“静”的分合，他认为，“同”是与自己相同又是与其它相异，是彼此联系的，“存在”、“运动”、“静止”，它们也是与自己本身相同与其它相异，因此，这5个“种”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四是“存在”和“非存在”的分合，柏拉图指出，“非存在”虽说是绝对的“无”，但当我们说它是“非存在”、“无”时，本身就等于说它又是存在了，因为这里已表示了“是”、“有”，非存在的存在，所以，存在与非存在也是可以结合的。柏拉图由此得出结论：一切种或理念之间都存在这样的情形，有的是可以结合的，有的是不可以结合的。[①]

总之，柏拉图后期理念论通过对前期理念论的怀疑、批评和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从形而上学向辩证法的转变，在一定意义上，也反映了整个人类认识发展的过程，即人们开始只能认识个别的存在物，后来通过理性思维，从个别中抽象出一般或共相，这显然是一大进步。

柏拉图的哲学理论对后世哲学影响很大，晚期希腊和罗马时期的各派哲学，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的实在论，都直接继承了其哲学思想的某些方面。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家也通过各种方式利用、改造或发挥了他的思想学说。就是现代西方哲学中的许多流派仍然力图从中寻找自己的理论根据，并成立很多国际性的研究组织。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柏拉图哲学是欧洲哲学史上的一大支柱，柏拉图是一代宗师，千古哲人。

---

① 参见汪子嵩：《古希腊哲学中一般和个别问题》，载《外国哲学研究集刊》（四），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0—3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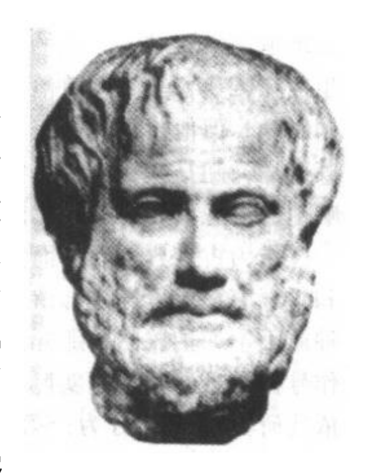
三　亚里士多德：西方古典哲学的灯塔

在古希腊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基础上，“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语），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对众多知识领域进行了认真而独立的研究，建立了一个古希腊思想文化史上最庞大的知识理论体系。亚里士多德被恩格斯誉为古希腊哲学中“最博学的人物”,①成为古典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出生于希腊北方色雷斯的斯塔吉拉城。父亲尼各马可是马其顿王阿明塔二世（腓力二世之父）的御医。亚里士多德幼年父母双亡，由一位亲戚抚养长大。公元前367年，他17岁时来到雅典，进入柏拉图学院，跟随柏拉图学习长达20余年。柏拉图死后，他于公元前348年离开雅典，到小亚细亚爱家斯一带讲学，并和阿塔尔尼亚城僭主赫尔米亚的养女结婚。这时亚里士多德已开始对柏拉图的唯心主义进行批判，并阐发自己的独立见解。3年后，由于赫尔米亚的城邦被波斯人占领，亚里士多德被迫逃亡米底勒尼。公元前343年，他受聘为马其顿王太子即未来的亚力山大大帝的教师。公元前336年，腓力被刺身亡，亚力山大即位并开始东征。亚里士多德遂于第二年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9页。

回到雅典，在吕克昂建立了一所学校，形成他自己的“逍遥学派”（因他喜欢和学生在林荫道上一边散步一边探讨学术而得此名），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活动长达12—13年之久，直至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逝世，反马其顿斗争在雅典闻风而起，由于亚里士多德和亚历山大有旧而备遭攻击，被迫出逃他地。第二年即公元前322年，亚里士多德病死于欧比亚的加尔西斯。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的家庭出身和经历，至少从两个方面对他的思想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作为一个以医务为祖业的家族子弟，亚里士多德幼年肯定受过医务的基本训练，学习过医学、解剖学等医学基础知识，甚至可能独立处置过简易手术。丰富的基础知识，严格的专业实践训练，使亚里士多德自幼养成了专注事实的作风，并成为吕克昂学校的方针和学风。更重要的是，医学和解剖学向他显示了生命的奥秘，激发了他最强烈的好奇之心，使他在这个领域里作了大量的调查，进行了多方面的总结，也使他习惯于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观察事物，把自然看成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另外，亚里士多德生活在希腊历史的一个伟大转折点上，马其顿王腓力打败了雅典军队，结束了希腊各邦的军事反抗，实际统治了希腊，希腊人从此丧失了自己的独立，先后成为马其顿帝国和罗马帝国的领地，进入希腊化时期。虽然亚里士多德是一个

地地道道的希腊人，他的一生是学者和教师的一生，并长期生活在雅典，其社会政治观点完全不同于马其顿军事专制大国制度，但他与马其顿王朝尤其是与亚历山大的特殊关系，其命运又随马其顿王朝势力的消长而沉浮，因此不可能不影响他的思想发展，使其思想学说矛盾重重。

作为古雅典最后的而且是最伟大的一位思想家、科学家和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留下的著作和思想虽然由于动乱等种种原因不如柏拉图的那样完整，但也是足够丰富的。他的著作号称有千卷之多，实际也只留存下了 162 卷，（纸草卷）。依其研究对象可分为：第一，逻辑学著作：主要有《范畴篇》、《解释篇》、《分析前篇》、《分析后篇》、《论题篇》、《辩谬篇》。这些逻辑学著作在拜占庭时代被汇合起来称为《工具篇》。第二，自然哲学、自然科学著作：主要有《物理学》、《论天》、《论产生和毁灭》、《气象学》、《动物学》、《动物分类学》、《动物的起源》等等。第三，心理学著作：主要有《论灵魂》、《自然短论》等。第四，哲学著作：主要是亚里士多德在不同时期的讲演汇编而成的《形而上学》，又叫《物理学后诸篇》，共 14 卷。第五，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著作：包括《尼各马可伦理学》（十卷，由亚里士多德儿子尼各马可在他死后编辑而成）、《犹德穆伦理学》、《大伦理学》、《政治学》、《雅典政制》等。第六，美学著作：包括《修辞学》、《诗论》等。

（一）“第一哲学”

“第一哲学”即所谓“形而上学”，是关于宇宙本体的学说。它是亚里士多德全部知识体系的基础。亚里士多德在总

结古希腊哲学、科学的基础上，通过对知识领域多方面的探索和研究，认为各门科学依其目的和研究对象的不同可分为：逻辑学，它是求知的工具，因此也可称之为“分析法”；理论科学，它是以求知本身为目的的科学；实践科学，这是探求行为标准的知识，如政治学、伦理学；实用科学，它是寻找制作有实用价值的东西和艺术价值的东西的知识。其中理论科学又可分为3种：物理学、数学和“第一哲学。”物理学研究那些独立存在且变动的东西；数学研究那些非独立存在但不变动的东西；“第一哲学”研究的是既独立存在又永不变动的东西，即宇宙本体或实体。他说：“第一哲学专门研究‘有’(或译为“存在”)本身，以及‘有’凭本性具有的各种属性”；① 它“考察作为‘有’的‘有’，以及‘有’作为‘有’而具有的属性”。② 可见，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第一哲学就是专门研究“有”作为“有”的一种学问。而“实体”正是“有”的中心，因而也是第一哲学的核心。“实体是什么”这个问题，也就是“‘有’是什么”的问题。所以他说：“那根本的、非其他意义的、纯粹的‘有’，必定是实体。”③

那么，什么是实体呢？亚里士多德认为，实体的基本含义是：它是一切东西的主体或基质、基础。也就是说，实体是客观独立存在的，它不依赖于任何其它的东西。但是，在什么东西才算是实体的问题上，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前后并不一致，从而产生了3种不同的理解：个别事物的实体论，形

---

①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122页。

② 《古希腊罗马哲学》，第240页。

③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125页。

式实体论，神实体论。

实体：个别事物。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指出，能作为实体东西的，是个别的事物，因为惟有个别的事物才能满足实体所具备的“不表述主体”，“不存在于一个主体里面”，“变中的不变”的特征。他说“实体就其最真正的、第一性的、最确切的意义而言，乃是那不可以用来述说一个主体、又不存在于一个主体里面的东西。”① “同一个实体，当它保护着自己的同一性的时候，都同时能够容受相反的性质。”② 因此，实体的属性虽然是可变的，但实体本身是不变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实体有第一实体和第二实体之分。所谓第一实体仅指客观存在的个别事物或某个个体，第二实体则指个别事物所属的种或属。其中第一实体是最根本的实体，因此它是其它九范畴（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遭受）和第二实体的基础。

实体：形式。由于柏拉图的理念和个别事物是相分离的，造成了理念论无法说明事物的存在和运动变化。依据这一事实，亚里士多德认为，要说明事物的存在，必须在现实事物的内部寻找原因。通过总结古希腊哲学已有的研究成果，他提出：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存在都不过出自四个原因：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

所谓质料因就是事物的“初始基质”，即构成每一具体事物的原始质料，它是“构成了一个物件而本身继续存在着的东西”；③ 形式因是指事物的结构、比例和模型，也就是

---

① 《古希腊罗马哲学》，第309页。

② 《古希腊罗马哲学》第315页。

③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133页。

事物根据什么而形成；动力因是指使一定的质料取得一定形式结构的力量，即引起一具体事物的变化者、创造者或“变化或停止的来源”；目的因就是指一具体事物为了什么而形成，或者说它的产生是为了什么目的。以房屋这一具体事物的形成为例：砖瓦木石是质料因，房屋 的结构是形式因，建筑人员是动力因，房屋的用途是目的因。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只有四因说才能全面把握事物的原因。

亚里士多德在指出具体事物形成的四因后，进一步认为，这四因可归为二因：质料因和形式因。他提出了形式质料说。他认为，动力因和目的因都可归之于形式因，因为形式因是指事物的本质、结构，而目的因就是事物的本质的实现，是形式的体现和实现，因此，目的也就是形式。动力因是指事物的变化的原因，而事物之所以变化，就是由于它趋向一种目的，向着一定的目标而努力，为一定的目的而生存。所以，亚里士多德得出结论：“那个‘是什么’和‘所追求的东西’是同一个东西，而运动的来源与这些东西也是同类的。”① 在形式和质料的关系中，亚里士多德认为，质料是无规定性的、消极的和被动的，形式则是积极的、能动的。正是由于积极的、能动的形式去规范了质料，个别事物才得以形成。因此，形式是决定事物“是什么”即本质的东西。

实体：神。亚里士多德认为，从运动和变化的角度考察质料和形式，两者的关系是潜能和现实的关系。潜能是尚未实现的现实，现实是实现了的潜能，事物的运动就是由潜能的存在向现实的生存的转化。但是，由于作为质料的潜能是

①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 137 页。

被动的、消极的、待规定的，而作为现实的形式既是动力因，又是目的因，因此，不是潜能先于现实，而是现实从根本上先于潜能。所以，低级的事物虽然实现了它自身，走到了它的目的，但是相对于更高一级的东西来说，这个目的本身还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它还会进一步追求更高一级的形式或目的。如此推论下去，必定有一个最终的目的或形式，这个目的或形式本身是永恒不动的，但却是引起运动变化的根源，即它是"第一推动者"，也就是神。而"神是一个至善而永生的实体"。

（二）物理学

物理学即自然哲学，是关于客观自然界事物的运动变化的学说。在这一个学说中，亚里士多德阐发了他对物质运动和宇宙的看法。

亚里士多德认为，物质运动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他说："运动是永恒的，不能在一个时候存在，在另一时候不曾存在。"① 他用运动和时间的不可分离性来证明运动的存在。在他看来，时间是运动的表现，是运动的度量。他指出："如果时间是运动的数目，或者本身就是一种运动。那么，如果永远有时间。运动也就必定是永恒的。"② 运动有四种形式：事物本质的变化，性质的变化，数量的变化和位置的变化。自然是运动和变化的本原，是内在的变化的冲动力，凡是具有这样一种根源的东西，就具有一种自然。显

① 《古希腊罗马哲学》，第280页。
② 《古希腊罗马哲学》，第279页。

然，这里的“自然是指形成事物的目的因。从目的论出发，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自然归宿”说。他认为，按照事物运动的目的，重物总是自然向下运动，以地心为“自然归宿”，轻物总是自然向上运动以天穹为“自然归宿”，反之，便是违反了自然的“强迫运动”。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把宇宙分成了两大部分，月球以上的天体属于“月上区”，它由神圣的元素“以太”构成，是一种永生不灭的神圣存在并作完美的圆圈运动。而月球以下的自然物属于“月下区”，其万物无一不是有生有灭并作不完美的直线运动。他从而将统一的物质世界人为地分割为神圣的天上和物质的地下两个世界，得出上帝是在有限的宇宙之外的结论。这是无所限制的神秘主义宇宙观结论。

（三）灵魂学说

与第一哲学、自然哲学密切相关的是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学说。他在论述灵魂的性质过程中阐发了他的认识论理论。

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是“自然有机体最初的现实”，[①]“是潜在的具有生命的自然物体的形式，在这种意义上，它不能不是一种实体”。[②] 因此，肉体是构成生命个体的质料，是潜在的生命体，而灵魂是构成生命个体的形式，是现实的生命体。整个生物之所以分为植物、动物、人类三个不同等级，就在于它们各自的机能不同。人类灵魂除了具有营养和生殖、感觉和运动的机能外，还具有思维的机能。人的灵魂

① 亚里士多德：《论灵魂》，转译自 J·A·smith 英译本。

② 亚里士多德：《论灵魂》，转译自 J·A·smith 英译本。

中的理性思维部分是人的本质，惟有它才能使人同其他一切生物区分开来。

亚里士多德认为，感觉灵魂是肉体感官的功能，因为“在一种感官受了强烈的刺激后，我们就不大能像以前那样运用这个感官，例如听到了一个巨响之后，我们就不能立刻顺利地听到别的声音，看到太明亮的颜色或闻到太浓烈的气味之后，我们就不能立刻看或闻；……理由就在于感觉的机能是依赖于身体的”，① 感觉还是对外物的反映，要感觉，就必须有可感觉的东西。正是由于具有感觉能力的感官像一块白板一样，上面没有任何先天而来的痕迹，在外物的直接作用下，才产生了感觉。他说：“‘感官’是指这样一种东西，它能够撇开事物的质料而接纳其可感觉的形式。这正像一块蜡接纳图章的印迹而撇开它是铁或金子。”② 这就是亚里士多德著名的“蜡块说”。

亚里士多德指出，理性思维与感觉有本质的不同，它既不像感觉那样有相应的物质器官可以脱离肉体而存在，也不像感性那样以个别为其认识对象，而是以一般作为其认识对象。因此，理性认识的方式就是内在的、间接的和自主的。理性有被动理性和能动理性之分。被动理性依赖于感性，因为“没有任何事物脱离和外在于可感的有形物体而存在，因此，思维的对象是在可感形式之中的……所以，没有感觉，就不能认知或理解任何东西”。③ 能动理性则是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并以自身为对象的思维认识活动，它与被动理性的

① 《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51页。

②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149页。

③ 亚里士多德：《论灵魂》。

关系是形式和质料、现实与潜能的关系。潜在的思维之所以能转为现实的思维的根本原因，不是客观事物及对它的感性认识，而是能动理性对被动理性的作用。

（四）逻辑学

亚里士多德是公认的欧洲形式逻辑学的奠基者。他首次把人的思维方式系统化和形式化。其逻辑学思维主要体现在《工具论》中。《范畴篇》中，他讨论了范畴、名词和谓词的分类，认为范畴是命题的主项和谓项，范畴可分为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和遭受等十类；命题就是判断；确定了三段论的演绎推理，提出了公理系统的证明方法，详细论证了矛盾律和排中律等思维规律。因此，尽管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受时代限制还有不少缺陷，但是，仅就现行的形式逻辑各个主要部分他几乎都讨论过这一点而言，他无疑是做了奠基性工作。他是当之无愧的逻辑学之父。

（五）政治学和伦理学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伦理学是关于人的行为的实践科学。

亚里士多德十分重视对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对国家的起源、本质和形式等问题都进行过有益的探索。他认为，人类自产生之初，便有家庭，因为人的生殖本能和共同保全的本能必然使男女结合、主奴结合从而形成家庭这种团体。若干家庭又结合成村社，由村社组成国家或城邦。由于人天生

就是政治动物，人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以单独的个人存在，总是存在于一定的家庭、部落和国家之中。因此在时间上，国家起源于家庭。但是，从目的和性质上看，国家并不是家庭和村社的机械总和，而要高于个人、家庭和村社。所以，国家是本质，是根本。政治是最高的东西，政治权力是最优越的权力。在这一基础上，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中等阶级"执政的政体。他提出，在任何一个国家中，根据财富的多寡，公民可以分为三等：十分贫穷的阶层，十分富有的阶层，属于这两者之间的阶层。根据中庸之道的伦理原则，居中者最善，因此，应由他们执政。他说："既然已经认为居中适度是最好的，所以很显然，拥有适度的财产是最好的；因为，在那种生活状况中，人们最容易遵循合理的原则。所以很显然，最好的政治社会是由中等阶级的公民组成的。"①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伦理学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如果说政治学讨论人如何组织成为社会国家，那么，伦理学则讨论人按什么规范行动。他认为，人所有行为就是为了追求善和至善。善就是美德。作为政治动物的人的美德就是行德，因为人的美德和人的激情有关，而激情和由激情所引起的行动都有过多、不足和中间的情况，其中过多和不足都是不好的，只有中间才是最好的，才是美德。因此，人们应当选择一条中庸之道。由于适中是相对的，它会受到时间、地点、条件等的制约，因人因环境的差异而有所变化，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所以，掌握中庸之道就只能靠人们的"实践智慧"，并在实践活动中不断探索，才可以找出分寸来，由习惯而成自然。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指出，行德还不能使人达到

---

①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157—158页。

最高的幸福，因为人还有理性灵魂，所以还必须有理性智慧的美德即知德。所谓知德就是离开人的行为的沉思，为求知而求知，为研究学术而研究学术的纯思辩活动。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活动不以自身之外的任何目的为目的，因而它是所有美德活动中最纯粹、最愉快的活动，也是人的最高幸福和神圣生活。显然，亚里士多德所追求的这种生活不是一般的人（自由人和奴隶）能够享有的。

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不但对西方哲学史和思想史的发展，而且对欧洲的科学文化的发展都产生过巨大的作用。由于他留给了后人一个庞大的、复杂的、具有内在矛盾的思想体系，因此，具有不同思想观点的人都从这个体系中去寻找其理论依据。既有他的学生和学者继承和发扬他的唯物主义思想，不断推进科学研究；也有人利用他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糟粕。特别是中世纪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正统经院哲学的理论依据完全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在当代，西方学术界仍相当重视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研究，至今，还有许多专门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学术团体和发表研究其成果的期刊。亚里士多德不愧为西方古典哲学的灯塔。

四　继续发展中的科学文化

城邦的危机，使希腊古典后期的科学文化发生了一些变化。但由于作为经济基础的奴隶制经济继续发展，因而古典科学文化并没有随着城邦的衰落而衰落，相反，仍有创新和发展。

(一) 自然科学

天文学方面，欧多克索（公元前408—前355年）把观察天象与研究几何学结合起来，第一个建立了宇宙的几何模型。这是一个以地球为中心的壳层球模型，其中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日、月五大行星和恒星分别附着在一些同心透明球形壳层之上，围绕地球而转。仅依靠这个模型来说明行星的不规则运动以及日、月运行视运动的变化是很不够的，于是，欧多克索又把他的模型构想成一个极为复杂的运动系统。他为每一个行星设计了四个同心球，为日、月各设计了三个同心球，加上恒星的一个同心球，使模型的同心球达到27个。他煞费苦心地设计了行星、恒星和日、月运动的情况，力求使其与实际观测相符合。然而，这个模型虽然能够解释日月食等一些天体现象，但仍不能成功地解释行星和日月永久运动的变化。尽管这个模型是不很成功的，但它作为最先研究宇宙几何模型的成果，对后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亚里士多德和他的朋友卡利浦（公元前370）继承了欧多克索的工作，他们用增加同心球数量的办法，以达到模型和实际观测相符合。卡利浦把同心球增至34个，亚里士多德则增加到55个。同心球数量越多，模型越复杂，但结果仍不令人满意。这方面更深入的探索和研究还将期待后人向前推进。

古典晚期在数学上也有发展。柏拉图虽在数学上没有做出具体的成果，但他却十分重视数学。柏拉图重视研究数学的目的不是以实用为目的，而是寻求一种思维中的完美，因而他特别注重数学中的证明方法。由于他们的努力工作，数

学中的分析法、归谬法等推理方法逐步严密和完善起来。柏拉图以后，古希腊的数学的理论化程度更加高了。欧多克索在古代天文学上贡献突出，但他更大的成就在数学上，他解决了当时数学中的一些矛盾和难题，取得了许多新的成果。首先，他定义了量的比例关系，以此解决量的问题。从此，自毕达哥拉斯以来的几何和数的简单而直接的联系被分开了，古希腊的数学也更加偏重于几何学。其次欧多克索在智者派安提丰把圆看成是无穷多边的正多边形的研究基础上，完成了计算曲边形面积和曲面体体积的方法。这一贡献的意义在于推进了穷竭法的研究，穷竭法中孕育和萌芽着微积分的思想。欧多克索的学生美尼克漠在数学上的成就是发现了圆锥曲线，他选取项角分别为直角、锐角和钝角的三种圆锥，分别以一垂直于锥面中一母线的平面与之分割，从而得到了抛物线、椭圆和双曲线。尽管这一发现才是此项研究的开端，但是对几何学、天文学和物理学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物理学方面，古希腊人很早就对世界的物理现象进行过精彩的议论和认真的研究，从米利都派到毕达哥拉斯学派再到恩培多克勒和德谟克利特，对物理世界的认识和研究逐步加深。到古典晚期，真正认真研究物理现象的是亚里士多德，他写了世界上最早的物理学专著——《物理学》，其中力学问题是亚里士多德着重研究的问题。在他看来，月亮以下的世界的物体都处在重者向下轻者向上的自然运动状态，要改变这种状态必须有外力，当外力消失时，物体立即恢复其自然状态。亚里士多德反对虚空论。他认为物体是在某种介质中运动的。物体的运动与作用于其上的力成正比而与它所受到的阻力成反比。为什么一个被抛物体在离开抛物者后

仍能继续运动一段距离呢？亚里士多德说，当物刚离开抛物者那一时刻，由于它向前的冲力而把部分介质排开，这样就在物体后面形成一个虚空，周围的介质很快就填满了这个虚空。这些介质又对物体形成一个向前的推动力，使得物体继续向前。而当物体运动中所受到的阻力和推力相等时，它的运动就停止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没有科学实验的基础，与实际也不相符合，因而其结论也不尽正确。尽管如此，他在对机械运动的思考、假设和分析中，仍对科学发展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古典后期，亚里士多德在生物学方面贡献也是很大的。他的著作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关于生物学的，现存下来的也有不少。如果说他的物理学还缺乏实验依据的话，那么，他在研究生物学时做了大量的观察和解剖实验。他把组成生物体的各个器官叫做生物体的质料，认为这些仅仅是一种潜能，只有灵魂才能赋予它们以形式，从而使它们成为现实的生物体。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又是生物体动力因和目的因。灵魂是有层次的，最高层次是能够推理的推理者的灵魂，只有人才具有。亚里士多德对许多生物的器官及其功能做过认真的观察、研究，积累了大量的材料。他的著作中记载了大约500种动物，他至少解剖过其中的50种。对动物进行分类是亚里士多德对生物学的最主要的贡献。他的分类方法共有8种，其中以动物形态、胚胎和解剖学上的差异进行的分类叫做“级进分类”，它基本上是按照从低等动物到高等动物的次序进行排列的。亚里士多德还注意到等级间的连续性，把整个生物界都看做是一个延续的系列，其中每一个等级都有微小的差异和变化。在古代那样的条件下，能够对于自然界纷繁复杂的生物进行系统观察和研究的，只有亚里士多德

那样博学的人才能做到，尽管他在许多方面的认识和理论上有差错。亚里士多德死后，他的学生狄奥弗拉斯特继续他的研究工作。狄奥弗拉斯特着重研究植物学，他以植物的基干和枝条的形态作标准，对植物进行了分类，并对植物的地理分布和植物生态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这些成果对生物科学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二）文学和史学

希腊古典后期在文学方面的突出特点是修辞和演讲。随着城邦民主政治的发展，公民需要在各种集会上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修辞演讲就成为公民们十分重视的学问。在修辞演讲十分盛行的时期，雅典出现了两位著名的修辞学家和宣传家，这就是伊索克拉底和德漠斯提尼。伊索克拉底是亲马其顿派的代表，他在论说过程中非常注重演说的技巧，十分强调演说中要有广博而深刻的知识内容。他还创办了修辞学校，培养了一大批才智出众的演说家。他注重修辞学和演说散文的写作，在著作中对字词音调都很讲究，作品经过千锤百炼，形成既华丽流畅又庄重高雅的独特风格。他写的《全希腊盛会献词》和《泛雅典娜节献词》，用了几年乃至十年功夫进行推敲斟酌，达到十分完美的程度，以至亚里士多德在其《修辞学》中多次引用他著作中的例句。

反马其顿派领袖德漠斯提尼的演讲风格着重于情绪激昂和逻辑严密。他是一位十分注重学习和锻炼的人，既广泛阅读书籍，吸取书本知识，又向名演员学习朗读技巧，然后刻苦磨炼。据说他经常口含石子面对惊涛骇浪大声朗诵，因而他的演说很有千军万马奔腾、神州风云激荡之势。德漠斯提

尼也很注重演讲内容，每次演讲都经过精心准备，甚至逐字逐句斟酌推敲，不即兴发言。他的政论演说被西方学术界尊为楷模，对以后的西方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一时期出现了色诺芬那样博学多才的史学家。色诺芬于公元前 430 年出生于雅典一个富豪之家，很早就受过贵族式教育，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学识、阅历很丰富，除史学外，在军事学、经济学、哲学、政治学、教育学等方面都有研究。色诺芬在政治上反对雅典民主制，推崇斯巴达那样的军国主义政体。他曾站在僭主立场上，反对民主派。僭主政治失败后，色诺芬便参加了希腊雇佣军，前往波斯帮助小居鲁士争夺王位。然而，小居鲁士在巴比伦附近一次作战中被杀，失去雇主的希腊军顿时军心涣散，面临被消灭的危险。色诺芬被推举为将军，率领部队由巴比伦绕道北上，经小亚黑海沿岸辗转千里而退回希腊。这在西方历史上，是一次著名的远征。色诺芬退回希腊后并未回雅典，而是投靠斯巴达那里去了。雅典公民大会判处他终身放逐。于是色诺芬只得浪迹斯巴达、科林斯等地，直至公元前 350 年去世，再没有涉足雅典。

色诺芬的主要著作是《希腊史》，它记述了公元前 411 年到公元前 363 年的史事。但色诺芬的这部史著，无论在哪一方都无法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相比，他缺乏修昔底德那种对历史事件及人物活动的严肃而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态度，文章写得也不通俗。但人们可以从他的书中看到，当时希腊各邦是怎样长期争战，而又互相削弱的。色诺芬的《远征记》是一部军事冒险活动的回忆录，主要记载希腊雇佣军失去了雇主被迫撤退后，历尽苦难，辗转千里重返希腊的故事。《远征记》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因而流传甚广。

除此而外，色诺芬还写了政治著作《居鲁士的教育》、《斯巴达政体论》、回忆录《回忆苏格拉底》、语录体著作《经济论》以及晚年的作品《论税收》等。公元前5世纪末到前4世纪初希腊的历史史料，主要靠色诺芬的记载流传下来。

公元前4世纪，希腊还有两位著名的史学家，一位是爱乎罗士，著有《希腊全史》，这是一部通史体历史著作，在当时具有创新意义；另一位是提奥庞普士，著有《希腊史》和《腓力王传》。

（三）美学理论

柏拉图以前的古希腊美学是和艺术、哲学及奴隶主民主制同时发展起来的。可以这么说，在整个希腊美学这座大厦里，艺术是建成大厦的材料，哲学是支柱，奴隶主民主制则是大厦的基础。柏拉图以前的美学思想主要由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和苏格拉底的美学观点构成的。毕达哥拉斯可称为古希腊第一个美学家，他认为美就是和谐。现实世界中，凡是具有一定和谐关系的一切事物都是美的。这个关于美的本质的概括，是那时人们审美与艺术活动的成果，表明当时人们的艺术鉴赏力、想像力和创造力水平达到了较高的水平。随着社会发展，现实中那些动荡不定的事件把人们心目中那些和谐和理想冲散了，特别是建立在矛盾冲突基础上的悲剧极大地震撼着人们的心灵，于是和谐不再吸引人们。许多人希望看到神界或人间的矛盾冲突，感受冲突在人们灵魂中激起的剧烈震荡。赫拉克利特的美学思想就是人们这种审美观念的反映。赫拉克利特的美学思想是建立在他的哲学思想的基础上的。在他看来，和谐虽然是美的重要

特征，但不是美的根源，真正的美来自事物对立面的斗争。世界上一切都处在矛盾运动过程之中，没有永恒的绝对的和谐，只有暂时的相对的和谐。和谐不仅产生于事物同一，而且更重要的是产生对立面的斗争。赫拉克利特这一观点，是朴素辩证法在美学中的出色运用，以至列宁高度赞扬他的思想“非常正确而且重要：‘他物’是自己的他物，是向自己的对立面的发展”。[①] 赫拉克利特的美学思想是动荡的社会生活的反映。赫拉克利特的美学思想固然是重要的，但它仍然是贫乏的范畴，需要深化和充实，以赋予具体生动的内容。那时候的艺术，在表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方面，把人当做艺术的真正主题。于是，以人为中心的美学思想产生了，德谟克利特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从理论上总结和反映当时审美观点和艺术实践上的成果是德谟克利特在美学上的贡献。从根本上说，他的美学成就就是“小宇宙”的发现。从审美客体上说，小宇宙就是人的内心世界，即性格、德行、灵魂；从审美主体上说，小宇宙又是热情、灵魂等修养。德谟克利特的这一成果开拓了美学研究的新课题，对后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美学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小宇宙的发现预示着一种新的社会思潮的出现，这种思潮在西方通称为人本主义。它引起了人们在认识论、方法论方面的深入思考，在艺术上也出现了程式化与定型化、装饰化和享乐化等主观化倾向。这时候，苏格拉底从他的哲学思想出发，认为真善美就建立在精神的普遍性上，无须在主观世界中去寻找什么真善美。在他看来，艺术应该是思维的艺术，应该表现人的灵魂，而不必去繁饰一切。对于人来说，

---

① 列宁：《哲学笔记》，第288页。

应勤于劳动，养成勤劳朴素的本性。真正的美是有用的、能带来效益的东西，那些游手好闲、好逸恶劳无所事事的人，即使外表打扮得花枝招展，光彩夺目，也谈不上美。尽管苏格拉底这些观点有他的片面性，但它突出了审美活动中的主观因素、社会因素、内在因素和理性因素，这又是积极的、正确的。

简单地回顾了柏拉图以前古希腊美学的状况，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古典晚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位大思想家的美学理论。

柏拉图是一位政治家，他的哲学和美学都是以政治为出发点的。他从政治走向哲学，又由政治、哲学走向美学。柏拉图从小酷爱文学、喜欢写诗，后来在许多对话中，都表现出他有较高的文学及审美素养。他的美学思想主要表现在：在美的本质上，坚持理式论。这些理论的主要观点在于：美的本质不在于自然事物，而在于“理式”（和谐、智慧、至美、至善等）。由于理式的参与，才形成事物的美；理式具有层次性，美有等级性。“至善至美”是最高的理式，最低级的理式只能微弱地看出某种事物的美。还有介于二者之间的美，如心灵美、制度美等。美的本体是绝对的美，客观存在的是美最完全的体现。美的本体和善的本体是一致的，因此至美就是至善。在审美过程中，柏拉图坚持“回忆说”。在他看来，回忆既是认识形式，也是审美形式。真正的审美必须凭借于心灵，通过回忆或者联想，才能实现。柏拉图把摹仿看作艺术的特征。在他的艺术理论中，艺术就是摹仿。他的摹仿论是建立在回忆的基础上的。柏拉图认为，艺术要透过自然表面现象，去接近真、善、美的本体；艺术家应同时是哲学家，具有哲学家那种敏锐的观察力和分析力；应当

把艺术看作人类超脱于自然、并丰富和发展人的理性的途径。在艺术创作的源泉上，柏拉图认为艺术创作的冲动不是来自别处，而是来自于灵感。灵感论肯定了作为一种独立的精神现象的艺术以及艺术现象所具有的独特的形式，强调了激情与想像在艺术创作品中的作用。灵感论是柏拉图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从灵感论出发，第一次对艺术的创作过程作出描述，给激情与想像以崇高的地位，这对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亚里士多德在批判柏拉图唯心主义美学的基础上，对美学进行了更加深入详尽的研究，在希腊乃至西方美学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第一，在美的本质和根源上，亚里士多德认为，美存在于自然的与人工的事物本身。人的审美观念、艺术的创造乃至人本身，都与自然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美的发展，是随同自然的不断进化而变化的。亚里士多德把美的相对性与自然的进化结合起来，从自然进化的程度来说明自然美的现象。在他看来，自然进化程度以及现象越高就越美，人的审美活动与其感觉、思维、想像以及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因此，人的审美情趣与自然进化的进程是完全一致的。亚里士多德还认为，美与善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种统一现象在事物的生成与创造过程中。这表明，善和美是一个运动的过程，我们必须从运动中去认识和把握美。

第二，亚里士多德丰富和发展了古希腊的美感学说。亚里士多德从灵魂论即有关心理结构和功能及快感论两个方面否定了柏拉图的回忆说，在美感理论方面提出了一些新颖而富有独创性的思想。他认真分析了人的感觉知觉和回忆等方面的性质与特征，充分肯定和强调了理性在认识过程中的作

用，把求知作为审美和艺术活动的心理基础。在这里，理性实际上是指人的思维。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对于美，人们不仅在感觉着、回忆着，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思维着。人们只有在思维的时候，才能接受真正的审美快感。同时，亚里士多德全面考察了快感的心理因素，揭示了理性与欲念之间的关系。他把理性看作灵魂的准则，而欲念则是它的天然的伴侣和随从。欲念又是人的天性，快感是一种目的，一种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进行审美活动的人不仅是理性的人，而且是包含各种丰富的心理因素的人。因而审美既是理性范畴的事，也是情感、意志范畴的事。审美活动与人的认识活动和伦理活动是密切相关的。不仅如此，亚里士多德还对快感的本质作了说明。在他看来，人的最大的快感是“自我觉识”，是从审美对象中看到自己的理性、道理、智慧、才能等。因此，人不仅能感受到美，鉴赏美，而且能够创造美。真正的审美感应属于那些以自己的善与美不断创造着的实践家。这些思想，在希腊美学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三，亚里士多德深刻地指出了艺术的本质。他认为艺术理论中的核心范畴是“创造”，这是艺术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最基本的思想和本质。这种“创造论”实质上是一种认识论。因为创造的过程，主要是一个认识过程。这种关于艺术创造的思想与他的美学理论是有机统一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起源于求知、向善、爱美的本性，人的本性决定了人在真、善、美的进化系列中居于天体以下的最高层。人不仅能在认识中得到精神上的满足，而且能够自觉地参与到大自然的创造活动中，按自己的美的理想去创造出自然界所没有的对象。由于美是理性的源生物，理性又是鉴别美的根本手段；又由于显露出理性光辉的东西才是美、美的东西，使

理性得到快慰的感受才是美的感受，因而艺术的根本任务就是用真理去指导人们进行创造。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把艺术同哲学、科学等置于同等地位的原因。

除此以外，亚里士多德还阐述了他关于悲剧与史诗的理论，从理论上确立了史诗与悲剧的历史地位，阐述了悲剧性这一重要范畴，形成了以情节为中心的创作理论。这些理论不仅是对古希腊的艺术实践的高度总结，而且是对他自己的美学思想作了充分发挥。亚里士多德还深刻地论述了音乐的社会功能，其中许多重要思想是耐人寻味的。他的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也在对这些问题分析论述中不断深化和发展。

（四）建筑和艺术

古典后期的希腊建筑和艺术也有较大的发展。除了继承并发展传统的古典形式以外，还在艺术特别是建筑方面，解决了一些全新的课题。

在建筑方面，一般是以柱式体系的原则为标准的。从性质上说，这些建筑古迹和古典盛期的作品有着本质区别。这一时期在建筑上发展最广泛的是建筑剧场、角力场、体育场、大会堂等。在纪念性建筑里，出现了用来表彰个别人物的建筑场。特别是在小亚一带，当地统治者雇请希腊建筑艺术家，着力创造一种融汇希腊和东方特色的宏伟建筑。公元前4世纪中期，哈利卡尔纳苏斯为总督莫索鲁斯建造的陵墓，就属于这种建筑。它是在希腊柱廊之上修筑金字塔式顶层结构，又请著名雕塑家斯科巴斯等人精心制作许多雕像，使整个建筑显得异常宏伟富丽，动人心魄。这一建筑被列入世界七大奇迹之一。保存下来的为个人所建造的建筑物中，

最引人入胜的是建于公元前334年的雅典李西克拉特的合唱队纪念碑。整个建筑的特征是精美与潇洒有机结合，规模与比例高度和谐。它的产生，是与具有社会的民主主义艺术基础的城市国家风格的建筑紧密相关的。此外，还有在伯罗奔尼撒重建的女战神雅典娜的神殿，建于公元前4世纪中叶的阿斯克列庇亚圣堂建筑群和在奥林比亚建立的腓力纪念堂等，都表现出古典后期希腊建筑艺术发展的新趋势，预示着希腊艺术开始超越城邦规模发展，为日后希腊化艺术奠定了基础和准备了条件。

古典后期的雕塑艺术也有新的发展。虽然这一时期的雕塑作品在艺术风格上和前一阶段有明显区别，但传统表现手法并不是截然而止。和古典盛期的雕塑作品相比较，这时作品在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上的特点主要是：在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基础上，更注重人物情感和情绪特征如愤怒、悲痛、绝望等的刻画；在艺术风格和流派上，既有激昂悲壮的喧染，又有温柔细腻的描绘，使艺术形式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在题材内容上既有用艺术形象来表现抽象的，如自由女神、和平女神等，又有更多地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尽管在希腊各地有许多的优秀的艺术流派，但雅典仍然是希腊的艺术中心。普拉克西特是当时雅典最负盛名的雕刻大师，他的作品能给人一种深思冥想而娴雅柔和的女性美。《赫尔美斯与狄奥尼索斯》和《奈达斯的阿芙罗底特》等作品，充分体现了这种艺术特征。由于他的大胆创新精神，因而使其作品具有一种清新的旋律感和隽永的情调，如同一曲舒畅人心的抒情诗，给人以轻松愉快的审美享受。与普拉克西特齐名的雕塑艺术家还有史柯巴斯和列西普斯等，前者的作品以悲壮激奋风格见长，后者创作丰富，题材广泛，魄力雄厚，善于刻画

人体动作。

在公元前4世纪的艺术发展中，绘画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尼克斯是公元前4世纪中叶最杰出的画家，普拉克西特非常推崇他。柔和的层次渲染，鲜明而细致的色彩对比，突出的外形塑造，是以尼克斯为代表的艺术家们广泛采用的表现手法。此外，还有著名美术家阿贝列斯，他是古典后期最著名的肖像画师，在绘画技巧上，表现出高度的完整性。到了公元前4世纪最后的三分之一时期，实用美术继续繁荣起来。不仅瓶钵形式更为复杂了，而且瓶钵表面上的图案越来越精细。那时，给瓶钵外表上突起的好似浮雕一样的画面涂上颜色的做法，也广泛流行。

第六章 东西方文明交融的希腊化时代



- 世界文明史上崭新的一页
- 三个哲学流派
- 繁荣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术研究中心

从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东侵远征，到公元前30年埃及被罗马帝国完全吞并的300多年，希腊以及希腊统治的东方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史称希腊化时代。所谓希腊化，主要是指希腊文明随着希腊统治的扩张而传播到东方各地，东方被希腊化了①。这一时代最显著的特点，是古代希腊的文明与古代东方各国的文明交流融合而孕育出更为普遍和发展的文明成果。反映城邦危机时期希腊人世界观的变化、东方文明和自然科学对哲学影响而产生的新的哲学流派、极为兴盛的学术研究及其成果，构成了这一时代文明的主要特色。

一　世界文明史上崭新的一页

公元前336年，希腊各邦已完全处于被征服的地位。正当马其顿王腓力招兵买马，加强备战，准备东侵亚洲发动大规模战争的时候，他却在女儿结婚的宴会上遇刺身亡。腓力被刺杀后，希腊各邦认为反抗马其顿的时机已到，以雅典、底比斯为首的各城邦高举义旗，起义烽火燃遍希腊大地。马

① 事实上，在这一传播过程中，希腊文明也接受了东方的影响，可以说到了东方的希腊人也东方化了。但这一称谓近百年来一直在史学界普遍沿用，因而本章仍沿用这一概念。

其顿形势十分危急。在这种危难时刻，腓力之子亚历山大继位。这是一位血气方刚、无所畏惧、年仅 20 岁的年轻人。他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其父腓力为了培养自己的接班人，让他自幼接受希腊文化熏陶，曾聘当时希腊最渊博的大学问家亚里士多德做宫廷教师。亚历山大 16 岁起随父征战，协助父亲指挥部队，积累了一定的作战经验。他对荷马史诗醉心不已，经常以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人物自居，养成了马其顿王族蛮悍专横的气质，成为一个颇有才能而又野心勃勃，妄图征服天下的人物。腓力的死无疑给亚历山大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的绝妙机会。希腊各邦掀起反马其顿叛乱不久，亚历山大迅速率领其父王留给他的那支精良部队镇压希腊各邦的反抗和叛乱。他以极其残暴的手法镇压了底比斯，将其城邦付之一炬，夷为平地，把三万居民卖为奴隶。他以这种暴横残酷的镇压，企图使他统治下的希腊各邦惴惴战栗，服从其指挥。

亚历山大镇压了希腊各邦反抗，率领马其顿和希腊各邦联军，开始了世界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亚历山大东侵远征。

公元前 334 年春天，马其顿远征军渡过赫勒斯滂海峡进入小亚细亚，并在格拉尼库河畔与波斯军首次交战，结果波斯军大败。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战役的胜利，为马其顿及希腊各邦联军进入整个小亚地区开辟了道路。亚历山大很快占领了小亚各地，不久和大流士三世在叙利亚交战。公元前 333 年 11 月，亚历山大与波斯军战于叙利亚北部的伊苏斯湾。大流士三世亲自帅领 40 万波斯大军督战，他自恃兵重将多，企图一战而胜。然而，亚历山大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以排山倒海之力，率其精锐骑兵部队浮过河流直扑波斯军中锋猛打猛攻。马其顿和希腊步兵乘势追击，打得波斯军落花流

水。大流士三世见势不妙，弃阵而逃，波斯军看到主帅动摇遁逃，更加士气不振，无心再战，全军迅速溃退。大流士三世出征时带到军中的母后妻女及宫廷内的皇亲国戚全部被俘。战役结束后，亚历山大拒绝了大流士三世乞和的要求，继续引兵南下，征服了腓尼基的一些海港城市。在腓尼基最大的商业中心推罗，人们奋起抵抗，但最终寡不敌众，城市失守落陷。推罗城被毁，许多人被杀，三万居民被卖为奴隶。公元前332年冬，亚历山大经过苏伊士地峡侵入埃及，未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领了那块肥沃的土地。他在那里采取怀柔政策，表示支持和保护神庙，利用埃及人的宗教信仰，拢络阿蒙神庙等的祭司阶层维系其统治。他征用埃及大量人力物力，在尼罗河入海口建起一个新的海港，并以他自己的名子命名为亚历山大里亚城。此后，这个海港城市发展很快，建城50年后，亚历山大城拥有30万居民，是地中海区域人口最密集的城市。基督教纪元开始时，它已拥有100万人口。居住城内的主要有埃及人、波斯人、马其顿人、希腊人、犹太人、叙利亚人及阿拉伯人。亚历山大城不仅是埃及最大的商埠，而且成为地中海地区商业和文化中心。来自地中海、非洲东部、阿拉伯及印度等地的货物在各个市场交易流通。被吸引到这座世界性中心城市的还有诗人、哲学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等。亚历山大城发展之快，影响之大，以至今天仍是埃及最大的港口。次年春天，亚历山大率军继续东侵，经巴勒斯坦、腓尼基进入两河流域。当年9月，在亚述古都尼尼微近郊的高加米拉原野上，他以巧妙的阵势和精湛的战术，击溃了大流士三世率领的号称可使敌人“血肉横飞”、“无往不胜”的波斯大军。接着，亚历山大又率部进入巴比伦，占领了苏撒和帕赛波里斯两个都城，夺取了王宫和

金库。联军将士大发横财，个个金银满怀，而那座象征古代东方文明的帕赛波里斯王宫却被点火焚烧了几天几夜。金碧辉煌、豪华壮丽的宫殿就这样消失了。

这时，狼狈逃窜的大流士三世已众叛亲离，濒临绝境，不久就被巴克特里亚（后被我国人称为大夏）总督贝苏斯刺杀。贝苏斯自立为王，被亚历山大擒获，以弑君罪将其处死。从此亚历山大便以波斯帝国的合法继承人自居了。这位野心勃勃的君王继续东侵，进入中亚地区，遭到当地人的抵抗。他在那里停留了近3年。公元前327年春，亚历山大侵入印度河流域上游地区。当他准备引兵恒河流域，向印度腹地深入，妄图吞并富饶丰腴的整个印度时，他的军队已疲惫不堪，许多士兵鼓噪不进，纷纷举行集会，酝酿哗变。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亚历山大被迫下令退兵回师，分水陆两路西归。在亚历山大看来，未来帝国的中心应在两河，而不在希腊，巴比伦应是帝国首部。这两支部队于公元前324年初会师于巴比伦，准备以此为亚历山大帝国的都城。至此，声威浩大的亚历山大远征宣告结束。

为了巩固和发展对东方各国的统治，亚历山大力图把东西方文明熔为一体。他在各占领区，建起大小不等的城市，让马其顿及希腊人和东方人在那里杂居。据说亚历山大行军时常带着荷马史诗，并且注意在东方各地采集标本，再送回希腊供他的老师亚里士多德研究。为了更加深入地促进东西方融合，他提倡和鼓动马其顿和希腊人与东方人通婚，以此为东西方人更加紧密地融合提供一条牢不可破的纽带。他自己在远征巴克特里亚时曾娶当地之女罗克珊娜为皇后，后来又与大流士三世的女儿巴西尼结婚。他的将士效法其主与波斯显贵的女儿和民间妇女结婚的大约有一万余人，并且举行

了史无前例、盛况空前的集体婚礼。但波斯帝国原来固有的矛盾和亚历山大迅速建立起来的帝国的新矛盾，并不因这种东西方融合和广泛的联姻而消失，东西方人的矛盾日益加剧。亚历山大也因染上恶性疟疾，于公元前323年大病不起，死于巴比伦，时年33岁。他所建立的那个帝国也如流星，转瞬即逝了。东西方融合的局面被一系列希腊化国家组成的希腊化世界所取代了。

亚历山大远征所开创的局面，标志着希腊及希腊统治下的东方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希腊化时代。这一时代最突出的特点是古代东方文明与希腊文明的交流融合而孕育出更为发展、更富特色的文化。亚历山大远征所建立的统治区域，西起希腊、马其顿，东至印度河流域，南临利比亚、埃及，北界高加索和中亚，形成一个比波斯帝国更为辽阔的疆域。这个庞大的帝国虽然不久就分裂为许多希腊化国家，但希腊文明却始终在这里延续、发展，从而揭开世界文明史上崭新的一页。这些文明不仅在文化上，而且表现在政治和经济上，在西方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在经济上，亚历山大远征形成了欧亚非三洲一体化的希腊化世界，为东西方商业贸易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广阔的希腊化世界，打破了原有的界限，使希腊与东方各国以及东方各地之间的贸易更为密切。在这种情况下，东西方贸易达到空前未有的水平，同时为更广泛的世界贸易创造了有利条件。特别是以希腊化世界为中心，向东西方向的拓展和辐射。在西面，与意大利、法国、西班牙以及整个西欧、中欧相联，形成以希腊化为中心的地中海经济贸易圈。在东面，主要是建立远东、近东与欧洲的经济贸易往来，其中丝绸之路是一条最重要的商贸之路。当年亚历山大远征时，在中亚

方面已到达帕米尔高原西麓，离中国不远了。那时中国正处“战国时代”。中国人与希腊人之间没有什么联系和往来，甚至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尽管丝绸之路是在亚历山大远征后两百年才以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而正式建立，但希腊化时代形成的由中亚经伊朗和两河流域再到叙利亚及埃及的商贸网点，却为它在西部奠定了基础和准备了条件。东西方贸易往来的日益扩展和生产技术的不断交流，大大促进了希腊化时代奴隶制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希腊化的东方各国在原来经济结构基础上，吸取了希腊人大量使用奴隶、注重商品生产的奴隶制经济模式，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城市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和贸易的发展，使亚历山大的希腊化东方各国君主改变了宫廷和国库贮藏巨额金银的传统习惯，而把它铸成货币以利在贸易中流通，这对国家金融管理走向科学化，促进货币流通，繁荣经济贸易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仅如此，亚历山大远征和以后希腊各国的大规模争战为奴隶市场提供了丰富的奴隶来源，不仅奴隶的数量剧增，而且价格低廉，奴隶买卖盛行以至形成较大规模的国际奴隶市场。这些事实足以表明，亚历山大远征对世界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

在政治上，亚历山大远征使希腊和东方体制相互影响，形成了一些新的特点。由于亚历山大及其后继者在统治政策上照搬东方体制，因而使希腊的马其顿王国变成了和埃及等相类似的君主国家。在希腊化时期的希腊马其顿地区，城邦政治被君主政治所取代。原属东方文明的国家和地区，在希腊化时代的政治特征上也增添了一些希腊国家的因素。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在承袭古代法老传统中，吸收了希腊城邦政治中建立自治城市的做法。据说亚历山大在东方各地建立的城

市共有 70 多座，经考证和发掘核定的就有 40 多座。许多新建城市有的成为较大的工商业都市，有的作为军事要塞。这些新城，后来发展为各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少数成为历史名城。东方人大建新城的做法来自希腊传统，是殖民城邦的一大特色。新建希腊城市给东方体制中增添了希腊文明的特色，它把西方文明在政治方面的传统和成就引向东方，为希腊文明的传播和东西方文明的交融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文化上，亚历山大远征使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交汇融通结出了更加丰硕的成果。此前，希腊人学习和吸取东方文明受到一定的局限，而希腊文明虽已传入地中海东部沿岸，但尚未直接传入内陆地区，东方人要直接接触希腊文明是很不容易的。然而，亚历山大远征却为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和传播创造了条件。希腊人创造的灿烂文明随着远征军脚步声而传入西亚和中亚内陆地区。当希腊文化传入东方各国后，与当地文化结合而产生了许多新的成果。东西方文化相互吸取，推陈出新，竞相争艳，使古典文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当代的考古发掘表明，希腊哲学家的著作和悲剧早就在万里之外的亚洲腹地就被人传诵了。不仅如此，东方文明对希腊文化成就也产生了重大作用。特别是建在埃及土地上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术研究中心，使东西方文明交融发展达到了“希腊化”的高峰，其学术影响和科学成就对后来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总而言之，在希腊化时代，东方文明和希腊文明交汇融通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构成了希腊化时代文明的光辉篇章。

二　三个哲学流派

光辉灿烂的希腊哲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达到了最高的繁荣和兴盛，此后开始走向自己的暮年而逐渐衰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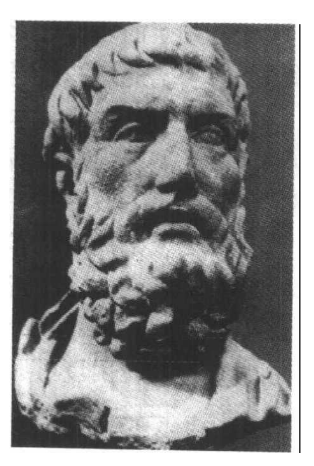
希腊化时代的希腊本土，由于马其顿的侵入，城邦奴隶制的衰落及城邦内部矛盾的加剧，使得城邦危机日益加深。城邦经济、民主政治和科学文化等已失去了往日那种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繁荣局面。作为时代精神反映的哲学，也出现了新的转折和特点。在希腊化时代，哲学家们的注意力不再集中于研究和解决自然与社会的根本问题，而集中在寻求个人幸福，寻找摆脱困境与痛苦的途径。当时出现了三个著名的哲学流派：伊壁鸠鲁派、斯多噶派和犬儒派。这些流派及其哲学家们的哲学思想，充分反映了城邦危机阶段希腊古典世界观的变化以及东方文明和科学成果对哲学的影响。在他们的思想中，人生哲学和社会伦理、神秘主义和怀疑主义、苦闷和失望及对快乐和幸福的憧憬与追求，成了他们哲学体系的中心或根本，而以往哲学中的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只被当做伦理学的基础、工具或手段。这一切都表现出奴隶主阶级走向腐朽没落时期的思想情绪。不过，在这些流派的哲学家中，也不乏真知卓见和对以往哲学的丰富与发展。

（一）伊壁鸠鲁派

伊壁鸠鲁（公元前 341—前 270）是希腊化时代杰出的

唯物主义哲学家，伊壁鸠鲁学派的创始人。他高举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大旗，丰富和发展了古代原子论哲学；他反对无神论，倡导感觉论，丰富了人类的认识学说；他提倡积极的快乐主义，把避免痛苦追求幸福作为一切道德的基础，成为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典范。

伊壁鸠鲁出生在萨摩斯岛上一个乡村教师家庭。萨摩斯岛位于爱琴海东部。公元前352年雅典城邦向岛上增派大批军事殖民，伊壁鸠鲁的父亲涅俄克勒斯可能就在这一时期携妻带子从雅典随军事殖民团体来到萨摩斯岛定居。涅俄克勒斯来到萨摩斯岛后继续以教书为业，而伊壁鸠鲁的母亲则靠为人画符念咒为生。伊壁鸠鲁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对哲学等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求知欲望很高。据说他小时候在学校听老师讲解赫西阿德的《神谱》时问老师，作品中“混沌”的含义是什么？这位老师却吱吱唔唔，张口结舌。这使伊壁鸠鲁对当时照本宣科，不求甚解的教育方式大为不满。后来他自己阅读了许多哲学家的著作，又去听一些哲学家的讲座。他善于思考，敢于质疑，发现问题，抓住不放，是一个自学能力极强的青年。18岁那年，伊壁鸠鲁按照雅典城邦法规去雅典接受了两年的军事训练。在那里，他多次去雅典学园听克塞诺克拉提讲哲学课，这使他对柏拉图等人的哲学思想有了深刻的理解。军事



伊壁鸠鲁

训练结束后，他和家人在小亚细亚的科罗封过了一段安静的生活，这使他有充足的时间系统地学习和研究前人的哲学思想，开始思考和逐渐形成他自己的哲学观点和思想体系。公元前 310 年起，他在小亚细亚各城市传授自己的哲学学说，并开始辗转办学。他希望哲学能够成为医治人们精神创伤的“良药”，用哲学教育的手段来武装人民，振奋民族精神。伊壁鸠鲁的思想和观点很快吸引了许多人，不少人投奔他，想做他的学生。公元前 306 年，他终于到雅典定居，自置花园，办起一所富有特色的学校，人们称之为“伊壁鸠鲁花园”。他广收门徒，学生中有男有女，也有奴隶，实为希腊教育的大创举。在那里，他打起了“伊壁鸠鲁学派”的旗号，建立了自己哲学传播发展的大本营。伊壁鸠鲁在这所学校里授课著说，形成自己独特的哲学思想体系，直至公元前 270 年去世。

伊壁鸠鲁著述甚丰，是一位多产学者。据说他一生写了 300 余部作品，但几乎全部失传，只留下一些格言片断和几封书信。伊壁鸠鲁的哲学思想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他对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丰富和发展，对后来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连马克思在大学毕业时所写的博士论文，也以《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为题目。伊壁鸠鲁还是古希腊一位杰出的启蒙思想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称赞“他是古代真正激进的启蒙者，他公开攻击古代的宗教，如果说罗马人有过无神论，那么这种无神论就是由伊壁鸠鲁奠定的”。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年版，第 147 页。

伊壁鸠鲁哲学思想体系分为三个互相联系的部分。这就是关于研究自然的学说（物理学）、关于认识方法的学说（逻辑学或论理说）和关于人的幸福和人生目的的学说（伦理学）。在这三个部分中，关于人的幸福和人生目的的伦理学说是核心，而研究自然的物理学和关于认识方法的逻辑学则是他整个思想体系和核心问题的基础，是达到目的的方法和手段。

关于原子论的自然哲学

伊壁鸠鲁继承和发展了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唯物主义思想，认为一切物体乃至整个宇宙都是由原子和虚空构成的。现实的物质世界不是由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创造的，而是现实存在的、永恒的、不可消灭的。原子内部没有空隙，是有形体的现实存在物，它的最基本的属性在于它具有不可分割性和永恒不变性。虚空为原子运动提供必备条件，是原子运动的场所。原子和虚空是构成宇宙的基本要素。由于原子在虚空中排列、组合、运动的差别，才形成了世界上形形色色复杂多变的客观事物。原子和虚空也是无限的，因而由它构成的宇宙也是无限的、没有边际的。

从表面上看，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在内容上是一致的，但仔细考究可以看出，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和前提，前者是后者的继续和发展。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虽然详尽探讨了自然界的物理现象，但它缺乏经验科学的支持，因此具有一定的缺点和局限。伊壁鸠鲁继承了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基本思想，并对其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同时修正和补充了他思想中的某些错误和缺陷，在他的整个理论体系中增添了科学成份，极大地丰富了原子论唯物主义。伊壁鸠鲁对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丰富发展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伊壁鸠鲁改正了德谟克利特把原子想像为无限大的缺陷，认为原子是由“微小的部分”组成，是不可分割的物质微粒。在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中，一方面肯定原子是不可分割的物质微粒，另一方面又说原子是有大小的，有的甚至是无限大的。伊壁鸠鲁看到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矛盾，并力图克服这种矛盾。在他看来，原子作为不可分割的物质微粒，那就不能成为看得见的东西。在自然界中“并不需要存在着各种各样大小的原子，因为这样就一定会有某些原子进到我们眼界之内，成为看得见的，但是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也不能想像一个原子如何能够变成可见的”。①

第二，伊壁鸠鲁在德谟克利特只承认原子有体积和形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原子的第三种属性即重量。在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中，只对原子的形状、次序和位置的差别进行了说明，没有涉及重量问题。伊壁鸠鲁明确提出了原子具有量的规定，这无疑是对原子论的一个丰富和发展。在他看来，物体运动是由于重量的作用，人们可以以“微小的部分”为界标，对原子的重量和体积进行测量。他认定：“原子除了形状、重量、大小以及必然伴随着形状的一切以外，并没有属于可知觉的东西的任何性质。”② 把重量与形状、体积区别开来，这对科学发展也是一个贡献。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伊壁鸠鲁“已经按照自己的方式知道原子重量和原子体积了”。③

---

① 伊壁鸠鲁：《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165页。

② 伊壁鸠鲁：《古希腊罗马哲学》，第354页。

③ 恩格斯：《反社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6—467页。

第三，伊壁鸠鲁提出了原子运动中的偏离说，为认识丰富多彩的物质世界及其形成提供了依据。在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中，原子运动的方式被描述为向各个方向的“任意移动”，是一种“急剧、凌乱的运动”。伊壁鸠鲁则认为，原子重量是原子运动的内在根源。具有重量的原子在向下运动中由内部原因而自动脱离其原来作直线运动的轨道产生倾斜而偏离出去。他说：“原子永远不断在运动，有的直线下落，有的离开正常，还有的由于冲撞而向后退。”① 这种偏离运动必然引起原子间的碰撞、组合和凝聚，从而组成了各种具体事物，构成了复杂多样、千姿百态的现实世界。伊壁鸠鲁的偏离说，不仅是对德谟克利特学说的重要补充和修正，而且是对古代原子论的重大发展。德谟克利特把原子运动的必然性绝对化，看不到物体运动中的偶然性。伊壁鸠鲁在肯定事物运动的必然性基础上，克服了这一缺陷，他看到了原子运动中的自动倾斜或偏离，为事物存在和发展中的偶然性提供了客观依据，并确立了偶然性在事物运动发展中的地位。同时，这一学说还反对了那种片面强调必然性，否认偶然性而导致的宿命论，为民主主义思想和唯物主义历史观奠定了哲学基础。可见，伊壁鸠鲁的偏离说不仅闪耀着古代朴素辩证法的光辉，而且为人们摆脱命运的束缚，追求个人幸福和自由找到了理论依据。

① 伊壁鸠鲁：《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161页。

关于认识的逻辑学。

伊壁鸠鲁坚持以原子论为基础的"影象说"，继承和发挥了德谟克利特的唯物主义反映论。他把客观事物作为认识对象，认为认识是由事物所发出的"影象"通过人们感官的孔所产生的。在他看来，事物本身会发出一种流射物，它以很快的速度给心灵造成各种各样的形象，形成了感觉和思想。伊壁鸠鲁说："我们由于心灵或感官的认识、活动而得到的每个影象，不拘是关于形状还是性质的影象，都是具体对象的形式或性质，这是由于影象不断重复或留下印象而产生的。"① 这表明，他的认识论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反映论的性质。

伊壁鸠鲁在认识论上的重要特点，在于他补充和发挥了唯物主义的感觉论。首先，他强调了感觉的客观现实性。在伊壁鸠鲁看来，德谟克利特的约定论有很大的主观色彩，他把人们对事物的冷热、苦甜和颜色等等的感觉看作主观约定的，这就违背了感觉的客观本性。他强调，我们的认识"永远要以感觉以及感触作根据，因为这样你将会获得最可靠的确信的根据"。② 由此可见，感觉在认识过程中是不能被推翻的，除了存在实在性的感觉，一切认识都不可能产生。其次，他充分肯定了感觉在认识中的作用。他说："如果你排斥一切感觉，你就连你所能指称的标准也不会剩下。这样，你就会没有可以用来判定你所责斥的错误判断的东西了。"③ 可见，他把感觉看成认识的起源和基础，看作判断和检验认

① 伊壁鸠鲁：《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163页。
② 伊壁鸠鲁：《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168页。
③ 伊壁鸠鲁：《古希腊罗马哲学》，第345—346页。

识结果的东西。伊壁鸠鲁在当时许多人抬高理性贬低感性的唯心主义盛行的时候，坚定地肯定感觉在认识中的作用，这种大无畏的科学态度和唯物主义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当然，伊壁鸠鲁也并不排斥理性的作用，他认为理性能使人们得到感觉所达不到的更精细的知识，理性能给贤哲们带来最大的福利，并使他们终身享受这些福利。[①] 但是，伊壁鸠鲁的这些认识论思想仍然有很大的缺陷甚至错误，他片面夸大感觉的作用，把感觉当成检验认识的标准的观点显然是不正确的。他虽然在肯定感觉作用的基础上，也肯定了理性的作用，但他不懂得感性和理性的辩证关系，特别是对感性的理解有很大的片面性。

关于人的幸福和人生目的的伦理学

这是伊壁鸠鲁哲学思想体系的中心问题。他从原子论宇宙观出发，用原子的运动来解释世界上一切现象，根本否认超自然的原因。他说，不能把天体的运动和旋转，日月蚀、升起、降落等自然现象看作由神决定的。把神看作是创造一切、主宰人的祸福的观点，只是虚妄的假定。他还认为，灵魂是由极细微的原子构成的。灵魂这种物质性的东西是感觉的根源和基础，一但灵魂分解了，失去了，感觉也就丧失了。这些思想，为唤醒人们从对神、对超自然的力量以及对死亡的恐惧中解放出来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于当时那些处在奴隶制衰落和危机、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社会生活动荡不定时代的人们破除迷信，摆脱宿命论，追求幸福和快乐具有积极的启蒙意义。

在此基础上，伊壁鸠鲁的全部哲学都是为了阐述论证道

① 参见伊壁鸠鲁格言残篇，《古希腊罗马哲学》，第345—346页。

德的伦理学。他说，认识人生，就是为了克服对死亡的恐惧。追求幸福，人的感觉和认识，人的本性就是为摆脱痛苦追求快乐。正如他说的："我们说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和目的，因为我们认为幸福生活是我们天生的最高的善，我们的一切取舍都从快乐出发。我们的最终目的乃是得到快乐，而以感触为标准来判断一切的善。"① 这充分表明，追求人生的快乐和幸福是人生的出发点和最高目标，是判别一切的道德准则。因此，伊壁鸠鲁的伦理学又被称为快乐主义。诚然，要达到快乐和幸福，首先要以一定的物质条件为基础。但在伊壁鸠鲁看来，人的幸福首先是心灵上、精神上的愉快，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更大的快乐。伊壁鸠鲁这样说："当我们说快乐是一个主要的善时，我们并不是指放荡者的快乐或肉体享受的快乐"，"我们所谓的快乐，是指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② 那种终日美酒佳肴，生活放荡无度的人，并不是真正幸福和愉快的。他主张把物质享受的欲望降低到最低程度，养成简单朴素的生活习惯。要特别注重精神生活的愉快，重视知识的学习和培养。增进友谊，不要爱财如命，贪得无厌。要达到身心宁静、怡然自得的人生境界。这就是人生的幸福和快乐，也是人生的根本目的。

伊壁鸠鲁的哲学很快吸引了大批听众，来"花园"求学的人纷至踏来。许多人感觉到，伊壁鸠鲁的哲学使人摆脱对神灵的恐惧，医治心灵的创伤，确实能够在精神上得到安静和快乐。往日希腊城邦人们那热爱生活，追求真理，相信自己力量的勇敢的创造精神，以及向往自由和幸福的民族精

① 伊壁鸠鲁：《古希腊罗马哲学》，第 367 页。
② 伊壁鸠鲁：《古希腊罗马哲学》，第 368 页。

神，再度恢复和振奋起来。在他的“花园”里，师生共居一室，生活非常简朴，人人以自身的行动来实践这种快乐幸福的伦理学。许多学生对于物质欲望尽量加以克制，而努力追求精神上的安宁，以达到最大的快乐和幸福。

除此以外，伊壁鸠鲁还最先提出了国家起源于人们相互间共同协定的契约。这同他的伦理思想也是一致的。人们追求自由的精神和愿望，成为社会契约论的思想萌芽。尽管这些思想在当时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对后来的哲学和政治、伦理思想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诸多的局限，他的思想仍然难以摆脱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本质。

（二）斯多噶派

与伊壁鸠鲁同时，在希腊出现了一个影响较大的哲学学派，它与伊壁鸠鲁派相对立，极力宣扬以宿命论为中心的伦理学，这个学派叫斯多噶派。

斯多噶派的创始人是塞浦路斯岛上的芝诺（约公元前336—前264）。他出身于一个富人家庭，曾随父亲从事商业活动，后来定居雅典。他阅读了赫拉克利特、色诺芬、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十分崇拜苏格拉底。后来又先后受教于犬儒派的克拉提和麦加拉派的斯提尔波以及柏拉图学园派波莱莫等人，36岁前后在雅典创立了自己的哲学学派，开始讲授哲学。他讲学的地方在卫城以北一个公共会场的画廊下，他的学派由此而得名。斯多噶是“画廊”的译音。芝诺和他的弟子们为早期的斯多噶派其后还有克利西波斯。克利西波斯把斯多噶派学说系统化，他的一些门徒把斯多噶派学说传到罗马，深为罗马帝国统治阶级所推崇。斯多

噶派写了大量著作，但早、中期著作留下来的很少，了解他们的学说，主要依据第欧根尼·拉尔修和西塞罗等人的文献记载。晚期斯多噶派的著作有许多被留了下来。从哲学的阶级属性上看，斯多噶派哲学是当时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反映，他们中的许多人经常出入宫廷，和统治阶级保持着密切来往。从哲学的内容和体系上看，以芝诺为代表的早期斯多噶派把哲学分为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关于这个体系中三个部分之间的关系，他们通过形象的比喻进行了说明。如果把哲学看作一个动物，那么逻辑学就是骨骼系统，物理学就是血和肉，伦理学则是灵魂；如果把哲学比作一个鸡蛋，那么逻辑学是蛋壳，物理学为蛋黄，伦理学则是蛋白；如果把哲学当作田地，那么物理学好比沃土和果树，逻辑学是田地周围的篱笆，而伦理学则是那无数的累累果实。[①] 由此可见，伦理学是斯多噶派哲学思想体系中最为重要的核心部分，他们的整个学说，就是为了建立一个适合奴隶主阶级进行统治的伦理道德规范。

斯多噶派的逻辑学在认识论方面主要表现在对知识的起源和真理的标准问题上。他们吸取了亚里士多德关于只有个体（某个东西）才能真实存在的思想，认为一切知识都来源于对个别事物的感觉。反过来说，感觉是一切知识的基础。斯多噶派说"知觉是在心上产生的印象，这名称是很恰当地从印章在蜡上所做的印迹借来的"。"所谓知觉，乃是来自真实对象的东西，与那个对象一致，并且是被印在心灵上，被压成一定形状的，如果它来自一个不真实的对象，就不会是

① 参见《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178—179页。

这样”。[1] 在他们看来，人的灵魂在最初时好比一张未写上字的白纸，只有在与外界接触后才形成印记，这就像蜡板接受图章的印记一样。人的认识就是这样从对个别事物的感觉、知觉，再把这些知觉积累起来形成经验知识，在这些知识基础上进行推理并在心灵上形成概念，再用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知识的来源和认识的过程。

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斯多噶派主张“真理的正当标准是具有说服力的印象，那就是说，这个印象是来自真实的对象”。“因此，确定事物的真理性的标准是一种知觉”，[2] 真实的知觉和明晰有力的印象，是判别知识真假的标准。

这些思想体现出一定的唯物主义精神，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他们的整个认识论思想有很大的缺陷，在感性知识的来源上，常常似是而非，前后矛盾，在真理标准问题上又陷入唯心主义。

斯多噶派还注重研究思维的形式，对形式逻辑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们对选言判断和假言判断等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和说明，特别是对假言判断中的简单命题和复合命题做了全面探讨，提出和分析了复合命题的不同真假情况。在逻辑学中，他们有许多唯物主义的、有价值的成份，但也有不少唯心主义的观念和思想。

物理学也就是斯多噶派的自然哲学。在这一方面的思想，主要表现在关于世界的本性和宇宙的生成问题上。首先，他们根据亚里士多德关于实体就是个体的观点，肯定一切都是有形体的物体，同时，认为，由于世界上一切物体都

---

①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179—180页。

②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180—179页。

是有形体的，因而神和灵魂也是有形体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实存在。这又走向唯心主义那里去了。可见，在世界的本性问题上，他们是把唯物义和唯心主义混杂拼凑在一起的。其次，在关于宇宙万物的产生问题上，他们仍然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一方面借助前人对世界的唯物主义解释说明自己的观点，另一方面又对其加以唯心主义的说明和发挥。斯多噶派借用了赫拉克利特“火”的思想，认为火是世界产生的原动力，在整个宇宙的形成演化过程中，火是产生万物的力量和原则。他们说，从原始的火转化为气，气又形成水，水中的重浊成分沉淀凝聚成土，清轻部分再变成气，气又转化为原始的火，火、气、水、土四种元素相混合而形成世界万物。斯多噶派认为，上帝就是原始的火，这是生成变化的源泉，它不仅使宇宙成为活生生的，而且形成有秩序的和谐的体系。因此，上帝是世界的灵魂和主宰，是万物的本原和始极。

从这种观点出发，斯多噶派又借助赫拉克利特的循环论，提出了世界轮回说。他们说，由火产生的宇宙万物，经过一段时间又被一场大火烧掉了，这时万物又复归于原始的火。再经过一个很长时间宇宙又依照原样从火中产生形成一个新世界，这个新世界再经过一场大火焚烧，而后又再生。这样循环往返，无穷反复，这就是世界形成、存在和发展的过程。按照这种世界轮回的循环论，新生世界往往重复前一个世界的事情。据此，斯多噶派又引出宿命论观点。他们把世界看成是由必然性即命运所支配的，命运是由上帝的意志决定的，因此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由上帝的意志决定的、主宰的，这就更远地走向宗教唯心主义的深渊了。

伦理学在斯多噶派哲学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是其整个

思想体系的核心。他们认为，人的本性是宇宙普遍本性的一部分，“因此，主要的善就是以一种顺从自然的方式生活，这意思就是顺从一个人自己的本性和顺从普遍的本性；不作人类的共同法律惯常禁止的事情，那共同法律与普遍万物的正确理性是同一的，而这正确的理性也就是宙斯，万物的主宰与主管”。[①] 这种明显的宿命论观点，要求人们要顺从自然，顺从本性，顺从理性。那么，如何去顺从理性呢？斯多噶派认为，世界上一切都是由必然性、命运所主宰的，这种规律也是一种理性，它也是神的意志的体现。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按照神的意志预先安排好的，任何人是逃脱不了、改变不了的，也是不可抗拒的。因此，顺从理性就是要服从这种不可改变的规律或必然性，也就是服从神的意志，服从命运。

按照这种观点，斯多噶派又引出了禁欲主义的思想倾向。在他们看来，只有理性的完善才是最大的幸福和快乐。除此之外，都是恶，都是不道德的。财富、权力、地位、健康、生命等本身并非善，而贫穷、卑贱、耻辱等也不一定为恶。然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无多大价值，应该对它们采取不动心、不介意的态度。一切有道德的人不应当去谈论关于快乐、幸福的事情，也不应听别人谈论此类事情。真正的幸福和快乐，应该是顺从理性，无条件地服从不可抗拒的命运。这些道德说教，是直接为当时奴隶主阶级统治服务的，是反动统治阶级麻醉人民、愚弄百姓的毒剂和工具。在后来罗马的斯多噶派中，这种禁欲主义和宿命论表现得更加突出。

---

① 《古希腊罗马哲学》，第375页。

（三）犬儒派

犬儒派的思想，反映了雅典和希腊的进一步没落给人造成的失望心理和愤世嫉俗的消极情绪。他们中许多人的观点和行为，充分表现出对当时雅典和希腊社会的政治感到不满和失望。这种情绪使他们认为，通晓哲理的人，只要拥有美德就是幸福。美德就是关于如何抑制自己欲望的知识。一个能自觉控制自己欲望的人就是有美德的人，否则就是无德行的人。犬儒派反对一切社会权力，傲视权贵，主张摈弃世俗的名利富贵，安贫乐道，把生活需要降到最低限度。

犬儒派的始祖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安提斯梯尼。他是雅典人，母亲是个奴隶，因而受到一些歧视。他从小从师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耿直刚毅和漠视感情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苏格拉底死后，他住在快犬健身房，经常在一个名叫“犬”的运动场里和人谈话教学。因为那是一个供穷人进行锻炼的场所，因而有了“犬儒”学派这个称谓。也有的人说，因这个学派中的人过的生活和行为方式在当时与狗无异而得名。的确，从安提斯梯尼开始就奠定了犬儒派的生活方式。他主张清心寡欲，“宁可做疯子也不追求感官的快乐”，认为生活越简单越贫困就越快乐。有人问他，应该同什么样的女人结婚，安提斯梯尼说：“要是她漂亮你别娶她，要是她丑你就报之以深深的爱。”在他看来，只要有美德，有苏格拉底那种品格力量，就有了快乐和幸福，其他什么也不必要了。

这种消极无为、玩世不恭和放荡不羁的禁欲主义思想和行为，在犬儒派的著名代表狄奥根尼斯（约公元前400—前325）那里表现得更为突出。他本身自称“犬”，人们也称他

为“犬”。他从母邦西诺卜来到雅典，拜师就学于安提斯梯尼，但他把安提斯梯尼的主张发挥到极点。他模仿动物的生活方式，蔑视人类的一切生活享受。据说他的全部家当，是一根用橄榄树干做成的棍子，一身褴褛的衣服（夜里还要当被子盖），还有一个讨饭用的口袋和一只喝水的杯子。他带着这些家当四处为家，遍地游荡。他睡在木桶里，过着以乞讨为生的极其贫困的生活，反而自得其乐，到处宣讲他的哲学学说。他的思想主张和处世态度，通过他的许多奇闻故事表现得淋漓尽致。据说，有一天狄奥根尼斯在街上晒太阳，正好亚历山大路过那里，这位大帝站在他面前说：“哲学家，你对我有什么要求？我可以满足你的一切欲望。”狄奥根尼斯瞥了这位大帝一眼，平静地说：“我所要求你的，就是你走开，不要挡住我的阳光。”这表现出他对世俗的现实生活消极和不满。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小孩子用手捧水喝，受到很大启发，从此连喝水的杯子、讨饭的碗也扔掉了。

犬儒派的思想在后期希腊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希腊各地广为流传。这种反对文明进步，以贫困和禁欲主义为最大幸福和最高快乐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后来也影响到斯多噶派哲学以及往后的基督教，实际上成了古代奴隶制没落失望的哀歌。特别是这种消极厌世的情绪，到后来发展成为虚无主义和怀疑主义。怀疑主义的创始人是皮浪（约公元前356—前275），他认为认识事物是不可能的，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都是值得怀疑的。因此，是非曲直无从判断，只有对现实漠不关心，驱除思想上的矛盾和困惑，清心寡欲，宁静灵魂，无所事事，才能达到最高的道德境界，才是最好的行为哲学。有一则生动的故事，充分表达了皮浪的处世态度。一次皮浪乘船遇到大风暴，同船上的人无不惊慌失措，而一

只猪却漠然不动，仍旧平静安稳地在那里吃食。于是，他便指着猪说，哲人就应当像它那样不动心。① 皮浪的怀疑主义哲学同样反映了希腊晚期奴隶主阶级在城邦危机中的心理特征和充满没落腐败的情绪。它同时表明，希腊古典哲学在城邦危机和没落时期陷入了不可解决的矛盾之中。希腊文明及希腊化时代文化的最积极的成就，不可能再在哲学领域中取得了。自然科学和艺术等文化的发展，将从雅典转移到一个能对其起领导作用的新天地。

三　繁荣的亚历山大里亚学术研究中心

希腊时代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各国人民及不同文化的融合和交流。希腊化城市不仅在从事商业活动的规模方面大大超过了希腊的城邦，而且在文化发展中也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最能表现希腊化时代特点的是亚历山大里亚城，它建在尼罗河的一个人海口上，是当时希腊化时代的经济文化中心。市内有居民 30 多万，是地中海地区人口最密集的城市。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被吸引到这座世界性中心城市来的还有哲学家、诗人、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亚历山大里亚成为一个十分繁荣的学术研究中心。

亚历山大里亚有一个著名的博物馆，许多学术研究机构就设在这里。博物馆属于埃及托勒密王宫的一部分，它包括一座宏伟的图书馆，供研究用的动物园和植物园，还有供学

① 参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 3 卷，第 119 页。

者们进行学术活动的报告厅、展览厅以及有关生活设施的建筑物。为了纪念阿波罗神手下管理文艺和科学的九位女神缪斯，这里又被称作“缪斯神宫”。缪斯神宫那种古代东方王室和神庙的庄严神秘气氛，被具有希腊精神的学术研究活动所打破。在这里，可以自由选题深入研究，热烈讨论，广泛交流。这种繁荣、热烈的学术研究活动受到托勒密王族的重视和支持，不仅给予大量资助，而且还以优厚待遇招贤纳粹，“引进人才”，一时间，亚历山大里亚学术研究中心精英荟粹，群贤毕至。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对当时学术研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据说藏书在50万册左右，许多已知的希腊文著作和东方典籍收藏其中。图书馆的馆长都是学识很高、成果丰厚的著名学者，在语言学、目录学等方面做了开创性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学者不仅是图书馆的管理者，而且是学术研究的组织者，在科学研究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这样良好的条件和氛围下，亚历山大里亚学术研究十分繁荣，并且带动了整个希腊化世界文化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一）自然科学

希腊的科学在希腊化时代达到了高峰。当亚历山大入侵小亚细亚地区时，一大批科学家也随之来到亚洲各地。这些科学家搜集了关于天文学、地理学、植物学、动物学等方面的大量资料，从理性上进行分析和研究，用逻辑的形式使这些知识系统化，从而形成各门科学。

在数学方面，亚历山大里亚产生了两位极富盛名的数学家。生活在亚历山大里亚城的欧几里德（约公元前330—前

275）是最早从事科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他总结了从泰勒斯到毕达哥拉斯、欧多克索及所有前人的数学研究成果，写出了重要著作《几何原本》，建立了几何学论证体系。这就是从一系列公理出发，用严密的逻辑思维推演出一系列定理，从而使整个内容形成一个完整严密的逻辑体系，成为数学和一般科学教育中的基本经典。我国明末由来华传教士利玛窦与徐光启将《几何原本》的前6卷译成中文出版，那是第一部介绍到我国来的西方科学名著。在欧几里德的努力和影响下，形成了以他为首的亚历山大里亚数学学派，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著名的数学家。阿基米德（约公元前287—前212）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一位数学家。他出生于西西里岛上叙拉古一个具有文化教养的贵族之家，早年受到良好的教育，曾在亚历山大里亚城留学多年，与那里的科学家结下了深厚友谊并保持着联系。这是一位超越了自己时代的旷世奇才，是一位令人敬佩、成果卓著的科学巨匠。他研究掌握了丰富的科学理论知识，但又非常重视把知识应用到生产及解决实际问题上去。阿基米德在数学上的主要贡献是几何学，他把古希腊数学推向了顶峰。他着力研究了球面积、体积与其外切圆柱的面积、体积之比，找到了求弓形面积、抛物线和阿基米德螺线所围面积的方式。阿基米德十分注重研究实际问题，他从埃及人用沙杜夫杠杆提水的现象中发现了杠杆原理，并发明了提水螺旋。他在当时几何学、代数学知识的基础上，制定了一些数学公式，其中最著名的是圆周率。他应用穷竭法把圆周率的计算精确到了3.1428571和3.1408451之间，尽管还不及我国公元前5世纪大数学家祖冲之所计算的圆周率（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那样精确，但在当时的欧洲已经是很精密了。总之，阿基米德继承和发扬了古希腊

数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又把数学的研究与实际应用紧密地结合起来，旨在解决生产和实践中的技术及实际问题。这在科学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后来的数学及其他领域的科学家的研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亚历山大里亚城还有一位数学家叫阿波罗尼（约公元前262—前190）。他出生在小亚半岛一个叫丕嘉的地方，一生的学术生涯主要在亚历山大里亚城。他的主要著作《圆锥曲线》被认为是古希腊最杰出的数学著作之一。阿波罗尼是第一个从同一圆锥的截面上来研究圆锥曲线的科学家。虽然欧多克索的学生美尼克谟早在百年以前就发现了这些曲线，但以一个平面按不同角度与圆锥相交，分别得到抛物线、椭圆和双曲线等各种圆锥曲线的方法，是他明确提出的。他给了圆锥曲线的定义，系统阐明了求一圆锥曲线的直径、有心圆锥曲线的中心、抛物线和有心圆锥曲线的轴的方法，以及作圆锥曲线的切线方法。他还对双曲线的渐近线和共轭双曲线及有心圆锥曲线焦点的性质等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和研究，为后来数学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天文学和地理学在希腊化时代得到了较大发展。古希腊天文学的始祖可以追溯到米利都的泰勒斯，到希腊化时代又出现了两位最著名的天文学家。公元前3世纪中期，希腊天文学家阿里斯塔克（约公元前310—前230）首创“太阳中心说”。他出生于萨摩斯岛，从小热爱天文学。他测定了太阳、地球和月球的体积大小及相互间的距离，做了大量开创工作。他认为，太阳和恒星都是不动的。不是太阳围绕地球转，而是地球和行星都绕着太阳旋转。地球绕自己的轴每日自转一周。他肯定太阳的体积要大于地球许多倍，因此必然是地球绕太阳运行，而不是相反，这就打破了古代一直流行

的地心说。这个发现比哥白尼早了一千多年，但离当时人们的观念相距太远，没有人正确地理解和支持这种科学的创见，反而认为他是亵渎上帝，他因此受到控诉。阿里斯塔克还没有来得及梦想和研究这种天体运行的模型、形成完整的科学学说，这种新的科学思想就被扼杀了。直到 1800 多年后的 16 世纪中期，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再次发现了这一科学真理（仍然受到了教会的攻击），“太阳中心说”才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在阿里斯塔克以后，希腊化时代最著名的天文学家是伊巴谷（又译作喜帕恰斯，约公元前 190—前 120）。他生于小亚细亚西北部的尼西亚城，曾长期在罗得斯岛的天文台工作，后又辗转到亚历山大里亚城从事研究工作。伊巴谷对天文学的贡献主要是：第一，发现了“岁差”（即春分点西移的现象），得出的数值是 36″（亦即 100 年差 1°）。他测定一回归年为 365.2467 日（今测得正确数值为 365.2422 日），一朔望月为 29.5306 日（今测得正确数值为 29.530589 日）。他还测得月球半径与地球半径之比为 1：3（今测得数值为 27：100）。第二，他发明创造了许多天文仪器，还按照巴比伦人的方法把圆分为 360°。三角学和经纬度的划分，也是伊巴谷的重要贡献。第三，伊巴谷在天文学上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推翻了欧多克索的同心球宇宙模型，提出了一个均轮——本轮模型。这个模型的中心是地球，他设想各天体各自沿着自己的本轮作匀速圆周运动，这些本轮的中心又沿着各自的均轮以地球为中心作匀速圆周运动。他指出了日、月、行星的本轮及其中心的运动方向和速度之间的关系。这是他长期对天象观测和精密构思的结果。他用这一模型解释天体的运动和变化。伊巴谷以地球为宇宙中心的模型和学说长期统治着西方古代天文学和欧洲人的思想，直到文艺复兴

时期才被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等科学家打破。

古希腊人随着航海事业、移民活动和后来与马其顿人一起进行东侵，已经懂得了不少地理知识。早期自然哲学家、米利都派的阿那克西曼德曾绘过《爱奥尼亚地图》。后来德赫卡泰厄斯（公元前550—前457）、德谟克利特和欧多克索也绘制过相类似的地图。赫卡泰厄斯著的《大地巡游记》一书，被认为是地理学的百科全书。他本人也被誉为“地理学之父”。欧多克索也著有《地球的描述》一书，书中记载了不少地理、地质及生物等方面的知识，内容非常丰富。这些都为后来的地理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希腊化时代，曾在亚历山大里亚城图书馆担任馆长的埃拉托色尼（公元前275—前195）是古希腊一位最博学、最伟大的地理学家。他学识渊博，文史兼通，在哲学、数学、文学、史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他一生收藏了大量文献资料，地理学是他建树最深的学科。他著有《地理学》、《对地球大小的修正》等重要著作，建立了较完备的地理学知识体系。他把地球划分为几个不同的地带，这就是围绕南、北极的两个寒带，在寒带和南北回归线之间的两个温带以及围绕赤道的热带。埃拉托色尼还根据当时已知的各地之间的距离及纬度高低绘制了古代地图。特别是他根据希腊人已具有的地理学知识，根据地球球体原理测算了有关地球地理数值，从而创立了数学地理学。特别是他在欧多克索开创的方法基础上，用自己更为巧妙精确的方法对地球的周长进行了科学测定。他根据夏至日正午在亚历山大里亚城和尼罗河中游昔恩尼（在北回归线上）两地日影的差异，用三角测量法计算出地球周长为252，000希腊里，合39，690公里，与现今测得的准确数值40，075.13公里十分接近。古代希腊人

在当时条件下取得这样高的科学成就，实在令人惊叹和敬佩！

物理学在希腊化时代以前就取得非常丰硕的成果，但亚历山大里亚城的科学家中也有更为突出的人物和成就。被誉为“力学之父”的阿基米德就是其中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他重视实践，态度严谨，发明了杠杆、滑轮、螺旋等许多器械、生产工具和武器，发现了浮力定律，杠杆原理，特别是对杠杆原理进行了严密的逻辑证明和数学表达。有一个著名的传说，反映了阿基米德发现浮力定律的过程。说是叙拉古城邦的僭主希厄洛二世定做了一顶金王冠，但有人说匠人掺了铜。怎样判定金冠是否掺了假呢？希厄洛二世就把阿基米德请来了。阿基米德百思不得其解，当场无法回答。有一天他去洗澡入浴时发现自己的身体在水中浮起，水也溢出盆沿，便悟出可用浮力原理来测出金冠是否存金。他从浴盆中站起来，高喊“我懂得了！我懂得了！”，便直奔回家。阿基米德发现，物体入水失重，其所失去的重量等于其同体积水的重量。金比铜重，相同重量的金和铜，铜的体积肯定大于金。他用比重原理，算出了那顶王冠里的金子和铜的比重。阿基米德曾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托起这地球！”这种建立在科学原理基础上的豪言壮语，对后来人启发很大。阿基米德不仅取得了卓越的科学成果，而且创造了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他注重观察和实验，精于严密的逻辑推理，不仅分析事物的现象，而且进行数学上的论证，这对后来科学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希腊化时代在医学和生物学方面也有新的成就。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希腊解剖学家赫罗菲拉斯也是一位著名的医生。他是第一个把人体动脉和静脉区别开来的人，并且对血液循

环、神经、眼睛、肝脏等器官进行过详细描述。后来，以他为首创立的赫罗菲拉斯派，在医学上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埃拉西斯特拉塔和欧德谟等著名学者，在解剖学、神经系统、骨骼系统及动脉静脉分布、微血管、胰腺和胚胎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为后来西方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希腊化时代的生物学是在亚里士多德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托勒密王朝的君主们在亚历山大里亚建立了动、植物园，集中了各种珍禽异兽，果木花卉，专供学者们实验和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学生狄奥弗拉斯特还对植物进行了分类，并对植物分布和植物生态等进行了研究，取得了许多有科学价值的史料和成果。

（二）建筑和艺术

希腊化时代的建筑，既有对传统风格的继承和发扬，又有东西方结合的创新与发展。

这一时期建筑与以往相比有许多新特点。首先，建筑风格上除了继续使用古典柱式外，广泛流行的是更加华美、更加壮丽的双重圆柱式建筑。多数情况下，采用爱奥尼亚柱式来代替严谨的陶立安柱式。但是，希腊化世界建筑的共同倾向以及新的建筑物类型的出现，使柱式建筑的性质和意义有了较大变化。比如古典时期的建筑物里，两层列柱只有神庙内部的大殿里才被采用，而到希腊化时期，它的应用就十分广泛了。同时，墙垣开始在希腊化时期的建筑物里起重要作用。其次，古典时期城市的中心建筑物主要是神庙，而到希腊化时代，神庙只不过是城市整个中心建筑物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包括行政建筑物、大会堂、图书馆、剧场、体育

馆等。建筑方面的这种变化，无疑是希腊文明进步的一个外在特征。再次，在希腊化时代，建城之风非常流行。不论是旧城改造，还是筹建新城，都吸取了希腊建筑经验，充分考虑到居民的生活需要，修建了宽阔的街道、体育运动场地、剧场、会堂、中心广场等。这一切，形成了希腊化时代城市建设的突出风格和共同模式。在许多新建城市里，可以看到庞大的建筑物，宏伟的建筑群，复杂而豪华的建筑形式，精致而更加完美的建筑技艺，宏大的城建规模与优美的设施。埃及托勒密王朝首府亚历山大里亚城，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宏伟的城市了，它的建设是古代城市建设的一个典型。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波在他的《地理志》中对其做了详细描写：整个亚历山大里亚街道纵横交错，非常便于骑马和驾车。两条阔达百英尺的宽敞大道，彼此成直角互相交错。城内有最壮丽的庙坛和王宫，约占全城面积的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在这座城市里布满了豪华的公共建筑物与神殿，其中最出色的是中央有柱廊的体育场，柱廊要比赛马场的宽大。城市中央是法院与丛林。这里还有人工造成的一块高地，如同岩石重叠的山岗一样。迂回曲折的道路通向这一块高地，从这一块高地的顶上，可以看到整个成圆形伸展开来的城市。

亚历山大里亚最著名的建筑是法洛斯岛的灯塔，被列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法洛斯灯塔建于公元前300—前280年间，整个建筑全用石料砌筑，塔高130—140米，塔顶安装了玻璃镜面，常年以燃木为炬。夜里，从百里之外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塔上的灯光。整个工程非常坚固，为了及时把火炬燃料和各类物品送上塔顶，塔上还安装了升降机械。法洛斯灯塔矗立海边近2000年，直到14世纪才因地震而塌毁。这

一庞大的建筑物代表着希腊化时代建筑的特征，是东西方工程技术的结晶。

城市建设的兴盛，促进了希腊化时代艺术的发展。雕刻艺术在这一时期有了充分的用武之地。和古典时期相比，它的主要特点是突破了过去只注重神话题材的局限，而向现实主义表现及日常生活题材发展。以往那种表现英雄气概，贯彻着慷慨激昂气氛的纪念性作品已经消失，而反映普通市民和下层群众生活的情景，表现自然景观、风土人情以及用来修饰花园与公园的装饰雕塑，大大发展起来。这些特点，在亚历山大里亚的艺术中表现得极为明显。例如具有代表性的雕刻作品《老妇人像》是表现一位老年妇女赶集归来的情景。你看她，手提篮子，背负重袋，步履艰难，疲惫不堪的样子，充分反映了当时普通百姓终生劳累，处境凄凉的状况和命运。另一个制作于希腊化时期晚期的雕像《老渔夫》则以自然主义手法表达了出身于社会底层的人物形象特征。在作品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裸体消瘦的、由于年岁已大而弯腰驼背的老年男子的形象。他半张着嘴，没有牙齿，皮肤萎缩，静脉僵化，走路步伐不稳。作品的主题表现得淋漓尽致。在风俗雕塑方面，出于公元前3世纪波厄多斯之手的青铜群像《小孩与鹅》盛誉卓著。艺术家用轻松幽默的手法表现了小孩与庞大的鹅的斗争，出色地刻划了优美的体型和动作。作品群像结构巧妙，小孩与鹅的形体比例及造型处理协调得当，富有独特的感染力。用来装饰富豪别墅及执政者庭园的园林雕塑，广泛采取了日常生活和神话的题材，它以丰富多彩的内容引人入胜。其中流行最广泛的关于阿芙罗黛蒂的神话、关于狄奥尼斯索及其伙伴们——力士、洋人、山林水泽女神的神话最受关注。

希腊化时代的绘画艺术也有较大发展。和雕塑作品一样，亚历山大里亚的绘画广泛地描写了具有田园诗风格的题材，风景画和静物画也普遍流行。同时，用彩色玻璃制做的镶嵌画，在当时也倍受关注，广泛流行。许多大型历史构图与神话构图都采用这一技术制作，这一工艺也用来刻画风俗场面和装饰纹样。此外，实用美术也以各式各样的体裁得到了广泛的发展。

除了亚历山大里亚以外，希腊化时代希腊本土各地和其他各国建筑和艺术也有很大发展。这些成就共同构成了希腊化时代建筑和艺术的重要特征。希腊化时代建筑师们所创造的经验和取得的成就，对后来人们在城市建设、建筑群设计、园林建设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时期，艺术的现实主义原则，对后来罗马，中世纪乃至现在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马克思说的，希腊的艺术和史诗，直到现在“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①

（三）文学和史学

希腊化时代仍有大量文学作品问世，但古希腊文学至此已属尾声。荷马史诗及公元前5世纪的戏剧那样的伟大作品，在这一时代再未出现过。从文学特征上看，神话和英雄传说的主题逐渐成为过往的陈迹，而让位于现实主义文学。此外，文学脱离政治、讲究词藻、对战争和社会矛盾表现冷淡。成就突出的是新喜剧、田园诗和史诗。新喜剧不谈政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4页，1972年人民出版社。

治，通过爱情故事和家庭关系反映当时社会的风土人情。戏剧情节曲折，风格雅致，但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新喜剧的主要角色是世俗人物，如鞋匠、农民、医师、药剂师、乐师、食客等，特别是以士兵、艺妓、奴隶、食客居多。新戏剧的讽刺很生动，剧中没有天神出现，演出形式上一般分为5部分，没有合唱队，中间穿插歌舞。

最著名的新戏剧作家是米南德（公元前342—前292），他出身贵族，写过一百多部喜剧，得过8次戏剧奖。他的作品只传下少数残篇，内容几乎不涉及政治。从《恨世者》残篇和《评叛》等剧的主题看，一般都在于劝善规过，提倡宽容仁慈。他善于突出人物性格的描写，着力加强戏剧冲突，语言通俗生动，讽刺幽默并佳，深受市民群众欢迎。米南德的喜剧作品经过罗马剧作家的改编，对后来欧洲喜剧特别是风俗喜剧产生了较大影响。

在田园诗创作中，主要代表人物是忒奥克里托斯（约公元前315—前250）。他的诗作留传下来的有29首，作品流露出诗人对于大自然的美所产生的强烈感情，主要描写了西西里优美的农村生活和自然风光，读来生动感人，清新可爱。

史诗方面，阿波罗尼奥斯（约公元前295—前215）的《阿尔戈船英雄记》享有盛名。这部具有荷马史诗风格的史诗记述了伊阿宋乘阿尔戈号船到黑海西岸的科尔喀斯去取金羊毛的故事。诗作富于浪漫情调，风格优美，描写动人。亚历山大里亚的诗人卡里马科斯（约公元前305—前240）在当时也颇负声誉。他作品甚丰，但往往自炫博学，浮词矫饰。卡里马科斯的诗作和倾向被称为“亚历山大里亚体”，常常被后来一些诗人所仿效。

希腊化时代的史学继承了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史学传统，在某些方面又有创新。这时的史学家们，不仅记述了希腊世界的政治、战争史，而且记述了东方国家的历史。伽利斯色尼斯写的《波斯志》，不仅记述了亚历山大用兵的方略和经过，而且记载了波斯的政治概况。在史著体例上，仍然延续了历史叙述体，也有的开辟了通史的体例。

和古典时期的史学家们相比，希腊化时代史学家们的著作有了某些创新和发展。从历史观念看，古典时期史学家们的著作中充满了希腊人与希腊族以外的被称为野蛮人之间的敌对意识，而希腊化时代的史学著作中，则表现出希腊人和野蛮人之间的合作和共同推进希腊文明发展的观点和史事。希腊化时代史学观念上另一创新和突破，是随着亚历山大东征，人们眼界的开阔，史学家头脑中的世界概念大大扩展了。希腊世界单独的历史概念，被包括亚历山大帝国的历史在内的整个世界统一的历史观念所代替。从著述的方式上看，这时的史学家不局限于以访问目击者证词为素材编写历史，而是进行编纂，即从以前史学家们的著作中摘录出相关资料，再进行考证和分析，然后根据要记载的史实和自己的史学观点进行编著。希腊化时代杰出的史学家当波里比乌斯（公元前200—前118）的著作，反映了希腊化时代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他撰写的关于罗马崛起的历史著作成为他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和前人不同的是，他力求对人类历史进行理性的思考和说明，这在他关于罗马是怎样从一个城邦发展到世界帝国的解释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第七章 罗马早期的文明



- 意大利半岛上的文明城邦
- 王政时期
- 武力扩张与罗马早期文明的发展

当希腊化文明正在地中海东部沿岸蓬勃发展的时候，一个新兴的强大国家在西方兴起了。这就是意大利半岛上的文明城邦——罗马。

罗马，从古到今始终是一个光彩夺目、震撼人心的名字。它既指一段光辉的历史，一座古代名城，更重要的是指一种文明，一种和古希腊文明不可分割的古典文化传统。罗马文明是西方文明源头上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在整个西方文明史上，它又起着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作用，对近、现代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罗马的早期文明为整个罗马文明奠定了基础。从王政时期的政治组织，到第六位国王塞维·图里乌斯的政治与社会改革，从贵族与平民的斗争到法律及其他文化成果的产生，无不凝结着早期罗马人在推动社会历史进步中的聪明智慧。

一　意大利半岛上的文明城邦

意大利是古代罗马的中心地区，从地理上看，它活像一个皮靴形的半岛。纵贯全境的亚平宁山脉由北而南，形成半岛的高大屋脊。在北部有肥沃的波河平原，涛涛的波河由西而东奔向亚得里亚海。波河平原的西北面是雄伟的阿尔卑斯山，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意大利和北方各地隔离的天然屏障。意大利半岛三面临海：它的东边是亚得里亚海，南临爱

奥尼亚海，西连第勒尼安海。与希腊半岛周围的情况相比，意大利半岛三面海域的岛屿很少，基本上是孤立存在的，给发展商业和航海业带来不便。在邈远的古代，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岛及非洲连在一起。西西里岛位于半岛南端，中经墨西哥海峡，两岸隔水相望，因而与意大利南部地区融为一体。意大利有丰富的水系资源。在北意，波河流域称为山南高卢（其西北边境的阿尔卑斯山区与欧洲相连的地区称为山北高卢），灌溉山南高卢的是波河及它的许多支流。中意地区的台伯河，成为伊达拉里亚、翁布里亚和拉丁姆的界限。在伊达拉里亚地区还有亚诺河，台伯河穿流于翁布里亚和拉丁姆之间，其下游从远古就利于航行。台伯河南岸就是著名的古罗马城，古代罗马国家正是以罗马城为中心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意大利半岛的面积比希腊半岛大得多，和希腊半岛那种被山峦和海湾分裂成许多地区的情况相比，它的地理条件很适于政治统一。半岛境内多山地，高耸在山地之上，横贯全境的亚平宁山脉驮着那原始的肋状山脊，从西北海岸弯弯曲曲延伸到东边的亚得里亚海岸，又折回到意大利底部。半岛东岸与希腊接近，但多为悬崖险滩，不宜舟楫停泊和人们出入。而南端和西岸则多有良好的港湾，交通方便，因而希腊文明的传播，最早是从南端和西岸进入意大利半岛的。意大利的气候温和，雨水充沛，加之境内河流纵横交错，平原土地肥沃，为古代农业和畜牧业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特别是南意地区土地丰腴富饶，像西西里岛地区自古就是欧洲有名的宝地粮仓。但由于半岛上良港很少，航海条件不及希腊。然而，居于地中海中部的意大利半岛，却占据和控制着整个地中海区域的战略地位，它除了便于实现半岛内的政治统一

外，一旦征服东西部地中海各国后，很容易和非洲、欧洲相连，对希腊、小亚等地实行统一和控制。

根据考古发现，远在石器时代意大利半岛上就有人类居住了。到公元前2000年初，也就是希腊人南下爱琴海区域的时候，操印欧语的诸部落从东北方向的多瑙河沿岸，循着阿尔卑斯山的一些隘口进入意大利半岛各地。其中在台伯河流域拉丁姆平原上定居下来的一些部落，称作拉丁人。拉丁姆平原气候宜人，土地肥沃，适于农业和牧业发展。由于台伯河流经这里，因而地下水量也很充足，土地灌溉条件很好。拉丁人进入拉丁姆平原后，开始从事畜牧和农耕，并且已经有了纺织、制陶和铁制工具与武器制造等技艺。在拉丁人居住的地方曾出现了一些有围墙的城寨，位于台伯河畔的罗马城就是其中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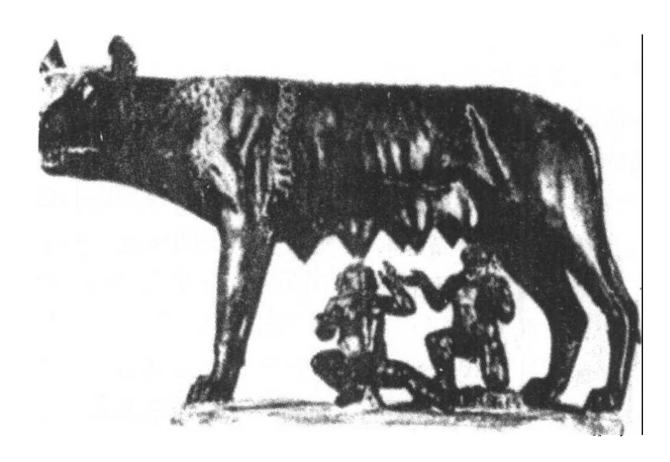
在意大利半岛，除了拉丁人外，还有别的部族。大约在公元前9世纪左右，有一支叫伊达拉里亚人的东方部族，从小亚细亚进入意大利。关于伊达拉里亚人的来源，自古以来尚未定论，但一般认为，伊达拉里亚人最早是居住在爱琴海区域的，可能在小亚细亚。他们来到意大利半岛中、北部地区，征服了当地的土著族而占据其地。地中海东部的先进文明被伊达拉里亚人带到了意大利，从而使意大利人日益开化起来。公元前6世纪，伊达拉里亚已经建立起北起波河流域，中经拉丁姆，南至坝佩尼亚的广大统治区域。这时候的伊达拉里亚人有了较高的文化，掌握了一定的生产技术。他们已经能够制造精巧的陶器和青铜器，工商业也发展繁荣起来，并且有了海军和商船队，对外贸易相当广泛，艺术文化也比较发达。从地下发掘看，这时已经形成了阶级社会，他们建立了许多城邦，筑有坚固的城垣。奴隶制度在伊达拉里

亚有了较大发展。

从公元前8世纪后半期开始，希腊人向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进行移民，并先后在这些地方建立了许多城邦，其中最主要的有邱米、他林敦和叙拉古。希腊文化便由这些地方传播到整个意大利，对罗马文明的产生有着深远的影响。

以上是罗马城邦兴起时意大利半岛上的概况，现在我们来看罗马城是怎样兴起的。关于罗马的起源和兴起，有一些美丽的传说。传统的说法认为罗马城始建于公元前753年，但近代学者考证发现，罗马建城的年代可能比这个时间要晚些。罗马城所在地，原是台伯河南岸一片丘陵地带。拉丁人按血缘关系分别居住在这些小山丘上，形成了许多小村落，后来散在各个小山丘上的小村落逐步联合起来。随着频繁的贸易往来，开通了一些南来北往的通商大道，其中有一条穿过罗马的山丘村落，它的渡口就在后来成为罗马城的附近。为了贸易的需要，也可能拉丁人出于想控制这个渡口的需要，他们便派人居住此地，这些人就和萨宾人混合建立了联盟，罗马城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这段传说，在后来又被演化为一个更为动人的神话故事。虽然这个关于罗马神圣起源的神话缺乏希腊神话那样曲折丰富和充满想像力，但这段纯朴的故事却被罗马人代代相传。据传说，很久以前，希腊联军在特洛伊战争中用木马计攻占并烧毁了特洛伊城。特洛伊王子经过母亲的帮助，辗转逃到意大利半岛的台伯河岸，开始在那里娶妻安家，治国平天下。若干年后，他的后代阿穆略篡夺了哥哥努米托的王位，并把他赶了出去，接着杀害了哥哥的儿子，只留下其惟一的女儿希尔维亚。阿穆略强迫希尔维亚去当维斯塔庙里的祭司，要求她终身守节，保持贞洁，不得婚嫁。他把希尔维



传说中喂养罗慕洛兄弟的母狼

亚关在一个孤塔中，不许和外界的人接触，谁知战神马尔斯却闯入塔中，与希尔维亚相爱并生下一对孪生子，取名罗慕洛和雷慕斯。阿穆略知道这件事后恼羞成怒，他除了百般迫害希尔维亚外，还把这对孪生兄弟装到篮子里投入波涛滚滚的台伯河。这对苦命的孩子随着河水漂游，不久漂到岸边一棵树下。一只母狼看到后跑过来用奶水养活他们。他们后来又被一位好心的牧人发现并收养起来。兄弟俩长大成人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便杀了阿穆略，并恢复了努米托的王位。这对兄弟不愿继续在当地生活，决意去开创自己的事业。他们来到当年获救的地方——台伯河畔，在母狼哺养他们之处建起一座新城，以罗慕洛的名字命名罗马。就这样，罗马城在台伯河岸建立了。

这段关于罗马起源的故事完全是虚构的。因为它表明罗马人的始祖来自特洛伊，这纯属捏造。事实上，罗马人的始祖拉丁人是在公元前 2000 年中期由北而南进入意大利的。

传统观点总认为，罗马建城的时间在公元前753年，并以此作为罗马的纪元，类推建城以来某某年。但现代考古发现和新近研究结果表明，罗马建城可能在公元前6世纪，即伊达拉里亚人统治罗马初期。从那时起，罗马才用石头筑建城墙，用砾石铺设路面，修建排水系统，并逐渐以罗马城为宗教活动和商业贸易中心。同时，传说中王政时期的7位国王中，后几位都是伊达拉里亚人，这也可以推论罗马城建于伊达拉里亚统治时期。诸多史学家一致推论：伊达拉里亚统治时期是罗马建立并走向自身发展的起始。在这一过程中，伊达拉里亚人把其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带入罗马。在伊达拉里亚人统治时期，东方文明特别是希腊文明对罗马的影响更为突出。罗马人接触希腊文化，往往是通过伊达拉里亚人传播的。像希腊字母这样的文化成果，就是通过伊达拉里亚人沿用后传入罗马，尔后又演变为拉丁字母的。不仅如此，在开通商路、发展贸易以及民主政治等方面，希腊文化都对罗马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切，都使罗马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逐步成为继希腊城邦文明以后的另一古典文明城邦和西方文明源头上又一颗灿烂的明珠。

二　王政时期

早期罗马的历史通常称作“王政时代”，它大概指公元前8世纪到6世纪这一时期（公元前753年中期到公元前509年），大约二百多年。从罗慕洛创建罗马城开始，相传先后经历了7个“王”。开国元勋罗慕洛和第三“王”为拉

丁人，第二“王”和第四“王”是萨宾人，后来的3个“王”都是伊达拉里亚人。罗马王政时期的历史多数为神话传说，直到公元前6世纪王政时代进入后期，有了文字记载，罗马才进入了有史时期。实际上，所谓王政时代，不过是罗马国家的幼儿时期。7个国王中前4个王是拉丁人和萨宾人，表明这两个部族最初可能结成了共同联盟，然后才逐渐向阶级和国家过渡。关于这两个部族还有一段著名的传说，这就是罗慕洛与部族抢劫萨宾妇女的故事。传说罗慕洛建城的时候，罗马的居民很少，为了增加城市人口，他接受了一些逃亡者和其他城邦流落到这里来的人，每次外出征战也带回大量战利品和俘虏，这样城市人口很快发展起来了。但是居民中几乎全是单身汉，妇女很少，罗马人很想从邻近部落中寻找配偶，希望把那里的姑娘娶过来。可所有邻近部落都拒绝这个要求。罗慕洛见和平求婚不成，便决定用计谋掠夺妇女。他向各邻邦宣称，罗马将举行盛大庆节，届时将举行各种竞技和游戏，邀请各邻邦参加庆节。同时，他安排手下武士到时埋伏在会场周围，待他下令后就把所有来的萨宾妇女掳为自己的妻室。节日盛况吸引了很多人，毗邻的萨宾人来的特别多，他们带着妻子儿女来观看竞技、游戏。当竞技开始，看热闹的人注意力被完全吸引时，罗慕洛发出了预定信号，埋伏在四周的罗马青年一轰而上，冲入萨宾人群中，每人抢到一个萨宾姑娘带回家去。受到侮辱的萨宾人退出会场，发誓要报仇雪恨，决不轻饶罗马人。不久，萨宾人和罗马人之间展开了残酷的战争。抢劫妇女虽然解决了罗马的一大社会问题，但却招来一场激战。双方剑来箭去，大动干戈，伤亡越来越严重。在一次大决战中，突然听到妇女们的大声嚎啕，双方将士立即停止战斗。这时，大家看到一个

萨宾妇女阻止战争

动人心弦的场面：从山岗上跑下来一群曾被罗马人抢去的萨宾妇女，她们披头散发，怀里紧紧抱着吃奶的婴儿，又哭又叫。她们奋不顾身冲进战场，以自己的血肉之躯隔开罗马人和萨宾人的刀枪，恳求自己的父亲和丈夫停止厮杀，不要把她们变成孤儿寡母。面对双方将士，罗马人是他们的丈夫，萨宾人则是自己的父兄。女人的眼泪和恳求感动了双方将士的心，他们立即停止了战斗，签订了和约，不共戴天的仇敌变成了兄弟般的亲家。从此两个部落合二而一，和睦定居在罗马城中。所以，拉丁人和萨宾人交替为王共同统治罗马也就不难理解了。此后罗马的范围不断扩大，最后在7个小山丘周围筑起一道防御工事，以利防守，所以罗马城历来有"七丘之城"的说法。这时的罗马在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上已接近奴隶制小国的条件了，但考古发现表明，它既没

有文字，也没有城垣神庙宫室等建筑，社会制度属于军事民主制。从文明产生的条件尚不完备方面来看，前4个王中拉丁人和萨宾人交替为王的时候，罗马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

罗马前4个王时期社会的基层组织是氏族。据传说：最早定居在罗马的只是一个拉丁部落，后来又有两个部落加入进来。每一个部落有10个胞族，叫做库里亚，每一个胞族又包含10个氏族，这样算下来，整个罗马共有3个部落，30个胞族（库里亚），300个氏族，他们统称“罗马人民”。“罗马人民”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过着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原始公社生活。他们内部再无拉丁族和萨宾族之分了，可见地域关系取代血缘关系而建立的联盟是那样的稳固。

古代军事民主制的政治要素在罗马初期的表现情况是这样的：公民大会、长老会议和军事首领在罗马分别叫库里亚会议、元老院和国王。库里亚会议是按库里亚（胞族）召开的民众大会，由全体成年男子参加，他们按照自己所属的库里亚聚会，并进行议事投票。库里亚会议是最高政权的代表者，它有权宣战和审判重大案件，决定或否决元老院提出的法案，选举国王以及其他高级军政要员。元老院的元老来自各族的族长，他们原是每个氏族从某个家庭中选出来的，是国王在对内或对外政事方面的顾问。元老院是由300个族长组成的，它的职能是充当国王的顾问，为库里亚会议准备议案。按说它并没有多少实权，但实际上，它却有较大的权力。每个氏族从某一家庭中选出元老的习俗成了一种惯例，这种惯例是由于财产分化所引起的，这样，在罗马就形成了氏族显贵，从而产生了贵族家族。元老院就是氏族贵族势力的代表者，因而拥有一定的特权。在国王的参与下，元老院有权批准和否决库里亚会议的决议案，有时他们包办选举国

王。在财政、外交、征兵、媾和等方面元老院也拥有决定权，这在以后的罗马形成一种传统，以至元老院的权力日益加大，凌驾于公民大会之上，成为罗马社会中最重要的政治组织机构。国王在拉丁语中称为“勒克斯”，相当于古希腊历史上的“巴赛勒斯”。国王实际就是军事首长，战时担任军事统帅，领兵征战，平时则为最高祭司和裁判官。一般情况下，国王不具有行政权，氏族部落的内部事务都由库里亚会议和氏族自行决定处理，但他仍是“罗马人民”的最高首领，在作战中有处置军事和生杀大权。国王不是世袭的，他由选举产生，并可以由群众罢免。在这一方面，古代军事民主制的遗风表现得很突出：一个老王卸世后，他的权力暂时归元老院，元老院指派一名贵族元老出任摄政，代行王权，5天后再把王权移交给另一位元老，如此轮流直至选出新王。新王的候选人一般由摄政提名，征得元老院的同意后，再由库里亚会议表决确定，新王产生后还须由元老院审查批准方为有效。

随着交换经济的发展和武力的扩张，罗马社会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氏族组织开始分化。贵族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大量土地财产据为己有，而许多氏族成员丧失了其原有的份地，不得不依赖于某个贵族，沦为地位如平民一样的“被保护民”。另一方面，武力扩张的结果，使罗马居民中加入了许多新成员，这些新成员虽不能在那种氏族组织中享有政治权，但却享有人身自由，有领得土地和从事工商业以及为罗马服兵役的权利和义务。社会现实的变化，使罗马从第五王伊达拉里亚人塔克文·普里斯库斯（又称老塔克文）夺取王位开始，才结束了原始社会末期的平民民主制，并向建立真正国家的方向发展。

从罗马建城起，罗马人就与伊达拉里亚人有了密切来往。随着生产发展和贸易联系的加强，伊达拉里亚人常来罗马经商旅居。罗马在城建、水利、工商业贸易等方面都依靠伊达拉里亚人的帮助，特别是在国际贸易方面，伊达拉里亚人几乎垄断了从古希腊等来自海外的农、工产品。移居罗马的大批伊达拉里亚贵族、商人、工匠在罗马已形成一种强大的势力，并且和罗马朝廷及贵族保持着密切联系。罗马人在对外作战和其他政治活动中遇到困难，也常向伊达拉里亚具有一定统治经验的人求援。这表明两者关系甚密。所以从第五王起，由伊达拉里亚人为王就不难理解了。老塔克文来到罗马后，取得了老王安库·马尔修斯的信任，在朝廷取得了高位。当安库·马尔修斯去世后，老塔克文力排众议，自荐为王，从而开了伊达拉里亚人在罗马为王的先河。他身后的第六王塞维·图里乌斯是他的女婿。塞维之后王位又回到塔克文家族，塔克文·苏佩布成为王政时代最后一位国王。伊达拉里亚几代人在罗马称王，标志着罗马国家的真正建立。这时候的国王在理朝主政时头戴金冠，身着紫袍，手持权杖，就座于豪华的象牙宝座之上。国王身边有手执棍棒、斧头等权标的12位侍从。国王率军征战回师，必有隆重盛大的凯旋仪式，场面极为壮观。这一切表明，罗马王权和国家在发展中日益巩固和完善。伊达拉里亚人的统治，无疑对罗马社会走向自己的发展道路奠定了基础。

伊达拉里亚人在罗马建立了真正的政治统治，同时也把伊达拉里亚的政治经济和文明带到了罗马。从考古材料看，罗马城墙、广场、神庙等的建设以及生产技术的提高，都有伊达拉里亚人的创造和劳动的迹象。至于伊达拉里亚的文化对罗马影响更大。据说第五王塔克文·普里斯库斯（老塔克

文）的母亲是伊达拉里亚的贵妇，其父则来自遥远的希腊科林斯城。如果这个传说真正属实的话，那么伊达拉里亚人对罗马在文化方面的影响就更有条件了。希腊文明传入罗马多是以伊达拉里亚人为中介的。而希腊的产品经伊达拉里亚人运往罗马，引起繁荣的贸易商潮的同时，也把希腊的政治文明传入罗马，特别是雅典民主政治对罗马影响很大。雅典梭伦改革（公元前594年）的时候，正是老塔克文为王执政的时期，他身后的塞维·图里乌斯进行的民主政治改革和塞维之后为王的、王政时代最后一位国王塔克文·苏佩布被罗马民众驱赶下台的事实表明，它们虽有深刻的社会矛盾，但希腊政治文明通过伊达拉里亚人传入罗马，对其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这两个重大事件，不仅推动了罗马历史和文明进步，而且引起了罗马社会发展的重大变革。

公元前6世纪中期，罗马社会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政治与社会改革。领导这场改革的是第六王塞维·图里乌斯，史称塞维改革。

在老塔克文为王的统治时期，罗马社会的经济已有相当发展。随着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私有财产的扩大，阶级分化日益加剧。氏族贵族依靠政治特权大量聚敛财富，而大量平民贫困破产。平民和贵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化，他们请求进行社会改革，废除贵族统治。塞维·图里乌斯因受到老塔克文的喜欢，从小被带入宫中收养，长大后被招为女婿。老塔克文死后，塞维依靠岳母帮助，登基继位，成为第六位国王。塞维极力推崇民主改革，深得民心。他强调适时应变，通过一系列改革使罗马社会摆脱危机，大大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首先，他打破原有的氏族界限，对罗马居民不分贵族和

平民，一律按财产多寡分为5个等级。第一等级的财产为100000阿司，第二等级为75000阿司，第三、四、五等级分别为50000、25000、11000阿司。[①] 第五等级以下的贫民为无产者，不列等级。那时，在军团组织中，战士的地位也决定于财产状况。第一等级中最有钱的公民在骑兵中服务，被称为“骑士”。这一级中的其他成员应当有步兵的全套重装，包括头盔、铠甲、盾牌、护腿、矛剑等，这些人位于军团的前列。其他各等级依照自己的地位而拥有较轻的武装，在军团中处于后排位置。不列等级的人们是不能服役的。根据等级的划分和社会需要，规定了每一等级服兵役的人数。那时的军队以每100人为一个军事单位，叫做百人队。每个等级出百人队的数量不是按人口多少而是按财力能负担军事装备的比例计算。第一等级贵族组成80个步兵百人队，18个骑兵百人队，共98个。第二、三、四等级各组成20个百人队，第五等级有30个百人队，还有工匠艺人百人队2个，乐师号手百人队2个，再加上一个贫民无产者的百人队共计95个百人队。在百人队大会上，每一个队只能有一票表决权。我们不难看出，这样的安排完全是出于贵族阶级专政的需要。因为在193个百人队中，只要有97票就可以占居多数，而第一等级贵族就独占了98票，其他等级共有95票，永远也占不了多数。这在表面上看是民主合理的，实质上是为贵族阶级保护自身利益、实行稳固的政治统治提供了合法

---

① 见李维《罗马史》第1卷，第42——43页。阿司是罗马最早的基本货币单位，一种纯铜币，约重0.3359公斤。李维和其他古典专家著述中用阿司作计财单位，可能出自后人的折算，因为阿司这种货币单位在公元前4世纪才使用，赛维时代不可能用阿司作计财单位。

的保证。

其次，他创设百人队大会。这个以服兵役的5个等级的公民组成的大会，取代了库里亚会议。原来由库里亚会议决定的一些重大问题，如选举官吏、审判要案、宣布战争等，现在都由百人队大会来决定。大会以军号召集，会址设在城外马尔斯田野的战神操场上。大会投票的方式很奇特，它以列队呼叫表示赞同或反对。每个百人队以多数票为决定意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大会议案由大会召集人提供，塞维执政时期是国王，后来废除王权建立共和国时，一般由国家最高行政官执政官担任，有时军事长官也可充任召集人。如前所述，由于第一等级贵族在百人队大会中占绝对优势，因而他们的一致性意见就代表了百人队大会的意志，其他公民的权利实际上已被剥夺。又由于第一等级实际上被元老院的元老们所控制，他们对这些人的决策产生极大影响，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百人队大会也是元老院及其元老们利益和意志的反映。

第三，他用按地域建立的部落取代以血缘关系组成的氏族部落。以前的三个部落的氏族组织遭到了破坏，罗马居民按照地域划分为四个地区部落，不管原来属于哪个部落，只要现在居住在该地区部落，经过登记便可以确认其公民资格。每个新建地区部落都设立了行政管理机构，用以处理公民登记、征兵征税和各种摊派等事务。按地域来划分居民，是真正的国家产生的重要标志之一，对罗马社会进步无疑起了积极作用。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这样，在罗马也是在所谓王政被废除之前，以个人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古代社会制度就已经被破坏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新的、以地区划分和财产差别为基础的真正的国家制度。公共权力在这里体现在服

兵役的公民身上，它不仅被用来反对奴隶，而且被用来反对不许服兵役和不许有武装的所谓无产者。”①

塞维改革的意义是深远的。他表明真正的国家完全形成，第一等级占有明显优越，广大平民获得了公民权。罗马氏族制度的破坏和国家的产生，是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取得胜利的结果。这场划时代的改革，使氏族贵族受到打击，新的等级按财产而不按家世出身确定，富有的平民被提到与原来氏族贵族平起平坐的地位，而又和普通平民、无产者区分开来。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到，新建立的国家权力成为保护有产阶级并对无产者和奴隶进行统治的工具了。

塞维改革使罗马居民经受了初步的民主洗礼，激发了广大公民的民主政治意识。这场社会政治改革不仅没有巩固王权，反而从根本上动摇了王权，为罗马走向民主共和的政治道路铺平了道路。公元前509年，当王政时代最后一个王塔克文·苏佩布专横跋扈、暴虐无道、激起人民无比愤怒时，罗马人高举义旗，坚决反对暴君霸主。他们顽强反抗，推翻了塔克文·苏佩布的暴政，从而结束了王政时代，建立了罗马共和国。从此，平民们用神圣的民主权利，坚持顽强的斗争，创造出与希腊文明齐名的罗马古典文明。

①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6页。

三　武力扩张与罗马早期文明的发展

这里说的罗马早期文明，是指早期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文明。它在公元前509年塔克文·苏佩布被逐和百人队大会选出两名贵族执政官到公元前146年罗马征服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几百年里，创造着灿烂的文明。

（一）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开创了罗马民主进程的新篇章

早期罗马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王政时期的结束。贵族执掌政权后，使平民与贵族界限更为分明。贵族内部通行联姻，平民与贵族不得通婚。塞维改革虽然大大推进了罗马历史上的民主进程，但却未从根本上打破元老贵族与普通公民的界限。共和建立后，贵族当权，不仅没有把塞维改革显示出的民主化倾向向前推进，反而使贵族特权更加强化，非贵族阶层的普通公民统统被划为平民。从贵族中推选出来的两名执政官，虽有指挥军队、召集元老院会议和百人队大会的权利，但实质上这些真正的权力被元老院贵族们所把持。元老院不仅有权控制财政，决定法案和政策，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监督和操纵着执政官，没有他们的允许，执政官很难行使职权。在元老院贵族统治下，平民无权参与土地的分配和使用，许多人失地破产，贵族却拥有许多土地。失去土地的平

民为了生存，只得以身抵押借债，大批贫苦大众沦为债务奴隶，平民与贵族之间的矛盾与日俱增。

压迫愈深，反抗愈大。经过塞维改革中民主精神熏陶和政治斗争锻炼的广大公民，已经富有一定的政治斗争经验。加之许多人在工商业活动中接触到希腊人，受到雅典民主政治的影响，再看看那些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被奴役的平民，更加坚定了与贵族的斗争决心和意志。发生于公元前494年的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使贵族阶级惊恐不已。在罗马人与埃魁人和沃尔斯奇人的战争中，许多平民出征作战，有的立了战功，但由于债务缠身而倍受折磨。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平民们高举义旗，奋起反抗，坚决抵制再次出征的命令，并离开罗马聚结到罗马城东北边的阿芬迪山上，声明要脱离罗马另立新邦。面对平民们的集体抗议，贵族们顿时惊惶失措，立即派人与平民谈判，答应平民的要求，并每年从平民中选出两名保民官，以保护平民不受贵族侵犯。保民官没有行政权，但根据当时的法律，可以保护平民不受非法迫害。保民官可以行使否决权。后来又设置了两名平民市政官，充当保民官的助手。后来保民官的人数又有增加，他们常在各地巡回，收集平民的申诉，监督和纠正贵族官员的不法行为。他们可以召集平民集会，这种会议称为平民大会，按部落单位组织平民参加。平民拥有投票权，不仅可以推选自己的官员如保民官等，还可以审理侵犯平民利益的案件。尽管元老院的贵族千方百计限制平民大会的影响，否认它的权限，但它毕竟表明：平民通过斗争已经有了自己的代言人和政治机构，在对贵族的斗争中有了自己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了。

平民对贵族的斗争不断取得胜利，他们越来越懂得用法

来保护自己。罗马共和国初期没有成文法，只有习惯法。习惯法的规范非常含糊，而且解释权和司法权的行使完全归于贵族，贵族常常利用习惯法为自己谋利益，这也成为贵族压迫平民的一个重要手段。平民们纷纷要求制定成文法。开始，贵族极力反对，经过长期斗争，贵族无法继续坚持。据传说，当时派遣了一个3人组成的委员会到希腊去学习和考察希腊的立法，特别是梭伦的法律。两年后返回，建立了一个由贵族组成的十人委员会，并赋予广泛的权力。经过一年的工作，编出了10个法表，公布在罗马广场上让大家见识见识，再提交百人队大会审议批准。平民们不满意法律条文中的内容，便于公元前450年改组了十人委员会，这次选出的成员不仅有贵族，而且有平民，各占一半。他们又制定了两表条文，作为对前者的补充。由于全部条文是镌刻在十二块铜牌上的，因而被称为“十二铜表法”。这是罗马第一部成文法典，它体现了平民反对贵族斗争的巨大胜利，是罗马历史上民主政治的重要里程碑，同时也是后世罗马法典和欧洲法律的重要渊源。但就实质上说，它们仍是为了保护贵族奴隶主的统治。法典明确规定维护私有制度和债权者的利益，未给平民带来直接好处。但法典有了明确的条文，量刑定罪有了统一标准，贵族不能像对待习惯法那样任意曲解，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贵族的专横和舞弊行为，保护了平民的利益。

此后，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仍在继续。公元前445年，根据保民官卡努尤斯法案，废除了平民不得与贵族通婚的陋习陈规，从法律上确立了平民与贵族在血缘关系上的平等地位。然而，平民担任执政官，土地和债务等尖锐问题仍未解决。贵族不但霸占现有的大量土地，而且对外战争掠夺来的

土地也被他们占有；同时，平民的债务问题越来越突出，与贵族的矛盾和斗争越来越大。根据卡努尤斯法案的另一提议，平民也有当选执政官的权利，贵族不肯，但提出了折衷方案：这就是停选执政官，设立军政官（又称军事保民官），贵族和平民均可当选。军政官行使执政官的职权，但任职期满后不能进入元老院。军政官初为3人，后又增至6人（又有4人之说），但贵族仍占多数，平民担任军政官的很少。为了稳固贵族统治，弥补在设立军政官问题上的损失，贵族们又增设了一种只有贵族才能当选的监察官，以拼命维护和最大限度地保持执政官的那些权利。监察官设立两位，主要职权是编制财产表，掌管国家财务，补充元老院元老和开除元老，监督社会风俗等等。平民们对贵族这些花招十分反感，反抗斗争风起云涌，而贵族则百般阻挠。公元前376年，斗争达到了顶点。这时，担任保民官的盖约·李锡尼和鲁西乌·塞克西图针对平民与贵族斗争中涉及的土地、债务、政权问题，提出了3个重要法案。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平民所负的债务一律停止付息。已付的债息作为偿还本金计算，剩余未偿的本金3年内分期还清。这实际上等于取消了长期债务，因为当时债务人已付的债款利息，大多数等于甚至超过本金了。

第二，全体公民都有权占有和使用公地，但占有的数额最高不得超过500犹格。

第三，宣布取消军政官，恢复执政官制度，在每年选出的两名执政官中必须有1名平民充任。

李锡尼、塞克西图法案触及到平民与贵族斗争的3个要害问题上。它提出以后，贵族极力反对和破坏，而广大平民则热烈拥护，并把它作为斗争的纲领和目标。面对贵族的阻

挠和破坏，李锡尼、塞克西图领导广大平民坚持了10年的长期斗争，10年中他们一直被平民们选为保民官。他们每年都提出这项法案。经过激烈的斗争，直至公元前367年，全部法案才获通过。塞克西图当选为第一任平民执政官。李锡尼、塞克西图法案对推动罗马文明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力地调整了罗马平民与贵族的关系，扩大了“罗马人民”的范围，解决了长期困扰平民的土地和债务问题，特别是在触及到平民与贵族斗争的焦点即政权问题上，取得了胜利。平民作为执政官，第一次跻身于最高权势者的行列，这简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它标志着罗马民主政治斗争的又一巨大胜利，对罗马历史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这一斗争的胜利，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不断取得新成果。公元前326年，在平民的强大压力下，又通过了波提利阿法案，禁止人身抵押，废除债务奴役制。史家李维这样写道：“对于罗马平民来说，这一年（公元前326年）仿佛是自由的新的开始，因为债务奴役制被取消了……执政官受命向人民提出，除去真正的罪犯以外，当他们还未受到正式惩罚以前，不应当把他们套上枷锁；用来保护债务的应当是债务人的财产，而不是他们的身体。这样一来，被奴役的人便获得了释放，而在将来的时候也被禁止奴役债务人。”①公元前287年，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又起高潮。在罗马还有一种按地域部落组成的会议，叫特里布斯会议，它由平民参加，决议也只对平民有效。出身于平民的独裁官霍腾西阿颁布新的法案，规定特里布斯会议成为全体公民参加的会议，

① 李维：《罗马史》。转引自科瓦略夫著《古代罗马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19页——120页。

会的决议也不必经过元老院的批准，可对全体公民产生法律效力。这一法案，使平民会议变为具有完全立法权的机构。通常认为，罗马共和国早期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至此结束。

平民与贵族的斗争经历了两个多世纪，平民最终在政治、经济、法律上取得了与贵族平等的地位，并开始享有完全的公民权。这标志着古代罗马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个新阶段的首要标志，是旧的氏族制度被"炸毁"，平民不仅能与贵族通婚，而且具有充任各种官职的权利。正如恩格斯指出："在罗马，氏族社会变成了闭关自守的贵族，贵族的四周则是人数众多的、站在这一社会之外的没有权利只有义务的平民；平民的胜利炸毁了旧的氏族制度，并在它的废墟上面建立了国家，而氏族贵族和平民不久便完全溶化在国家中了。"① 但是，平民的斗争成果在一定意义上仍有局限性。比如说，在土地、债务问题上，只是暂时缓解了矛盾，而未从根本上解决。平民的负债或破产在一定条件下仍然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政治权利上，虽然平民可以担任国家公职，但这对广大贫苦平民来说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由于早期罗马官职是没有薪饷的，普通贫民是难以问津的，只有富有的平民才能跻身于上层统治集团。这些人担任高职进入统治集团，卸任后可以成为元老院元老，他们还以通婚方式与原贵族融合，共同把持共和国统治大权。这样，进入统治阶层的富有平民和原有的贵族就形成一个新的统治阶层，称为"新贵"。新贵阶层的产生，初步平息了罗马国家内部动荡，巩固了罗马的公民政治，大大推进了塞

①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5页。

维改革以来的民主化进程。不仅如此，在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中，罗马的国家机构也逐步完善。国家主要官职已经确立，除执政官外，又新设立了保民官、大法官和监察官等高级官员。公民会议也逐步完善起来，这一切为日后的对外扩张和奴隶制度发展奠定了有利条件。

（二）罗马的对外扩张：地中海世界的主人

当年台伯河畔一个小国寡民的城邦，是怎样开疆扩土，战胜劲敌，成为地中海地区强大主人的呢？可以这样说，罗马外部发展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大大小小的战争史；罗马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对外扩张，以征战求发展，最终称雄地中海世界的过程。

罗马建国初期，国外形势对它还很不利。它的北边有强悍的伊达拉里亚人，南边有许多其他的拉丁姆部落，东南山区是强大的萨莫奈人，兵力众多，善于征战。再往南则是“大希腊”，那是希腊人的殖民地。而意大利北部平原和阿尔卑斯山地之间的高卢人，更是强大勇猛，这些人一旦南下进入台伯河畔，那将给罗马带来很大威胁。面对这种局势，罗马人只有以武力扩张克敌制胜，才能取得在意大利乃至地中海地区的统治权，才能推进奴隶经济和社会政治发展。

罗马的扩张使他们首先把以前的盟友变成了侵占、掠夺对象。公元前5世纪，罗马先后对近邻伊达拉里亚的维爱城发动战争。公元前396年，在卡米卢将军指挥下，一举攻克维爱，将全城洗劫一空。维爱城巨大的财富被当作军饷分发给罗马士兵，只有出卖俘虏的收入归了国库。当罗马人还沉浸于胜利的喜悦、为取得的战果兴奋不已的时候，南下的高

卢人长驱直入，大举进攻罗马，对处境不稳的罗马构成强大威胁。这事发生在公元前 390 年。据说，一个朦胧的夜晚，高卢人进攻罗马人所在的城砦。他们攀上峭岩一步一步往上爬，把武器传上去，悄悄到达了山顶。这些士兵轻手轻脚地移动，几乎没有任何响动和异常。而此时罗马人还在梦乡里。就在这时，城砦神殿中奉养给朱诺神的鹅却已警觉，它们一边扑楞翅膀，一边嘎嘎地大叫起来，沉睡中的罗马士兵被鹅唤醒了，他们立即拿起武器，快速出击，把立足未稳、地理不熟的高卢人打下山崖，罗马人免除了一次危机。但现代史家又认为，高卢人进入罗马后猛力攻打内城，费时 7 月未克，便勒索了黄金 1000 磅才退回到波河流域去。从公元前 343 年起，罗马人发动了对萨莫奈人的战争。萨莫奈人生活在亚平宁山区，他们分为许多部落和部落联盟，是意大利半岛上开化较晚的一部分。罗马人要向东南边扩张，必然要经过萨莫奈，只有征服萨莫奈人才能为其继续扩张扫清道路。罗马人与萨莫奈人的战争进行了 3 次（第一次是公元前 343—前 341 年；第二次是公元前 327—前 304 年；第三次是公元前 298—前 290 年）。尽管萨莫奈人英勇作战，凭借山区有利地形，联合伊达拉里亚、高卢人对付罗马，但终因力量分散，不能形成坚强的战斗力而屡遭失败。罗马人打败萨莫奈人，取得了征服中部意大利的胜利。

萨莫奈战争后，罗马人又向意大利南端的希腊城邦进行扩张。公元前 282 年，罗马军队开往希腊人的殖民地图里城，这使离此不远的他林顿人难以容忍，它向罗马宣战，同时向希腊西北部的伊庇鲁斯求援。伊庇鲁斯国王皮洛士是一个醉心仿效亚历山大远征、朝思暮想成为亚历山大那样具有勋功伟业的人，他林顿的求援正符合他的扩张野心。公元前

280年，皮洛士率领20000名士兵，3000名骑兵，2000多名弓弩手和投枪手，还有20头战象组成强大部队渡海进入意大利。在与罗马人初次交锋中，皮洛士的象队冲锋陷阵。它们背驮士兵冲向罗马人，怒吼着用鼻子把罗马士兵高高举起再抛下，从未见过大象的罗马兵被这怪叫而凶猛的庞然大物吓懵了，惊骇万状无法抵御。罗马人的战马也惊恐失措四处奔逃。皮洛士大败罗马军。不过，这次战斗皮洛士损失也很惨重，面对战场他不禁叹道：要是再来一次这样的胜利，我就只能孤身返回希腊了。后来，人们就把用很高代价而换来的胜利称作"皮洛士式的胜利"。在后来的一次战争中，皮洛士再胜罗马人。但罗马经过惨重失败进行休整后，很快就恢复了元气，针对皮洛士的大象战术，他们发明了对付大象的办法。他们发现大象怕火，就做了许多火球，作战时点燃投向大象，弄得大象惊惶失措、四处奔逃。公元前275年，罗马人战胜了皮洛士。野心勃勃的皮洛士丧师糜饷，劳而无功，只得带着残余部队狼狈退回伊庇鲁斯。罗马人占领了南部意大利那些希腊城邦。至此，罗马人征服了整个意大利，成为意大利半岛上真正的统治者。

认真分析一下罗马以小胜大，以弱胜强，转败为胜的原因，对认识罗马文明史具有重要意义。首先，罗马的胜利，是广大平民爱国之情和战斗积极性空前提高的结果。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广大平民男性公民享有了政治权利，使罗马国家有了稳定的立国基础。罗马人热爱国家，争先为国效力。特别是平民们分得公地、减轻债务、废除债务奴隶制，以及能在公民大会上行使某种权力，这使平民与贵族的矛盾得到了缓和，从而大大鼓舞了平民在战斗中的积极性，并力求以自己付出的代价来维护和保障他的切身利益。其次，优良的

军事组织是罗马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罗马的军事组织以“军团”为单位，每个军团辖30个中队，每个中队辖两个百人队。每个军团约有4500—6000人，包括重装兵、轻装兵和骑兵等。在战争中，每个军团可以单独作战，也可根据需要随时调动。罗马军队也有良好的装备，不仅有长矛、短剑、投枪、弩炮和舰船等战斗武器和交通工具，而且还有金属头盔、盾牌、甲胄、护膝等防御装备。在战术上，先由力壮兵士向敌阵投掷标枪，以打乱敌军行列，接下来是新兵冲锋，最后是久经考验的士兵，以备和敌军决战。在军事布阵上，轻装兵置于两翼，重装兵放在中间，骑兵队和各兵种在外围密切配合。罗马军事组织的纪律非常严格，军令如山，不服从指挥者格杀勿论。罗马的这种军事组织制度，在其征服意大利的扩张中起了关键作用。第三，有效的对外政策也是罗马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罗马统治集团善于和这一部分结盟去攻打另一部分，待时机成熟后再去攻打原来的同盟者。这种对外政策和军事行动紧密结合，对罗马的扩张并不断取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罗马在征服了意大利各地区之后，不是立即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把被征服地区变成所谓“同盟者”，保持着同盟关系，有的被列入“附庸”，也有的被收为罗马的直辖殖民地。他们对这些地区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用以维持它的统治，控制整个意大利。

罗马征服意大利后，就成为西部地中海的一个大国。接下来的罗马历史便是一个由奴隶制大国演变为罗马大帝国的历史。

当时迦太基是西部地中海的强国，它占有从西西里岛到西班牙的广阔的疆土，农业发达，贸易繁荣。罗马实现帝国

梦想，把矛头指向西西里等地的时候，就必然和迦太基发生冲突。争夺地区霸权，掠夺资源和奴隶的斗争势必导致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公元前264年到公元前146年的100年间，罗马和迦太基间进行了3次战争，史称布匿战争（罗马人称迦太基为“布匿”）。布匿战争的原因，是罗马奴隶主贵族同迦太基奴隶主贵族争夺地中海西部的领土、争夺奴隶和商业霸权。第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前241）是罗马与迦太基为争夺西西里岛而爆发的，战争以迦太基失败而告终，罗马占领了西西里岛及与意大利之间的所有岛屿，获得了大量战争赔款。西西里岛成为罗马的一个行省。罗马在战争中也损失了大量士兵和战船，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经过这次战争的迦太基并不甘心，时刻准备和罗马再比高低。

第二次布匿战争爆发的时候，迦太基出现了一位英勇顽强、精娴韬略、胆识过人的有志青年，他叫汉尼拔（公元前247—前183）。汉尼拔从小随父到西班牙，以军营为家，决心长大后为国家报仇雪恨。公元前219年，立志向罗马复仇雪耻的汉尼拔率大军进攻罗马盟邦萨贡图，罗马以此向迦太基宣战，从而拉开了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序幕。公元前218年春，汉尼拔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翻越阿尔卑斯山进攻意大利的一次远征。汉尼拔率领部队英勇作战，连续打了几个胜仗，特别是公元前216年那次战斗，由于汉尼拔指挥得当，用兵巧妙，致使罗马8万兵士几乎全军覆没。汉尼拔漂亮地导演了一出以少胜多的战例。然而，罗马军队也很顽强，他们坚定团结，誓与敌人血战到底。他们把17岁以上公民应征入伍，号召官兵共赴困难。迦太基军队由于补给困难，孤悬敌国，陷入困境，战斗力日趋衰弱，使战局出现逆转。公元前204年，罗马进攻迦太基，汉尼拔被元老院召令回国应

战。双方在公元前202年进行了一次决定性的战斗，汉尼拔遭到失败，罗马终于战胜了迦太基。次年订立的和约规定：迦太基除向罗马赔款外，放弃非洲以外的所有领土，未经罗马同意，不得对外进行战争。

经过第二次布匿战争，迦太基在军事、政治上已无力和罗马抗衡，但在经济上仍有一定实力，特别是农业和商业逐步开始恢复。罗马担心迦太基经济上强大起来后会东山再起，便蛮横地发动第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49—前146）。迦太基人同仇敌忾奋起反抗，决心保家卫国。罗马军围城两年一无所获，到了第三年城内发生饥荒，迦太基城终因力尽粮绝而被罗马攻陷。

当布匿战争持续进行的时候，罗马又向地中海东部进行扩张。公元前213—前168年，罗马先后3次发动了对马其顿的战争，最后征服了马其顿王国。又通过叙利亚战争（公元前192—前188）控制了叙利亚和近东地区。到公元前146年，罗马对希腊马其顿和各地反抗者进行了彻底镇压。至此，经过长期东征西杀，浴血奋战的罗马人，终于以摧枯拉朽之势征服了整个地中海地区，成为地中海世界的超级霸主。

（三）武力扩张促进了罗马早期文明发展

罗马对外扩张的结果，不仅使它成为地中海世界的霸主，而且促进了罗马文明的发展。布匿战争以前，罗马早期文化已经初步形成，并对罗马生活产生某些影响。那时，不仅农业、手工业、商业、军事和货币有了较大发展，而且在法律、宗教、口头文学、戏剧和建筑造型艺术方面也取得了

一定的成果。但罗马文明真正的形成，则是在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中叶的100多年间。从第一次布匿战争起，随着罗马武力扩张，截止夺取整个地中海地区，罗马文明也由萌芽走向成熟。特别是希腊和东方各地陆续被征服后，希腊文明通过各种途径进入罗马，罗马人和希腊人在军事、外交和商业上发生了关系。他们亲眼看到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和希腊的富裕人那种讲究、高雅的生活方式，而这些生活和罗马粗朴简素的生活现实相去甚远。同时，希腊和东方各地被征服后，许多人以奴隶、人质和外交代表的身份出现于罗马，其中不少是有文化、有技艺的。那时候，罗马的教师、医生、乐师和自由职业的其他代表者，几乎清一色为希腊人所充任。这些人以其知识和技能为主人服务，他们中有些人属于国家的奴隶，做的是狱卒、杂差和刑吏等，有的人以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创造着物质财富，而许多人则参与了罗马文化艺术方面的创造。他们传播希腊和东方先进的文明成果，大大促进了罗马早期文明的发展。

这种情况下，罗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迅速开始了希腊化的过程。早在公元前3世纪初，新贵中间便已经广泛地学习希腊语言了。罗马的使节们用希腊语进行交往，许多作家用希腊语写作。在贵族中甚至出现了爱好希腊事物的希腊狂。希腊文化的影响不只局限于新贵的狭小范围，而且在广大居民中广泛传播。比如说，希腊和东方的祭奠习俗在公元前3到前2世纪间传到意大利居民中。据说，在与汉尼拔作战最激烈的时候，元老院命令在罗马举行以崇拜阿波罗神为目的的赛会，以求神保佑这个国家驱除灾难。然而，当外国的信仰迅速在意大利奉行，以至和罗马淳朴风习相抵触时，元老院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予以纠正，一些人为此受到

了惩罚。

随着奴隶制经济发展，罗马的文明程度日益提高。罗马早期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为其早期文明进化奠定了基础。起初，罗马农业技术是非常原始的，直到公元前2世纪才实现了农具的更新和集中经营的制度。在罗马的这种农业性质和自然经济的条件下，手工业和商业仍有发展。传说，在国王努玛·庞皮留斯时代就设立了笛工、金工、木匠、染匠、靴匠、皮匠、铜匠和陶工8个手工业联合会。如果这个传说是可靠的话，那么它说明手工业和农业在那个时代已经开始分离了。从考古发现可见，许多建筑物都有巧妙的石匠和其他手工业者的杰作。在坟墓中发现的铜制品，如华丽的镜子和附有装饰的化妆盒，上面非常精巧地刻着希腊神话的场面，其制作技术已相当高妙。在共和国前两个世纪中，频繁的战争要求大量的进攻和防卫用的武器、头盔、甲胄和运输工具等，这些几乎完全是手工业生产者制造的。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大大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史料记载，罗马早期已经形成了国内贸易市场，每8日1次，每逢集市日①，农民到城里市场上去用自己的农产品交换他们所需要的手工业品。起初集市在广场上进行，后来移到了台伯河边，并且形成了食品、蔬菜、家畜市场。罗马的对外贸易早在王政时期末叶就达到相当水平，但共和国建立后，罗马在地中海地区的对外贸易占着微不足道的地位。直到共和国的最后两个世纪里，对外贸易才获得了高度发展。随着贸易发展，货币也产生并发展起来。罗马最早的交换工具是牲牛和

① 在共和时代，罗马每8天为1个星期，直到帝国时代才按照东方的方法，把一星期定为7天。

绵羊，一头牡牛的价值大约等于10头绵羊的价值。后来用青铜，“十二铜表法”中提到的罚金和后来关于对高级官吏处罚的法律中，都用青铜若干斤来计算。约在公元前4世纪后坎佩尼亚人仿照希腊的样式铸造出固形的有一定重量而上面又有特定印记的钱币，这样就出现了一斤重的铜币。大约与此同时，罗马经协商利用坎佩尼亚某些城市的造币厂，开始铸造发行带有罗马印记的、希腊式的银币。公元前268年，罗马出现了自己的银币。公元前3世纪的最后25年，罗马才开始铸造金币。货币的出现，更进一步促进罗马奴隶制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奴隶制经济的繁荣带来文化的发展。在希腊文化的强力影响下，罗马早期文化很快地发展起来。

早期罗马在思想文化方面最典型的主导形式是宗教。和古代东方国家一样，远古罗马宗教的特色是原始的多神教。每一件物体和每一种现象都有自己的灵魂、自己的神。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的本命神、保护神。每一个家，每一个过程都有自己的神。据说童年时期的神就有43个，如婴儿第一次哭泣的神、初生婴儿的知觉的神、第九天的神、第一步的神、摇蓝的神等等。后来罗马宗教中分化出了进步、最高的神，产生了三位一体的神，如起源于伊达拉里亚的朱比特——朱诺——米涅娃等。希腊宗教传入罗马后，这些神和希腊神话几乎融为一体。罗马的神和希腊的神相统一，只是名称有所不同。如罗马的朱比特就是希腊的宙斯，朱诺就是赫拉，米涅娃即雅典娜等等。随着宗教的发展，罗马有了一定的宗教仪式，并产生祭司团。祭司团的最高首脑在国家中拥有很大的权威，国家遇有重大事件需要求神问卜，占卜祭司就出来预测吉凶，这些人往往用这种手段来干预政事。

罗马早期的文学艺术成果也很突出。最早的文学来自民间的口头创作。远古罗马人有一种饮宴时唱歌的习俗，在笛子伴奏下，歌唱伟大人物。还有葬歌、讽喻诗、谚语、咒语、宗教歌等都是劳动人民在生活实践中创作的。但这些作品很少保存下来。罗马早期建筑与造型艺术发展也很快，公元前4世纪，那些最古老的罗马建筑遗址，其伟大气魄使人十分惊异。在伊达拉里亚人影响下，罗马人开始使用远古东方和希腊已广泛利用的拱顶法柱式进行修建，并广泛运用于神庙的建筑中。共和国头几年，从农家建筑风格开始出现了比较复杂的城市住宅，它由中庭、正房和柱廊三部分组成。那些城市富人的房屋一般是二至三层，无论在布局设计和结构合理性上都达到一定水平。真正能代表罗马建筑艺术的是那些规模宏大的建筑工程如庙堂、会馆、剧场、桥梁、城市广场和水道等等，这些我们在后面将作详细说明。

第八章 繁荣的罗马科学文化



- 奴隶起义与罗马文明
- 自然科学
- 文学和史学
- 法制和法学

通过扩张和对外征服，罗马国家体制和性质经历了巨大变化。奴隶起义接连不断，政治斗争此起彼伏。奴隶的斗争，推动了罗马经济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从而使罗马科学文化也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并取得了灿烂辉煌的成就。

一　奴隶起义与罗马文明

通过对外扩张，特别是第三次布匿战争，罗马已经征服了整个地中海地域。大量战俘和被征服地区的平民沦为奴隶，其中有文化的希腊奴隶对罗马文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促进了罗马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在长期的对外侵略中，罗马从外邦掠夺了大量金钱和财物，这些财富使罗马奴隶制经济和社会阶级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公元前 146 年到公元前 27 年这一个多世纪，是罗马共和国的晚期。这时的罗马政治体制虽然还是共和制，但实际上它已进入奴隶制帝国阶段。这时的罗马，不仅奴隶制经济得到充分发展，而且由此进入古代奴隶制发展的高峰。奴隶制帝国统治加剧了社会矛盾，激起了奴隶起义和平民的斗争运动，使共和国晚期的历史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情景。在那个奴隶斗争风起云涌，英雄人物群星璀璨、层出不穷的时代里，罗马社会内部发生着急遽变化。连年不断的战争，贫富越来越大的分化，使整个社会阶级矛盾和政治斗争达到极为

尖锐的程度。公元前 2 世纪初，罗马社会中的主要劳动力是奴隶，这些奴隶一部分是战俘和被征服地区的平民，另一部分是欠税或负债的人，他们被债权人卖为奴隶，还有一部分是被海盗在地中海沿岸掠夺来拿到奴隶市场去贩卖的奴隶。这些奴隶一般分为国家奴隶和私人奴隶。被用于公共性劳役，修建神庙、政府大厦、城堡、驰道、水渠等公共设施的奴隶为国家奴隶；被广泛用于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役的是私人奴隶。在罗马，无论是奴隶的数量还是奴隶主对奴隶的残酷压榨，都较之希腊有过之而无不及。许多罗马豪门贵族使用着大量奴隶，他们甚至一跺脚就可从奴隶中组成数千人的军队。西班牙的一个银矿使用着数万奴隶进行采矿。这些奴隶额上被打上烙印，脚上戴着镣铐，成群结队，在皮鞭威胁下进行繁重的杂役劳动。

更为残酷的是，罗马奴隶主还把奴隶当作一种娱乐工具，以奴隶的生命来取乐。他们逼迫奴隶接受格斗训练，然后上竞技场进行角斗残杀，或者让接受过训练的奴隶和野兽搏斗。许多角斗士横尸竞技场，无辜葬送生命，而那些失去人性的观众则以此为乐，每每在得胜的一方击倒或杀死对方时，才尽兴而去。广大奴隶在政治、经济上受到惨无人道的压迫和剥削，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境况十分恶劣。罗马史学家戴奥多罗斯在《史事汇编》中这样记载：奴隶们“戴着镣铐，他们不停地在工作，日日夜夜都不准有任何休息……只要监工者略略示意，无情的皮鞭就会重重地打在他们身上。这些可怜的人们没有受到丝毫的关顾，他们所穿的破衣，连他们那光赤的身体都遮掩不住。无论什么人看到了他们那凄凉的、惨不忍睹的境遇，都一定要恻然兴悲。虽然他们是病了，受伤了，甚至是残废了，都不许有片刻的停顿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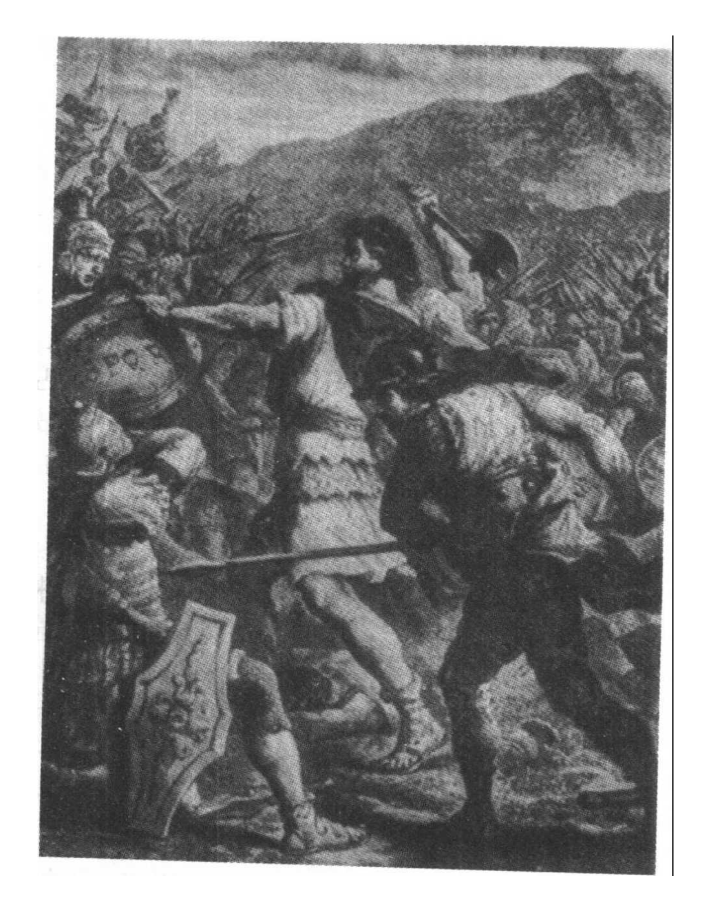
休息。老年人的衰迈无力和妇女们的孱弱，也不能得到丝毫的宽宥。他们都是在皮鞭下被强迫着去工作，直到他们死了才算完”。后来，一位罗马文学家阿普利乌斯在《金驴》一书中，描写了他在磨坊中亲眼看到的奴隶们那惨不忍睹的情景：“天呀！我目中所见的竟是一群怎样佝偻的、瘦小的人啊！他们的皮肤上布满了青黑色的创伤，背上则全是一大块烂疮。那些破碎不堪的衣服，与其说可以御寒，不如说只是聊以蔽体罢了……他们的额上打着烙印，囚首垢面，膝上钳有锁链……他们的眼睑都溃烂了。”这些几乎用血泪写成的文字，充分表明万恶的奴隶制度是何等残酷野蛮，奴隶们失去了一切做人的权利和自由，被奴隶主当作“会说话的工具”而备受折磨。

公元前2世纪中期，罗马奴隶制社会内部矛盾更为尖锐，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导致大规模的奴隶起义。其中影响最大的有西西里奴隶大起义和斯巴达克奴隶起义。

西西里岛位于亚平宁半岛南面，那里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适于发展农业。岛上盛产谷物、葡萄和橄榄，大理石和白玉石的蕴藏量也很大。但自从划为罗马行省后，西西里的肥沃土地就被罗马的奴隶主所占有。他们霸占了大量土地，迫使千百成群的奴隶在那里苦作。奴隶主对待奴隶十分残暴，西西里中部恩那城的大奴隶主达莫菲勒斯虐待奴隶是出了名的。他用烧红的铁在他们身上打下烙印，强迫奴隶服各种劳役，不给他们衣服，也不给他们以足够的食物。他在奴隶身上作威作福，每天都要找一些极小的过错来鞭打奴隶。他的妻子墨加丽达也以寻找惩罚为乐，百般虐待女奴。贪婪残暴的达莫菲勒斯夫妇，为了最大限度地榨取奴隶的血汗，

连奴隶维持生命的最低生活保障都不给，甚至让奴隶夜间外出打劫衣食。

无法忍受残暴剥削的奴隶，终于结盟起义。公元前 138 年，起义烽火燃遍西西里城乡。起义军中有个叫尤诺斯的人，以勇敢的斗争精神和惊人的智慧，博得了奴隶们的拥护和信任，从而成为起义首领。在尤诺斯的带领下，400 多名起义奴隶手持镰刀、斧头、各种长竿短棒冲进恩那城。城内许多奴隶积极响应，他们也掀起暴动，杀死自己的主人，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起义军队伍中来，恩那城很快被奴隶占领。尤诺斯为了更有力地对付奴隶主反扑，很快地组织了政权。他召集全体起义者集会，审判并处死了达莫非勒斯夫妇，并决定建立王国。尤诺斯被推举做了国王。国王之下又设立了人民议会。为了加强武装力量，进行军事行动，尤诺斯征集工匠为起义部队铸造了武器，使奴隶部队全副武装起来了。起义烽火越燃越旺，不久在西西里南部也爆发了奴隶起义，起义首领克利昂率领 5000 人的奴隶起义部队占领了阿格里根特。不久，这两支部队汇合在一起，奴隶部队人数达到了 20 万人。起义军如狂飙席卷，所向披靡，不仅惩治了那些罪大恶极的奴隶主，而且多次战胜罗马军队的反攻。罗马人派来的部队常常被起义军打得狼狈逃窜。当罗马大军包围恩那城时，奴隶们英勇奋战，坚守不屈，但终因寡不敌众，加之叛徒出卖和被围困后缺乏粮食而陷入饥饿。恩那城于公元前 132 年失守，克利昂阵亡，尤诺斯被俘后死在狱中。这次声势浩大的奴隶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留下了奴隶斗争那壮丽的英雄事迹，给奴隶制度以沉重的打击。



斯巴达克起义

公元前104年—前101年又爆发了第二次西西里奴隶起义。这次起义的直接原因是西西里总督涅尔瓦审查奴隶事件。在罗马，大批农民因债务而沦为奴隶，这给罗马扩充部队造成兵源危机。为了解决兵源问题，罗马元老院命令行省长官审查奴隶出身，凡自由民出身的予以释放。西西里总督

涅尔瓦受令释放了800名奴隶。释放奴隶无疑影响了奴隶主的直接利益，他们便向涅尔瓦行贿，涅尔瓦立即停办审查释放奴隶的工作。渴望自由的奴隶愤怒反抗，涅尔瓦反而勾结盗匪打击有反抗情绪的奴隶。赫拉克利城附近的奴隶们揭竿而起，很快组织起两万步兵、两千骑兵的队伍，推选萨维阿斯为王。此后，西部利利贝城附近又有一万多奴隶在阿铁尼奥举行起义，起义军占领了特里奥卡拉城，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接连两次大败罗马军，并把年轻力壮的奴隶起义者编入军队，到处袭击罗马的军政机构、仓库和驿站。起义军很快发展到三万人，斗争烽火燃遍西西里广大地区。罗马军接连出兵镇压，萨维阿斯在战斗中牺牲，部队由阿铁尼奥指挥。公元前101年，阿铁尼奥也在一次战斗中英勇就义，剩下的人终因饥饿等失去战斗力，许多起义者被钉上了十字架，另一支奴隶队伍受罗马人欺骗放下武器，全部被带上镣铐送往罗马做角斗士。第二次西西里奴隶起义遂告失败。

西方古代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奴隶起义是公元前73年—前71年斯巴达克所领导的起义。斯巴达克出生于希腊半岛北部的色雷斯，体魄健壮、勇敢强悍、智慧过人。他曾在罗马军队服役，因争取自由出逃被俘而被卖为奴隶。他被送到一个角斗训练学校受训。在那里，奴隶们的生活更残酷，整日受到监视，加之角斗士在竞技场上的悲惨命运，迫使他们为自己的自由而斗争。公元前73年，角斗士训练学校200多名奴隶密谋暴动，不料事机泄漏，只好先期行动。斯巴达克率70多名角斗士用厨房的菜刀和铁叉武装起来冲出奴隶营，沿途不断有武器补充和人员加入，起义者聚集到维苏威火山，建立起坚固的营地。斯巴达克在他的伙伴阿诺诺斯和克利克苏协助下组织队伍，起义军很快发展到一万余

人。斯巴达克规定了纪律：不侵犯良民，不私藏金银，平均分配战利品。起义军四处袭击奴隶主的庄园，整个坎佩尼亚地区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罗马政府才感到事态严重，遂派大军进攻围剿维苏威火山。就在这生死存亡时刻，斯巴达克以超人的智慧和英勇，命令部队用野藤编成绳梯，沿着没有罗马军防守的悬崖峭壁攀援而下，绕至敌后出奇制胜，打得罗马军晕头转向，狼狈逃窜。从此起义军声威壮大。公元前 72 年秋，起义军又击溃了罗马政府派来的两个军团。起义军占领了南意大利部分地区，许多人纷纷加入起义洪流，起义军发展到 7 万人。

斯巴达克才能杰出，治军有方，指挥作战常能出奇制胜，加之军纪严明，深受拥戴。他在军事思想上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善于进攻，主动出击，而不是被动防守，这和西西里奴隶起义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他以这种战略战术思想领导起义军多次打败罗马军，开始向北意大利进军。罗马元老院派兵追击，起义军在波河流域又连续打败了前后夹击的罗马军。公元前 72 年，起义军已达到 12 万人，意大利全境为之震惊。斯巴达克又率兵南下，这使罗马统治集团惊慌不已。奴隶主贵族听到斯巴达克的名子就会魂飞魄散，甚至选执政官时竟无人敢参加竞选。元老院经过艰难周折，最后任命大奴隶主克拉苏任镇压起义军的统帅。克拉苏在同斯巴达克交战中连吃败仗，这时斯巴达克改变了进攻罗马的计划，决定派一部分起义军到西西里发动奴隶起义。但当他率军来到意大利半岛南端的时候，渡海计划因海盗们未履行诺言而落空。斯巴达克自制木筏渡海，但因海上有大暴风未能成功。这时克拉苏率军从北扑来，企图把起义军封锁在意大利半岛南端，并挖沟壕切断起义军退路。斯巴达克以惊人的

胆略，在一个风雪交加的黑夜指挥部队填平了一段壕沟，率起义军突破了克拉苏的防线，使一部分起义者突围成功。但这时起义军内部出现意见分歧，脱离主力部队的那部分起义军被克拉苏全部歼灭。斯巴达克率领的部队继续坚持战斗。公元前71年初春，一个风雪之夜，起义军在与罗马军大决战中，终因寡不敌众，死伤惨重。斯巴达克冲杀在队伍最前面，他要亲手杀死克拉苏，但却未抓到。他在杀死敌人两名军官后，终因力竭，壮烈牺牲。6000名起义军被俘后全部被罗马统治者钉死在十字架上。余下的起义军在南意大利山区坚持了十余年的斗争，直至公元前63年被罗马歼灭。斯巴达克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他为人类争取自由解放而斗争的伟大精神是永存的。马克思称赞他是“一位伟大的统帅……具有高贵的品格，为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的代表”。[①] 列宁则说：“斯巴达克是大约两千年前最大一次奴隶起义中的一位最杰出的英雄。”[②]

这3次奴隶大起义在罗马文明发展中起了什么作用？它与罗马文明的关系是怎样的？这个问题是学术界很少涉及的，其主要原因之一是缺乏具体材料。但如果我们深入历史事实进行认真的透视，也可以看出他们在促进罗马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方面的重要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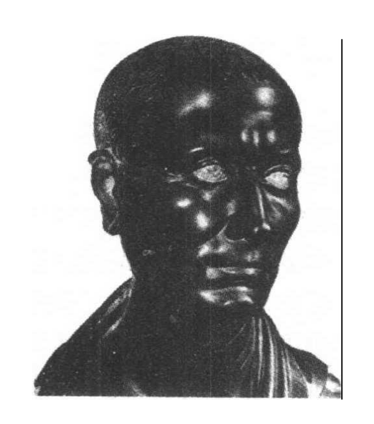
在经济上，奴隶起义促进了罗马奴隶制经济的繁荣。帝国初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奴隶起义和被征服各族的解放斗争，使奴隶制生产关

①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59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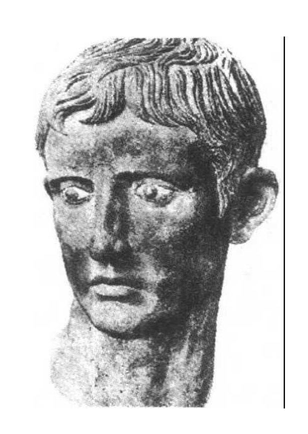
② 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第5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系得到一定改造，为生产力发展和经济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和良好的环境。

在政治上，奴隶起义加速了罗马由共和向帝国的改制，促进了社会政治改革。应该说，共和制比皇帝专制要进步些，但在罗马，共和制不仅没有缓和社会矛盾，反而加剧了各种矛盾的激化，奴隶起义就是一个重要表现。因此，只有把共和制转为帝制，才能有效地调整罗马社会内部奴隶主阶级的内部矛盾。奴隶的反抗和起义无疑加速了共和制向帝制的转化和改制，适应了奴隶制发展的要求。同时，在当时社会矛盾十分激烈的情况下，奴隶起义也促进了罗马社会改革。西西里起义后进行的革拉古改革运动，其目的就是限制元老侵夺征服所得的国家土地，把限额外的公地收回分给破产失地的贫穷农民，以解决由于土地集中和农民破产而引起的社会问题，保证罗马军队的兵源。然而，当元老贵族们的利益受到触动的时候，他们都极力破坏改革，甚至用暴力消灭改革者。兄长提比略·革拉古和弟弟盖约·革拉古被杀害，革拉古改革终告失败。此后，由于奴隶起义和对外战争，军事形势日益严峻，罗马国家必须保证必要的兵源和加强武装力量，这时民主派又拥戴平民出身的马略。马略进行了军事改革，他把旧的征兵制改为募兵制，改农民兵为雇佣兵。这一改革，有力地解决了兵源不足的问题，而且由国家供给士兵薪饷和武装，规定服役期限，加强军事训练，从而大大提高了士兵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在这种情况下，罗马社会的政治斗争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在军事斗争上，内战十分激烈。阴险毒辣的军事首领苏拉拥有军事实力后，和马略派进行腥风血雨的残杀，成千上万的马略派人被杀害，最多时一次被杀人数竟达 10 万之众。斯巴达克起义后，曾为苏拉部将、



凯　撒



屋大维

镇压过斯巴达克起义的克拉苏，面对元老势力受到很大冲击的现实，转而向平民接近，与马略派的骑士们讨好。他和其部将庞培把眼光转向马略派将领凯撒（约公元前100—前44）。凯撒是一位很有胆识的人，他很快和克拉苏、庞培组成三头政治同盟（即历史上所谓的“前三头”）。后来克拉苏在远征安息战斗中败亡，庞培受元老派拉拢而与其勾结，反对凯撒，于是就有了凯撒与庞培激战。庞培在决战中全军覆没，逃至埃及被杀，凯撒成为罗马帝国惟一的统治者。凯撒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可以说是罗马史上第一位皇帝。凯撒遇刺之后，他的甥孙（被认为养子）屋大维脱颖而出，和凯撒的密友安敦尼及凯撒另一部将、骑兵长官雷必达结成新的三头政治同盟（史称“后三头”），对付元老贵族组成的共和派。后来三头之间又有斗争甚至互相残杀。屋大维成为内战最后的胜利者独掌大权。在奴隶起义推动下的罗马社会政治变革，最终使共和国被彻底埋藏，军事独裁的帝制在罗马建

立起来。公元前27年，屋大维获得“奥古斯都”神圣尊号，这是这次社会变革的历史标志。

在文化上，罗马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也无疑闪耀着奴隶劳动和起义斗争的灿烂光辉。起义部队每占领一个地区，就利用奴隶主的庄园进行劳动，发展生产，以保障起义部队所需的粮草、马匹和军用物资。劳动实践为精神财富的创造奠定了基础。在起义军中也有不少富有文艺细胞的人，在起义部队中也常有文艺演出。奴隶劳动和如火如荼的奴隶起义斗争，成为文化创作活动的源泉和动力。另外，那些奴隶起义的英雄和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本身就是文化史上光彩夺目的人物。斯巴达克智勇双全，雄才大略，军事上韬略精娴，出奇制胜，政治上深谋远虑，决策英明，受到古今赞颂。凯撒和西塞罗是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他们在罗马的散文写作上也颇有成就。他们虽然在政治上属于元老派和反元老派两大营垒，但在对文化事业的贡献上则可谓异工同力，各领风骚。这些人物和成就，为整个罗马帝国时代的文化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基础，使罗马文明的百花苑中开放出一簇簇更为灿烂夺目、异彩纷呈的花朵。

二　自然科学

由于频繁的征战，加之残酷的奴隶制统治，严重地压抑了人们的聪明和智慧，因而使罗马人在科学上没有希腊人那样富于创造性。特别是高度紧张的内外政治事务和军事斗争，要求他们忙于应付和解决实际问题，而很少把精力放在

抽象的学术理论研究上面，这就造成了罗马人崇尚实用而不重视理论研究，以致在科学上几乎没有大的创新和突破。但罗马也不乏一些出色的科学家和科学成就。

公元前 2 世纪中期，农业科学家加图写了《论农业》，这是罗马第一部农业科学著作。加图在这部著作中，对管理奴隶制农业的原则、如何经营奴隶制农庄、怎样对待奴隶及剥削奴隶等进行了全面阐述。到公元前 1 世纪后期，瓦罗又写出一部《论农业》，全书共 3 卷，其中第一卷讲经营农业的方法，第二卷讲饲养牲畜的方法，第三卷讲饲养鸟类和养育的方法。公元 1 世纪中期，当意大利农业逐步走向衰落的时候，当时的农学家科鲁麦拉也写了《论农业》的著作，全书 12 卷，书中不仅阐述了农业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而且论述了社会经济关系，特别是书中对农业的衰落和怎样发展已经萎缩的意大利农业，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从这几位农学家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意大利奴隶制农庄的情况以及奴隶制农业兴起、繁荣和衰落的过程。

凯撒是一位政治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在科学上的贡献是修订了儒略历法，以 365.25 天为一年。这个历法虽然较实际有较大误差，但它在欧洲一直流行到 1582 年。这个历法后来被教皇格雷哥里十三世下令纠正，苏格兰和英格兰分别于 1600 年和 1752 年加以纠正。

出生于希腊本土，一生主要在罗马从事科学研究的斯特拉波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地理学家。他的专著《地理学》内容全面，资料丰富，对当时罗马人所知的世界进行了系统描述。全书共 17 卷，除了总述地理学知识外，对欧、亚、非三洲各地作了全面介绍。

普林尼（约公元 23—79，又称老普林尼）是罗马科学

史上一位具有代表性的科学家。他出生于意大利北部的科莫，从小在罗马读书，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是当时渊博的学者。普林尼一生著作甚丰，其中最著名的是《自然史》。这部37卷的巨著，内容十分丰富，包括了天文学、地理学、历史学、生物学、农业、矿产、医药卫生、交通运输、语言文字、实用工艺及绘画雕刻等。这是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据说普林尼写这部著作阅读参考了2000多种文献，几乎把当时所知道的各种知识都包括进去了。当然，从科学性、创造性上看，普林尼的《自然史》内容庞杂，只是收集罗列前人的科学材料，很少有他自己的见解，更谈不上科学创造。然而，《自然史》在整理、保存古代科学知识资料方面，对科学发展史仍是一个重要贡献。

托勒密和盖伦是罗马统治时期希腊化地区著名的科学家。

托勒密（约公元100—170）生于埃及，一生在亚历山大里亚城从事学术研究。他的研究领域较广，但成就最突出的是天文学和地理学，著有《天文学大成》、《地理学》、《光学》等，其中《天文学大成》影响最大。在这部著作中，托勒密吸取了埃及、巴比伦、希腊人在天文学方面的优秀成果，在前人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确认地心说。在他看来，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是不动的，而日、月、星辰都是按照一定轨道围绕着地球在旋转。托勒密的学说被教会奉为金科玉律，怀疑、反对者被视为异端，甚至被活活烧死。在哥白尼以前，他的著作一直统治着欧洲思想界。《天文学大成》充分运用了古典天文学和几何学知识，描述了天体结构和天体运行，初步论述了地球、太阳、月亮及行星运行的规律，提出了千余个恒星的位置和亮度，从而成为古代最完备的宇宙

星图。在这部科学著作中，托勒密还对如何推算日食和月食、怎样确定行星位置、制作天文仪器和演算历法等作了全面阐述。他的《地理学》共8卷，几乎对西方人已知的地理知识进行了一个全面论述和概括。他还绘制过一幅包括欧、亚、非三洲在内的世界地图。在数学方面，托勒密的主要贡献在三角学方面，他在研究天文学中，证明了许多与天文学计算有关的球面三角定理。

古罗马时期第一位医学家是阿斯克勒皮阿德。他从原子论出发，主张治病主要的是要使人体的气孔和其他所有孔道都得到疏通，因此，要以运动、发汗、沐浴和按摩等作为治病的主要方法。他还精通手术，是第一个切开气管进行手术治病的人。古罗马最著名的医学家是盖伦（129—199）。他是小亚细亚人，曾在许多地方行医，后来成了罗马皇帝的御医。他从小好学，后来曾在爱奥尼亚、科林斯及亚历山大里亚城留学，从许多名师那里学习哲学和医学。学成后先是回本土行医，公元161年前后来到罗马，后被召聘为皇帝的御医，并竭力进行科学研究，最后在西西里岛逝世。盖伦一生著作甚丰，据说共有131部著作，现存的有83部。盖伦的医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他认为医学必须以生理学和解剖学为基础，所以他特别重视研究人的生理机能。由于那时禁止人体解剖，他就亲手解剖猕猴，进行医学临床观察，提出了关于消化和血液循环的理论。他在生理、病理和医疗学方面成就显著，特别是他把神经分为运动神经、感觉神经、混合神经三类，大大推进了神经生理学的发展。他在药物学方面研究颇深，著作中对540种植物药物、180种动物药物、100种矿物药物进行了介绍，可谓古典药物学的集大成者。

相比之下，古罗马的技术科学较为发达。农业方面，罗

马统治时期已普遍使用铁锄、耙、锹、镰等，人们已懂得保持地力与作物丰产的关系，开始实行二圃制，即把耕地分为两部分，每年轮流耕种其中的一部分，其余一部分休耕养地。人们种植的作物主要有大麦、小麦、葡萄、油橄榄等。帝国初期农业有了较大发展，在意大利半岛出现了规模较大的果园、农庄和牧场，一些地区灌溉系统也有了较大改善。特别是生产工具的改进较快，有了带轮子的犁，发明了打谷机具，生产效率提高很快。在手工业方面，罗马城邦时期已具有相当基础的冶金、制陶、制革、木工等技术，在帝国时期有了较大发展。以意大利半岛为主的许多手工业中心，在青铜铸造、制陶、毛纺织品、玻璃制造等方面已负盛名。罗马采矿业也很发达，先后在西班牙和莱茵河等地区开采金、银、铜、铅、锡、铁等矿。从对公元 79 年被火山灰埋藏的庞贝城的考古发掘看，罗马的农副产品加工业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那里有尼绒、珠宝、石工、铁器、玻璃、香料、磨面和食品加工等许多作坊，其中面包作坊就有 40 多家。

罗马时期最负盛名的实用科学家和工程师赫伦（公元 1 世纪）长期生活在亚历山大里亚城，他不仅著述甚丰，而且有许多发明创造。他创造了滑轮系统、双缸单程鼓风机、计里程器、虹吸管、测量用的测准仪等实用机械器具。在他的发明中，最为惊人的是蒸气反冲球，这是一项把热能转换为机械能的技术发明，可以被看作是蒸气机械的前身，它的机械原理一直延用到近、现代。赫伦对光学、数学等方面也有深刻研究，研究过平面镜的反射，数学方面写过一本《几何原理》，证明过一些新的定理。他还写过一本《测地术》，此技术在以后数百年间一直被人们所采用。

罗马的建筑技术较为发达。著名的城市水道建筑是为了

把城外水源引入城内以供人们生产和生活之用，这种水道在帝国时期的许多城市先后建成。从公元前4世纪开始，罗马城就开始建设水道，到公元前2世纪，据说已修了9条，总长约90多公里。这些水道穿山越岭，纵横交错，在一些洼谷地带还用石块建成拱券渡槽，有的渡槽高达60多米，工程宏大壮观，使人望而兴叹。古罗马人还修筑了许多公路和桥梁，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分布于帝国广阔的领土上。公路上设有一定的里程碑，有些碑石至今尚存。桥梁是公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在多瑙河上的一座大石桥，共有20个桥墩，还筑有巨大的圆孔，这种古罗马式的石桥在欧洲现在还可以看到。至于其它大型建筑艺术，我们在后面还将论及和说明。

三　文学和史学

（一）文学

罗马人在模仿希腊文学的基础上，逐步创造了自己的文学。罗马最早的文学是在劳动和举行宗教仪式时逐步兴起的，那时唱的歌谣留传下来的很少。共和时代末期和帝国时代初期，罗马文学创作蔚然兴起，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文学家和不朽的作品，在罗马文学星空升起颗颗灿烂的明星。

1. 共和时期的文学

罗马人真正形成自己的文学——罗马文学，是在公元前

3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的一个多世纪里。这一时期，罗马文学由萌芽走向成熟，其中诗歌、喜剧、散文成就显著。

诗歌。公元前284—前204年的李维优斯·安德罗尼库称得上罗马第一位诗人。他是南意希腊人，公元前272年在战争中被俘沦为奴隶，后被释放成为罗马公民，给罗马人当家庭教师。他第一次把荷马史诗《奥德赛》译成拉丁文，在罗马广泛流行，并作为罗马学校中心经典教材。李维优斯·安德罗尼库还是一位抒情诗人，他曾受国家委托创作祭神的赞歌，这个赞歌是供女孩子合唱队在宗教活动时进行演唱的。另一位颇有影响的拉丁诗人尼维阿斯（约公元前270—前200）主要的文学活动是史诗的创作。他写了一部名为《布匿战争》的史诗，记述了罗马帝国初期一段斗争经历。《布匿战争》在写法上模仿希腊诗体，但文采一般。尽管如此，他仍不失为罗马文学史上光辉的一页：在罗马文化中，他开创了以文学形式记述建立帝国伟大业绩的先河。

继他之后的诗人恩尼乌斯创作了记述罗马史事的史诗《年代记》，据说长达18卷，但已失传，今存的只有少量残篇。恩尼乌斯不仅创作巨篇史诗，而且写喜剧、悲剧和教谕诗，曾有“罗马诗学之父”之誉。在罗马，还有用散文诗形式记述军政史事、历史演进、医学、农业的，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罗马文明的发展和成就。

喜剧。在早期的节日歌舞、民间传统戏剧和希腊戏剧影响下，罗马戏剧日渐繁荣起来。罗马戏剧也有悲剧和喜剧两种，在题材和形式上，有的模仿希腊，有的是根据罗马历史和现实创作的。悲剧已经失传，流传下来的喜剧主要有普罗塔斯和特伦斯的作品。

普罗塔斯（约公元前254—前184）生于罗马北部的翁

布雷亚山区，属平民阶层，曾在剧场干杂活，后经商失败去做苦工，并开始写作剧本。可以说他是一位业余作家，他的作品有丰富的生活基础，特别是反映社会下层的生活，人物生动活泼，令人喜爱，很受欢迎。他一生写了 130 多部作品，大部分失传，现存的有《安非特里翁》、《阿辛纳纳里亚》、《商人》、《吹牛的军人》、《一坛金子》、《孪生兄弟》等 20 部。在创作风格上，普罗塔斯的喜剧采用希腊化时代的新喜剧，特别是用雅典戏剧家米南德的戏剧题材和背景，来反映罗马社会生活。他的作品有的取材于希腊神话故事，但大部分表现罗马社会现实。他的作品故事情节、人物类型大都从日常生活出发，滑稽可笑，通俗易懂，戏剧冲突和讽刺幽默充分反映了一般的人情世态，特受罗马人喜爱。普罗塔斯的喜剧从平民观点出发，讥讽社会习俗，情节大多是描写因风流情爱、金钱遗产而引起的纠纷，并以离奇巧合阴差阳错而获得圆满的结局。他在作品中嘲笑富人，同情奴隶，生动地刻画罗马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下层人物，军官、士兵、水手、商人、奴隶、战俘、婢女、食客、庸医、妓女、浪子、主妇、厨师以及那些花天酒地、吝啬贪财、卖弄风情的人物，在他笔下都表现得栩栩如生、维妙维肖。在创作技巧上，普罗塔斯主要以修辞见长，注重用语言技巧来刻画人物，表现主题。例如在《商人》中，外出经商的儿子买回一位漂亮的女奴，却被其父占有。这位主人在向服侍他的男奴打听事情经过时有一段精彩的对话，足见普罗塔斯作品的风格。奴隶说："啊，鼓起勇气说吧，坏事来了。当他一见到她，这老恶棍就把她抱在怀中。"主人："苍天在上！抱着她？"奴隶（高声大笑后说）"当然哪！难道会抱着我？"普罗塔斯就是用这些妙趣横生、机智幽默、夸张的语言技巧，

加上离奇滑稽的情节以及祸与福、正与反的阴阳错位，来反映罗马社会现实，并形成其喜剧风格的主要特色。

另一位喜剧作家特伦斯（约公元前195—前159）生于北非，出身奴隶，随其主人到罗马受过文化教育，后来获释成为平民。他留传下来的喜剧作品有6部，内容多是通过父子、兄弟等家庭成员的关系，来反映老少两代人之间的矛盾。特伦斯的代表作品主要有《岳母》、《两兄弟》。在这些作品中，作者站在贵族立场上，用生动的故事和滑稽可笑的情节，表明一些深刻的道理。如在《两兄弟》中，他认为穷人之所以不干荒唐事，是因为他们没有钱，富人有钱，就不免要干荒唐事，对富人干的荒唐事应予原谅。由于特伦斯的出身和经历比较特殊，所以他的文化档次和创作风格要比普罗塔斯档次更高一些。他在语言技巧上没有普罗塔斯那样生动感人，但文风却显得纯净高雅。还有，特伦斯的作品不像普罗塔斯那样立足罗马社会现实，以罗马民间文化传统为基础，而是侧重于希腊文化遗产。他的创作大多数是改编或者翻译米南德的作品。特伦斯对喜剧艺术的贡献主要在于，他以深刻的哲理思想和细腻的心理描写，运用优美的语言和扣人心弦的剧情，使人物形象极为鲜明和活泼。特别是他的喜剧中“人性”色彩非常浓厚，剧中人物关于“我是一个人”的呐喊，成为罗马人本主义思想成熟的标志，被历代哲学家和艺术家所论及和赞颂。

散文。罗马的散文在其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加图（约公元前234—前149）是惟一一位有拉丁散文作品传世的作家。他出身贵族，早年从军，后来成为政治人物，任过执政官和监察官。他精于修辞，擅长演说。据说他写的演说名篇有150篇之多，今存残片也有80多件。加图把修辞演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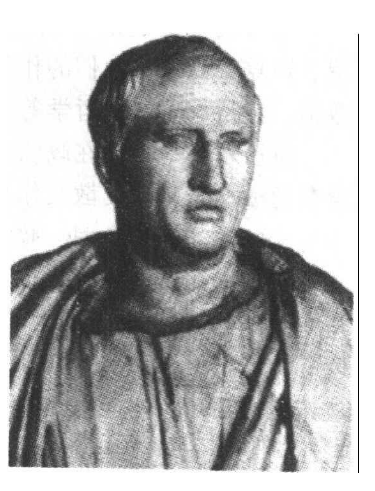
与散文写作结合起来，一生共有散文作品 7 部，内容涉及军事、政治、法律、历史、农业、医学等许多方面，可惜其中一些代表作已经散失，只有《论农业》这部散文作品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罗马文学史上的著名散文作家还有凯撒、西塞罗、瓦罗、卢克莱修等，他们的作品不仅在罗马文学史上，而且在政治、经济、军事、哲学等方面产生着重要影响。

凯撒不仅是一位在政治上叱咤风云的人物，而且是一位著名的散文家。他的散文作品大多是在戎马倥偬的军事生涯中写成的，其经世致用、政治宣传的风格十分突出。他的散文留传下来的有《高卢战记》和《内战记》两部。据说他还写有《论演说家》、《论类比》、《旅途杂记》等，还有一些演说辞，但都已荡然无存。在留存下来的两部作品中，《高卢战记》最为出色。全书总共 8 卷，前 7 卷是凯撒亲笔所写，在体例上以一个年度的事记为一卷，从公元前 58 年凯撒任高卢总督写到公元前 52 年，从公元前 52 年到公元前 51 年的战争由凯撒部将奥卢斯·依尔久斯补写，成为第 8 卷。凯撒散文的风格通俗简洁而雅致刚劲。他从小受过良好教育，长大后师承一些文化名人，受过希腊文化特别是语言与修辞的教育。再加上他丰富的军政生活实践经验，使他的作品显得更加平易简朴。像《高卢战记》这样的作品，字字句句贴近生活，从而达到雅俗共赏、老少皆宜、易读易懂、家喻户晓的程度。一位凯撒部将对《高卢战记》大加赞扬："一般人只知道他怎样出色地、完善地写成了这些战记，但是我却知道他写作是多么得心应手，一挥而成。凯撒不仅有最流畅

和最雅致的文笔，而且还有最确切的技巧来表达自己的意图。"[①]《高卢战记》的成功甚至受到他的政敌西塞罗的赞扬。由于这部著作的成功和广泛受到群众喜爱，它被当做后来人学习拉丁文的启蒙教材。

被誉为"拉丁散文泰斗"的西塞罗（约公元前106—前43）在罗马文学史上具有更大的影响。西塞罗是凯撒的政敌，但在文化上和凯撒一样，对罗马文明做出重要贡献。他不仅是罗马政治家、哲学家，而且是著名的散文家。西塞罗出身骑士家庭，家境富裕，自幼受过良好教育，先后在罗马和希腊学习哲学和修辞。他以出色的律师才能走上仕途，先后任财务官、高级市政官和行政长官，公元前63年当选为执政官。西塞罗的学问博大精深，他视野开阔，无所不及，对各方面知识兼收并蓄。他精通文史哲，尤以修辞见长。他充分吸收希腊文化的精华，又十分重视发挥罗马文化的特色，在二者的融通结合上狠下功夫。希腊修辞学在文体风格上以词藻华丽、活泼明快尽显特色，而罗马人有稳重沉着、注重现实的民族性格。这些特点在西塞罗的作品风格上，表现为结构严谨，词汇朴实，句法优美，音韵和谐。由于他的作品朴实无华，内容独具匠心，



西塞罗

① 奥卢斯·依尔久斯：《凯撒高卢战记第八卷序言》。

行文流畅自如，因而为世人叹服不已。

西塞罗的散文作品数量很多，现存演说辞达57篇，哲学和修辞学方面的传世之作近20篇。特别是他留传下来的书简竟达900篇，其数量之多，影响之大是少见的。这些书简中，最主要的有《致阿提库斯书》16卷，《致友人》16卷，内容主要是反映共和末期社会政治生活，描绘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这些作品尽管丰富多彩，但按罗马古典文献分类来看，多属修辞学范畴。他不愧为“文学泰斗”、修辞学的巨匠。在他身后一百多年，罗马修辞学家昆体良称他“取得了可和希腊人相比的成就”，“决不低于他们中的任何人”。在昆体良看来，西塞罗成功地“集聚了希腊前辈大师的优点，在他身上同时具有德谟斯提尼的力量、柏拉图的丰富和伊索克拉底的完美。……他的绝大部分甚至全部优点，都出自他本人，出自他涌泉般无穷无尽的超人的天才”。[①] 的确，西塞罗的文才曾经折服了许多人。罗马时代文艺理论家朗吉弩斯在其名著《论崇高》中，对西塞罗的作品风格和写作技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德谟斯提尼的崇高风格在于其峻峭挺拔，孤峰独立，而西塞罗的优点则是其蔓延扩伸，又如燎原大火，无往不屈，喷爆腾越于整个四野，这是从他自身迸发出来的火焰，丰富而从不衰竭……。”[②] 如果我们体味一下西塞罗的作品，就会加深对上述评论的认识。他在致阿提库斯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的店铺有两间突然倒塌了，人们说这是遭灾背运，我却处之泰然。苏格拉底啊！你教我乐天知命，我真对你感激不尽。苍天在上，我确实对这些俗

① 昆体良：《修辞学教程》，第10卷，第1章，第105——110页。
② 朗吉弩斯：《论崇高》，第12节。

事能做到无系于心了。但无论如何，我也做好重建铺房的安排，要它能使我失而复得。"① 简短的描写既有哲学家的豁达沉着，又见文学家超人的文才，怎能不为人叹服！

在罗马文学史上，博学多才、著作丰厚的散文作家还有瓦罗和卢克莱修等。瓦罗（公元前 116—前 27）早年从政，后转行从事学术研究。他博览群书，笔耕不止，一生著述达 74 部，共有 620 卷，内容涉及哲学、历史、宗教、天文、地理、航海、数学、医术、农技等广泛领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古物志》、《传记集》、《论农业》等，都是罗马文化中有代表性的古典作品。卢克莱修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而且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在罗马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他的长篇散文诗《物性论》哲理深邃，气势磅礴，在哲学和文学史上具有极大的影响。

2. 帝国时期的文学

屋大维当政的"奥古斯都时代"是罗马结束战乱、完成统一的一个太平时期。这时期有许多文学家，可以静心写作、歌颂伟大的时代，出现了许多饱学之士和文学星斗，从而带来了罗马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

这一时期，最著名的诗人是维吉尔、贺拉斯和奥维德。

维吉尔（公元前 70—前 19）是这一时期古罗马文坛上最杰出的诗人。他生于意大利北部曼图亚城附近的农村，父亲可能是个小土地所有者。维吉尔从小在乡下度过，对农村生活和农业劳动比较熟悉。他很早来到意大利北部的米兰读书，并到罗马等地学习文学、哲学和修辞学。他原打算学习演说术再从事政治，但因天性害羞，不善言辞，便改学哲

① 西塞罗：《致阿提库斯》，第 14 卷。

学。在他的许多诗作里都可看到伊壁鸠鲁学派的印记和受卢克莱修自然哲学的影响。他在农村家中写了许多诗，但大都散失，只有少数保留下来。他一生的主要作品有3部：《牧歌》、《农事诗》和《伊尼阿特》。因他出身农家，从小对农村生活和自然景象有深刻的体验和感受，他的作品在描写意大利农村美丽的田园风光，表现农民的辛劳疾苦，抒写农村生活的真实情感方面，显得更加得心应手。《牧歌》和《农事诗》就属于这类诗篇。《伊尼阿特》是维吉尔晚年倾全力创作的罗马民族史诗，在创作风格和文体上都重在对荷马史诗的模仿。但维吉尔也注重推陈出新，用旧的文学形式反映新的内容。这3部作品，在罗马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极大影响。



维吉尔

《牧歌》写成于公元前37年，是受希腊田园诗影响而写成的。它由10首短歌组成，在写法上采用了牧羊人对歌或独歌的形式，内容上有哲理诗、爱情诗、哀歌、酬友诗等。一部分诗也描写了农村生活现实，反映了小土地所有者对大奴隶主消极抗议的思想情绪。《牧歌》中浓烈的乡土气息和深刻的哲理情趣，在罗马诗坛和百姓中引起了强大轰动，甚至引起奥古斯都的重视。诗中提到曼图亚地区农民的许多土地被征占分给退役老兵，使一些农户蒙受苦难，维吉尔本人的财产也被圈占。屋大维知道后，很快命令手下人把土地归还给他。这不仅说明维吉尔的诗影响之大，受到当政者的重

视和赏识，而且表明他的诗能立足现实，反映农民生活疾苦，针砭时弊，渴望安静幸福的生活。

《农事诗》共有4卷，每卷500多行，是一篇反映罗马农民工作与生活的诗歌。在长达2000多行的诗篇里，描写了耕种谷物、橄榄和葡萄以及畜牧养蜂等农事，在文体上属于赫西阿德教诲诗一类。经过多年内战，罗马农业遭到很大破坏。屋大维推出新政策，极力恢复农业。维吉尔的《农事诗》不仅赞美歌颂意大利的美好河山、人民的勤劳和丰富的物产，而且介绍了许多农事及农业知识。他这种热爱农业、劝民归农的情感和观点，和屋大维恢复农业，发展农业的政策不谋而合，所以备受重视。

《伊尼阿特》是维吉尔晚年的一部力作，写作时间长达11年，直到他死前才初告完成。据说维吉尔带上已初步完成的诗稿，从希腊回到意大利途中不幸染病身亡。临终前他留下遗嘱，要求把诗稿烧掉。这可能是表明作者对修改诗稿的认真态度。此消息被屋大维知道后，立即下令不许烧毁，并把诗稿交给维吉尔生前好友整理后出版，这才使这部长达12卷的民族史诗得以保留下来。在《伊尼阿特》中，作者编选了特洛伊英雄伊尼阿特历尽千辛万苦，来到罗马，成为罗马开国之君的故事。史诗的主题在于叙述帝国的命运，歌颂罗马祖先建国的功绩，歌颂祖国的荣耀，并宣扬罗马祖先源于天神。在史诗中，维吉尔说伊尼阿特的儿子尤鲁斯是凯撒和屋大维的前祖，这无疑给凯撒和屋大维涂上了一层神统“圣光”。《伊尼阿特》在风格上与荷马史诗相仿，故事情节是虚构的，但其中对罗马建国历程的描写，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因而倍受屋大维器重。《伊尼阿特》有独特的艺术成就，全诗音韵严谨，情节动人，长于爱情心理描写，善用生动贴

切的比喻，因而受到世人重视，享有盛誉，以至对中世纪，乃至文艺复兴以后的欧洲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贺拉斯（公元前65—前8）是和维吉尔齐名的一位诗人，生于意大利南部的维纳西亚。他家境不很富裕，但其父尽力送他到罗马受良好的教育，后来又送他到雅典去学哲学。贺拉斯热心政治，凯撒被刺后曾追随共和派转战希腊，后来回到罗马，谋得一小官，开始写诗。他攀附新贵，结识了维吉尔和麦刻纳斯，进而和屋大维相识并获得其赏识。他从此便以诗为业，成为受赡养的宫廷诗人。不久，麦刻纳斯在罗马近郊送给他一座庄园，从此，他便在那里定居，过着宁静的生活。

贺拉斯的作品以讽刺诗、抒情诗为主，也有关于文艺评论的，其中享有盛名的传世之作有《颂歌》、《诗艺》。

《颂歌》共有4卷，是一首著名的抒情诗。在古典抒情诗中，贺拉斯的《颂歌》可谓独具风格。他恬静随和，才思俊永，往往能把人带入恬静安逸的境界，并让人在优雅明媚的田园风光中感受其乐天知命的哲理。《颂歌》中一部分内容是宣扬中庸思想的，认为享乐不可过度，规劝人们既可依附权贵，又要有自己的独立自主。他认为最美好的生活是田园生活，人要知足常乐，保持心灵平静。听听下面这段对青年人的劝勉：

> 正直的人心胸坦荡，
> 无私无畏，
> 既不为一切邪念左右，
> 也不会去花天酒地……
> 只有他能用无畏的两眼，

面对变幻的万千，
既不怕莫测的深渊，
也不怕高空的闪电。①

《颂歌》的另一部分内容主要是赞美罗马国家的伟大和歌颂屋大维的丰功伟绩。这些内容多为应时之作，是适应屋大维需要而写的，所以，显得有些苍白。

《诗艺》是贺拉斯许多诗简中的一封，这封诗体书信，主要是阐述他的文学观点，进行文艺评论。他强调作品的整体效果，提倡创新；提出戏剧作家应有生活体验，创作要有程式，结构安排上要出奇制胜；强调判断在创作中的作用，提倡文学必须“寓教诲于娱乐”，只有高超的艺术才能引人入胜。贺拉斯在亚里士多德之后重审文学模仿自然的学说，肯定文学的教育作用，主张改革贵族们追逐钱财、道德败坏的现状，摒弃那种布景华丽、追求场面热闹的舞台风格，提倡作家到生活中去寻找典型，应当宣扬公民道德，歌颂英雄们的光辉业绩，写爱国题材。贺拉斯的这些思想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他创作思想总的倾向是在保守中求创新，在作品内容和形式上他更注意形式的完美。贺拉斯的这些文艺思想和创作原则对罗马文学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也大大激发了文艺复兴时期诗人和文艺评论家的思想火花，对欧洲古典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奥维德（公元前 43—18 年）出身于一个骑士家庭，早年在罗马攻读修辞学和法学，曾留学雅典，去过西西里岛和近东各地，从而思想丰富，积累了不少创作素材。奥维德早

① 贺拉斯：《颂歌》第 3 卷，第 1——8 行。

期作品内容轻佻，反映风花雪月的东西较多。这些作品迎合和反映了奴隶主贵族骄奢淫逸、腐化靡烂的生活方式。一些作品往往令人肉麻和乏味，如《恋歌》中对一个叫科林娜的女人有这样一段描写：



奥维德

我谛视和抚摸的背和手是多么温柔！
我拥抱的那丰满的胸脯多么像微波起伏！
胸脯下那纤细的腰身多么的窈窕！
微呈曲线的臂和腿多么年轻俊俏！①

由于他的做人和作品与屋大维“重整道德”的治国政策相违背，屋大维便把他流放到黑海西岸的托米城。他在流放期间写了一些作品，最后死在黑海之滨。奥维德写了许多作品，其中有《恋歌》、《烈女志》、《爱的艺术》、《哀歌》、《黑海书简》、《变形记》等。奥维德最好的作品一般公认是《变形记》，这部作品深受人们欢迎。全诗共15卷，内容结构可分为序诗、引子、神的故事、男女英雄的故事、“历史”人物的事迹、尾声。它对古代文学的最大贡献在于，把古代世界的神话传说有机地结集在一起，并在神和人的处理上表现了巨大的独创性。《变形记》写了几百个神话故事，大都是以其主人公最后变形，成为飞禽走兽、花草树木、顽石古怪等等为结局。它的内容极为丰富，写作技巧独特。它广泛运用幻想、想像以及生动巧妙的语言，创造出了一些新鲜活泼

① 奥维德：《恋歌》第1卷。

的故事和人物，在罗马文学史上产生重要影响。

以上是罗马文学史上三位主要诗人。在屋大维死后的200年间，罗马文学再没有以前那样兴盛，出色的作家和创造性的作品较少，拉丁文学史上通常称之为“白银时代”。尽管如此，也出现了修辞大师昆体良，杂文名家卢西安，小说家阿普利乌斯等一批文学史上的代表人物。

（二）史学

罗马史学是在希腊史学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有文学家说，直到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罗马才开始积累资料，产生史学。在此之前5个世纪内，罗马没有自己的史学。[①] 但并不是说罗马史学一片空白，在罗马文化历程和史学星空上，仍有引人注目的丰碑和闪光的星座。

费边·毕克托（约生于公元前254年）可以说是罗马第一位历史学家。他著有《罗马史》，从神话时期写到公元前3世纪末，是最早详细记载第二次布匿战争的人。罗马史学的真正奠基人是加图，他用拉丁散文形式写了大量著作，其中用罗马民族语言写成的《史源》资料丰富，记述详实。全书共7卷，采用希腊历史编纂的一些方法，特别是模仿修昔底德的风格来描述历史。书中不仅记载事件，而且论说伦理道德、介绍智者格言、树立英雄楷模。由于写得生动精彩，书中所写内容在罗马人中广泛传诵。加图是罗马史发展的重要开端，从他以后，罗马史学无论是在主题、内容还是在思想观点及方法上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① 参见汤普森《历史著作史》，1967年版，第1卷，第67页。

共和末期的史学家萨卢斯特（公元前86—前34）也是罗马的一位政治家，贵族民主派的领袖。他的史学佳作主要有两部：《哈提林叛乱记》和《朱古特战争史》。《哈提林叛乱记》生动地记述了罗马贵族哈提林利用人们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于公元前63年发动叛乱，英勇战死的经过。在写作风格上模仿和继承了修昔底德"求真"的传统，较为客观地描写了事件全过程。文风上摒弃当时浮夸华丽之风，遣词造句、叙述描写力求严谨、凝炼。《朱古特战争史》记述的是罗马出兵镇压北非努米底亚王国，国王朱古特奋起反抗的战争史事。据说他还写过一部罗马史，可惜没有流传下来。

凯撒不仅是一位政治上、军事上的风云人物，而且是一位才华出众的文化名人。除了前面所述他在文学史上对散文的贡献外，他还在历史学上颇有成就。凯撒的史学代表作是《高卢战记》和《内战记》。《高卢战记》详细记载了凯撒在高卢经营的全过程，不仅记述了他对高卢人、日耳曼人的战争以及两次入侵不列颠岛的经历，而且对高卢本地的地理形势、主要物产、民族情况和风俗民情、社会面貌等进行了详尽描述。据近代一些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考证，《高卢战记》的记载基本是翔实可靠的，它对研究罗马的政治、军事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内战记》和《高卢战记》比起来却相形见拙。这是一部记述他战胜庞培及其党羽的史书，注重政治上的宣传，常有美化自己、夸大失实的地方，因而史学价值和历史影响不大。

到了帝国时期，罗马史学更加兴盛，成就更为辉煌，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李维和塔西陀。

李维（公元前59—公元17）生于北意大利的帕多瓦城（今威尼斯附近）。据说，他小时候曾在帕多瓦城读书，青年

时来到罗马定居。他的家族较为富有，这使他过着平静的书斋生活，长期足不出户，闭门攻读，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在他生活的那个风云震荡的年代里，罗马从分裂到统一，从武力征服地中海世界到共和国倾覆与帝国建立和统治，这一切变革和事件，都深深地打动着这位博学的历史学家，使他对这一时期的历史较为熟悉。加之他潜心研读过毕克托、加图和萨卢斯特等人的历史著作，这一切为他的历史著作奠定了基础。

李维的代表作是规模宏大的《罗马史》（又称《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这是一部长达142卷的力作，他历经40年才告完成。在这部巨著中，李维记述了罗马建城到高卢人攻陷罗马的外城所遭受的劫难；叙述了罗马早期的武力扩张，最后统一意大利半岛；记载了布匿战争和内战经过；描写了前三头同盟始末和凯撒与庞培的决裂，以及凯撒建立独裁政治以至最后被刺的史实；叙述了后三头同盟始末及阿克沁海角战役；记载了奥古斯都时代的政事，止于公元9年德鲁苏斯之死。可惜这部卷帙浩瀚的巨著，大多已经散失，留存的只有5卷以及陆续发现的残篇。

和以往的史家和史学著作相比，李维的著作有自己的显著特征。他把七八个世纪的史事记载在一部著作中，撰写了世界上第一部通史，开创了西方“通史”体例。他对历史人物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即使对敌手的记述也忠予事实，不偏不倚。他十分强调历史的教育作用，注重以史为鉴，指导当前的思想行动。李维的史学著作还有很高的文学欣赏价值。他是著名的散文家，有高深的文学素养和修辞功力，往往落笔生花，行文流畅，文词美妙，感染力强，以至英国诗人拜伦称赞说，李维的历史著作像是生动的画卷。但是，李

维宣扬迷信神话，并用它来解释和说明罗马一些战争的结局，认为主宰人世间一切的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这则是十分错误的。他过分宣扬罗马扩张主义，认为罗马征服地中海世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塔西陀（约公元55—120）是古代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出身富裕的贵族家庭，少年时代曾师承一著名修辞学家，受到很好的文化训练。塔西陀曾跻身罗马统治集团，做过上层要员，十分熟悉宫廷内幕和历史过程。他后来专事历史著述，一生写了许多历史著作，主要有《阿格里古拉传》、《日耳曼尼亚志》、《历史》（亦作《罗马史》）和《编年史》。其中最为杰出的长篇史著要算《历史》和《编年史》。

《历史》共12卷，主要记述罗马的一段政治历史，可惜大部分已经散失，只存下开头的第四卷和第五卷中的几章。以写作时间看，《历史》在《编年史》之前，但从所记史事内容上看却相反，《编年史》又在《历史》之前。屋大维死后至尼禄覆亡的历史，为《编年史》的中心内容，而尼禄死后至图密善则为《历史》所记。如果把两书有机合成，就是安敦尼王朝以前的帝国通史。《编年史》共16卷，今存下来的仅9卷，还有5—6卷及11—16等卷的残篇。从现存部分看，《编年史》文笔刚劲有力，语言简洁明快，内容丰富，寓意深远，可见这位杰出史学家的老道和深沉。

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东部地区即希腊文明的故土上，也有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史学成果。波里比阿（公元前204—前122年）所著的《通史》共有40卷，记述的是罗马武力扩张及其政治制度的演变。出生于小亚细亚的地理学家斯持拉波所著的《地理志》也是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对于人们学习历史具有重要作用。普鲁塔克（约公元46—120）

是著名的多产作家，古希腊、罗马最负盛名的传记作家和道德学家。他写的《希腊、罗马名人合传》（又称《传记集》）共有50篇，是世界文苑中的重要著作之一。它记述的古代历史中的许多重要人物及其事迹，广为流传。他的著述甚丰，对罗马文明乃至后来文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阿庇安（约公元95—165）是早期罗马帝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用希腊语写的《罗马史》共24卷，今存11卷，主要记述从王政时代至图拉真时代的罗马历史。另一位史学家阿里安（约公元96—175）著有不少史料价值很高的历史著作，其中传世之作《亚历山大远征记》是公认的世界历史名著之一。随着公元3世纪危机的到来，罗马史学更暗淡无光。唯心主义哲学思潮到处泛滥，基督教史学悄然兴起，宗教迷信和宗教历史观取代了史实真相，希腊古典文学和罗马史家那种求真务实的优良传统也随之消失了。

四　法制和法学

恩格斯说：罗马法“是我们所知道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法律的最完备形式”。[①] 罗马人对世界文明的最大贡献就是他们的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

---

①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3页。

（一）罗马法的演变和内容体系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经过几百年的演变，罗马法最终成为奴隶社会最发达、最完备的法律体系。

从罗马奴隶制国家形成至共和国初期是习惯法向成文法发展的时期。公元前3世纪以前，罗马实行习惯法，其规范是很含糊的。掌握立法和司法权力的贵族任意解释和运用习惯法为贵族谋利益，这样，平民要求制定成文法。经过长期斗争，公元前451—前450年制定了成文法，这就是著名的《十二铜表法》。它总结了原来的习惯法，并为以后罗马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对外征服到共和国末期，在市民法得到充分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万民法。市民法是罗马国家早期的法律，其适用范围仅限于罗马公民。随着征服地区的扩大，罗马公民和异邦人以及被征服地区居民间关于适用法律的矛盾日益突出。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公元前3世纪产生了万民法。所谓万民法，意思是各民族共有的法律，是通过罗马外事裁判官的司法活动所制定并被罗马国家用强力保证实行的，适用于罗马公民和非公民的法律。其内容绝大部分是关于财产关系的，特别是有关个体所有权和债务等方面。万民法体系更加完备、灵活，更能适应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和对外侵略扩张的需要。

罗马法发展的鼎盛时期是帝国初期。所谓罗马法与罗马法学的“古典时代”，就是指这个时期。公元2世纪中叶，两派观点渐趋一致，其后百年间学者倍出，涌现了著名的五大法学家：盖尤斯、保罗、乌尔比安、伯比尼安、毛特思

丁。这时的法学派别层出不穷，法学界百家争鸣的局面，持续达一百六七十年之久。统治者依靠法学家的帮助，全面制定了罗马私法，并为自己独揽立法大权找到了理论根据。

罗马法在帝国后期获得更大发展，通过法典编纂，形成了系统完整的罗马法法典。

罗马法具有丰富的内容和完整的体系。从广义上说，罗马法分为公法和私法两大部分。前者包括国家机关活动和宗教祭祀活动的规范，后者包括所有权、债、婚姻家庭和继承法等方面的规范。《查士丁尼法学总论》中指出："公法是有关罗马帝国政府的法律，私法是有关个人利益的法律。"从私法看，罗马法形成了以市民法为主线的三个体系，即市民法、最高裁判官法和万民法。三个法律部门组成具有内在联系的罗马法的统一整体。

市民法包括民众大会和元老院所通过的、带有规范性的决议以及其它一些习惯法规范。市民法采用属人主义，罗马公民不论其居住地区何在，均受到法律保护。而居住在罗马的异邦人和被征服地区的广大居民却得不到司法保护。奴隶主统治阶级认为这种所谓的一国一民族的法应该是永恒的。尽管由于奴隶制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变化，逐渐暴露出市民法与社会生活需要的不适应性，但罗马统治者却不愿意改变市民法。这样，市民法作为罗马法中最古老的部分，在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和演变之后，仍然被列入帝国时期的立法中。

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变化和自由民内部财产剧烈分化，市民法规范已感不足。法律必须反映经济生活和社会关系。现实情况要求对市民法进行修改，增加和补充一些新的内容。这时，奴隶主统治阶级不得不考虑改变现有的法律，但他们在形式上仍摆脱不了市民法体系。直到最后设置了专

门掌管司法大权的最高官职，即最高裁判官。最高裁判官享有一定的权力，他可以颁布告示，运用告示拟定办案原则和措施，并公之于众。这实质上使最高裁判官享有部分立法权，从而在不改变市民法形式的情况下，有效地应用法律手段为奴隶制经济基础服务。这样，最高裁判官无异于在创制新的法律规范，所有这些新的规范都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这些新的规范最终自成一套规范体系，后来被称为最高裁判官法。

万民法，实际是由外事裁判官通过司法实践活动亦即通过审理罗马人与异邦人、异邦人与异邦人之间的诉讼案件，逐步扩大其司法保护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法律规范体系。当奴隶制经济发展成为社会全部生活的基础，民事流转关系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时候，新的经济关系要求承认与罗马人发生贸易往来的其他各民族的合法权力，并且给予在罗马的外国人以必要的司法保护。而古老的市民法狭隘民族性的弱点却与之相悖。出于对商品货币的贪婪欲望，外事裁判官按照统治者的意志和愿望，终于创造了万民法体系。这种新的万民法体系，除包含罗马法原有的部分规范外，还注意吸取了同罗马国家有贸易关系的其他民族的法律规范。它以自然理性为依据，克服了市民法狭隘民族性的缺点，毕竟是一种进步，也更能满足奴隶主阶级的利益需要和整个社会的普遍要求。

罗马人以权利的主体、客体和保护为思想脉络，按结构把私法分为人法、物法和诉讼法三个部分。

所谓人法是关于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法律地位、权利的取得和丧失以及婚姻家庭关系等方面的法律。罗马法规定要具备完全的人格，享有权利能力，就必须有自由权、

市民权和家族权。享有自由权的人分为生来自由人和解放自由人。市民权指罗马市民所享有的特权，包括公权和私权。公权又分为选举权、荣誉权，私权又分为婚姻权、财产权、遗嘱能力和诉讼权。根据市民权，罗马法又把自由人分为市民、拉丁人和外国人。家族权即罗马市民在家族团体中所享有的权利。家长（家父）对外能够代表一家独立行使权利而称为自权人。其他附属于家父的人（妻、子女等）称为他权人。他权人所隶属的权力有家长权、夫权、买主权。只有同时具备这三种身份权，才能在政治、经济和家庭等方面享有完全的能力。依法享有三种身份权的自由民才享有公民的一切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拉丁人和其他异邦人的权利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奴隶则处于完全无权的地位。

物法主要包括物权、债和继承三个方面的内容，是罗马私法的主体。在法律上具有金钱价值的东西才是物，物不限于有形物体，法律关系和权利也包括在内。罗马法依据不同标准，把物主要分为有体物和无体物、可有物和不可有物、要式转移物和略式转移物、交易物与非交易物、动产与不动产、主物与从物等不同种类。物权是指权利人对其权利标的物直接行使的权利，共有六种，即所有权、役权、地上权、永佃权、质权和抵押权。物权中除所有权为自物权即物权的标的物属于权利人本人外，其余皆为他物权。奴隶主不但享有自己物上的权利，同时对他人物上也享有役权、质权等权利。债也是物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查士丁尼法典》认为，债是“按照国家法律使人担负义务的法律联系”。依据债的标的性质、给付方法等，债可分为许多种，如单一债和复合债、选择债和代替债、可分债和不可分债等。债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两种：契约和私犯。前者是双方当事人因签订契

约而发生的，后者是因侵权行为而引起的。在所有权和债的基础上，又规定了比较详尽的继承法以适应私有制发展和维护有产者利益。

诉讼法是关于诉讼程序的法律的总称。罗马的诉讼法对国家司法活动的一般原则、案件管辖范围、诉讼种类和时效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尽管罗马私法中，残存着古代法的许多弱点和特点，以及皇权排斥司法独立的鲜明趋向，但在那种相同的社会形态下又的确堪称为最先进的司法制度。同雅典一样，罗马是世界上最早就有陪审制度的国家，成为资产阶级陪审制度的发端。古罗马实行“控诉式诉讼”。与此相联系，有“保护人制度”，即保护人为被保护人所进行的诉讼代理行为，他可以出庭并在法庭上替被告人发言，反驳控诉人提出的种种指控，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辩护人制度。公元1世纪，罗马进入帝国时期以后，原来实行的诉讼代理和辩护原则便正式发展成为律师制度。现代各国律师制度，几乎莫不渊源于罗马，这是罗马法制对后世的一个重要贡献。

（二）罗马的法学理论

罗马法的发展为罗马法学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和条件，罗马法学的发展又为罗马法的系统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依据。同罗马法一样，罗马法学对后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罗马涌现出许多著名法律思想家，如波里比、西塞罗、“五大法学家”和辛尼加等人。他们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斯多噶派的自然法理论，建立起独自的理论体系，使法学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

西塞罗是古罗马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法学家。他曾

因出庭辩护触怒了独裁者苏拉，被迫出走。苏拉死后，他返回罗马，继续担任律师。他的政治法律著作有《共和国》、《法律篇》、《论雄辩》等。西塞罗接受并集中了希腊各个学派的主张，结合罗马现行法律制度，提出了以自然法理论为基础的完整的法律思想体系。西塞罗认为“事实上存在着一种符合自然的、适用于一切人、永恒不变的、真正的法——即正义的理性。这个法通过自己的命令鼓励人们履行他们的义务，又通过自己的禁令约束人们不去为非作歹。它的命令以及禁令总是对善良的人们有影响，对恶人并不奏效。用人为的立法来削弱它，在道义上永远是不正当的；限制它发挥作用，也是不允许的；使它全部无效，更是完全不可能的”。① 正是这种自然法应该成为一切人类法的准则。法律和自然法标准相结合，才是“真正的法律”。他还把神法和自然法等同起来，认为法律是上帝的一贯意志，上帝的理性依靠强制和约束来指挥一切事物。上帝是自然法的制定者、解释者、颁布者。上帝赋予人以理性和思考，理性是人和上帝的首要的共同的财富。当这种理性在人类理智中稳定而充分地发展了的时候，就是法律。世界国家普遍适用的共同的法律，不过是上帝的“世界天国政府”存在的自然法则的体现。西塞罗以永恒的、普遍的自然法则为前提推导出人类自然平等的法律观。只要在“世界国家”的大家庭中，共同服从自然法的人，不论其原来的国别、种族、社会地位如何，都具有“理性”这一最大的财富，每一个人都具有成为人类一分子的尊严。西塞罗所说的平等是指一切人在有理性、能学习以及明辨善恶与是非的能力上平等。基于此，他主张奴

① 转引自沙宾《政治学说史》，第164页。

隶也能成为国家一分子，被征服地区的居民都应当享有平等的公民权。西塞罗以自然法理论和人类自然平等的法律观为基点，进一步推导出人类社会应将成为世界性的国家。他还提出了共和政体论，认为以三种最好的政体（指君主、贵族和平民政治）互相联合、互相纠正而成的共和政体是最可取的。

西赛罗是一位贵族奴隶主阶级的法律思想家，他的法学理论不过是要给统治阶级的法以神圣的地位和理性的依据，力图通过它来调节奴隶主阶级各阶层之间的关系。西塞罗的法学理论为罗马法提供了理论基础。他的法律思想对以后西方的思想界和法律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如果说罗马是沟通古代和中世纪乃至近代思想的桥梁，那么西塞罗正是这种历史联系的代表者。如果说法学从政治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是罗马法学家的创造，那么西塞罗是其开端。

公元二三世纪，罗马先后出现了著名的五大法学家：盖尤斯（公元117—180年）、保罗（公元121—180年）、乌尔比班（公元170—228年）、伯比尼安（公元212年以前）、毛特思丁（公元250年前后）。罗马法学家继承了希腊斯多噶学派和西塞罗的法律思想，代表了罗马帝国后期法学界的一般思潮，对罗马法做了深入研究。他们提出了法律是统治者意志的思想。以后，关于法是统治者的意志或者法是理性这双重观念，就绵延在西方法学理论中。他们对法律体系进行了分类，进一步论证了自然法、万民法和市民法的关系。他们把自然法称为自然和上帝的理性、普遍适用和永恒不变的正义、各国成文法的准则和依据。盖尤斯认为万民法是同自然法一致的。乌尔比班认为由自然的条理而成的是自然

法，由各国规律而成的是万民法，由市民的法律而成的是市民法，自然法高于万民法，而万民法高于市民法。他们还探讨政治权力和法律效力的来源，认为政治权力的根本渊源是人民，法律效力来源于人民的授予。实际上，这些法学家在讨论人民主权问题时，所谈的都属于罗马城邦共和时代的政治状况。对罗马帝国皇帝权力的来源，乌尔比班说，人民把自己的权力与权威赋予皇帝，并都委托给皇帝了。显然这种理论正是迎合了罗马皇帝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罗马法学家为罗马帝国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和对外扩张主义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他们的著作是罗马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把罗马法基本内容系统化，其法律思想也富含法理。他们的这些成果在法学发展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深深地影响了近代欧洲各国的法学理论。

第九章 罗马的哲学和宗教



- 社会震荡中的哲学思想
- 基督教发展中的神父学理论

从理论上讲，古罗马哲学是古希腊哲学的继续，但它同时又是古罗马奴隶制社会内部矛盾及当时科学、宗教和道德的反映。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到帝国时期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有了相当的进步和发展，但同时奴隶制占有制的社会也开始走向危机。这种危机和没落在罗马人心理上引起巨大的震动，也在罗马统治者中间造成一种恐惧和不安。这种情况反映在意识形态上，使唯心论和宗教神学占主导地位，哲学和神学融为一体。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情况。

一　社会震荡中的哲学思想

随着罗马征服希腊，取代马其顿在地中海地区的霸权地位，奴隶制在更大范围、更大规模上得到了充分发展。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使罗马整个经济文化更加繁荣。但随着帝国时期的发展，奴隶占有制日益走向危机，社会矛盾逐渐激化。从斯巴达克起义到罗马帝国灭亡的5个多世纪中，奴隶、平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奴隶主内部元老派与骑士派及外地行省奴隶主之间矛盾重重，内战不止。公元3世纪帝国陷入全面危机，政治腐败、经济衰落，导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个部分。公元476年，日尔曼人的南侵和奴隶的起义反抗，终于使西罗马帝国消亡，

社会历史进入一个新时代。

罗马社会的动荡不安和种种矛盾，在罗马人的心理上引起了震动，产生了矛盾。特别是统治阶级心理上笼罩着恐惧不安，无可奈何的情绪：一方面想维护奴隶制统治，另一方面又无力支撑。因此，徘徊、怀疑、祈求神灵保佑等思潮占据整个心理世界，逐渐形成了以唯心论、宿命论、宗教神学为主导地位社会思潮。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罗马社会现实与人们思想心理状况的真实反映。

罗马哲学作为古希腊哲学的继续以及社会现实的反映，仍然表现出种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

（一）唯物主义思想

1. 卢克莱修：继承和发展古希腊的唯物主义传统

古罗马唯物主义的思想代表是卢克莱修，他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唯物主义的传统，是原子论的完成者。

卢克莱修（约公元前99—前55）是罗马最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是罗马原子论的著名代表。他倾毕生精力留给后人一部《物性论》的著作，从而使人们可以以科学的态度和形象生动的语言，去认识那时的自然、社会及人类灵魂的本性。卢克莱修的生平事迹不详。代表其基本思想的哲学著作《物性论》在古代和中世纪长期遭到压制和摧残，几乎被毁掉，直到文艺复兴时期的1473年才被发现，得以流传。其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是：

在自然观上，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的原子论。他提出，整个世界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永恒世界。任何事物的产生、存在都有一定的原因和条件，都有其严格的规律性。因为，任

何事物都是由“原始物体”或“种子”构成的。他说，世界上有两种物体：“一种是事物的始基；一种是始基结合而成的东西。”① “始基”又叫“种子，实际就是德谟克利特的“原子”。因此，“始基”同“原子”一样也是绝对坚固的，“没有什么能加以毁灭”②。卢克莱修认为，原子不仅是永恒的，不可分割的，而且是有形的，形状是各式各样的。在无限的原子中，有的平滑，有的粗糙，有的分枝，有的带钩。这些不同形状的原子，以不同的次序组合排列，从而形成千差万别的事物。在卢克莱修看来，原子虽然小到超越人们的视觉，看不见摸不着，但它确实是真实存在的。他说狂暴的大风、不同的物味、炎热寒冷以及人们说话的声音等等，虽然看不见，但它毕竟是存在的物体。卢克莱修还认为：除了原子之外，作为万物另一种本原的虚空也是存在的。因为虚空是原子运动的场所和条件，运动是每个人能够感觉得到的，没有虚空就没有运动,③所以“独立存在的全部自然，是由两种东西所构成：由物体和虚无，而物体是在虚空里面，在其中运动往来”④。不仅如此，卢克莱修还对原子在虚空中的运动情况作了十分生动的描述。他说，从表面上看，原子是看不见的，但实际上它是不断运动的。这就像人们从远处看山上的羊群似乎是静止不动的，但实际上它们都在撒欢跳跃着。再好比站在高山上看平原上的战争演习，看上去是一些静止不动的闪光，但实际上那里却是“刀光剑

---

① 卢克莱修：《物性论》第一卷，《古希腊罗马哲学》第379—387页。

② 卢克莱修：《物性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6页。

③ 参见卢克莱修：《物性论》第一卷，《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199—200页

④ 卢克莱修：《物性论》第一卷：《古希腊罗马哲学》第391页。

影”，一片动人心魄的战斗场面。

由于卢克莱修肯定了原子和虚空作为万物始基的物质性、惟一性的永恒性，肯定了世界万物的产生和灭亡都是原子虚空中运动的结果，从而否定了宇宙万物是“超自然的力量一次安排就绪的”①神秘本源，这是对原子论的一个发展。

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上，卢克莱修提出灵魂不可离开肉体而独立存在。他以原子唯物论为武器，深刻地揭露了“灵魂不死”的错误谬论。他认为，宗教所宣传的对死的恐惧是人类不幸和罪恶的根源，对“灵魂不死”的迷信则是人类产生恐惧的关键之所在。因此，要解决人类对死的恐惧，破除“灵魂不死”的迷信，就必须说明和证实灵魂的物质性。为此，卢克莱修指出：“心灵和灵魂的本质是物质的：因为既然我们看到它能驱策四肢，能从睡眠中夺回身体，能使脸色改变，能统治和左右整个人的状态，——而如果没有接触这是永远不可能的，如果没有物体则不会有接触——难道我们还能不承认心灵和灵魂乃是由物质的自然所构成？……我所言，它是特别精巧的，是由极小的粒子所构成。”② 所以，他断言，灵魂不能单独存在，必须依赖肉体器官。肉体也必须以灵魂作为自己的枢纽，身体没有灵魂，就无法灵活运用自身的器官。灵魂没有身体，也不能产生生命的运动。③ 所以，“灵魂不死”论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谬论。需要指出的是，在古代科学不能解释灵魂真正本质的情况下，卢克莱修依据大量的经验知识和逻辑推理，驳斥了灵魂不死的观念，得出

① 卢克莱修：《物性论》第二卷，《古希腊美学哲学》第411—412页

② 卢克莱修：《物性论》第139页。

③ 卢克莱修：《物性论》第一卷，《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57页。

了灵魂与肉体不可分离这种形神相印的结论，这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是对西方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贡献。

自然宗教的本质包含在它所崇拜的对象之中。卢克莱修在揭露了“灵魂不死”的本质之后，就转向了对宗教本质的批判。他不仅把人间的不幸、罪恶、黑暗、恐怖、愚昧都归结为宗教迷信的束缚给人带来的灾难，而且对宗教产生的根源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他认为，宗教的起因，是对自然的无知并导致人们对天体崇拜和对自然界奇异灾变的恐惧。“人类常常带着憧憬的心情，看见发生于天地之间的其它一切现象；这些现象引起人对神灵的恐惧，使人们的心灵自觉卑下，并把人们按下去跪在地上，因为对于原因的无知迫使人们把一切事情归之于神灵的操纵，并承认它们的至高无上的统治。”① 为此，卢克莱修大胆地论证了自然的形成和自然界奇异突变的产生原因。他认为，客观世界是自然发生的，世界最初是一种混沌状态，既没有天空，也没星辰，只是杂乱无章的始基。由于运动、撞击、遇集，相同的始基结合了，不同的始基分离了，从而形成了客观世界的雏形。认识自然的真正方法，不是靠提伦的卷籍（占卜的书），而是认识自然现象本性。如雷电就不是神灵的震撼，而是由火元素构成并与高空疾驰的云块相互撞击而成。卢克莱修对西西里岛伊特耶峰火山的爆发、“山冥之间”的分析都表现出这样的看法。所以，“事物的始基既不是按计谋而建立自己，不是由什么心灵的聪明作为，而各各落在自己适当的位置上，它们也不是订立契约规定各自应如何运动，而是因为许多事物的始基，每种格式，自无限的远古以来，被撞击所骚扰并

① 卢克莱修：《物性论》第五卷，第337页。

且由于自己的重量而运动着，经常不断地带动飘荡，以一切方式互相遇集在一起”①。

卢克莱修的伟大之处在于并未就此止步，而是进一步去思考了宗教所以能统治亿万人民的深刻的社会根源。他认为，宗教苦难本是人间所有。他说：“�魃鲁斯，口中吐出一阵阵可怖热焰，但是没有什么地方有这东西；存在于亚基龙的深处笞刑，他们全都是这个人世间所有的。”② 由此可见，卢克莱修已经看到了宗教不仅不能消除任何苦难，反而是人类不幸、罪恶的孵育者。如一些人为地狱之苦“出卖祖国和亲爱的父母”，一些人贪婪财富和权位，不惜“用同胞的血为自己积累好运，甚至把人间一切善良者都推翻而加以残杀”③。但是卢克莱修并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在揭露批判“灵魂不死”和宗教迷信时，并不从根本上否认神的存在。把灵魂归结为物质，虽然在反对将精神现象神秘化的唯心论、有神论上有积极的意义，但由于不理解精神现象的特殊本质，其观点本身是不正确的。

卢克莱修在《物性论》中还探讨了人类的起源和社会文明的发展。他认为人类文明并不是天意，其开端是人类模仿自然，如最初把火带给人类的是闪电。火，使人类学会了熟食和制造金属工具。音乐的发生则是由于人们模仿鸟类流畅的歌声，风吹芦苇的鸣啸。甚至连语言也不是人有意的创造。他说：“如果以为在那些日子有人给周围的事物规定了

① 卢克莱修：《物性论》第五卷，第286页。

② 卢克莱修：《物性论》第三卷，第181—183页。

③ 卢克莱修：《物性论》第一卷，第133—134页；第三卷，第183页。

名称，然后人们从他学习了事物的最初的名目，那就是蠢话。”① 他甚至认为人也是自然的产物。上述思想表明，在卢克莱修看来，人类社会是一个不断进化发展的过程，并不是由预谋而安置的。针对罗马当时穷兵黩武，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社会现实，卢克莱修认识到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并对私有制进行了批判。他认为，正是黄金，助长了人们聚敛财富的野心，引出了层出不穷的战争。因此，社会契约既是维系社会共同生活的需要，也是国家法律建立的基础。

由此可见，卢克莱修的哲学思想，不仅系统化了原子唯物论，批判了“灵魂不死”和宗教迷信，而且运用原子唯物论回答和论证了当时的一些重大问题。其《物性论》不愧为古代一部优秀的唯物主义哲学著作。

2. 琉善（卢西安）：宣传无神论与唯物论

琉善是古代罗马著名的哲学家和修辞学家，在哲学、无神论方面对罗马文明做出了贡献。

琉善，约生于公元120年叙利亚的幼发拉底河畔，死于公元180年与200年间。他的家庭是一个手工业者，本人从小学过雕刻，后来离家到小亚细亚西岸的一些地区游历，读了大量演说家、诗人的作品，成为一名著名的修辞学家。公元164年前后，他放弃修辞学转而研究哲学，并先后辗转马其顿、科林斯等地，最后回到叙利亚。老年时曾在埃及做过罗马官吏，后来因病弃官从教，在生活贫困时病亡。

琉善的著作很多，是保存下来的古代文献中数量较多的人，以琉善名义保留下来的作品共有84篇。但也有人说其

① 卢克莱修：《物性论》第五卷，第327页。

中有的是伪作，不过从人们公认的真笔中，可以看出其完整的思想体系。琉善在哲学上总的思想倾向是宣传无神论和唯物论，他对现存的奴隶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揭露，对各种唯心主义宗教迷信给予有力的嘲讽和抨击。琉善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以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坚持无神论，否定神的存在。他对唯物主义哲学家备加赞赏，对那时普遍流行的宗教迷信偏见和神职人员对民众的欺骗无比愤怒，给予无情的揭露和痛斥。琉善的无神论哲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对研究罗马哲学和宗教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以致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都给予他很高的评价。

鲜明的社会政治观点

琉善生活和著述的时期，正是罗马皇帝马可·奥里略统治的时代。那时，正是罗马帝国的盛期。生产技术的改进、科学成果的应用，使生产力快速发展，帝国经济进入空前繁荣时期。然而，繁荣之中孕育着危机。经济的高度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正在冲击着落后而野蛮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奴隶制经济日趋走向衰落。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斗争和奴隶起义从未间断，加之外族人入侵，罗马奴隶制社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到马可·奥里略时代，帝国太平盛世——“黄金时代”即将结束。罗马帝国随着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危机而发生动摇，只有隶农制仍广泛实行。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手工业和自由佃户纷纷破产，变为隶农，这些人随时都有可能被奴隶主作为奴隶。于是，随着反对统治阶级队伍的扩大，社会的对立和斗争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这种社会危机反映在哲学等意识形态上，产生了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统治阶级利用宗教欺骗人民，大肆愚弄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宣扬基督教，用于维护其即将没落的反动统治。哲学和宗教完全变成直接

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了。

琉善的社会政治观点和哲学思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他从穷人和奴隶的利益出发，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腐败，阐发了他的社会政治观点。首先，琉善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他把矛头直接指向社会的最高统治者，认为当时的社会里坏人充满了整个城市，主宰一切的是无知和欺骗，许多人道德堕落，变得奢侈、苍白、下贱。在琉善看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社会上很多人把金钱看得过重，甚至为了金钱互相残杀，而有了钱的人则变得虚荣、无知、傲慢、柔弱、蛮横。根据这种观点，琉善着重对僭主这种奴隶社会的统治者进行了揭露和抨击。他说僭主往往凌驾于城邦之上，坏事做绝，罪该万死。僭主死后和以往的君主一样变得卑贱、渺小，以致不论什么人都可以骑在他的脖子上，踩他的肩膀。琉善还对总督等各级官吏进行了无情揭露，他说，那些富人都“眼睁睁地盯着黄金”，“他们由于生活奢侈，有如发了霉的口袋，已经腐朽了。因此，即使有人给他们装进智慧、坦率或真诚，这东西也会立即露出来，流失掉，因为底部盛不住……”。① 其次，琉善的思想明显地表现出对穷人的无限同情和对美好社会的热切向往。他用一个鞋匠死后到冥间去的故事，来说明对当时黑暗社会的憎恨和对美好社会向往。他说，穷人们对那个社会简直深恶痛绝，无法容忍，如果有人说要离开这个社会，他们甚至连鞋都来不及穿，就会跟着往前走。因为，穷人没有黄金、住宅、田地，没什么值得留恋的。在琉善看来，美好的社会

① 琉善：《冥间的对话》、《琉善哲学文选》，罗念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4月第1版，第133页。

应该是人人平等的社会，在那里一切都很美好，人人有平等的地位，没有人比旁人优越，没有人追债，不须上税，冬天不至于冷得发抖，也没有疾病，不会捱权势者的棍棒，到处都很平静。穷人笑逐颜开，富人叫苦连天。①

琉善的这些社会政治观点，虽然无情地揭露了社会的腐朽，抨击了反动阶级的统治，看到了穷人和富人的对立和斗争，并力图揭示社会问题的根源，提出了美好社会的目标方向，但他还没有找到社会的分裂和对立的真正原因，看不到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对社会的影响和作用，因而还是不科学的。

提示了社会变革时期罗马哲学的本质和特点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要评价古代世界崩溃时代的晚期古代各家哲学学说的现实意义……只须注意一下这些学说的信徒在罗马称霸世界时的真实处境就行了……可以在琉善的著作中找到这样的描述：人民如何把他们看作当众出洋相的丑角，而罗马资本家、地方总督等如何把他们雇来养着作为诙谐的弄臣，要他们在餐桌上为几根骨头和面包屑而和奴隶们争吵不休，在争得一勺酸酒之余，就专管用'不动心'、'忘言''快乐'等逼人的话来使大臣和他们的客人们开心。"② 的确，在琉善时代，奴隶主阶级的哲学完全变成统治者的附庸了，哲学原有的革命性和进步性停滞和堕落了，唯心主义盛行，被歪曲和庸俗化了的哲学同宗教一起，成了统治者玩物丧志的思想基础。面对

---

① 琉善：《摆渡》、《琉善哲学文选》，罗念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4月第1版，第3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48—149页。

这种情况，琉善坚定地高举唯物主义大旗，坚持无神论观点，针锋相对地对奴隶主腐朽没落的哲学给予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

琉善站在受压迫人民的立场上，严厉痛斥当时各派哲学为奴隶主统治阶级服务、欺骗劳动人民的本质，揭开了蒙在他们身上的看似正人君子，实则奴才走狗的层层面纱。他在《还阳者——钓鱼人》、《出售哲学》、《提蒙》、《墨尼波斯》等著作中，尖刻地剥开了反动哲学家的伪装，许多地方写得极为精彩、生动，读来让人痛快不已。我们不妨用一点篇幅来摘引他那精彩论述中的一片断：

天那！他们所说的话真好，真聪明，真令人钦佩！可是他们之所以传授这些教诲，不过是为了要薪金，他们尊崇富人，张着嘴注视金钱；他们比狗易怒，比兔胆怯，比猴子谄媚，比驴子淫乱，比猫爱偷，比鸡好斗。他们成了笑柄，因为他们争吵不休，在富人的门前推推搡搡，他们参加盛大的宴会，在那里发表庸俗的颂辞，不顾体面地大吃大喝，还公开抱怨饮食不够，举着酒杯高谈阔论，声音刺耳，令人生厌，他们喝纯酒过量，烂醉如泥。那些在场的外行人自然会讥笑他们，唾弃哲学，因为他们抚养出了这样一群废物。

最可耻的是，他们每个人都说，什么也不需要，而且大声地宣称，只有聪明的人才是富有的人。可是过了一会儿，他们就出来乞讨，得不到施舍，就感到愤慨，像一个人穿上国王的衣袍，戴上高耸的冠冕，拥有王家的一切威仪，却向比他低贱的人行乞。

他们需要施舍的时候，大讲应该共同享受，似乎财

富无所谓好坏："金子和银子是什么东西？无异于海上的石头子儿。"但是当一个老伴或朋友需要帮助，跑来向他们乞讨他们的大量金钱中的一丁点儿时，他所遭遇的却是沉默、困惑、无礼以及对信条的否认；他们的那么多论友谊的话，以及善和美都远走高飞了，不知跑到哪里去了，真是言辞有翼，白白地被他们每天用来在学园中对着影子争吵①。

由此可见，琉善对当时的社会和哲学的本质看得是那样清澈透底，把反动哲学家揭露得那样体无完肤。

与此相反，琉善对唯物主义却大加赞赏，深表敬意。他在《伊卡洛墨尼波斯》、《提蒙》、《出售哲学》等著作中，对恩培多克勒、阿那克萨戈拉、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以及伊壁鸠鲁等人备加称赞，敬佩不已，认为他们是最聪明的人，是真理的代表者，他们的哲学对那些鼓吹宗教迷信的歪理邪说具有金钢石般的识别力。

从哲学基本问题上说：琉善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论述了哲学上两条路线的对立和斗争，这无疑是对哲学的一个重要贡献。

坚持无神论，对宗教迷信进行无情揭露和批判

琉善对宗教迷信的批判，深得恩格斯赞扬。恩格斯甚至称他为"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伏尔泰"②。

琉善首先认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神，对神的崇拜

---

① 琉善：《还阳者——钓鱼人》，《琉善哲学文选》，罗念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4月第1版，第97—98页。

②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27页。

和迷信反映了人们的无知和愚昧。他在《神的对话》、《演悲剧的宙斯》、《被盘问的宙斯》等著作中，坚定地否定神的存在，并用通俗而深刻的分析和朴实的道理，来说明神是不存在的。琉善说，既然神是救世主，那他为什么把毫无过错的人钉在十字架上？既然一切都是由命运决定的，那么还有什么必要去敬神呢？既然神是完美无缺的，为什么他们也要恋爱、受伤、遭受镣铐，沦为奴隶，甚至从巨富变为穷光蛋？琉善还从神的存在形态和人们敬神的过程来说明神的不存在。他说神完全是骗人的，在一些城市里白鹤或鳄鱼是神，而在另一些城市里狗、猫、猴又是神，一些人以左肩为神，另一些住在对面村庄的人则是以右肩为神，这不是很可笑吗？① 琉善还说，从人们敬神的过程看，最初是以树林、山岳、飞禽、植物来作贡，后来又修建神庙，为神雕像。所以神是人造的，并不是先天就有的。

在此基础上，琉善彻底揭露了基督教的骗局和迷信的荒谬。他在《佩雷格林之死》一文中，通过一个基督教主教那流氓无赖的生活史，揭露了基督教僧侣的卑鄙、虚伪和诡诈。琉善认为，要摆脱迷信的泛滥和欺诈，必须对迷信的荒谬性进行揭露。在他看来，把已去世的人当成神、预言者，为他们大办丧事、立碑、建坟，都是没有必要的，愚蠢的。琉善对破除迷信的论说是很诚恳的。他说老年人不要向孩子们讲关于鬼神的故事，这会给没有知识的孩子们增加恐惧和不安。真正破除迷信的办法是学习科学，增长知识，有了这个武器，任何谎言都不会迷惑和扰乱我们。

① 琉善：《演悲剧的宙斯》，《琉善哲学文选》，罗念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4月第1版，第189页。

琉善的唯物论和无神论哲学思想，不仅是当时罗马哲学的重大的成就和对古代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的巨大贡献，而且对当时的人民起了很大的启蒙作用，对后来的哲学和政治斗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哲学思潮

随着罗马的征服和扩张，希腊文化得以在地中海沿岸传播开来，开始与其它文化接触、碰撞并产生出各种不同的哲学思潮。

①西塞罗的折衷主义

希腊文化在罗马世界传播开来时，罗马思想家们虽然接受了希腊文化，但并没有建立起独立的思想体系，而只是根据自身的需求，拿来他们所需要的思想，因此，就出现了折衷主义的哲学思潮。其著名代表就是西塞罗。

西塞罗是罗马共和末期的一位政治家、演说家和拉丁语著作家。在罗马共和末期的奴隶主统治集团内部集权斗争中，他支持旧的元老院制度，反对新的独裁制度。西塞罗在哲学上毫无独创之处，只是继承和混合了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主义、柏拉图哲学和斯多噶派的唯心主义。因此，西塞罗反对用原子和虚空来解释世界。认为“根本不能有什么虚空，也没有什么看不见的形体”。[①] 相反，他同意神灵的存在。他说“我同意神灵的存在”[②]，“灵魂是‘普通神心’所

① 西塞罗：《论神性》，《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158页。
② 西塞罗：《论神性》，《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158页。

分出来的……灵魂既然是如此迅急活泼的东西，能记忆过去，能推测未来，能理解艺术科学，能有如许之发明，既如此之广大无边，其本质一定是不死的了”。① 他指出人们所公认的清晰明白的概念是神给予的，人生而就有“天赋意念”。人类没有确定的知识，而只有惑然的知识。因此，人的美德在于发扬理性，控制欲望，寻求快乐只能使人堕落，最理性的政体是君主、贵族和民主派的联合政体。由此可见，西塞罗的上述思想实际上是毕达哥拉斯主义和柏拉图哲学、斯多噶派和禁欲主义、宿命论与当时怀疑主义的综合。

②新斯多噶派的哲学思潮

斯多噶派是一个传播很广并且存在很久的哲学学派，其学说的中心是以宿命论为主导思想的伦理学。创始人为芝诺。大体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晚期的斯多噶派即称为新斯多噶派，其著名代表是辛尼加和马可·奥里略。

辛尼加（公元前 4—65），罗马皇帝尼禄宫廷的朝臣，奴隶主贵族统治者官方哲学的著名代表。他认为，奴隶和奴隶主都是自然所生，他们之间是一种平等关系。因此，奴隶对奴隶主应“超出日常服务，例如牺牲自己的生命和所有的一切来拯救需要帮助和陷入危机的主人”，② 而奴隶主应对奴隶和善些，这是维护宇宙的统一、和谐、秩序和发挥人性的准则。他还将早、中期斯多噶派鄙视物欲，追求心灵安宁的道德教条发挥到极致，认为“肉体上的快乐是不足道的，短暂的，而且是非常有害的，不要这些东西，就得到一种有力的、愉快的提高，不可动摇、始终如一、安宁和睦、伟大

① 西塞罗：《论老年》，《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 187 页。

② 辛尼加：《论幸福生活》，《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 123 页。

与宽容相结合”。[1] 当辛尼加教训别人要遵从道德，摒弃物欲和快乐生活时，他自己却争得了尼禄宫廷的高官厚禄，过着奢侈、腐化的生活。这一矛盾充分暴露了辛尼加宣扬宿命论禁欲主义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马可·奥里略（公元121—180），罗马帝国的皇帝，被称为“宝座上的哲学家”。他认为，每个人都是宇宙整体的一部分，每个人都与其它部分密切联系着。因此，“要使你自己适应于你的命运注定要同他们在一起的那些事物，以及你命定要和他们在一起的那些人，要爱他们，要真正地忠实地这样做”。[2] 马可·奥里略从禁欲、宿命、服从出发对宇宙理性、神、善推崇备至，论证也不遗余力，甚至提出不要关心自己的命运，要去关心自己的责任，对朋友要正义，对自己要冷漠的最高的善的要求。

总之，包括新斯多噶派哲学在内的整个斯多噶派哲学理论体系的中心目标，就是要制造一种适合奴隶主统治集团的道德学说。

③新怀疑主义思潮

怀疑主义作为一种学派是与伊壁鸠鲁学派、斯多噶派差不多同时出现的。其创始人是皮浪（公元前360—前270）。怀疑主义也有早、中、晚之分。早期即希腊化时期的皮浪的怀疑主义；中期为柏拉图学园派（中期）怀疑主义；晚期即罗马时期的怀疑主义，又叫新怀疑主义，其主要代表是塞克斯都·恩披克里。

新怀疑主义思潮的主要思想是进一步发展了皮浪的怀疑

① 辛尼加：《论幸福生活》，《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190页。
② 马克·奥里略：《沉思录》，《古希腊罗马哲学》第448页。

主义。他们认为，无论是感性知觉或理性思维都不能提供可靠的知识，不可能有"自明"的真理。恩披克里说："无论感性知觉或思维都不能给我们提供出一个真理的标志，我们可以用来当作真理标志的一切，都会充满着矛盾的，都是不可靠的。"① 因此，对一切事物的本质和价值不要做判断，一切都可怀疑。"对一切都应当保持不决定的态度。"② 恩披克里还通过为怀疑主义提出的5个论据，通过对认识的相对性、矛盾性的论证，提出事物和认识本身都应当彻底怀疑的观念，并要求人们对一切都采取保留思想，不作决断，以免"独断之义"。

值得指出的是，怀疑主义虽然认为一切都可怀疑，但他们主张人仍应当遵循国家的法律、社会习俗和宗教仪式。

④新柏拉图主义

新柏拉图主义不是简单地复活柏拉图的学说。这个学派是以柏拉图的理念论和神秘主义思想为基础，接受毕达哥达斯学派、亚里士多德、斯多噶派的思想，并与东方的神学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神秘主义哲学。其真正的创始人，也是最著名最有影响的代表是柏拉丁。

柏拉丁（公元205—270）在哲学上充分发挥了柏拉图关于理念和理念世界是惟一真实的学说，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一个独立的哲学体系。

柏拉丁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太一"，也就是神。"太

① 塞克思都·恩披克里：《皮浪学说概略》第一卷，《古希腊罗马哲学》第457页。

② 塞克思都·恩披克里：《皮浪学说概略》第一卷，《古希腊罗马哲学》第457页。

一”是绝对的，它排除杂多、运动和区别。它虽然不是具体物，超越一切，但又能产生一切。他说：“‘太一’本身并不是万物中的一物。所以它既不是一个东西，也不是性质，也不是数量，也不是心智，也不是灵魂，也不运动，也不静止，也不在空间中，也不在时间中，而是绝对只有一种形式的东西，或者无形式的东西，先于一切形式，先于运动，先于静止。因为这些东西都属于存在，存在创造了这些繁多的东西。”①

柏拉丁认为，世界万物是从“太一”那里流溢出来的。“太一”首先流溢出“努斯”、“心智”、宇宙理性（即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其次从“努斯”或“心智”中流溢出世界灵魂；最后则从“灵魂”中流溢出物质世界。在柏拉丁看来，“物质世界”离“太一”最远，是与“太一”对立的，因此，它是对存在的否定，它是杂多体，是最卑贱的，是邪恶的根源。但是，灵魂趋向自然，与物质结合虽然是一种堕落，却是一种必然。因为，灵魂也像“太一”、“心智”一样，有一个表现和施展自己的过程。施展就要有对象，有对象就必须产生事物。所以，人生的目的就在于“赶快脱离这个世界上的事事物物”。② 而要达到这一目的，灵魂必须经过“净化”，即消除一切肉体欲望，从肉体中超脱出来，清珍静观，断思绝虑，与“太一”融而为一，和神合二为一。

柏拉丁哲学，实际是对罗马帝国的没落以及奴隶制全面衰竭和危机的反映，因此，它所表现出来的是对“现状不堪

① 柏拉丁：《九章集》，《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14页。
② 柏拉丁：《九章集》，《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218页。

忍受，未来也许更加可怕，没有任何出路，悲观绝望”①。其思想观点很多被基督教所接受，从而成为基督教教义的组成部分。

二 基督教发展中的神父学理论

基督教对于欧洲乃至全世界社会历史、思想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它与欧洲哲学思想的发展关系也很密切。

（一）基督教的产生与早期发展

经过几个世纪的侵略与扩张，罗马成为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公元前63年，罗马军队攻占耶路撒冷，屠杀12000多名犹太人，标志着巴勒斯坦已被罗马占领，成为罗马帝国控制下的一个附属国，受叙利亚总督管辖。

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犹太人从未停止过反抗斗争，下层人民的起义连绵不断，此起彼伏。但这些起义都遭到罗马统治者的残酷镇压和疯狂迫害，起义大都失败，犹太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于是，一些人“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寻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寻思想上的安

① 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33页。

慰，以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①。但是，这种精神上的出路在哪里呢？答案是，它就在宗教中。因为，虽然当时的犹太人中流行着好几个宗教派别，但它们都信仰犹太教先知的预言：将有一位救世主——弥塞亚降临，在地上建立起神的统治。这种信念正好适应了当时遭受迫害走投无路的犹太人渴望得到心理上的安慰和精神上有所寄托的需要。这样，在各犹太教派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宗教——基督教。

基督教在其形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既吸收了斯多噶派的宿命论、禁欲主义，又接纳了以斐洛为代表的犹太——希腊哲学、新毕达哥拉斯主义、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主义，并对"逻各斯"作了神秘的解释。可以说，那些没落的希腊罗马哲学为基督教提供了思想养料，并成为其教义的重要内容。

基督教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思想理论基础决定了其早期思想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基督教最初是从被压迫和被统治的下层民众中产生的，所以最初的基督教是"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或驱逐的人们的宗教"②。因此，这时基督教的思想观点基本上表现为对罗马统治者及一切特权的仇恨。《约翰启示录》中将罗马帝国比作"大淫妇"，用7头十角怪兽影射尼禄，并预言基督即将降临，战胜罗马皇帝等等，都是上述这种思想观点的反映。恩格斯曾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这些观点都敌视当时的制度，敌视'当局'。"③ 所以，早期基督教遭到了罗马统治者的残

① 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34页。

② 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25页。

③ 恩格斯：《启示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1页。

酷迫害和镇压。但是，另一方面，早期基督教的思想内容中又有许多消极的东西，如受宿命论的影响，它并不要求民众去反抗，去变革，而是要人们忍耐，消极等待基督的降临，拯救世人，并认为基督统治的“千年王国”代替罗马帝国是上帝早已安排好了的，不需要斗争，不需要反抗。显然，这种“千年王国”的降临，在现实世界中是实现不了的。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才说：“基督教和工人的社会主义都宣传将来会解脱奴役和贫困；基督教是在死后的彼岸生活中，在天国寻求这种解脱，而社会主义则是在这个世界里，在社会改造中寻求这种解脱。”① 早期基督教的消极性使其在往后的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被罗马统治者利用。

早期基督教的变化首先表现在它的成员和领导已逐步为剥削阶级所渗透和控制以及它的教义、制度甚至整个思想体系逐渐和罗马统治者的意识相融合。基督教兴起之初，其成员主要是奴隶、被释放的奴隶以及广大下层贫民。但随着基督教从农村扩展到城市，教徒队伍越来越大时，其成分也越来越复杂，一些奴隶主和富人加入进来，地方官员甚至罗马帝国的一些宫廷官员和军队的成员也成了教徒。它表明，上层统治阶级和剥削分子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环境里也需要心理安慰和精神解放。同时，基督教会活动所需要的物质保障，也要上层人物的钱财支持。上层贵族分子的人教，使基督教的性质和教义开始发生变化，他们不仅把持教会的权力，而且根据自己的需求，逐渐确定了以主教为中心的尊卑分明的教职教阶制度以及一整套教规礼仪，竭力向教徒和其

① 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25页。

他民众灌输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宿命论的伦理道德，并要求教徒放弃反抗斗争，服从罗马的统治。基督教大肆宣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① 的阶级调和论，公开为罗马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辩护，成为罗马统治者统治的工具。

伴随着早期基督教的上述变化，罗马统治当局对基督教的政策也发生了较大改变：由迫害、镇压逐步地转变为扶植、控制和利用。特别是当罗马帝国的“强盛时期”已过，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统治者需要一种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思想工具时，这种变化就表现得更加明显。公元 313 年，“米兰敕令”的颁布，不仅使基督教取得了合法的地位，而且取得了种种特权。经过公元 321 年尼西亚会议和公元 381 年君士坦丁堡会议，尤其是公元 392 年禁止基督教以外其它一切宗教的合法存在的令谕的颁发，基督教终于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它表明欧洲奴隶主阶级在意识形态上已完全没落了。

（二）基督教的教父学和宗教信条

基督教在其国教化过程中，在信徒中出现了一些护教人物，他们不但宣传基督教信仰，制定教义，而且努力为信仰作论证，逐渐形成了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前身——“教父哲学”。“教父哲学”的根本目的是为罗马统治阶级服务，因此，其思想内容多是原始基督教中的消极成份和当时流行的各种惟心主义哲学思潮。这个时期，由神父们制定的神学信

① 《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 5 章，第 39—40 节。

条主要有：

①**创世说** 他们认为，上帝从虚无中创造出包括人在内的世界上的万事万物。

②**三位一体说** 基督教反对多神教，信仰惟一的神，认为上帝是世界的主宰，是一个有意志、有智慧、有情感的人格化的神，主张上帝具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并共存于同一个神的"本体"之中。

③**原罪说** 他们认为，上帝最早制造了亚当和夏娃这两个人类的祖先，但由于亚当和夏娃受邪恶的引诱，偷吃了伊甸乐园中的禁果而犯下大罪，他们的罪恶传给了自己的子孙，使其人人有罪，无一例外。

④**赎罪说** 基督教认为，人既然都有罪，因此世人受苦受难，就无法自救，需要靠上帝来解救，于是救世主耶稣通过受苦而替人类赎了罪，所以，人类应当把自己无限地奉献给上帝和基督。

⑤**天国报应说** 基督教的宗旨是信仰上帝和基督，为此就必须服服贴贴地接受上帝所确定的地位、身份，蔑视鄙弃物质生活享受，以求升入天堂，实现永恒的幸福，否则死后就要打入地狱，永遭惩罚。

⑥**天启说** 基督教认为，跟信仰相对立的一切知识是无用的，因为信仰完全来自上帝的天启，而一切真知都是"天启"的，所以认识和理性要服从信仰。

教父们所制定的上述教义，一直被基督教会所沿用，同时也成为基督教会内部争论不休的几个问题。但是，从宗教发展史看，上述教义既巩固了基督教在欧洲奴隶社会中的地位，又成为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重要理论基础。

（三）神学世界观的系统化

“教父哲学”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早期基督教的一批虔诚信徒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奥里根和得尔图良在神学世界观的系统化上做出了突出贡献。

①奥里根：运用希腊哲学建立基督教神学体系的第一人

奥里根（约公元185—254）出生于北非亚历山大城，早期基督教著名的神学家兼哲学家。自幼在亚历山大城的基督教教理学校学习神学、哲学，后继任该校校长。奥里根自小就从其父亲那里接受基督教思想，每天都要背几段《圣经》并刨根问底，还学习了希腊文化知识。公元202年，罗马皇帝反对基督教，父亲被捕，奥里根决定随父一起接受信仰考验，为基督教牺牲，由于母亲阻拦，未能如愿。父亲殉教逝世后，17岁的奥里根就肩负起赡养母亲和6个小兄弟的责任。公元203年，奥里根被破格任命为教理学校第三任校长后，他一方面大力宣扬基督教教义，另一方面孜孜不倦，刻苦钻研各种文化知识，尤其重视哲学知识的学习。他还常去卡萨卡斯创立的哲学学校学习，同柏拉丁一起琢磨新柏拉图主义，后又去罗马、巴勒斯坦和雅典旅行，了解新斯多噶主义，终于创立出一个以新柏拉图主义和新斯多噶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亚历山大里亚基督教学派，并博得了许多听众，吸引了教内外的不少学者，成为远近闻名的人物。

奥里根一生著作颇多，传闻有6000卷之多，但目前保存下来的极少，且残缺不全。在所流传下来的著作中，最有名的是《原理论》和《驳凯尔斯》。其他的还有《旧约六面对照》，《旧约八面对照》，《论复活》，《告殉教者书》等。

奥里根着重论证了以下几个宗教哲学原理：

上帝和三位一体论 奥里根认为，上帝涵盖了整个宇宙，但上帝又超越宇宙。他说“上帝不是物质，而是精神”，“上帝即完满，他就是善”，是一个“纯粹的神体”[①]。因为“上帝是精神，朝拜他的人应该用心灵和真诚来朝拜他”，所以“你们不知道，我们都知道”。因此，人们如果摆脱物欲，超越宇宙，接收圣灵内心的照明，就能够认识到上帝。用耶稣基督的预言就是：“心灵纯洁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将看见上帝。”[②] 显然，这些论述与柏拉丁所论述的“太一即神”，是最高的存在极为相似，奥里根根据《圣经》加以神化，使之与上帝挂上钩。

奥里根根据新柏拉图主义对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教义进行了论证。他认为，上帝是惟一的，但可分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其中在世界万物之前圣父就生下圣子，但圣子保持着圣父的性质。圣子仅次于圣父，因此，圣父是第一位的，圣子是第二位的。[③] 而圣灵是由圣父和圣子共同创造的，因此，它具有神的本性，同圣父、圣子一样是精神的，但其功能减弱不仅次于圣父，也次于圣子。所以在奥里根看来，上帝三位虽然是同一性质的统一神体，但存在着高低等级的区别。他说：上帝“绝对单一”、“至高无上”，圣子、

① 奥里根：《原理论》Ⅰ，第1页；《驳凯尔斯》Ⅰ，第23页，Ⅵ第69—72页。

② 奥里根：《原理论》Ⅰ，第1—2页；《驳凯尔斯》Ⅰ，第23页，Ⅵ第70页，Ⅶ第34页。

③ 奥里根：《原理论》Ⅰ，第2—3页。

圣灵表现为多种多样。①

创造论 古希腊哲学对宇宙起源问题的探讨对奥里根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奥里根不同意古希腊哲学关于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永恒的看法。他通过长达18年对《旧约·新世纪》的研究，所得到的结论是“我早就批评有些人对《圣经》作字面的解释，断言世界是六天造成的”②。这表明，在奥里根看来，上帝创造万物是在时间之前，或者说，上帝创造世界是无时间的。他认为，如果先存在时间，那么上帝在创造之前无所事事，这不是同上帝的“全能”发生矛盾了吗？上帝最初创造的是同永恒的、无形的、看不见的神体相似的东西，即“灵魂”。正是灵魂利用自由采取各自志愿，从而产生各种不同的无不具有形体的具体事物。所以，上帝虽然无始无终，但正是上帝创造灵魂的堕落而演变成了客观世界的万事万物。由此可见，奥里根以新柏拉图主义的流溢论为理论根据，在基督教思想史上首先创造出了上帝创造世界的神学理论。

人——灵魂又一次堕落的表现 就客观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由上帝创造灵魂的堕落产生的而言，人的产生也不例外。因此，人始终是有罪的。表现在人的灵魂已被禁锢在肉体之中，受肉体的各种欲望的影响，而不得不做恶。但是，在奥里根看来，人虽堕落，却依然具有本性和自由。所以，人依然知善、向善。或者说，人可以超脱物欲，回归到至善的上帝那里，人人得救是可能的。他说：“我们说过，灵魂——

① 奥里根：《原理论》Ⅱ，第4页；《驳凯尔斯》Ⅰ第23页，Ⅶ第64—66页。

② 参见奥里根：《驳凯尔斯》Ⅵ，第60—61页。

主要指理性的灵魂——比任何物体珍贵，因为它具有创造主的形象”。他还进一步指出：“因为上帝的逻各斯及其医治能力远胜过灵魂所有的恶。再者，上帝这种能力运用于每一个按照上帝意志生活的人。”① 为了论证这种观点，奥里根甚至提出地狱里的魔鬼也能得救的观点并予以证明。他说：“魔鬼并不是上帝创造时就是魔鬼，而是在他们具有思想变成理性的创造物时，才成为魔鬼这种状态的。”可见，“总是思想的一种表现。恶依附于物质，居位在可朽的事物之中”②。因此，上帝的“至善”和“万能”使魔鬼和人一样都能得救。

奥里根的上述思想理论虽然引起了较大的争论，但是，他的这些思想对基督教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他主张研究哲学、利用哲学论证教义、让哲学结合于信仰的方法不仅被当时许多教会和教父所拥护，而且被以后很多的基督教神学家和哲学家们如奥古斯丁等所接受和应用。从这个角度上讲，奥里根不愧为当时富有思想和远见的著名神父哲学家。

②德尔图良：第一个伟大的神学家，坚强的教父

德尔图良（约公元160—240）出生于罗马帝国的北非行省迦太基城（今突尼斯附近），其父是罗马帝国常驻北非的步兵大队百人队长。他幼年时期是个纨绔子弟，过着花天酒地骄奢淫逸的生活，毫无信仰可言。大约在公元195年皈依基督教后，他推崇信仰，贬低理性，开始投入到辩护其宗教信仰的宣传活动中。为了捍卫其宗教信仰的神圣性和纯洁

① 奥里根：《驳凯尔斯》Ⅵ，第62页。
② 奥里根：《驳凯尔斯》Ⅵ，第65—69页。

性，德尔图良于216年与罗马教会决裂，参加摩泰教派（早期基督教的一个派别，其教义是圣灵将再次启示，以弥补基督启示之不足，世界末日之前，基督将再次莅临，作为皇帝统治1000年）。他大肆宣扬禁欲主义，长期与罗马教会相抗衡，至死不愿向教会妥协。

德尔图良一生的著作甚多，而且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据教父学权威米涅（1800—1875）编辑的多卷本巨作《拉丁教父文集》统计，德尔图良名列首位，有两大卷，30篇之多。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护教篇》、《取缔异教徒》、《致各国书》、《论殉教者书》、《论逃避迫害》等。

德尔图良是一个著名基督教护教论者，这不仅表现在他留下的大量的护教论著作中，更重要的体现在他坚强甚至是极端的护教论思想上。针对罗马帝国对早期基督教的镇压政策，德尔图良冒着生命危险从法律的角度向罗马皇帝申诉道：基督教徒是忠诚老实、光明磊落的，传言基督教徒反抗罗马皇帝、危害国家是没有根据的。他们只是信仰上帝，追求真理，别无它求。并"祝愿皇上万寿无疆"、"罗马帝国昌盛"。因此，镇压和杀害基督教徒既毫无道理也无任何作用。他说，"我们遭受杀戮，说明我们得到胜利，我们虽被囚禁，我们却到处遨游"，"我们多次向你们证明，常常向你们预告：基督教的血是种子"，"这就是我们胜利的标志"[1]。为了达到维护基督教的目的，德尔图良提出是否信仰上帝是区分善恶的试金石。他认为，基督教徒都热爱、信仰上帝，因此，他们的一切宗教活动都是在追求至善，而不信仰上帝的人都是在甘心堕落，将来必须要当魔鬼的奴隶。这样，一切

① 德尔图良：《护教篇》第50页。

异教徒都成了德尔图良心目中的头号敌人。对这些异教徒，他恣意谩骂，恶意攻击，称一切异教徒是"敌人魔鬼来撒下的稗子"，作为基督徒，"当前我们的主要活动是反对一切异教徒"。[1] 为此，他告诫各地首脑，要防范异教徒。

德尔图良在阐述维护基督教的思想中，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他的宇宙观。他认为，整个世界的万事万物是上帝在某一起始时间里创造出来的。而在这之前，则是先在基督的第一阶段。到了创造物质世界时，上帝借助"逻各斯"进行万事万物的创造，"圣子"以"圣灵降孕"的办法，借童贞女玛利亚取肉得身而降世成人，使得先在的基督与物质的肉体人类联系起来。德尔图良认为，在上述思想中，并没有物质与上帝同在的意思，因为上帝是脱离了必然的，它具有自由意志，完全没有必要受到物质的限制。所以，上帝从"无"中创造出物质世界。因此，这个世界都是有形的。他说："如果我不糊涂，必须承认一切事物或是物质或是非物质的。就实体而言，有时应当承认存在着一种非物质的东西，即作为某事物的实体本身而言，它是非物质。"但是无论如何，凡是存在的，都是形体。[2] 对非物质，德尔图良也作了论述。他提出："当人们说一种看不见的东西时，已经在结构一种具有看不见特性的物质的东西。如果不存在看不见的东西，怎么能说看不见？反之，如果不存在有条件的东西，则什么都不可能存在。凡是存在的，必然是一个有条件的存在。如果它是一个有条件的存在，则这个存在就是形体。任何存在着，都有自己的物质。如果不存在，也就无所

① 德尔图良：《取缔异教徒》第20—28页，第43—44页。

② 德尔图良：《论灵魂》第7页。

谓非物质。"① 由此可见，在德尔图良看来，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非物质，非物质同样是物质，物质和非物质的区别无非是“粗壮和精细之分”。所以，德尔图良是不承认绝对精神的存在的，并得出了“上帝是一个形体”和“上帝是物质的"② 的结论。

在灵魂问题上，德尔图良用同样的方法，肯定灵魂和物质为形体。他认为：“灵魂是一种看不见的形体”，是“一种极其精细的物质"③。针对柏拉图的灵魂在先论，灵魂轮回论和灵魂不死论等观点，德尔图良认为灵魂和肉体一样是繁殖的。他说：“灵魂和肉体这两个肉体是同时造成的还是有先有后之分？可是，我认为，他们俩是同时受孕、发育、生长的。"④

从德尔图良关于基督教本性论述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德尔图良是一个典型的信仰主义者、蒙昧主义者。他强调信仰，宣扬信抑，断言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从而否定理性，把信仰作为人类思维的惟一方式。在他看来，错误在于理性，事情本是不庸怀疑的，因为理性自身有局恨性。因此，“上帝之子死了，虽然是不合理的，但却是可相信的；埋葬后又复活了，虽然是不可能的，但却是肯定的"⑤。这意味着，人的理性是不可能认识真理的，只有信仰才能把握真理。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将德尔图良的思想实质概括为：“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相信。”德尔图良为了使人们信仰上

① 德尔图良：《论基督的肉体》第 11 页。
② 德尔图良：《反普拉克塞》第 7 页。
③ 德尔图良：《论基督的肉体》第 11 页。
④ 德尔图良：《论灵魂》第 5—9 页。
⑤ 德尔图良：《论基督的肉体》第 5 页。

帝，竭力宣扬知识无用和哲学有害的观点。他说："没有一个人是智者，除非他是信徒。没有一个人是伟大的，除非他是基督徒。"[①] 并称《圣称》是真正的知识，是绝对真理，这真理是门徒们传下来的，门徒是基督传授的，基督是上帝传授的。[②] 异教徒相信世俗知识，追随哲学家，而"哲学家的思想渊源于魔鬼"，"哲学家的学说原来就是魔鬼的理论"[③]。所以，异教徒散布的是异端邪说，必须严加驳斥。由此可见，德尔图良为了维护绝对信仰，从无视理性到抹煞知识，直至最后否定一切哲学学说，这种惟独信仰的思想在西方思想史上是非常独特、罕见的。

（四）奥古斯丁：杰出的教父，宗教哲学的高峰

奥雷勒·奥古斯丁（公元354—430），西欧哲学史上的著名哲学家。出生在罗马帝国所管辖的北非塔加斯特（今阿尔及利亚的苏克阿赫腊斯城），其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而父亲则是一个异教徒。奥古斯丁虽然出生在一个经济条件并不富裕的家庭，但他自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先后学习过算术、文法、诗歌、历史。公元371年，奥古斯丁17岁时，其父去世，在亲戚们的资助下，他来到迦太基城攻读修辞和哲学，学习西塞罗的哲学思想，并根据《圣经》，开始探索罪恶的性质和根源。但由于基督教无法解释邪恶和苦难由何而来，因此，他不相信基督教，参加了摩尼教。经过长达9

① 德尔图良：《取缔异教徒》第33页。
② 参见德尔图良：《取缔异教徒》第37页。
③ 德尔图良：《取缔异教徒》第43页。

年的探索和研究，奥古斯丁发现摩尼教所谓恶的原则纯属无稽之谈，他开始抛弃摩尼教另找其它学说。于是，奥古斯丁来到罗马，招收学生，教授雄辩术；不久又去米兰，与著名教父安布罗西结为朋友。在安布罗西的影响下，奥古斯丁从基督教的思想出发，潜心探索和研究真善美，企图寻找罪恶的根源。在柏拉图思想的影响下，对照《圣经》，奥古斯丁终于抛弃了摩尼教的善恶二元论和学园派怀疑论，认为，上帝是绝对的存在，上帝是至善，上帝是一切善的根源，因此，作为世界万物中的人，必须弃恶从善，信仰上帝，实现真善美。公元 387 年复活节，奥古斯丁与儿子一起接受安布罗西的洗礼，正式加入基督教。他一方面不辞辛苦地宣讲教义，另一方面日以继夜地著书立说，写出《忏悔录》、《上帝之城》、《教父手册》等大量著作，使基督教神学趋于完善和系统化，为基督教理论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被教会称为“伟大的教父”和“上帝的圣者”。

奥古斯丁在神学上的主要贡献是阐述和论证了神学。他的阐发和论证涉及到上帝创世、三位一体、原罪、救赎等一系列神学世界观的基本理论问题。他不仅相信上帝在 6 天之中完成从无到有的创造，[①] 而且利用新柏拉图主义关于“从神流溢一切”的观点论证创世说，认为神包含一切，也产生一切，从神中首先流出的是理念，理念便实在化为万物。他特别强调圣父、圣子、圣灵三位的合一性与平等性，认为在至高的三位一体中，一位等于三位，而且他们本身是无限的。因此，对“三位一体”若不能有理由加以把握，就要用信仰加以拥抱。为了说明人类社会的罪恶来源问题，奥古斯

① 参见奥古斯丁：《教父手册》，《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 219 页。

丁在《忏悔录》中，不惜用自己的经验去论证人类原初就具有一种罪恶的本性。人的罪恶本性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并且人正是在神的感召下，才克服了肉欲和物欲等罪恶，才一心向善的。这样，奥古斯丁不仅达到了贬低人抬高神的目的，而且把宗教教义变成了神学思辩，从而完成了关于创世、三位一体、原罪、赎罪、乃至预定、命定等一套完整的宗教哲学理论的创造。

奥古斯丁的宗教理论，虽然从哲学角度看，有很多内容是荒谬的，但他的这一体系却是“教父哲学”的顶峰，是整个基督教文化的典范，在基督教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特别是，他的丰富思想和理论在不久的欧洲封建社会中立即被封建地主所接受，成为封建主们进行封建统治的精神工具。

第十章

光彩夺目的罗马艺术



- 伊达拉里亚的艺术对罗马艺术的影响
- 建筑艺术
- 雕刻和绘画

艺术是罗马文明百花园中一簇灿烂夺目的花朵。古代罗马的艺术承袭了伊达拉里亚文化的遗产，吸收了希腊文明的成果，在奴隶制社会历史发展中，勇于探索，大胆实践，形成并取得了具有罗马自身特色的成就。罗马艺术是西方古典文明的一块瑰宝，它在建筑、雕刻、绘画及实用美术等方面取得的成果，常常使人惊心动魄，激动不已。这些成就，在欧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一 伊达拉里亚的艺术对罗马艺术的影响

罗马的艺术可以追溯到古代伊达拉里亚的文化传统。在地域上，伊达拉里亚靠罗马最近，并且曾经是罗马的统治者，它的文化影响对罗马早期文明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最初的罗马城，在建筑工程、生产工艺、技术风格以及社会风尚、典章礼仪等方面，无不带有伊达拉里亚的模式和色彩。

伊达拉里亚的生产技术和手工业的兴盛，极大地促进了其艺术的形成和发展，也为罗马人提供了学习伊达拉里亚文化的有利条件。在伊达拉里亚，许多地区临山濒海，人们很早就懂得利用有利地形兴修水库，发展农业，城市建设都具规模。生产的发展使手工业很快兴盛起来，对外贸易中也有了自己的手工产品，金银首饰、铜镜倍受欢迎。另有一些能

工巧匠的技艺绝招，称雄古代世界。罗马人注重向伊达拉里亚人学习，他们用伊达拉里亚人的工艺技术筑建罗马城，许多工农业生产项目也注重以伊达拉里亚工艺技术为基础。特别是伊达拉里亚文化中注重技艺、务求实用、讲求美观的意识和传统，对后来罗马艺术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伊达拉里亚的建筑是在希腊建筑传统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神殿建筑在伊达拉里亚建筑中占重要地位，它和希腊圆柱式建筑不同，一般有很高的地基，按照正面结构建造，即正面是建筑物的狭窄面之一，在正立面装饰着很深的柱廊，其它各面被坚固厚实的墙垣所包围。神殿建筑在用料上多用木材屋檐房顶，外观装饰多用彩色陶瓦和陶像雕刻。神殿中雕塑和绘画装饰多以鲜艳的色彩渲染。需要指出的是，罗马人在吸取和承袭这些建筑技术和风格时，给予完善和发展，以更能体现自己民族的特色。此外，伊达拉里亚的住宅建筑形式也被罗马广泛运用。

与建筑密切相关的伊达拉里亚的壁画也对罗马产生较大影响，这方面的成就，在陵墓壁画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种壁画一般是描绘在潮湿的底色上，所用的大都是黑、白、红和黄色颜料，后来有了天蓝色和绿色，画面的背景一般用白色或浅黄色。绘在墙壁上的图画常采用长卷形式。墙垣上部一般用纹样形式描绘野兽等装饰形体，中间那宽阔的壁面上则描绘中心图案，底下用较窄的饰带或五色条纹加以装饰。这种风格与希腊传统是完全一致的。在内容上，或描绘宴会、男女跳舞场面，或描绘死者肖像，或描写神话故事、渔猎嬉戏，其中运动竞技、角斗士交锋、大出丧场面等最为流行。伊达拉里亚的壁画遗产为罗马所继承，并在运用和发展中形成自己的风格和特色。

雕塑在伊达拉里亚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早在古风时期，赤陶土的彩塑浮雕和雕像就已广泛流行于古代世界，许多建筑物的屋顶上已装饰了浮雕角饰①，在其它建筑物上，也装上了赤陶土的彩塑浮雕和圆雕。公元前6世纪，伊达拉里亚雕塑已达到繁荣时期。再往后，雕塑不仅用作建筑物的装饰，同时也有了肖像雕塑。特别是在基维多里出土的公元前6世纪赤陶土棺椁，构图优美，引人入胜。随着青铜加工技术水平的提高，尺码庞大的雕像也产生了。

二 建筑艺术

从共和国末期，中经奥古斯都时期到帝国初期，随着帝国统治的建立和奴隶制经济的发展，罗马建筑艺术在以前基础上，由逐步成熟达到日益兴旺。和希腊相比，罗马建筑无论在整体规划、结构设计，还是在类型繁多、用途广泛方面，都大大超出了希腊建筑。

（一）共和末期的建筑艺术

这一时期，罗马建筑在设计风格和建筑型制上基本上还是沿用希腊的柱式结构，但也有所发展，具有自己的特色。罗马建筑艺术家对希腊古典时期形成的多利亚、爱奥尼亚和

① 角饰：就是古代柱式建筑物三角形山墙角上，用雕塑等手法进行的装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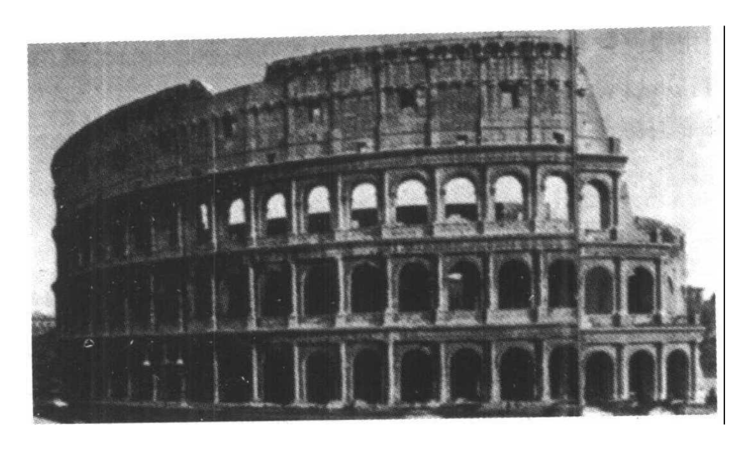
科林斯三大柱式十分崇尚，并且对其掌握运用得相当熟练，而且力求有所发展。

共和末期的罗马建筑艺术，在对希腊建筑艺术创造性的发展中取得的主要成果是神庙的建筑、建筑群的设计和修建以及水泥的使用。这些成就，把罗马文明推向新的高度。

在神庙建筑方面，从现存的共和末期建筑遗迹来看，代表性的神庙类型主要有：建于公元前2世纪末的赫拉克利斯神庙，属多利亚柱式；建于公元前1世纪初的命运女神庙和西比尔女祭司庙，属爱奥尼亚柱式和科林斯柱式。罗马人学习希腊建筑规范的同时也进行了创新，把从伊达拉里亚学来的希腊模式进行了创新改造，它一改过去的“环柱式”，使用了高基座，修建了惟一登临神庙的庙前台阶，更增强了神庙的威严庄重效果。

建筑群体的整体设计是这一时期罗马建筑的重要成就。在希腊，古典时期的建筑虽然成果辉煌，但它并不重视自成一体的设计思想。而罗马建筑则注意了按中轴线设计整个建筑群体系统，从而形成了整体设计的建筑艺术。在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是建于公元前1世纪的帕莱斯特里纳的命运女神圣所。这座宏大的建筑位于罗马东南方向的一个山区小城，按设计要求对整个山丘的坡面进行了改造。它从山下就以并列的两个梯道长廊通向第一平台，这对长廊上有屋顶，两侧有墙，这种封闭式的长廊给人增添了庄严神秘的感觉，走出尽头时顿觉豁然开朗，然后再依次通往各层的阶梯。整个建筑的中心就是以这对长廊尽头交接处为准的，建筑的纵深和高度也以此为中轴线而延伸。阶梯两边展现着各层平台上丰富的建筑内容。帕莱斯特里纳的女神圣所堪称古代世界建筑的杰作，它对后来的罗马建筑产生重大影响。

开创新的建筑类型是这一时期罗马建筑的又一成就。这些建筑类型分为以人们社会生活设施为主的实用性建筑和为帝国政权以及城市公众服务的建筑。前者如道路、桥梁、水道等，后者如著名的凯旋门、会堂、剧场及公共浴场等。特别是后一种类型的建筑，是希腊建筑未曾有的，但罗马人在这类建筑中对希腊的建筑技术和传统工艺的运用，却达到十分广泛和灵活多变的程度。凯旋门是罗马人举行凯旋式庆典活动时在主要通道搭的门。以往一般是木结构搭修的临时性建筑，到共和国末期，才有了砖石修建的永久性凯旋门，后来越修越精美豪华直到用大理石来修建。在用途上，也由原来只供凯旋仪式专用而发展为一种永久性纪念的建筑。帝国初期，凯旋门成为专为皇帝歌功颂德的纪念性建筑，涂上了更加神圣的色彩。这时凯旋门也由原来简单的拱门发展为用柱式、拱券等技术风格来修建和装饰，门道也由过去一道门而发展为中央大门两边两道小门，柱子的数量也有增加，再加上豪华富丽的雕琢装饰，更显庄严、隆重。会堂建筑也属罗马人的创造，这是专供人们聚会论说和法官开庭会商审议的场所。最初为木制结构，共和国末期开始运用柱式体系，并改木柱为石柱。会堂大厅内部是由两列柱子隔成的一个主厅和两个侧厅，主厅两边上方有一层顶阁，光线从两侧窗户射入，使大厅内明光灿亮。厅内四周柱子环绕，两头柱列外有半圆形法官开庭会商之用的耳室。这一创造性建筑对欧洲建筑特别是早期基督教教堂的修建产生了重要影响。罗马的剧场建筑也很有特色。希腊人以山坡地形来修建剧场，以山坡的自然倾斜面来构建观众席，在剧场形式上，一般只是半圆形。罗马剧场建在平地之上，舞台楼阁多层，观众席用多层坡面结构，形式上不仅有半圆，而且有圆形或椭圆形。观



罗马大圆形演技场，上面装饰着三种希腊“柱式”

众容量有的几千人甚至数万人，也有容纳四五万人的角斗场等。整个建筑宏伟壮观，利用层叠的各种柱式和各层列拱互相配合来进行立面设计，并综合运用了希腊的三种柱式，形成独特的建筑风格。在古罗马，像剧场那样供公民群众使用的大型建筑还有浴场，它是由冷、热和温水浴池构成的建筑群，还有会议厅、健身房和图书馆等建筑。浴场也能容纳很多人，是当时公民们的重要活动场所。浴场用砖石结构，一般以圆形为主，屋顶用穹窿圆顶设计。这种建筑到帝国初期有了更大的发展。

共和末期建筑成就的又一发展，是在建筑材料上广泛使用了水泥。那时的水泥是用火山灰拌合的泥浆，实际上是一种天然水泥。火山爆发时产生高压高温，使火山灰经历了一系列物理化学反应，因而具有了现代混凝土那样的性质，起到水泥的作用。这种天然水泥大约起用于公元前 2 世纪，共和末期已相当普遍。许多大型建筑都用这种水泥，相当坚固，且防水作用好。对于罗马建筑复杂多变的结构，可充分

利用水泥的可塑性来完成圆形、曲线、拱券、凹面等建筑结构。可以说，有了水泥，建筑的结构更为精美和完善，为后来帝国初期的建筑发展奠定了更好的基础和条件。

（二）奥古斯都时期的建筑艺术

奥古斯都时期是古代罗马文明极为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杰出的罗马诗人，如维吉尔、贺拉斯和奥维德等，史学也很有成就。以建筑艺术为突出成就的罗马文化，迅速蓬勃发展和繁荣起来。这一时期的建筑工程规模宏大，重建了整个市区，整修或修建了道路、桥梁、引水道，特别是修建了大量神庙、祭坛、广场、剧场等大型建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奥古斯都大会堂、和平祭坛等。

奥古斯都广场是奥古斯都时期卓越的建筑物之一，据说它的修建几乎花了 40 年时间。它是罗马建筑的传统精华和光辉成就，是这一时期建筑艺术的结晶。和此前的共和国广场和凯撒广场相比，奥古斯都广场具有非常庄严的、全国性的意义。广场的整个设计集罗马风格和希腊化特色于一体，充分展现了奥古斯都时期与古典主义艺术有机结合的新成果。这是一个长方形广场，四周由高耸的用凝灰岩和粗面石装饰的墙垣所环绕。围绕着整个广场的是和墙垣内部相衔接的柱廊。庄严的复仇神祇马尔斯·乌尔东神殿座落在广场入口处。神殿那宏大雄伟的规模，豪华壮丽的科林斯柱式结构，精美的装潢与装饰，显示出罗马人杰出的技艺和智慧。罗马帝国灭亡后，奥古斯都广场遭到了严重破坏，当文艺复兴时代人们慕名前往这座神殿时，那里已是断壁残垣、蔓草横生，只有几根神庙廊柱突兀耸立。艺术家们凭这几根精美

壮丽的柱子来窥视整个奥古斯都时代的建筑风貌，并竭力对其研究和学习。奥古斯都广场的建筑风格，后来被罗马城及各行省广泛学习仿效，取得了许多优秀的建筑成果。

这一时期出现的一部完整的建筑理论著作《建筑十书》，从另一侧面反映了奥古斯都时期罗马建筑艺术的成就。这部由维特鲁威所著的建筑学专著，是惟一完整保留下来的西方古典建筑经典。这位生活在奥古斯都时代的建筑学家，曾在凯撒和奥古斯都手下担任军事工程师，他在这部书中表现出来的丰富的学识和对罗马希腊建筑艺术成果的融通概括能力，表明那时罗马已形成了建筑学的基本规范和完整体系。在《建筑十书》中，作者论述了建筑学的基本内涵和基本理论，形成了建筑科学的基本体系；在总结古希腊、罗马建筑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把建筑技术和建筑艺术有机结合起来加以阐述，并提出了"实用、坚固、美观"的设计思想和技术原理。《建筑十书》还结合当时的哲学和科学成就，提出建筑应该奠定在这些科学知识基础之上。他还要求建筑师要德才兼备，要有一定的修养。这部建筑学著作，无论在技术规范，还是在理论原则方面，都对后世人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马尔索沃广场上的和平祭坛建于公元前13—前9年。以往的祭坛大都是建在露天的方形或圆形土台上，以供祭祀时献祭焚烧牲口的股肉之用。有的土台四周围上栏杆，以示庄重。到奥古斯都时代，和平祭台在建筑型制上并无改变，只是把土台、木栏改为大理石。

和平祭坛以方形设计，大理石砌成的墙环绕四周，墙内的方形坛体上安放了祭坛。整个祭坛的四面围墙内外都刻满装饰浮雕，内壁下刻有栏杆，外面墙壁上部刻有人物浮雕，下边刻有花草纹样。和平祭坛的成就不仅在于建筑本身，更

在于建筑的装饰和雕琢，它可以说是当时罗马雕刻艺术的杰作。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外墙上部饰带上所刻划的向祭坛行进的庆祝队列，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在庆祝行列的人物中，有奥古斯都及他的亲属和亲信，还有元老和祭司。墙上浮雕还有许多表现奥古斯都统治下国家兴旺昌盛的内容。分布在墙面上的还有许多植物装饰，这些鲜明优雅的植物装饰，更增强了祭坛建筑的感染力。从造型来看，浮雕作品以严谨求实、简洁明快而取胜。这种形象生动、极富感染力的建筑装饰，在公元1世纪的罗马艺术中广泛流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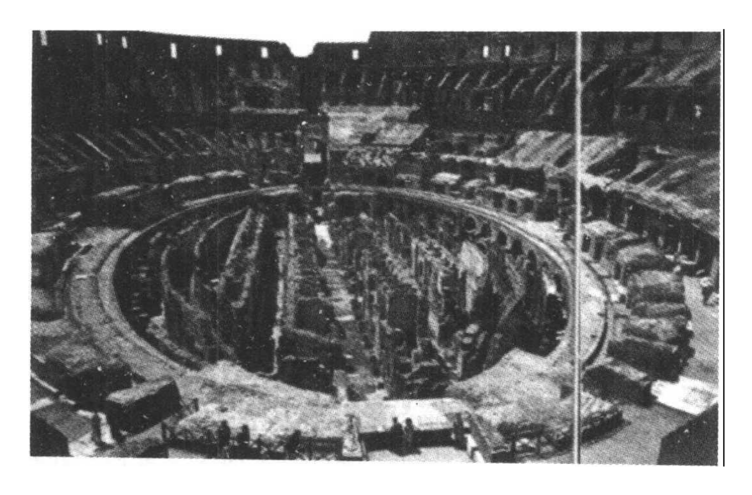
除了以上著名的建筑成就外，这一时期还有能容纳数千观众的马尔采剧场，用假围柱式建造的罗马神殿，还有罗马流行最广的凯旋式建筑。这些建筑充分反映了奥古斯都时期的建筑风格，和前面所述的建筑成就一起，体现了这一时期罗马建筑艺术的创新和发展。

（三）帝国初期的建筑艺术

建筑艺术是罗马文明在帝国初期最辉煌的成果之一。

在奥古斯都时代的基础上，罗马建筑艺术发展进入了空前繁荣时期。这时期，罗马人已经全面吸取和掌握了希腊建筑技术，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和风格。神庙、会堂、宫殿、广场、剧院、浴场、桥梁、水道、城建等方面，都有了前无古人的创新成果，并形成了罗马自己的特色。

帝国初期建筑最杰出的成就，是科洛西姆演技场。这是一座古代世界最宏伟壮观的建筑，它把罗马建筑推向一个最高峰。科洛西姆竞技场在设计和修建上有几个重要特点：一是雄伟高耸，规模宏大，它的外墙高48.5米，和12层高的



罗马大圆形演技场

楼房不相上下，椭圆长 188 米，宽 155 米，中央表演场长 86 米，宽 57 米，可在同时间内让 3000 对角斗士登场竞技，观众席共有 30 多排，可容纳 50000 多观众；二是坚固牢靠，据说场内舞台修建非常精细，以致可以灌水泛舟，表演海战；整个建筑结构用水泥砖石砌成，二层以下采用巨型石柱和石墙，厚达 4 米以上，拱顶部分用水泥和砖，三层往上全用水泥浇铸，表面贴上石板，使整个建筑稳固牢靠，无坚可摧；第三个特点是设计合理，观众出入方便安全，全场有 80 个拱门，一律在底层外圈，专供观众出入，内圈还设有 50 多座大小不等的楼梯，直通各层观众席，使数万观众在很短时间内能够迅速退场。

科洛西姆演技场的椭圆形舞台位于全场中央，周围用墙垣和观众席隔开。演技场周围是逐步增高的用宽敞的通道划分开来的观众席。可容纳数万人的观众席共有四层，第一层是指定给元首、元老及其侍从的，第二层往上依次指定给骑

士、罗马公民，最顶层则是自由人（解放了的奴隶）。这种在剧场里按社会地位和身份来安排座席的做法，在罗马这种奴隶制专制国家里很有代表性。科洛西姆演技场的设计者精心周到的安排，使整个演技场处于十分完整的系统之中。把观众席安排贯通在下面的坚固的拱形回廊上，这些回廊可供观众在下雨时避雨；回廊系统有众多的出入口，可以使观众迅速出入场；在第四层墙垣上，牢固地安装了竖起的杆子，在炎热的夏天可以扯起帐幕，防晒纳凉；在宏伟的建筑物地下室，设有专供角斗士逗留、休息的厅室，还有为在角斗场上伤亡的角斗士安排的房间，也有圈装野兽的笼子。场内的装修也很讲究，一般用大理石镶砌，上面雕琢美丽的花纹，有的地方安放了雕像。

科洛西姆演技场是罗马人运用希腊建筑技术，充分体现罗马建筑成果和特色的代表作。从这座建筑可以看出，罗马人把希腊柱式体系运用得多么精巧娴熟，技术的综合运用能力也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共和末期，罗马人已把拱门和柱式有机地结合起来了，到奥古斯都时代已经十分成熟。科洛西姆演技场已经把这一技法发展到尽善尽美了，四层的庞大结构使希腊三种柱式都有了用武之地。一般来说，第一层用多利亚柱式体现了整个建筑的坚固和朴实；第二层用爱奥尼亚柱式，使其秀美壮观；第三层用科林斯柱式，以见豪华壮丽；第四层则用罗马人喜爱的方倚柱。据有人说，第四层是在全场建筑完工后，在图密善时期增修的，但它和整个建筑十分协调，整体效果非常好。

强调指出的是，科洛西姆演技场用层层柱式分割技术来建筑巨大的立面，使连续拱券和柱式结合达到十分完美的境地。在那样宏大的建筑物里，一层层数百个拱门，如果不用

多种柱式进行框边装饰，对于当时深受希腊古典文明影响的罗马人来说，无论在人文精神和审美情趣上，都是难以接受的。采用柱式分割，可以把庞大的建筑由大划小，使其庞大笨拙的一面顿时变得小巧精美，充分展示立面效果。由于整个建筑把拱券和柱式分割有机结合起来，因而这一宏伟建筑物的立面结构特征使人一目了然。这座建筑在建筑结构和技术处理上的和谐一致，使它成为罗马建筑的杰出典范。

除了科洛西姆演技场这样杰出的建筑外，还有建于奥古斯都广场以南的和平广场、罗马广场上建立的凯旋门、图密善在巴拉丁山上修建的皇宫以及一些规模宏大的引水工程等。到安敦尼王朝的图拉真、哈德良时期，罗马的建筑艺术和工程技术都达到罗马文明的最高水平。在建筑成果上，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是图拉真广场、万神殿和哈德良别墅。

图拉真广场是和古代罗马最杰出的建筑师之一阿坡洛陀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阿坡洛陀是生于西西里的希腊人，曾受到东方良好的教育，他对建筑学颇有研究，写过两篇建筑方面的论文，也充任过图拉真的公职建筑师和工程师。图拉真广场及广场上的全部建筑都是由阿坡洛陀设计和建造的。这座被称为帝国时期最宏伟、豪华的广场之一的建筑，长达300米，宽200米。雄伟耸立于广场的图拉真纪念柱，高达38米。如此庞大规模的广场，这样浩大的工程，不要说在古代世界里令人叹为观止，就是在现代也是很大的建筑工程了。图拉真广场的入口处是一座凯旋门，后面有一个很大的三边绕以柱廊的庭院，庭院正中竖立着一座图拉真的青铜骑马雕像，柱廊后边的侧墙构成了两个半圆形。广场外墙的左后还设有一些街道店铺，使广场、会场和市民的商业活动融为一体。广场上有两座图书馆，存放着丰富的拉丁文和希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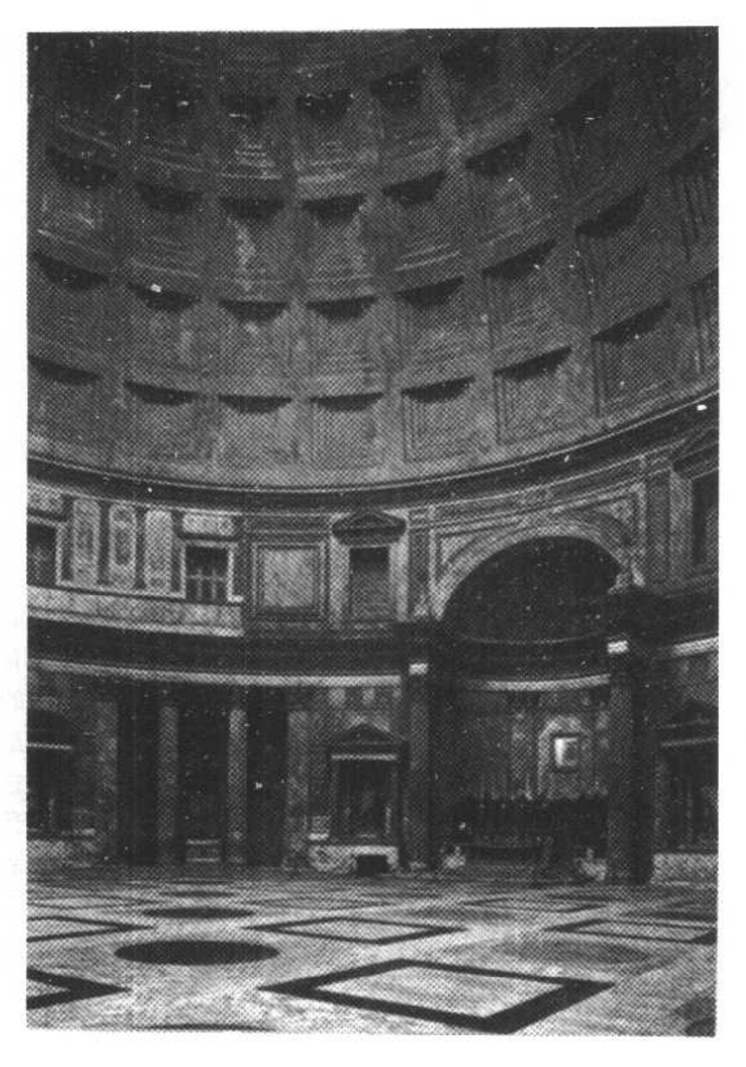
文图书。两座图书馆之间，是著名的图拉真纪念柱，上有表现图拉真事迹的浮雕。在图拉真死后，哈德良在广场深处为他修建了神庙，以纪念和奉祀图拉真。

图拉真广场实为古代罗马伟大不朽的辉煌杰作，它那高超的设计水平，虚实结合、层次分明的造型，功能齐全的设施和举世罕见的建筑和装饰艺术，令世人惊叹不已。据史书记载，君士坦丁皇帝参观图拉真广场：当他走进图拉真广场时，立即下马驻足，惊叹不已。这个建筑，在他看来，实属天下独一无二的奇迹，只有蒙受神明之助才能完工，因为它的宏伟复杂实非言语所能形容，也绝非凡人能够再作同样尝试的。① 图拉真广场无论在建筑史上还是在罗马文明史上，都是成就卓著、影响深远的伟大成果。

万神殿也是帝国时代的另一著名建筑，它开创了神殿建筑的新典范。与一般神殿只供奉一位或两三位神祇的情况不同，万神殿是供奉众神的神庙。万神殿在设计思想上有很大的创新。以前罗马神庙建筑主要是围柱式建筑型制的变体，通常用假围柱式与单翼围柱式建筑。而万神殿的设计则要求宽敞的内部空间应在一个纪念性神庙建筑的形象结构中发挥主要作用。万神殿的外型是一座大穹顶结构的圆形建筑物，外观上追求简明单纯，以求壮丽动人。在大穹顶下的神殿内部，有广阔的空间，它和整个建筑造型和庞大规模十分和谐。在穹顶中央开有一个很大的圆窟窿，不仅为宽广的空间采光，而且使殿内的人随时可以看到美丽的天空。万神殿的结构完美，比例协调，色调鲜明，圆形建筑物上面平鼓状屋顶，分三层设计修建，以解决建筑物的重心关系。整个建筑

---

① 埃米安卢斯·马赛林卢斯：《罗马史》，第16卷，第10章，第15节。



罗马万神殿内部

充分发挥了水泥、砖和混凝土结构的优点，使高大宏伟的建筑物坚强牢固。神殿内部，使用大理石镶砌与装饰，庄严美观。

万神殿的完美结构和高超的技巧，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在建筑艺术史上，它一直是穹窿屋顶的宏伟建筑物完美的典范之一，也是解决建筑中具有宽广内部空间这一难点的范例。它被历代建筑家纷纷效仿。文艺复兴后，万神殿更加频繁地被西方建筑界所研究效仿，万神殿所表现出来的不仅是建筑技术上的成就，而且是建筑学理论上的创新，对后世的影响是无比深远的。

帝国初期建筑成就的又一代表是哈德良别墅。它实际是哈德良的一座行宫，其建筑特色以园林风格为主调，加以错落有致的馆阁场所，与优美的自然风光融为一体，成为极富特色的园中园。哈德良别墅不仅有优美的自然景观，而且有浓厚的人文主义气息。哈德良把他所崇拜的希腊文明中心能工巧匠及其文化事迹，通过模拟，重现于人们面前。那里有亚里士多德讲学的健身堂，柏拉图授课的学园，斯多噶派的画廊和雅典议会主席团大厅等。别墅内的建筑物很多，但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位于整个园林西北角的黄金广场廊亭、建于别墅中心的海岛别庄和卡诺普斯的柱廊。这些建筑，设计新颖，极富特色，在建筑技艺上，讲求精细，往往出奇制胜，感人至深。

帝国初期繁荣的建筑艺术，随着后来罗马奴隶社会的危机而逐步衰落。

三　雕刻和绘画

和建筑艺术相联系，罗马雕刻和绘画艺术也取得了辉煌的成果。

古代罗马人最初接触雕刻艺术的时候，这门艺术已经在地中海各地成为一种普遍的艺术形式了。希腊人很早就从埃及人那里学会了雕刻艺术，并在埃及人启发下，学会了用雕作工具创作石雕艺术。罗马人征服地中海地区后，才真正打开了眼界，认识到卓越的希腊雕刻艺术在罗马的适应性。特别是希腊真实地再现当时发生的事件的记实手法和普通人像的写实雕刻法，迅速在罗马发展起来。

（一）共和末期的雕刻绘画艺术

在共和末期，罗马雕刻艺术主要表现在叙事浮雕和肖像制作两个方面。希腊浮雕艺术注重塑造人物形象、布局合理有序的特点，给罗马艺术家以很大影响。罗马浮雕保持了叙事浮雕固有的特色，同时体现了罗马人求实质朴、认真务实的精神。现藏于巴黎卢浮宫的多密图斯·阿享诺巴尔布斯祭台浮雕，详细地描述了罗马公民应征入伍和献祭送行的情景，其中对从报名应征、审查户籍到入伍编队、奔赴疆场的每一细节都进行了细致的刻画，画面层次分明，人物形象完美，动作生动优美，具有极大的感染力。这一时期的肖像雕刻也有非常优秀的成果。罗马雕像的出现是和殡葬仪式密切

相连的。罗马人崇拜自己的祖先，有保存前人遗容的习俗。他们用腊在死者脸上拓出遗容脸型，把它和灶神等家神同样供奉。这一习俗，是促使肖像产生的主要动力之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罗马肖像才具有特别的意义，并逐渐发展为一种影响深远的艺术形式。在罗马雕刻这一艺术宝库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些饱经风霜、精神坚毅、满面皱纹、深颊完额的老人肖像，也可以看到通过理想化、性格化加工的著名人物的雕像佳作。庞培、西塞罗、凯撒等人的肖像就属于这一类。他们不仅真实地模刻本人相貌，而且着重表现人物的地位、权势，因而具有重要的宣传意义和象征作用。在这方面，凯撒的雕像表现得尤为典型。掌握大权之前的凯撒肖像，一般着重表现他那顽强奋斗、勇往直前的豪壮气慨，描画他智慧超人、勇敢顽强的政治家形象，这时的肖像侧重于从人物的面孔上表现人的性格和精神，具有较强的客观写实性。但当凯撒独掌大权后，他的肖像特征就有了很大变化，原来的面孔上增加了许多带有帝王光辉的描写，那盛气凌人、君临一切的神圣气派，那历代帝王共有的光荣自豪、脱俗超人的性格气质在雕像创作中表现得惟妙惟肖。

这一时期，还产生了许多具有深刻艺术表现力的肖像雕刻作品。罗马音乐宫的《布鲁斯特》青铜雕像，提供了用肖像揭示人物性格的典范。这件青铜胸像雕刻，把共和时期罗马人严肃、坚定的性格形象鲜明地表现出来了。奠酒祭神的罗马人雕像，穿着又宽又长的衣袍，盖头裹住了头部，刮得干干净净的脸部和头部，充分表现了祭神祈祷者超常的注意力和虔诚地执行传统宗教仪式的情景。创作于公元前 2 世纪的《演说家》青铜雕像，右手挥向听众，脸部、服装、鞋子等个性特征，都刻画得精细入微。在这许多作品中，藏于罗

马特尔美博物馆的《角斗士青铜像》和藏于梵帝冈博物馆的《赫提克利斯》残雕，更有典型的代表性。《角斗士青铜像》表现一位罗马生活中常见的那种饱受苦难但仍结实健壮的奴隶形象。作品把角斗士五官粗陋、筋骨强健、满脸胡须、骨肉坚强的形象描写得入骨三分，特别是对其身上的累累伤疤、道道汗痕血迹、深凹的眼睛和临战前侧面张望、忙里偷闲的情景刻画得十分真实生动。《赫拉克利斯》残雕是罗马艺术史上一件著名的艺术遗物，它只有一段身躯和半支残腿，从这残留的部分看，它对人物肌肤筋骨的起伏明暗描写得非常绝妙。这些肖像雕刻无论在艺术手法和表现风格上，都充分显示了罗马人坚定开阔的精神面貌，标志着共和末期罗马雕刻艺术的发展和新的成就。

共和末期的绘画艺术主要体现在壁画方面，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著名的庞贝壁画。在庞贝城曾出现的绘制在墙壁上和天花板上的图画，是罗马古代绘画艺术的一个突出表现。公元79年，庞贝城由于维苏威火山爆发而被吞没，有幸的是那里的许多壁画被完好地保存下来了。19世纪末叶，学术界把庞贝壁画分为四种风格，这些风格基本上是按建起先后划分的，但也有一定交叉和历史联系。从历史进程看，公元前2世纪与公元前1世纪的共和国时期，是第一种和第二种风格发展的时期。这两种风格无论在内容还是表现形式上，都具有很大的差别性。

第一种风格，称为镶嵌风格或贴面风格。严格地说，它并不是绘画艺术，而是一种彩色墙面装饰。它是用色彩在墙上画出大理石的镶板贴面，可以说是对有色大理石砌成的墙垣的仿模。这种风格壁画上的色彩通常用暗红色、黄色、白色和黑色，主要突出色调的单纯和强烈。壁画上涂上颜色的

灰泥，由许多层组成，最后面是细微的粒子。这种风格的壁画大都出现在邸宅中。

第二种风格实际上是一种建筑风格。它的主要特点是用古典柱廊结构做画框，来分割墙面，然后在框内空间里绘出人物形象、亭台楼阁、宗教仪式、喜庆典礼等图案，因而具有更多的空间感。这种风格的壁画往往在墙垣的中央画上形体庞大的场面，其中大部分取材于神话。那里许多别墅、邸宅中的壁画，是保存下来的第二种风格壁画的优秀典范。特别是庞贝“秘密祭别墅”的壁画，在第二种风格的壁画及整个古代壁画艺术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是在一座宽大别墅的房间墙壁上绘制的图画，墙的上、下部是建筑装饰画面，其余的空间里画满了人物和活动。暗红色的背景，描绘出画面人物的庞大形体，鲜明的色彩、优美准确的轮廓比例，显示出这一壁画已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许多场面逼真有趣，动人心目。你看那位被拷问的年轻妇女，从姿势、神情，到蓬乱的头发，充分表现了受难妇人的痛苦形象。可是，另一幅画面却把人引入另一个天地，让你获得新的感受。跳着舞的年轻妇女，正在向酒神献祭，那漂亮的人物形体，虚实结合的线条，穿着飘动的黄红斗篷以及纵酒狂欢的神态，使人不得不对壁画创作者的艺术功力赞叹叫绝。

罗马雕刻艺术在奥古斯都时期有了较大发展，其代表作品首推和平祭坛浮雕。从这里可以看出，罗马雕刻在表现手法上已有创新。它一改过去追求原本的自然主义手法，而提倡在写实基础上加工和描写，这无疑为后来罗马雕刻艺术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安放在和平祭坛大门两边的神话和寓言浮雕，大都损失，只留存下来一块完整的作品。它表现一位女神。怀里抱着两个婴儿，代表海风和陆风的神灵绘在两

边。这位丰满健美的女神形象庄严典雅，被认为是罗马艺术中塑造的女性形象中最美的一幅作品。整个画面构图讲究，布局合理。祭坛外墙下边刻有许多花草浮雕，以显示和平祭坛将给人们带来生机和兴旺。



奥古斯都大理石雕像

提图斯凯旋门上的浮雕也颇壮观。在一块高24米的浮雕板上刻着皇帝在四马战车上凯旋的情景，皇帝身后是胜利女神，整个作品主题醒目，内容突出。浮雕上还刻画了战斗胜利归来的军队，画面上的人物从纵深处，朝不同方向行进，给人以真实生动的空间感和生动感。

人物雕像方面的成就更为突出。维铁里乌斯肖像，把一个妄自尊大、沾沾自喜的元首形象鲜明地表现出来。而维斯帕西亚努斯肖像，则塑造了另一个务实、执拗、幽默的元首风貌。特别是那幅梳着时髦的卷发的罗马妇女肖像，从现实主义出发，着重于表现人物性格——一位罗马高门淑女高傲自信的外表，显示出其内心世界的冷酷和利己主义性格。她的复杂的发型和面部高雅的风度，把这一人物特征表现得完美无缺。

绘画艺术在这一时期的主要贡献是促进了第三种壁画风

格的形成和发展。第三种风格也可以说就是装饰风格，它是冷静与华贵的有机结合，清雅纤巧、细中求精的表现。这种风格的壁画，加强了墙垣的平面性，把它用最精细的装饰纹样装饰起来。在装饰纹样间还有精巧华贵的柱子，活像金属的枝形烛台。第三种壁画风格一般在画面中间以浅色强光突现一幅纤巧精细的画，内容有描写神话故事的，也有描写山水风景的。这种画往往有梦幻般的效果，画中湖光山色、亭台仙阁若明若暗，好似海市蜃楼；那建筑物上蕴缀的光芒四射的珠宝花环，尽现荣光豪华气魄。

除了壁画成就处，还有一些架上绘画，其中最主要是肖像画。但是，罗马的肖像画几乎没有保存下来。

（二）雕刻、绘画艺术的辉煌时代

帝国初期的繁荣昌盛，给罗马雕刻和绘画艺术也带来了一个辉煌的时代。

最具代表性的《拉奥孔群像》被誉为古典雕刻艺术的杰作。可是，过去学术界一直为这一作品创作年代而各持一端，有认为产生于希腊时代的，有认为出于罗马头几朝皇帝统治时代。总的倾向是把它归入希腊艺术之列。这种情况终于在 1957 年从罗马以南的斯柏隆加发现的提比略别墅雕刻中，才见端倪。后来的研究证明，《拉奥孔群像》是提比略时代的作品，应是在罗马工作的希腊艺术家在罗马精神和艺术风格影响下刻作的作品，因而当属罗马艺术范畴。

《拉奥孔群像》描写的是特洛伊城祭司拉奥孔和他的两个儿子被大蟒吞食的故事。诗人维吉尔曾在《伊尼阿特》中对其做了详细生动的描述。拉奥孔的遭难和悲剧实际上反映



拉奥孔群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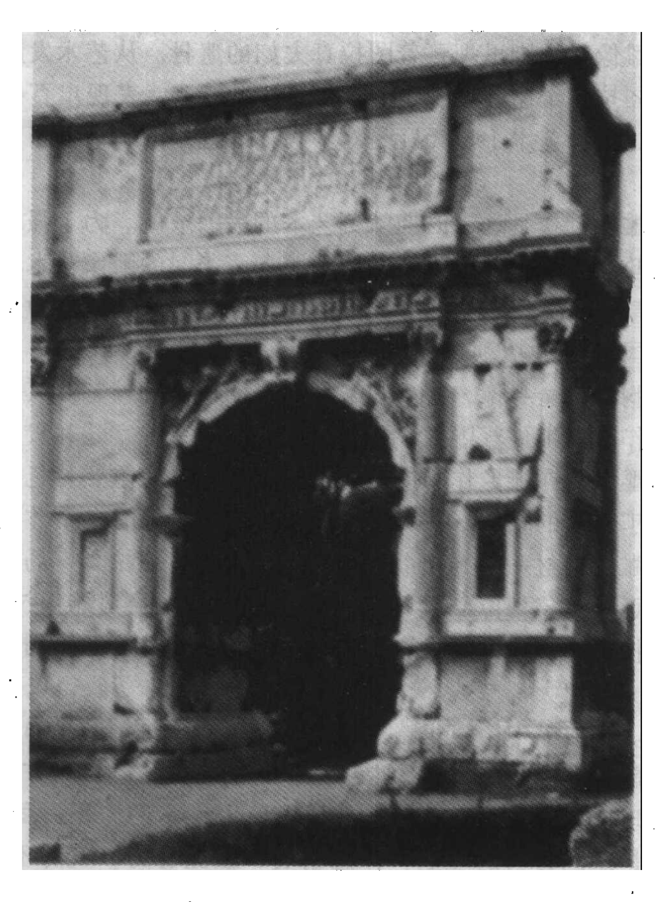
了绝大多数英勇正直的特洛伊人的悲剧。由于这一故事有声有色，动人心弦，因而给罗马人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用雕刻这种艺术形式来创作《拉奥孔群像》。这一古典名作在艺术上最为突出的成就，是用完美的艺术技巧表现了人物的感情和动感。它的细微、深沉、生动的描写，丰富的感情是其它古典作品无法比拟的。迟轲在《西方美术史话》中，对《拉奥孔群像》的艺术特色进行了细致的描写。父亲拉奥孔被蛇咬伤后，不顾巨蟒缠绕，继续奋力拼搏，身边的小儿子已被蛇缠窒息，即将气绝命断，周围的人无不同情和惋惜，他右边的大儿子尚未遭蛇咬，人们怕他又遭蛇咬，担

心他能否趁机逃脱。[①] 这种人情人理，生动感人的艺术创造，标志着罗马雕刻艺术在帝国时代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在这一代表性杰作的带动之下，帝国初期的雕刻艺术朝着情态丰富、技艺精湛的方向继续向前发展。

帝国初期的浮雕艺术十分繁荣，而且成就卓著。这时的浮雕尽管内容丰富，异彩纷呈，但仍然是建立在奥古斯都时代浮雕艺术基础之上的。从提图斯到图拉真的几十年间，是帝国初期罗马浮雕创作的黄金年代。那些直接为宣扬皇帝服务的规模宏大的建筑上的纪念浮雕，如提图斯凯旋门上的浮雕，图拉真凯旋门以及图拉真广场纪念柱上的浮雕，把罗马浮雕艺术推向高峰。

提图斯凯旋门是为纪念皇帝镇压耶路撒冷的犹太起义而修建的，位于罗马广场东南角。浮雕的主要内容是以提图斯平息叛乱、胜利回朝举行凯旋式为题材，中心画面是表现皇帝一身荣光驾车入城的情景和凯旋式中展示战利品的队伍行列。作品动态鲜明，布局设置井然有序。特别是浮雕平面上凭艺术技艺精心设计而获得的空间效果，对罗马浮雕艺术发展具有一定创新意义。图拉真建于本内文托的凯旋门是以表现他的和平政绩为目的的。它上面的浮雕作品不像过去那种专表皇帝军功武威那样荣耀辉煌题材，而主要表现内政外交方面的事务。图拉真广场上的著名建筑——图拉真纪念柱上的浮雕，是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佳作。图拉真纪念柱通体环绕着由22个圈组成的浮雕带，呈螺旋状自下而上遍布柱身。这个用圆形大理石块构成的圆柱，耸立在一个方形的基座上，柱身上浮雕总长200米左右，浮雕上出现的人物约

① 迟轲：《西方美术史话》，第44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



提图斯凯旋门

2500多个，表现了155个场面和情节。图拉真时而对官兵动员演说、时而召开军事会议的情景，人们献祭敬神、欢呼雀跃、庆祝胜利的场面，以及士兵们修筑工事、严阵以待或冲向敌人烧杀掠夺等场面和情节，无不尽现其上。图拉真纪念柱内部是空心构造，圆柱内有螺旋式梯子，柱头上安放着图

拉真雕像，柱脚里埋藏着图拉真夫妇的遗骨。从艺术发展来看，图拉真纪念柱在长达200米的浮雕带上，表现出百余个场面，这种艺术手法无疑是对罗马浮雕艺术的一个创新和发展。

雕像创作是这一时期雕刻艺术的另一成就。为了强化对帝国政治的宣传，为皇帝的统治服务，当时的雕像艺术着重制作皇帝肖像以及宫廷贵族们的雕像。在内容上，多为皇帝和帝国统治歌功颂德，增光添彩；从形式上看，主要有头像、胸像、全身像，并反映各种各样的装束和神态。其中优秀的作品如韦伯芗雕像、图拉真雕像以及一些宫廷和贵族妇女的雕像。在雕像作品中，青铜骑马像也具有重要特色。这种源于希腊的艺术形式，到罗马帝国时期，只有皇帝才能享有。雕像用材一般选用最珍贵的镀金青铜。图拉真广场上的图拉真青铜骑马像，就属于这种情况。青铜骑马雕像技艺，在图拉真、哈德良时代达到高峰，各朝皇帝雕制的骑马像数量不少，但大都被毁坏，只有马可·奥里略骑马像得以保存下来。在作品中，奥里略端坐在马鞍上，行进中的马昂头阔步，前蹄高扬，奥里略紧握缰绳，抬头挺胸，凝视远方，充分表现出皇帝坚毅、自信的气质和帝国盛世的太平和稳定。特别是那匹骏马的雕制，体态精美，强健有力，气势不凡，艺术家借马而喻人的用心表现得淋漓尽致。

帝国初期的罗马绘画，主要是形成和发展了庞贝壁画的第四种风格。它的特点是把前三种风格中贴面、建筑、装饰的特征结合起来，而形成的一种综合风格。这一时期，尼禄统治下的罗马为新的壁画创作提供了足够的用武之地，金屋皇宫等宏大豪华的建筑，使艺术家又可以大展宏图，尽现其能。但尼禄金屋的壁画大都残破，只有少数残迹留存，仅此

残迹，也使后人欣赏赞叹不已。庞贝壁画第四种风格的代表性作品可推庞贝城中的维蒂家宅。这位被释放的奴隶，因经营印染业而暴富。在他的住宅里，厅堂墙垣上布满了新风格的壁画，有的房间里绘制得富丽豪华，十分动人。这些画面一般分为许多方框，以深红宽带为边。中央大框和两旁及上部的框边内，都绘制着精美而丰富生动的画面，给人以四壁生辉、奇突变幻的感觉。特别是在许多厅堂壁画上，沿小框或画面空白处，描绘了一些能反映出宅主职业和社会生活中百业劳作的图画，从工商业到农业加工，甚至连印染纺织、金属加工、栽花植树、酿酒榨油、制砖造瓦等具体劳动场面，都一一绘入壁画中，使整个房间的画面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三）丰富多彩的实用美术

由绘画雕刻向实用美术的发展，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随着社会进步和各种艺术形式的发展，罗马实用美术日渐繁荣起来。

罗马实用美术在内容和形式上十分丰富。罗马人在希腊影响下，用罗马题材创作了许多宝石雕刻作品，帝王雕像和礼拜情景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这些艺术家采用缠丝玛瑙，巧妙地雕出神像和统治者的肖像。他们还把这些技术工艺用在制做货币用的模子或印章上，其中统治者的半身雕像刻在货币的正面上，成为古代罗马帝王和帝国政府同广大民众进行直接沟通的一种工具和纽带。

珠宝饰物是艺术家和工匠们忙于生产的饰物。这类饰物如王冠、耳环、项链、头盔、手镯、指环等，是通过雕刻、

铸造、制模、小锤敲打等工艺制成的。用金、银材料制作的饰物，是妇女十分喜欢的装饰品，后来人们对玻璃和彩石很感兴趣，接着就出现了用这些材料设计制作新颖别致的工艺品。除了为普通公民设计制作工艺品外，罗马艺术家还专为宫廷和私人住宅内制作了大量精美的工艺品。那些用木头、青铜、象牙制作的家具和工艺品，大部分已经腐烂、熔毁了，只有花园中用大理石雕作的座、桌、几等，顽强地抵挡着风雨侵蚀。



罗马宝石雕像

以玻璃为原料的工艺品在罗马也很兴盛。以前，人们制作玻璃容器的方法还很落后，一般采取冷切割、压模或在砂

芯周围灌入玻璃熔液成型等方法，不仅费力而且产品笨拙。公元前50年左右，罗马的叙利亚人发明了玻璃吹制成型艺术，从此，带来了玻璃器皿生产工艺的变革。玻璃不仅可以按人的需要直接吹制成型，而且能以熔接技术添加把手、底环等，并通过雕刻、绘画、加工，增加精美的装饰。在这种工艺基础上，还发明了一种更为奇特的技术，它把不透明的白色玻璃加热后压贴在彩色玻璃上，再用雕刻方法切去白色玻璃，使它成为宝石般的装饰品，看起来十分秀丽动人。

金属釉陶器皿在罗马也迅速地流行起来。在金、银、青铜器皿中，银制器皿比较流行，而且一般都是由技艺高超的艺术家精工制做，因而备受珍重。那些银制餐具如杯子、碗、长柄勺和盘、壶等，往往是人们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在制作工艺上，通常采用锤打、雕刻及涂金的方法，并用“敲花细工”即从反面推出花样的方法，使器皿表面呈现出精致的花纹和人像浮雕等装饰。这些银器上的装饰图案，在内容上有以罗马神灵和人物为题材的，也有许多是与希腊有联系的。这类银器上大都标有重量。庞贝城周围及古罗马不列颠沙福克地区的米尔顿赫都发现了这类艺术珍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富有的罗马人已经普遍使用贵重金属或玻璃精工制作的餐具、器皿，过去那种古朴廉价的陶制品在他们心目中越来越显得不重要了。许多富人对贵重金属餐具的需求日益增加，而工艺卓著的艺术家们用陶土原料制作的餐具则备受冷落。可是那些优秀陶器特别是制作精巧、造型优美的釉陶器皿，仍然广泛使用和流行。其中东地中海地区更喜爱的红色釉陶，对后来的发展更有意义。彩釉器皿上一般都仿制金属器皿上的人像浮雕或其它装饰，这种工艺以“麦加拉”碗而达高峰。碗上精致地雕绘着希腊神话和戏剧，

这类红色彩釉和优美浮雕，成为罗马釉陶精品的重要特征。在它的影响下，意大利、小亚细亚、高卢（法兰西）等地陆续开始仿制这种彩釉器皿，并逐步在各行省普及开来。这种工艺到后来有了一定的创新和发展，以至在小亚细亚、意大利和高卢等地相继出现了涂有真正浅绿色和淡黄色彩釉的器皿。

除此之外，罗马工匠们还制作了许多满足人们生活、生产的工艺器具。农具、兵器、甲胄、马饰、医疗器具、锁子、炊具和家庭用具等等，都充分体现了罗马人特有的造型艺术和工艺水平。特别是罗马骑兵阅兵式时戴的头盔，造型漂亮，工艺精湛。图案精美雅致、品种丰富多彩的纺织品在罗马也很盛行。亚麻织品、羊毛、驼毛等纺织品的编织方式、刺绣和绘画等手法，都标志着罗马实用美术发展到一个更新更高的水平。

后记

本书着重从西方文明的源头上来展示人类怎么样从原始的野蛮蒙昧时代，从封闭、孤立和分散的状态，走向文明、开放、联系的转变过程。

从古希腊神话那个奇幻迷蒙里走出来的人类始祖，所经历的每一个进步都是那样的艰难。然而，它的每一步又无不给后人以莫大的启示。当我们打开欧洲古典时代的文明画卷，无不给人以心灵上的巨大震撼。从欧洲文明前夜里那攀树的猿群到原始文化，从古希腊文明的曙光到欧洲文明源头上熊熊燃烧的火炬，从童年时期的哲学到古典盛期的智慧之光，从古希腊文明的成就到繁荣的古罗马科学文化，从刀光剑影的古代战场，到那些伟大战争引起的社会变革对欧洲古老文明的作用，那古代科技、工业、农业、医学、哲学、宗教、文学、史学、法学、建筑、艺术等，如同人类早期知识宝库里金光闪耀的瑰宝，使你不能不感到人类创造力的伟大，不能不为它而激动不已，更不能不在它们的影响和启示下，增强对中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坚定信心和

无穷力量。

因著者才识疏浅，很难将欧洲文明源头上那无穷的瑰宝完全奉献给读者，即使已成书的许多内容，也不尽完善，疏漏错误在所难免，诚望读者指教。

本丛书主编，北京大学教授易杰雄先生给了著者很大的指导和帮助，并对书稿进行了一些修改，没有他的指导，要顺利完成本书的写作也是不容易的。

本书吸收了中外学者在古希腊罗马研究方面的优秀成果，在此，对这些前辈、学者深表感谢！

在成书过程中，席成效同志搜集整理了部分资料，王吉平同志也做了一定的工作，翟新明同志做了后几章文稿的校对工作。对他们的劳动和帮助，我表示诚挚的谢意。

还要指出，我爱人谢菊兰同志在工作之余不仅承担了大量的家务，而且抽空进行了全书的文字处理工作，对她的辛勤劳动和奉献精神，我也深表感谢和敬意！

叶孟理
1999 年 8 月

附录：参考书目

1.《世界史》，崔连仲主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希腊罗马美术》，［苏］科尔宾斯基等著，严摩罕译，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版。

3.《世界各国神话与传说》，卡洛斯·纳达尔·加亚编、齐明山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4.《哲学的童年》，杨适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5.《外国文学史》，朱维之，赵澧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6.《世界上古史》，刘家和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7.《古代罗马史》，科瓦略夫著，王以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

8.《原始文化》，［英］爱德华·泰勒著，连树声译，上海文艺出版，1992年版。

9.《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关系》［英］W·C丹皮尔著，李珩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

10.《西方美术史纲》，李浴编著，辽宁美术出版社，1980年版。

11.《世界史》（上）［美］海斯、穆德、韦兰著，中央民族学院研究室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

12.《世界文化史知识》，季羡林、周一良、张芝联主

编，辽宁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3.**《自然科学发展简史》**，潘永祥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14.**《原始宗教》**，朱天顺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15.**《古希腊史》**，B·C塞尔格耶夫著，缪灵珠译，高等教育出版，1955年版。

16.**《神话与民族精神》**，谢选骏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17.**《世界科学技术史》**，王鸿生编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8.**《西方著名哲学家传略》**，王树人、余丽嫦、侯鸿勋等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9.**《罗马艺术鉴赏》**，［意］麦克尔姆·科利奇著，曹吉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20.**《欧洲文学史》（上）**，杨周翰、吴达元、赵萝蕤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21.**《古代罗马奴隶起义》**，易水编写，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22.**《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分部》**，林志纯编，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23.**《荷马和‘荷马史诗’》**陈洪文编，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

24.**《外国文学作品选》**，第一卷，周煦良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25.**《古代埃及艺术》**，刘汝醴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

26.《希腊城邦制度》顾准编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27.《基督教的起源》，［英］罗伯逊著，宋桂煌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

28.《世界文明史纲要》，郭圣铭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29.《希腊艺术鉴赏》，［意］弗拉维奥·孔蒂著，陈卫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30.《古希腊戏剧史》，［苏］谢·伊·拉齐克，俞久洪、臧传真译，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31.《古代雅典民主政治》，任寅虎、张振宝编写，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32.《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法学编辑部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33.《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一卷，叶秀山、博乐安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4.《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叶秀山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

35.《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叶秀山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6.《西方法律思想史》，张宏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37.《罗马法》，周枬　吴文翰　谢邦宇编写，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

38.《外国法制史》，陈盛清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39.《世界各民族历史上的宗教》，［苏］谢·亚·托卡列

夫著，魏庆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40.《**琉善哲学文选**》，琉善著 罗念生 陈洪文 王涣生 冯文华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41.《**希腊悲剧故事集**》，丘尔契改写 施咸荣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版。

42.《**外国史学史纲要**》夏祖恩编著，鹭江出版社，1993年版。

43.《**西方史学史纲**》宋瑞芝等主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44.《**西方史学概要**》郭圣明编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45.《**外国史学名著评介**》（第一卷）刘明翰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46.《**外国文学教学参考资料**》，华东六省一市二十院校，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47.《**罗马文化与古典传统**》，朱龙华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8.《**西方哲学史**》，（上册）全增嘏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9.《**欧洲哲学通史**》，（上卷）冒从虎 王勤田 张庆荣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50.《**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二卷）叶秀山 傅乐安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51.《**世界历史**》，（上古部分）朱龙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52.《**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53.《古希腊哲学》，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

54.《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 年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 欧洲文明的源头
作者=叶孟理
页数=417
SS号=10229229
出版日期=